

中共台前县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 台前红色记忆

(第三辑)



中共台前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台前县地方史志编纂中心 编

中共台前县革命历史资料丛书

# 台前红色记忆

(第三辑)

中共台前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台前县地方史志编纂中心 编



# 编 审 委 员 会

顾 问 常奇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县委书记）

主 任 王俊海（县委副书记  
县人民政府县长）

副 主 任 李志华（县委副书记）  
刘 锐（县委常委 常务副县长）  
郭炳申（县委常委 组织部长）  
成永飞（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  
王小鹏（县委常委 办公室主任）  
魏剑锋（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田开沐

副 主 编 钱登文 杜贵华 徐柱玲

编 辑 崔秀云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

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1987年2月18日）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我们要运用它们来经常教育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断增强大家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自觉性，提高大家驾驭全局和处理各种复杂事务的本领。

江泽民：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史工作是关系党的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放弃或放松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将会犯历史性错误。各级党委要继续把党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努力为做好党史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胡锦涛：1994年11月21日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和中共党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议上的讲话

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习近平：2019年9月29日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

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台前故事

常志记

## 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河南时强调，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员干部要多学党史、新中国史，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常学常新，不断感悟，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的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讲好四个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满载台前这块红色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台前红色记忆》（第三辑）即将付梓，在此，谨向长期以来为我县党史和地方志事业发展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广大党史工作者，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

台前是革命老区，红色是台前最鲜亮的底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台前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从1932年境内党组织活动开始到新中国的建立，面对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面对侵华日军的疯狂屠杀和野蛮掠夺，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专制独裁和反动内战，台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在这块古

## 台前红色记忆

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伟大的力量源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台前红色记忆》（第三辑）以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回忆和党史研究成果，记载了发生在台前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故事，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台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处处传递出信念和信仰的伟大力量。

我们希冀《台前红色记忆》（第三辑）的编辑出版，能够为台前党员干部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一部党史辅助教材，也衷心希望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认真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进一步筑牢信仰之基，巩固和升华理想信念，激发爱党爱国之志，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志；进一步铭记光辉历程，深入了解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为历史所感动、为历史而自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恩奋进、砥砺前行，不断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进一步补足精神之钙，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融入灵魂，化为行动、化为自觉；进一步激发内在动力，在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中再出发，在履行新使命的长征路上汇聚磅礴力量，为中原更加出彩不懈奋斗！

中共台前县委副书记  
台前县人民政府县长



2019年12月16日

## 编辑说明

台前是革命老区，革命战争时期，台前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畏强暴，英勇抗争，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不朽贡献。为了挖掘这一珍贵的红色文化资源，弘扬（缅怀）革命先烈光辉业绩，传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作风，开展群众性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台前提供精神动力，我们在编辑出版《台前红色记忆》（第一辑、第二辑）的基础上，经过不懈努力，继续努力年征集研究有关革命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整理编辑此书。

**记述范围：**主要为台前境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活动史实。抗日战争时期，台前境隶属范县（西南甘草垌堆一带）、寿张县和张秋县（东部打渔陈、夹河、吴坝一带于1941年6月划出寿张县，至1947年6月复归）。书中多用“境内”“台前境”“台前一带”等笼统名称表述，其本义主要指今台前县域。为留资料，对发生在台前边界地区的史实亦有所记载。

**辑录内容：**台前境域自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到解放战争胜利期间的革命史专题资料。包括党组织重要活动、重大事件、革命故事、党史人物等。为了保持文章的连续性，个别章节内容有所突破时限。

**资料来源：**原在台前一带工作过的老干部、当事人的亲身经

## 台前 红色记忆

历回忆资料及其后辈的纪念文章或专题文章，我县党史地方志工作者近年来的调访笔录研究文章，《巍巍丰碑》《冀鲁豫后代忆父辈》等著述成果。

**编辑原则：**遵循还原历史真实的原则，老干部的回忆录原则上不做改动，个别重复的有删减。书中涉及的个别人物名称不一，编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适当进行了处理，有的予以适当保留。同一重大事件的有关记述，由于收集的资料来源不同，所记述的角度有所不同；文中括注为编者所加。

受文献资料所限和年代久远等原因，个别老干部个人生平简介没有收录；部分收录的老干部个人生平简介，只写出生地为寿张县。

## 目 录

序 .....	(1)
编辑说明 .....	(1)
战斗在冀鲁豫 .....	潘 焱 (1)
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 .....	潘 焱 (6)
春梅晚唱——一个女八路的自述 .....	何 挺 (50)
我的革命生涯 .....	陈亚琦 (70)
杨勇同志在冀鲁豫 .....	赵健民 (81)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摘录) .....	乔丹阳 (86)
昆张支队 .....	王定烈 (93)
郟晋武戎马一生 .....	郟晋武 (119)
英雄营长刘玉清 ..... 王振亮 杨萃民 高黎光 王之信 李 哲	(127)
浴血抗日——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冀鲁豫边区军民 英勇抗击日寇侵略 .....	(132)
一身是胆，战功卓著——深切缅怀段君毅同志 .....	曾思玉 (169)

- 在寿张参加革命 ..... 李月贞 (177)
- 追忆甘草垌堆——怀念敬爱的父亲何光宇将军  
..... 何绍全 (187)
- 深情永系冀鲁豫 ..... 李 林 (192)
- 一个冀鲁豫老兵的拳拳初心 ..... 李 林 (207)
- 孙厚甫同志在鲁西 ..... 陈兆殷 (226)
- 怀念父亲刘晏春 ..... 刘东林 (248)
- 怀念父亲管大同 ..... 管汝胜 管小英 管北河 (264)
- 记战斗在冀鲁豫的我的母亲何挺 ..... 潘豫沙 (277)
- 我的父亲曹华亭 ..... 曹景山 (282)
- 吴忠勇闯三官庙 ..... 田道彬 (286)
- 李月贞冲破枷锁闹革命 ..... 王德生 (290)
- 崔子平的抗战故事 ..... 崔秀云 (295)
- 我的抗战岁月 ..... 郭文明 (301)
- 我经历的“八·二三”铁壁合围 ..... 郭文忠 (311)
- 我的革命家庭 ..... 郭继俊 (315)
- 我的革命经历 ..... 李守才 (331)
- 王敏智斗敌伪 ..... 汪 洪 (340)
- 十八棵青松般的十八名基干民兵 ..... 汪 洪 (342)
- 在抗日烽火的洗炼中成长 (张杰回忆录一)  
.....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344)
- 抗日战争中我在冀鲁豫军区的工作与战斗  
(张杰回忆录二) ...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357)

驰骋冀鲁豫，消灭蒋匪军（张杰回忆录三）	
.....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362）
为军队建设贡献力量（张杰回忆录四）	
.....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372）
参加地方科研建设，经历“文革”考验	
（张杰回忆录五） ...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375）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学生抗日教导队	
..... 朱德兴 王 克	（381）
寿张县区划演变、隶属关系及各届领导人情况	
..... 杨萃民	（390）
摆渡李先念将军过黄河 .....	杨卫民（396）
有关曾宪辉在黄河司令部长刘村的回忆	
..... 刘伦秀口述 徐柱玲执笔	（398）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 台前县委党史研究室	（400）
谁打响了战略反攻第一枪 .....	王德生（410）
难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	杨宝章（416）
后 记 .....	（421）



## 战斗在冀鲁豫

潘 焱

从濮阳县到军区驻地向东走，拂晓前到古云集附近，没敢进村，就在打麦场体息了一会儿。东方发亮了，我叫醒睡觉的同志，集合起来继续向东，走到杨集找到军区驻地。军区政治部接待了我们。晚饭后，我见到军区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向他俩报了到。晚上，我和厂虹到了苏振华家看了看孟璋，孟璋是苏振华的妻子，她那时有病躺在家中。第二天，杨、苏看了我们说：“你带来一批干部，顺利到达了，很好。军区的同志欢迎你们来抗大分校、陆军中学培养干部，政治部还要向你们具体谈谈干部使用问题。”他俩在我驻地与干部见了见面，又休息了一天，已是7月底了，“八一”节快到了，想不到今年的“八一”节在山东鲁西敌后平原根据地过。“八一”节那天，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来到我们驻地，讲这批干部分配工作的问题时说：“这批干部中，几个主要干部军区定下了，潘焱同志到分校一一陆军中学任教育长，该校校长由杨得志司令员兼，副校长余克勤，政治处主任郑思群。尚耀武同志任军事主任教员，其他干部到学校后再具体研究工作分配。”

由于敌情关系，在一个地方不能长住，住三、两天就要转移个地方，我们明天就到学校去。我带着抗大总校来的一批干部，

## 台前

顺利到达目的地。虽然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但总还是没受大损失，今天就要到工作岗位了，大家特别高兴！由军区驻地向学校走的途中，欢声笑语，喜笑颜开，欢乐气氛振奋人心。走了大半天到了学校，余克勤、郑思群同志都来到了，教育处长孙厚甫同志也来了，余、郑同志说：“你们今天就休息吧，干部配备问题，我叫政治处和教育处研究过具体意见，你们到了，我们再定下来。”

战争环境下，时间要抓紧，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非常重要。第二天（8月4日），学校领导研究干部工作分配，曹勉夫任青年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员，戚××任3队（陆中3队有武器配备）副队长兼军事教员，侯真夫任2队副队长兼军事教员，尚耀武到教育处任军事主任教员（军区定的），其他的担任军事教员，有的住教育处，也有的住到队里去。这样，来的一批干部分配和工作定下来了，宣布命令后，他们很快到达了工作岗位，投入各自工作中去了。

我本想离开教育工作，到战斗部队去带兵打仗，结果未能如愿，只有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了。学校驻地是移动的，常在龙王庄、马口、孟楼地区活动。这一带系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是军、政、地方机关、学校常活动的地区。我的工作正在展开。厂虹想到军区卫校学习一期，可她已经是6个月的孕妇。有的同志说：先叫她到后方去，分娩后再回来。我因刚到新的工作岗位，急于打开工作局面，没有同她认真商量，把她到后方去的事搁下了。她一个女同志，又年轻，人生地不熟，只好在学校卫生队随校生活、转移、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为了使我能很好地工作，她没再向我提起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感到深深的愧疚。她理解我，体贴我不愿给我增加麻烦，为什么当时我就不能

多关心她一点呢。

我召集教育处孙厚甫处长、尚耀武军事主任教员以及教育处同志开会，把工作布置下去，分校步兵大队快毕业，另作部署。关于教育计划执行问题，各队的情况都不一样，步兵大队的主课是射击、刺杀，班、排战术动作。陆中的课程主要是各个战斗动作，地形、地物、地貌、射击、投弹训练。1队主要是战斗概则教育，我亲自担任抗日战争战术的课程。

1942年9月下旬，日寇在推行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来，已将边区分割为许多小块。并在我濮、范、观地区四面封锁的基础上，调集重兵，进行大规模的“铁壁合围”式的“扫荡”，妄图以此来达到消灭我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进而摧毁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目的。9月中下旬，日寇以津浦铁路沿线之32师团一部为主，以陇海沿线之日军，集结步兵6千余人、骑兵5百余人、坦克10余辆，在12军团军团长喜多诚一的统一指挥下，以250辆汽车，将步兵秘密运抵郟城、聊城、濮阳等根据地外围重要据点集结。9月27日拂晓，挟当地伪军共3万余人，分8路出动，对我中心区濮、范、冠根据地展开“铁壁合围”。

我们学校住孟楼，各队分住马口、王楼各村。早晨太阳出来很高了，见敌飞机盘旋上空，我派黄尧参谋带骑兵到军区去联系，走到途中遇见军区骑兵通讯员送情报说：日寇和伪军已进到濮阳、白衣阁地区，军区向北转移。我和余、郑商量，要迅速向东南转移。余克勤副校长当即让我和郑思群同志带着校直属队及陆中各队，按划定的路线向东南方向转移。余说：“我带步兵大队断后掩护。”中午，直属机关及陆中几个队在旧范县城与敌人打起来了，却未见到有武装部队前来掩护，战斗了大半天，没有完整的单位突出合围圈。

没有武装的同学们，无论男女都在奋勇战斗着。在突围中，曹勉夫副队长就是手持一枚手榴弹领着队员突围。冒着敌人的机枪、步枪火力射击，挺着胸膛冲向敌人阵地，不顾自己性命，英勇奋战。从上午直打到太阳西斜。遍地硝烟弥漫，尘土飞扬。继续向南突围是不可能了，3队队长王凡说：“教育长，我们向西北突吧？”我看到当时战场情况十分危险，已到绝境边沿，我果断地说：“向西北突围！”这正好是在敌援甘草固堆的队伍的前卫通过，而其后尾未接上的空隙，我们利用瞬间之机会突过敌人合围口，3队副队长牺牲该地。得救的只是少部分干部和学生。在向外出突围时，校直大部和1、2队、青年队大部受损失。厂虹陷入敌人合围圈内，被敌人捕去，我未能救她出来。

“九·二七”是我永世难忘的日子，1942年也是我多灾多难的一年。一年遇到三次大“扫荡”，前两次（5月间）虽然丢失了东西，夫妻俩受尽了折磨，幸亏人还在。9月间的日寇“扫荡”，我失去了前妻厂虹。她被敌人捕去受尽污辱折磨，始终坚贞不屈，直至被杀害于郟城监狱里。这是我终身难忘的。部队、机关和同学们的损失，已使我受到巨大的精神压力，两方面的损失使我无限悲伤，痛苦流泪，也无法挽回了啊！厂虹及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我初到平原地区工作，人生地不熟，有时还转向。别人说清水河，我总认为是一条大的河流，其实是个村庄，名叫清水河。还认为河那边一定会有山地。在平原不习惯，更说不上平原作战的经验。学校、干部受了损失，我责无旁贷，但领导和同学们都谅解了我，我心里却始终不安。至今一想起“九二七”这个日子，我依旧那麽刻骨地痛恨敌人！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我还忘不了那个残酷的日子。

学校经过集结和整顿，余克勤副校长、郑思群副政委，我

们3个人根据军区指示，以精兵简政的精神，对机关进行了精简。步兵大队毕业分配了工作。陆军中学继续办，学员是从部队来的基层干部和地方招来的一部分学生。我们又迎来了培养新干部的任务。

文章来源：潘焱著《戎马生涯》

**作者简介：**潘焱，1916年生于河南省新县（原属光山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排长、连长、营长团政治委员、师作战股长、军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学员、队长、第一大队营长兼军事主任教员，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副校长，教三旅参谋长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参谋长，第一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副参谋长、参谋长。解放后，任贵州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六军军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七届财经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大第七届、第八届常委会副主任。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 艰难困苦的抗战岁月

潘 焱

1942年夏，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在空前残酷的斗争中。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在“扫荡”、“蚕食”、压缩、分割根据地的过程中，为限制、破坏抗日军民的活动，日军在交通要道附近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冀鲁地区的形势日益严重。

国民党军不仅坐视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蚕食”，而且对八路军不断制造摩擦和封锁，加剧了根据地的困难。有的国民党军队投降日本，勾结敌人使根据地周围的伪军不断增多，出现了顽伪合流的新情况。本来我人力、物力、财力在战争中已遭到大量消耗和损失，42、43年又连续出现严重自然灾害，使抗日根据地的军民面临更严峻的考验。

### 一、适应新形势，改变斗争策略

1942年9月27日拂晓，日寇纠集了开封、安阳、聊城、郓城、兖州等地的日伪军万余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大举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合围”、“扫荡”。敌人企图消灭我冀鲁豫军区机关和部队主力的目的虽未得逞，但后方机关、学校受到了损失，兵工

厂（修理枪支、自造手榴弹）被敌摧毁，地方工作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在我中心区及周围，设据点、筑碉堡并不断延伸，“蚕食”我根据地，将冀鲁豫军区原二军分区（昆、张）地区之郛城东梁山、汶上、寿张、东平根据地变为沦陷区，并组织了伪保安队守卫，使我根据地变质。因此，争夺该地区的斗争非常激烈，我区的形势非常险恶。根据地沦为敌占区后，敌伪军在寿张集、大安山、小安山、黄河涯、五连坡、大路口、徐福、三官庙、姚那里、邓楼、田庄、骆驼巷、菜市、师集、十里镇等村镇新设23个据点，到处碉堡林立，沟（封锁沟）墙（封锁墙）纵横，敌伪军在交通要道设卡，封锁我交通路口，活动十分猖獗。

“9.27”大扫荡过后不久，我由冀鲁豫军区抗大分校教育长调任教三旅参谋长，从此，结束五年多在抗大学习、工作的历史，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当时，教三旅由王秉璋为代旅长，曾思玉为政委，王辉球为政治部主任，旅部位于黄河北岸的范县刘庄。敌人还在湖西等地“扫荡”，对我们的“封锁”、“蚕食”也变本加利。部队的衣食、弹药、药品都十分困难。旅的领导和同志们一样，生活十分艰苦。记得一次肖华主任来我旅视察，谈完工作已近凌晨。警卫员煮了一脸盆小米红薯稀饭给我们做夜餐。我们还向肖主任解释说：“主任，这不算搞特殊化吧！”

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1942年11月至12月，冀鲁豫边区召开了地委、旅、分区以上高级干部会议。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新任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传达了中央和北方局的重要指示。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就边区对敌斗争的方方面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黄敬同志做了《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提出发动群众，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分化、拆散伪、顽、会、匪与日寇的联合；“敌进我进”，派遣小部队进入

## 台前

敌占区，变敌占区为游击区；进一步精简军队组织等一系列方针和斗争策略。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及时的。根据党中央和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党委的指示，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实行了野战军地方化，教导第三旅与第二军分区合并为第二军分区，王秉璋同志调湖西军分区任司令员，曾思玉任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第二地委书记段君毅兼任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我任第二军分区参谋长，尹斌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实行野战军地方化后，减少了中间环节，部队更加充实，军事工作，地方工作协调配合更加密切。合并后，我们立即召开分区党委会议，贯彻“高干部会议”精神，研究落实的办法。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冀鲁豫区党委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拥护各项斗争方针、策略。在具体实施上，同志们胆大、心细，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各项工作都做了分工部署。

为实现“敌进我进”的方针，摆脱被动局面，派遣小部队到敌占区，把敌人搅个鸡犬不宁。我二分区决定成立昆张地区工作委员会，组建昆张支队，到敌后执行作战任务。考虑到敌后武装斗争特点，我们几位分区领导反复磋商，决定由熟悉地方工作，对敌伪斗争经验丰富，能联系群众，团结一班人共同奋战的邵子言为工委书记兼支队政委；由能征善战的吴忠同志为支队长。经过精心选拔人员和物质准备后，他们带领一个中队全部着便衣插到戴庙以南，东平湖西和梁山周围活动。部队出发后，我总有些放心不下，让作战参谋随时报告他们的情况。

他们刚进入肖皮口以东之杨家营时，郟城伪军刘本功部四、五百人向我小部队进袭。我小部队经一夜行军十分疲劳，伪军兵力占很大优势，若仅凭村落进行抵抗将会被包围，如立即转移，必遭敌猛追，后果不堪设想。对此，吴、邵沉着、冷静，当机立

断，先命一个班依托村沿有利地形进行抗击，主力则隐蔽在村外。把敌诱至村内后，突然从其侧背出击。打得伪军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毙伤伪军数十人，生俘四十余人。待敌援兵到来时，我已安全转移。随后又在赵堤、四柳村击退了敌伪合击，在梁山东南之陈庄，一枪未发消灭伪军一个中队。10天的战斗是十分紧张的，部队一日一转移，甚至一夜数移，寻求战机，痛击敌人，敌人却摸不到我部的足迹。初战的胜利，增强了部队的作战信心，对群众也是一个鼓舞。

经过一段的斗争，我们又派八团二连也进入昆、张地区（现台前东部、东平西部、梁山东北部）坚持斗争。随后，又派王定烈任支队长、郓北县委书记左宏奇为政治委员（兼），率七团二连深入梁山以南和西南地区活动。由于敌伪据点稠密，相互策应，部队插入后虽然打了些仗，但斗争仍很艰难。因天天有战斗和经常转移，部队十分紧张疲劳。

1943年初，我们针对伪军战斗力不强，一击就溃，本地人对家属老幼安全顾虑大的特点，注意做争取工作，瓦解伪军。根据前段斗争经验，决定抓住敌薄弱环节，重点打击、分化伪军。一月中旬，正值敌对戴庙地区反复进行“扫荡”、“清剿”之际，昆、张支队乘伪军梁山、东平、汶上兵力薄弱，插入该地区，摧毁敌伪政权，镇压死心踏地的汉奸，扩大我军我党的影响。我袭占了三官庙（东平城东）伪警察所，俘虏其所长陈文久及伪军30余人。伪警察所长陈文久掠夺民财，霸占乡民吴老二的妻子，极力抓丁，为扩充伪军出力，实属作恶多端，当众处以极刑。对其余的人员，交待政策，教育后全部释放，并建立了联系。随后又转至戴庙地区镇压了一批叛徒，这些叛徒原为做地方政权工作的乡村干部，在敌伪扫荡中经不起考验，投降敌伪，破坏抗日。这

## 台前

次镇压叛徒，使日伪军十分恐慌，伪东平县长张勉之对其部属传令“不在县的统一组织指挥下，不得单独外出作战。”伪军的行动大大收敛了。

“打拉结合”是我对付伪军，分化敌人的重要手段。汶上地区伪军从未遭到我之沉重打击，敌气势汹汹的向我小部队频繁进攻。

我军进到五府集以北之高庄村，齐岗据点的伪军向我军猛犯，我将其击溃后，从电话中得知汶上伪军来增援的情报，我部移兵打援，正遇大雨。伪军途径朱庄，正在烧烤衣服时，我军乘机袭入，一枪未发，俘伪军50余人。伪军中队长潘恒忠率20余人坚守顽抗，经我强攻将其全部俘获。

潘恒忠的叔叔潘省三是汶上县潘庄人，组织红枪会，专与我抗日军民为敌，投降日军后当上了汶上县伪县长，是个大汉奸。1939年我六八六团三营打潘庄时，伤亡较大，潘恒忠担心我报复，认为必死无疑。出乎他所料，我们不仅未将其处死，也未侮辱其人格，将从他身上搜出的表、笔等个人用品全部退还，生活上还给以优待。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潘恒忠当即表示：“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再打八路军，尽可能的帮助你们”。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

我军此举大大影响了寿张、东、汶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他们争相传言“谁还有潘家和老八（指八路军）的仇大呀！连潘恒忠都不杀，我们还顾虑什么！”从此，我们在寿张地区广泛开展敌伪工作，建立了不少的关系。

在战斗中，又将昆张支队，扩编成5个中队，王定烈任支队长，常志义为参谋长。这支部队在昆张地区坚持斗争，在敌伪“格子网里”行踪不定，走得开，合得拢。既是战斗队，又是宣

传队，工作队。敌人找不到，老百姓天天见。与敌伪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们打击，分化敌人，瓦解敌伪组织，鼓舞了人民群众，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终于扭转了局面，恢复了政权组织，将昆张地区据点碉堡的伪军都掌握在我们手中。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1944年6月，我们军分区和昆张支队，保卫麦收，以军事、政治攻势，将昆张地区敌伪碉堡、据点，一扫而光，各县、区建立了人民武装。从此昆张地区的形势改观，恢复扩大了解放区，我根据地巩固了。抗日歌声又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高唱起来了！

## 二、黄河两岸度春秋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占领了华北、华南部分地区，向中原进犯。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并且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掘花园口黄河水改道，冲毁了大片的土地，水过之处人民的房屋财产冲光，被淹死的群众不计其数。老黄河下游干涸，尤其鲁西之鄆城、郟城北、濮县、观城、范县、寿张县南北，白霜霜的黄河故道，蜿蜒数百里东去。两岸沙多土浮，每遇大风就黄沙扑面，日月无光。“一天二两土，白天吃不够，夜晚还要补，你说辛苦不辛苦？”这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这贫穷地区成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中心区，也是冀鲁豫区党委、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贫穷地区日本鬼子伪军不易生存，进行大“扫荡”后撤回原防，这里又成了抗日军民驻地，如此往复，敌伪无可奈何！除了战斗部队外，我们的群众、医务、后勤等都同心协力，为打击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根据地虽然贫穷，但人民群众却有很高的爱国热情，有强烈的中华民族自豪感！不怕日本鬼子及伪军的“扫荡”和威胁，坚决抗战、消灭日本鬼子的决心毫不动摇。秋收后老百姓就掘地

## 台前

窖藏粮食，供给八路军，这叫做“抗日公粮”。村村、户户都有“地下粮库”。每个村庄里都由可靠的基本群众存粮，由抗日的村长、村支部书记掌管取粮。鬼子汉奸抢粮找不到。八路军到了，粮食就自动送来了，有人民群众作后盾，部队生活很苦，但士气高昂。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八路军的伤病员，那时，我们没有后方医院，黄河故道两岸沙丘和沙窝就是我伤病员的落脚地，利用沙丘挖些洞，敌伪“扫荡”、“清剿”，就将伤病员分散藏于洞内，医生、卫生员夜晚巡诊进洞治疗。医生李林祥和卫生员刘继光长期一同巡诊，革命的同志情、战士情，发展为爱情，结成了革命伴侣。卫生处长李奕以及卫生机关领导都是装扮成老百姓，巡回检查，了解情况。伤、病员一般是找不到的。只有医生、护士或者村子里个别的坚定的党员干部知道。伤病员的吃喝都是老乡们负责供给。

后勤供给处的同志们也是着便衣，化装成老百姓与敌伪周旋。同当地群众一起保护、管理好埋藏在地窖、地洞的物资。反“扫荡”时如此，平时同地主汉奸作斗争也是一样。他们化起装来，乍碰见简直不敢认识。记得有次后勤处长朱苾卿到分区司令部驻地来汇报，警卫员董培广来向我报告说：“五号，门外面有个老乡要见你，让进来吗？”

“让他进来。”我说。

“报告：我是来向你汇报工作的呀！”一个老乡模样的人边进门边说。

我抬头一看是朱苾卿处长，忙说：“是朱处长啊！快进来，快进来，坐呀！”

警卫员愣了，“他是朱处长吗？真看不出来，不是五号说那

敢认呀！”

朱苓卿同志是老后勤工作者。对付敌伪的“扫荡”、“铁壁合围”、“清剿”很有办法。后勤财产物资保管，从没出过问题。

敌后的仓库就在老乡家地窖内，或者另设掩藏处。鞋袜都是老乡做的，各家各户都分做抗日鞋，抗日袜，部队行军到达的村子随时就可得到补充。

坚持敌后抗战，要有自己的兵工厂，1939年，我们在东平湖畔的大小金山创建了自己的修械所，在敌人“九·二七”大“扫荡”时遭破坏。后来在濮、范、观中心区又建起了小型兵工厂。此时为防止敌人破坏，有时分散在黄河两岸的村子里，有时就在野地里挖一个坑，将上面盖起来，做好伪装，在里面点上汽灯就干起来。反“扫荡”时，车床等大的设备，笨重工具就埋在野外，敌人也拿我们没办法。

我们分区有一门九二步兵炮，是杨勇同志在鲁西当旅长时，在潘溪渡消灭鬼子一个中队时缴获的。有炮没有炮弹不行，曾思玉司令员说：“要想办法自制炮弹”。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曾司令的想法正合我意。于是我组织司令部和后勤部的同志研制炮弹。供给处长程重远，修械所长赵慕三，技术员赵连城，七团团团长龙世兴，侦察股长莫玉培，还有李觉、岳胜、贺毅然等同志都参加研制。大家积极性很高，劲头很大。研究方案，找材料，做实验，忙得不可开交。岳胜、贺毅然同志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在研制过程中慕玉培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几十次实验，终于获得了成功。

第一次使用自制炮弹是攻打鄆城北张典庄的伪军，几发炮弹后，伪军就缴枪了。部队上去查看炮弹威力，发现有的弹头只

炸开几瓣。后来，经过不断改进，炮弹的成功率高了，威力也大了。九二步兵炮有了充足的炮弹，就成了宝贝。有时打炮楼，打调堡，几炮过去，伪军就喊：“不要打炮了，我们缴枪投降！”这门炮在冀鲁豫边区对敌作战中贡献是很大的。

在敌人“合围”、“扫荡”的情况下，为把九二炮保护好，每打完一仗，就将炮拆开，涂上凡士林，运到野外埋起来。这项工作我都是指派专人去完成。作战股长李觉、赵萍、李英（他们三人先后都担任过此职），作战参谋闫秀文、常志义、总支书记任涛、炮兵连长吴嘉德等同志都分别执行过此任务。在准备打仗，攻取敌人据点时再挖出来，擦拭干净，参加战斗。

枪炮需要弹药，军民也要吃饭穿衣。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本来就处于偏僻穷困地区，敌伪“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进行疯狂破坏。过后实行“封锁”、“蚕食”。边区经济相当困难。从1941年起，又连续两年大旱，继而是蝗灾。大部分地区粮食减产，不少地方颗粒无收，发生严重灾荒。边区有2600多个村庄受灾。沙区鲁西北等地灾民达一百万人。

由于敌人的抢掠和饥荒，人们背井离乡，重灾区灾民逃亡50%以上，轻灾区灾民也逃亡12%—15%，那里村无炊烟，田园荒芜，饿殍遍地，有的地区村庄景况极为凄惨。姑娘到大街上过秤，论斤换粮食，媳妇不值钱，扮装姑娘卖，有的带着小孩就丢在大路旁边。卖地也不值钱，有地没有人要。

有的年头，庄稼葱绿茂盛，眼看丰收在望，顷刻之间，蝗虫象云雾一般铺天盖地而来，真是遮天蔽日，满地吃青苗，不多功夫好端端的庄稼就变成光杆。遍地的蝗虫，吃了青苗便产卵，第二年春天卵又变成蝗虫。面对蝗灾，党政军民齐动员手，将地两头挖上深沟，拿上扫把、草把，将蝗虫撵进地沟里，先用火烧尔

后再用土深深埋起。我八军分区（原二军分区）机关三天半灭虫24800斤。在广大军民的奋战下，终于扑灭了罕见的蝗灾，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面临灾情的困难情况，部队厉行节约，将口粮定量减少，连队每人每天节约1两，机关每人每天节约4两。在没有副食情况下，粮食不够吃，就以野菜、树叶充饥。榆树叶成了紧俏充饥食品。要减轻人民的负担，还要行军作战，吃的是高粱窝窝头，又黑又硬，战士们给它起个名字叫“钢盔”。在当年战争环境这是主食，有吃的就是好的，黑豆也拿来充饥（平常年景，作马料的）。很多同志因吃黑豆大便秘结而流血，诱发肛裂、痔疮。其他的供应也只有减少。为了坚持抗日根据地斗争，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部队经过了三次精减。军分区党委分工由我担任全区生产委员会主任，程重远、朱荇卿为副主任，领导全分区的生产运动。团及县大队，区队各有一名领导分管生产工作，主要是搞农副业生产，其次是手工业，也搞点商业。扩大耕地面积，每百人要有5亩（除原耕地外）。养猪、养羊、养鸡、养牲口，积肥都有具体要求，还有些小作坊。总的生产形势是好的，种菜园540多亩，打新水井和修老旧水井70多眼，年收蔬菜八十万斤，开荒地975亩，熟地754亩全部种粮食。七团杨俊生，温先星对生产抓得很紧，想方设法多打粮食。酆北县大队三中队劳动英雄夏澄云、赵登池不仅完成了生产任务还创造了打井的科学方法，同群众变工互助，还不时要与敌人斗争。发展生产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七团在酆城北黄河故道两岸大堤上种的菜，有次被酆城伪军破坏了，该团种菜的人员给酆城县伪军大队长（县长）王文贤写了封警告信：“你们伪军破坏了我们的菜地，警告你们，再破坏我们种的菜，老子要打倒酆城去过年……”。从此以

后，伪军再也不敢破坏了。

1943年冬至44年春，抗日战争形势好转，日本鬼子力量削弱。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围剿”、“扫荡”减少了，我积极作战拔除敌、伪据点，中心区扩大，乘机加强了农副业生产，扩大耕地面积。为不与人民争利，我率机关及直属部队，到刚收复的清丰、梁山、张秋地区新开耕地，连各团和县区武装，共开出耕地3000余亩。增加了耕地面积和部队收入，又方便了交通。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的。

在贫穷地区能生存发展，主要是靠共产党的领导，有高度民族觉悟的人民群众支持。他们有热爱祖国的高尚气节，日本侵略者再凶残，他们也勇于支援我们军队打日本鬼子。贫穷县（濮、范、观）为我冀鲁豫抗日领导机关驻地，以这方圆不到百公里地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后，敌伪军“铁壁合围”，我军、政、群机关跳出外围寻机打击歼灭敌人，敌伪“扫荡”主力撤回原据点，我主力和地方武装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区，有计划的拔除敌、伪安设的据点碉堡。为此，往返黄河两岸南北东西，跳来、跳去。所以指战员称“黄河两岸度春秋”。当地的老百姓懂得反“扫荡”、反“合围”要打出外围的必要，打出外线必然会返中心区的，反动派、地主、汉奸造谣：“八路军消灭了，被撵走了”，老百姓自动揭露他们的谣言：“八路军不会被消灭，他们一定会回来的”，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胜利！

### 三、奇袭八公桥

1943年下半年，随着法西斯轴心国失败的日子逐渐临近，日本军国主义急需集中兵力应付与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决战。它在华北的兵力被牵制在各抗日根据地，日军为了巩固它的后方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清剿”企图摧毁我根

据地，以便抽出更多的人力，物力与美英决战。日寇一面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一面驱使伪军实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妄想变华北为其巩固的“兵站基地”。

10月12日，15000多日军带着数万伪军，在天上飞机、地面坦克配合下，气势汹汹，直扑我冀鲁豫中心濮（县）范（县）观（城）地区“大扫荡”，称之为“10·12”大“扫荡”。这是继1942年9月27日大“扫荡”以后，敌人又一次大规模“扫荡”。反“扫荡”开始时，我们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跳到外线。敌人在中心区扑了空，各路伪军在日寇掩护下大筑据点，梦想摧毁我根据地。

寿张的伪军占领我中心区东部侯庙（今台前县侯庙镇）、莲花池；郟城的伪军刘本功占领了黄河南的黄楼，朝城伪军文大可部，占领了我北面的贾庄、虞铺。最严重的是国民党降将孙良诚所属二方面军两个军，兵力约两万多人，控制了我中心区西南侧两濮（濮县、濮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其精锐第五军王清翰部更深入我腹地，侵占了濮县城，并以此为中心，设置了坚固的大小据点百余处。孙良诚亲率其总部进驻濮县城东南八公桥，坐拥重兵，虎视眈眈。

我军分区机关直属队从东平外线返回内线，只控制着范县、观城之间方圆不过百余里的腹心地区。群敌环伺，形势极为险恶。为了迅速打开局面，恢复与巩固我冀鲁豫根据地，军区杨得志司令员、黄敬政委研究，命我二军分区，乘敌立足未稳，向寿张伪军伸入我莲花池按设的据点，朝城伪军伸入我范县根据地北之侯庙、虞铺的据点发起进攻，以便下一步扫除敌安扎在我根据地的濮县地区的据点碉堡，我命作战股长李觉，宣传部长赵凤歧率军分区特务连及朝城、寿张、范县的基干大队攻取之。11月

6、7两日，我部连克侯庙、莲花池、虞铺3处据点，全歼守敌。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蚕食”，军区首长决定将孙良诚侵入我中心区的据点拔除，以改变整个严重局面。

孙良诚部原是国民党正规军，公开投敌后，得到日寇和汪精卫的精心扶植，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这次他们倾巢出动，气焰嚣张。显然，干掉孙良诚就可使日寇失去锋利的爪牙，从而粉碎其侵占根据地的计划。

怎么个打法呢？敌人第一线的五军是孙部精锐，工事坚固，又和我腹心区贴近，戒备必严。据点密集，兵力配备强，不易迅速攻克，而且强攻据点，消耗太大，即便拔除几个据点，也不足以影响全局。军区决心采用掏心战术，来个“虎口拔牙”，以勇猛神速的动作，迂回到敌人背后，出其不意地将其首脑机关消灭。这是一着险棋。敌总部率直辖的三十八师两个团及特务团，集中于八公桥及其邻近的徐镇，南面距离仍为我控制的昆吾县境仅30里，我们可以秘密从腹心区进入昆吾，接近八公桥。敌人兵力虽大，却分布较广，便于我集中优势歼灭其一点。孙良诚公然敢于率总部进驻我纵深的八公桥，正说明他自恃前有五军，后有四军大小据点护卫，思想麻痹。这一带又地处两省交界，属于日寇华北、华中派遣军的接合部。日寇“扫荡”结束不久，各回原防，一时不易统一行动，目前正是我们反击的好时机。我如突然打下八公桥，孙良诚所部势必动摇后撤，根据地是不难迅速恢复的。

杨得志司令员肯定了这个大胆的作战计划。他指出奇袭八公桥，是摆脱被动，力争主动，集中优势打敌弱点、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只要我们能改变和避开不利条件，创造和利用有利条件，一定可以顺利达到战役的目的。

军区的战役部署是：第二军分区的七、八团、基干团主攻八

公桥。以三个县大队牵制八公桥外围据点，展开政治攻势，相机夺取。四军分区十六团、五分区十九团、二十团等部，分别部署于八公桥西侧，濮阳至东明一线，对付敌第四军，并提前行动，攻打敌人后方的据点两门镇，以吸引敌人西援，减轻我主攻部队的压力，战斗打响后，则阻击可能来援之敌。三军分区三十二团、回民支队带领中心区各县区武装、民兵，在濮县一带袭扰牵制敌五军，不许其回援。减轻我主攻部队的压力，战斗打响后，则阻击可能来援之敌。

根据军区命令，我们军分区的曾思玉司令，段君毅政委和我决定：采取偷袭战法，以温先星团长，杨俊生政委所率的七团附分区九二步兵炮连（一门炮）由八公桥东北攻击。以齐丁根团长、李仕才政委所率八团由八公桥西南攻击。战斗打响后要不惜一切强攻解决战斗。基干团李天德、关盛志率部随八团后投入战斗。

鄆北、郟北、昆吾等县大队牵制八公桥外围据点相机夺取之。

我向军分区司令部布置工作时要求说：要出奇制胜，必须做好四件事，第一向部队讲清形势，做好政治思想动员工作；第二确实掌握敌情；第三是严守秘密；第四是造成敌人的错觉。最后一条非常重要，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9页）。

我首先派侦察股长邱克难前往昆吾县，配合县委，侦察八公桥及徐镇的敌情。同时，故意把分区的指挥机关和部队从范县以南腹心区移向东南方向，驻于鄆城北面的刘楼，远离开孙良诚的部队，作攻坚准备工作，并派出侦察员和小股部队向东，到郟

城、刘口、肖皮口等敌据点附近活动。造成我军有攻打刘本功的声势，以迷惑孙良诚，给他们来个“声东击西”。

那些机灵的侦察员，各显神通，使用种种巧妙的办法，把消息传到据点里去。有的找到伪乡保长，故意恫吓说：“我军在这一带集结，走漏了消息要找你们算账！”有的告诉来往于敌占区的商贩：“你看到了我们部队在绑梯子，可不准告诉敌人！”有的把敌哨兵抓来，详细讯问据点的设防情况，然后又故意让他逃回，尹斌主任让敌工科长通过内线关系，把假情报直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所。散驻各村的部队同时展开了热烈的练兵运动，日夜擦枪磨刀，练习登梯拼刺，这一来，刘本功紧张极了，连忙收缩部队，据点周围都设上了双岗，还拚命向各地伪军喊叫求援。

邱克难同志派人送来一封信，详细报告了八公桥那边敌人设防的情况。最后说：“敌人本来天天向乡保长要民工赶筑工事，最近听说我们要打刘本功。民工也要得不紧了，围墙只筑了一丈多高”。显然。我们这一着奏效了，敌人产生了错觉。于是，我们悄悄将指挥机关和部队向孙良诚驻地八公桥方向接近，准备随时出动。

我友邻军分区十六团，16日在八公桥侧后的两门镇打响了。这是战前预定的一步棋，按照计划，把八公桥附近的敌人调出西援，那么我们就可以更无顾虑地立刻投入攻打八公桥的战斗。大家集中视线于徐镇，焦急地等待情报。

第一个侦察员回来了，“敌人毫无动静。”

第二个侦察员回来了，“还是不见敌人有什么动静。”

难道敌人看破了我们的意图？我心里暗暗着急。

直到第二天下午，邱克难同志才带着几个侦察员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赶回分区司令部驻地葛庄。一进门，他就兴高采

烈地嚷道：“两门镇歼灭敌人两个连，徐镇敌人一个团已经增援去了！”

敌人终于听从了我们的指挥！

一切条件成熟。曾思玉司令员用红笔在地图上唰地画了一条长长的弧线，目光闪闪，微笑着说“出发！”部队一夜小跑，直插西南。绕了一个不小的圈子，避开敌五军的占领地区，16日拂晓，到达了黄河故道大堤边的火神庙。这里距八公桥仅40余里。这时，曾司令员、尹斌主任都分头到各团进行战前动员。我命邱克难去和昆吾县委联系。

昆吾县，是濮阳以南、黄河北岸、河堤与河道之间的十几里长、几里宽的一块狭长地带。由于地方党在这里工作基础好，群众都已发动起来，敌人一直无法立足。因此，昆吾县一直被我们控制，借以沟通着我中心区与西南面六、七军分区的联络，而这次又成了我们的情报基地，也是隐蔽接近敌人后方机关的一条安全走廊。

没等到我们去，他们就先找上门来了。县委的同志们一个个腰插短枪，虽然是风尘满面，却都精神抖擞。我把当前情况和作战意图向他们谈了谈，提出部队需要几个向导，县委书记立刻答复：

“向导有的是，早带来了”。

“还需要100副担架”。

“准备了200副。参谋长，还要什么，请快说！”

我激动地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做得太好了，对这次战斗帮助太大了。”

正说着，跑来一个民兵，高高个儿，魁梧身材，方脸，是个漂亮结实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向县委书记报告：“八公桥敌人今

天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只有昨天日落时看见一辆小汽车开往开封方向去了。说不上坐的是啥官儿”。

部队到达火神庙，我将收集到的情报，亲自报告杨得志司令，他说：“这情况说明，敌人丝毫没有察觉我们的意图。”

16日下午4点钟左右，部队从火神庙出发，沿黄河大堤继续西进，走了20里，到陈岩，来个急转弯跨过大堤，直向正北急速前进。这时，太阳西下，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到夜12时多，突然狂风大作，卷起一阵阵黄尘，虽然行走在野地，沿途村庄犬吠不停，我真担心暴露军机！还好我们逆风而行，有什么大小的动静和犬吠声，都顺风向南了。敌人在北，听不到。这时，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跨一步要费很大劲。最苦的是梯子组，他们要抬着十几米长的木梯，顶风前进。尽管如此，他们仍精神抖擞，不觉得疲劳。

午夜时分，赶到八公桥，部队进入预定位置，指挥所设在史家楼。刚挂上作为指挥所标志的红灯，各团的通信员就来报告“部队接近战壕，准备好了！”这次，曾思玉司令员又到突击部队去了。曾思玉中等偏低身材，健壮的体格。江西省信丰县人，参加了本县农民起义，老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讲话爱发急，时带口头语。一打仗，他总是跑到前边直接指挥部队。常在战斗命令下达后，就下到突击队，到机关枪阵地指挥战斗。

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温先星，杨俊生率领的七团三连战士们从东北角越过外壕，翻过围墙，打开寨门，突击部队攻入寨内，后续部队紧接着突入围寨。直到此时，敌人才发觉，可是已经被我们战士堵在碉堡里动弹不得了。齐丁根团长、李仕才政委率领的八团从西南角突入围寨。李天德团长、关胜志政委所率的基干团同时突入围寨，西南角上的敌人哨兵还在碉堡内睡觉，我们突击队的勇士们喊道：“缴枪不杀……！”此时枪声、手榴弹

爆炸声四起，敌人惊慌应战，城中硝烟迷漫，我这时才暗暗地松了口气，偷袭成功了！胜利在望了！17日早7时，歼灭伪二方面军首脑机关八大处的捷报就传到了指挥所。我很快地向杨得志司令员报告：“袭击八公桥战斗已成功，正在歼灭镇内顽抗的敌人。”

接着，我们打开了顽抗的敌兵工厂和街心大碉堡，把敌特务团的两个营全部歼灭了，活捉了伪总部特务团团团长。他供称：

“昨晚间狂风大作，到半夜了我正在玩麻将牌，突然想起八路军游击队唱的歌儿，有句‘愈是天黑风雨夜，愈要到处去夜袭’的歌词，于是立刻放下麻将牌出来，刚到围墙边，八路军就攻进了寨，真想不到会这么快哟！”同时活捉的还有伪二方面军总参谋长甄纪印。一问，才知道15日下午开出的小汽车里坐的正是孙良诚。这次算他运气好。甄纪印这个“参谋长”对着我看，一口一口倒吸冷气，连声絮叨着：“真想不到，真想不到……”敌人确实想不到我们会打到这里，直到下午，濮阳的敌邮差还到八公桥送信来呢。

此战将孙良诚总部及直属部队全部歼灭，缴获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物资，取得了八公桥作战的完全胜利。

打下八公桥，我们又横扫了保安集、王郭村等据点，并伏击歼灭了东明方向援敌的两个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声威大震。敌全军惶骇，栗栗自危。濮县伪五军慌忙撤退于濮阳、柳下屯一带。当我们返回中心区时，濮县周围也无敌踪了，孙良诚不仅没有占到地盘，倒输了老窝。我冀鲁豫根据地反比敌人大“扫荡”前更加扩大了。使二、三、四、五军分区连成一片。

#### 四、攻克清丰县城

冀鲁豫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中

华民族的解放，同日伪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终于过了难关。根据地逐步恢复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得以壮大和发展，广大军民抗战热情进一步高涨，对敌斗争进入由相持到反攻的转变的时期。

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在中国的侵略战争，疯狂进行垂死挣扎，拼命保持已侵占的地盘，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解决其日益增加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困难。临到夏收、秋收季节，日伪军便倾巢出动，大肆抢劫粮食。1943年冀鲁豫根据地发生严重灾荒，清丰县伪县长张裕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交纳25000吨小麦，带领伪军四处抢粮，抢走了七百多吨粮食，更加激发起了人民群众对日伪军的刻骨仇恨。

为了迎接反攻的到来，冀鲁豫党委、军区号召根据地军民，大力开展对敌伪斗争，积极扩展根据地，保卫夏收，扩大敌后战场。1944年5月29日攻占清丰城的战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起的。

清丰县，历史悠久，隋置顿丘县，唐代，此地有个名叫李清丰的人，很有才干。朝廷发现此人后，命他赴外地任县令，他因母亲有病需要照顾，宁愿卖烧饼养家糊口，照顾母亲，辞官不去。皇帝得知他是孝子，就改此地为清丰县，命他为清丰县令，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清丰是冀南、豫北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大县，境内一片平原，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盛产小麦，素有粮仓之称，抗战以来，为敌我几经争夺之地。日伪军在县城及其附近的永固集、马村集、南堡、南清店、卫城集等地安设据点，修筑碉堡，可谓星罗棋布，企图长期控制清丰要地。

我第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在清丰县民兵武装配合下，向敌伪发起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断绝了敌据点、炮楼粮食，开展打炮楼，拔据点、保卫粮食的斗争。将城南集镇多处据点拔掉，对

被俘的伪军交待政策后全部释放，同时散发传单，并对伪军家属宣传抗日形势，指出光明前途，分化瓦解敌伪，我们还发动群众大造舆论迷惑敌人。今天说，这儿来了多少八路军，明天又说那儿来了几个团，准备什么时间打清丰城等等，搞得清丰城内敌人如惊弓之鸟，坐卧不安，日夜不敢出城。伪县长张裕元为保全性命，于5月15日弃城逃窜，沿途又经我地方武装打击，歼其数十人，余敌逃至大名府县城。

我第二军分区和地委、行署的负责同志对当时敌情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认为敌虽仓惶逃走，但日本鬼子不会轻易放弃清丰地区，而且麦收即将来临，敌人很可能重返清丰。于是即令我清丰县大队副大队长傅学阶，并通知县委迅速进城，发动群众，星夜拆除城墙、碉堡，摧毁敌一切军事设施。经过数昼夜努力，拆毁任务基本完成。5月24、25两日，分区接连收到清丰县大队和情报站的报告：“23日，伪冀南道尹薛兴甫（道尹，官名。1915年5月，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地方制。分省为数道，改观察使为道尹，日军在华北占领区沿用此官称。），剿共军第一军指挥官李铁山率13个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在新民会总顾问福田稔等监督下，由邯郸一个日本中队和日本技术顾问北岛薰护送，分乘6辆汽车，重占了清丰县城。”报告还说：“日伪从各县带来大批麻袋和100多辆大车，回城后举行‘庆祝光复清丰县城盛典’同时抓丁拉夫一面抢修被我破坏的城墙工事，一面进行出城抢粮的准备工作。”听完他们的报告，我关切地问：“你们讲的情况准确吗？”“总的敌情完全准确。”他们很肯定地回答。

为可靠起见，我们又查询了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情报站的同志，据他们反映，清丰情报站的工作一向准确。接着又得到清丰送来的情报，担任护送任务的日本中队23日下午乘汽车返回大

名。地委副书记万里同志说：“一个中队的‘武鬼子’走了，消灭剩下的‘文鬼子’和伪军就更有把握了”。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学生出身，高瘦身材，他说出了我们的一致看法。

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副政委万里和我在一起研究后，决定趁敌工事、城墙尚未修复、抢粮尚未行动、13个县的伪县长和警察所长尚未撤离之机，以突袭的方法夺取清丰城全歼该敌，一网打尽重返清丰县城的敌人和伪军，让他回掠覆没在清丰城！

曾、段把我们的想法和决心向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黄敬做了详细的汇报。此时杨勇已接替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司令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人，瘦高身材，浓眉大眼，地方口音重。初接触他时，使人感到有一种威严的气势。实际上待人和蔼，胸怀开阔，信任同志，很有大将风度。杨、黄首长又询问了有关情况后，当即同意我们的决心和部署，并指出：“打好这一仗对保卫麦收，巩固扩大根据地，鼓舞军民士气，有重要意义。你们要坚定决心，密切掌握敌人动向，迅速行动。军区把四分区卫河大队和二十二团配属你们指挥，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曾、段同志回到军分区驻地颜村铺，传达了军区首长指示，决定立即调集部队，于5月29日行动，以七团团直和两个营及清丰（含区基干队）、南乐、卫河、观城、昆吾、尚和等县大队以及军分区直属的特务连，九二步兵炮连参加这次战斗。分区指挥机关、直属连队及七团于5月29日由范县分别从颜村铺、龙王庄、马口地区出发，急行军140华里，黄昏前进至距清丰城30里之六塔集地区集结。

观城县大队副大队长贾鲁峰率该大队由观城东耿王庄出发，直奔清（丰）、南（乐）公路距清丰城东约20里的高堡村地区构

筑工事，以防清丰城之敌向南乐突围，并阻击南乐可能增援清丰之敌。我叮嘱他要与二十二团密切联系，务于29日晚到达指定位置，做好战斗准备。

清丰、南乐、昆吾、尚和等县大队副大队长或副政委于19日到达六塔集接受任务，各大队（含清丰各区中队）立即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军分区指挥关于29日到达六塔集，具体部署战斗任务，同时要求各部队切实保守军事秘密。段君段、万里同志向清丰县委布置了支前任务。

我又命令侦察股长邱克难通知南乐、清丰情报站，要严密注视清丰、南乐城内及周围据点敌人动向，有情况随时报告。

各部队行动部署及任务下达完毕，随即行动。我军分区机关和部队踏上了征途，指战员一个个精神振奋，士气高昂。虽然是急行车，但没有一个掉队的。我们几位领导同志一路上也谈笑风生，大家看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麦浪，更加充满了歼灭敌人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到达六塔集地区，指挥所下达口头命令，各部队分头执行的战斗任务。

七团团长温先星，政委杨俊生所率两个营，配属分区九二步兵炮连，特务连和清丰县大队（包括一、二、三、五、六区基干队）于29日晚22时完成对城内敌人的包围，23时发起攻击，力求将敌主要兵力歼灭于伪县府小围寨以外，30日拂晓前对小围寨发起总攻击，力争10时前全歼守敌。

南乐基干大队于24时强攻五花营伪军据点，以吸引南乐之敌，并有阻击大名南援之敌的任务。

尚和县基干大队于晚22时前完成对永固集据点包围，力求歼

## 台前

灭该敌。如不能得手，则待明日将清丰敌人消灭后，由七团派一个连前往消灭之。

攻清丰城部队为七团及分区配属的部队，清丰县大队及区基干队，统归七团团、政委指挥，攻城部队完成歼灭敌人任务后，于明午12时撤至城外，集结于清丰城东陈庄、聂庄、李家庄一带，迅速调整组织，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清丰城防由清丰县大队负责，迅速恢复社会民序，并注意南乐方向敌人动向。其它部队无军分区命令不准进驻清丰城。

军分区指挥所设在南关东王窑。

天渐渐黑了。各部队趁着夜色从麦田里迅速向城下运动。此时，城内敌人正在“高高兴兴”地看戏，沉迷在“光复清丰”大捷之中。然而这些得意忘形的败类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夜，约21时许，我各路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将清丰城团团包围。

二营从城东角实施攻击，五连担负突击任务。指导员范亚承号召全连：“同志们，胜利不胜利，就看我们五连了，共产党员、老战士要冲锋在前，血要洒到城墙上！”

天完全黑了。如同一幕帏帐遮住了战士们的身影。五连组成的两个梯子组抬着已绑好的梯子前进，他们选择好各自攻击的地点，准备开始攻城。

“砰”，城墙上一声枪响掠过夜空，接着又打几声冷枪。这是“胜利”而又空虚的敌人在为自己壮胆。争取时间就是胜利，部队迅速展开了，梯子组抬着四副梯子，向城下悄悄跃去。

“干什么的！”愚蠢的敌人终于觉察出似乎有些不妙，扯起嗓子喝道。“是老百姓，”梯子组的同志机智地应声道。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沟里隐蔽的指战员焦急地等待着攻击的命令。教导员张希登拍着大腿喃喃地说：“不好，敌人可

能发觉我们了。”“准备强攻！”营长项立志厉声命令。

突击组和梯子组的战士们夜暗中向城墙下继续前进。他们蹲在城墙的外壕里，借着微弱的星光向上望去，那一个个垛口黑黝黝的活象敌人。梯子组的二班长对大家轻声说：“城墙上好象增加了兵力，而我们只有四副梯子，突击组登城会很困难”。带路的老乡刘二志说：“向东走20多步，有一段城墙宽约两丈，还没有修好，很陡，下面搭个肩人就爬上去，不过要特别小心，里面就是炮楼。”敌人在此进行了重点设防。

这时，已经是22时半，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当机立断，决定突破口就选在那里，虽然敌人做了重点防守，但从这里突进去，一是便于攀登，二是出敌不意。

突击排的通信员许德盘蹲在墙跟下，搭好肩。第一个人越过墙去，第二个人踩着肩又跳过去，第三个人，第四个……排长也踩肩过去了。

三班长徐坤然带领全班新同志迅速跟进，他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放大胆子往里冲，二排同志们杀进去了，我们也冲进去。”他们一举登上鼓楼，包围了警察局，歼敌一部，占领了两排房，残敌窜到东北角小围寨内。

敌伪拼命地抵抗着，枪声一阵紧似一阵……一营营长李光前、教导员赵阳命令突击队四连从城东南侧敌人未修好的城墙缺口一举突入城内，与敌人进行巷战。敌伪拼命反抗，疯狂进行反扑。我英勇的四连战士们，利用街道墙角和打通房屋墙壁与敌进行巷战，打退敌人一次次地反扑，并消灭其一部。残敌边打边退。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他们从城内东街一直打到南街，又发展到西大街，与清丰县大队在西城衔接。该营第二梯队投入战斗，一直打到城西北角。

这时，西城墙上敌人的火力大大减弱，清丰县大队一中队突击组秘密接近城墙，在火力掩护下，一举登城奏效，接着又占领了四城门全部制高点。在打退了敌人数次反冲击之后，巩固了已占领的阵地，然后在西门上，布置好机枪步枪火力，对西大街之敌狠狠射击。

五连完成了对城墙的突破，肃清小围寨外围的敌人之后，很快抵近敌小围寨。围寨位于城内东北角，四周筑有6米高的围墙，四角各有一个2层碉堡，构成火力交叉体系。围寨墙内四周满布高低房屋，这里住着“光临”清丰的“客人”伪道尹薛兴甫、伪县长、警察所长、警备队长，加上他们的主子日本顾问。清丰城内未被消灭的敌人纷纷龟缩到小围寨内，妄图凭险顽抗，等待增援。这时，我部队从四面八方将小围寨包围起来，几千只眼睛喷射出复仇的火焰，数不清的枪口对准小围寨，敌人已成瓮中之鳖了。

主攻小围寨的任务交给五连，配属该连九二步兵炮一门，和团的迫击炮。从围寨东北角实施突击。该连受领任务后，决定以一排为突击队，任务是在九二步兵炮火力支援下，从东北角突破，先攻占东北角炮楼，及其东侧的房屋，掩护后续部队投入战斗。二排为二梯队，协同一排巩固突破口，随时准备抗击敌人反冲击，三排为预备队。

攻击开始，团迫击炮向据点守敌猛烈射击，九二步兵炮将东北角敌炮楼下部击穿一个洞。一排在火力掩护下，三班迅速冲入消灭炮楼下层守敌六、七人。一、二班穿过洞口相继突入围寨内，全排冲进敌东侧房屋，歼敌十余人。尔后，依托已占领的东侧房屋，掩护二排投入战斗，先消灭东北角炮楼二层的敌人，然后协同一排消灭围墙内占领房屋的敌人。

副连长陈景玉深情地看看他们的战士，随后告诉二排长，需

由四五班组织一个突击组。一听到此消息，战士们争先恐后，马上就组织起来18个英勇战士的突击队。他们是宋怀泉、段玉生、杨继尧、齐鸿臣、李华、许德盘、江得华、张金祥、任福昭，王中德、王金成、李宽、王金保、朱子俊、陈梦杰、刘从普、王永志、陈六品。陈副连长连声说：“好好！你们真是人民的好儿子，八路军的好战士呀！”嘟……第一次冲锋号响了。

东方发白了，激战一夜的指战员们顾不上疲倦、饥饿和伤痛，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坚决消灭敌人。

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二排长命令四班歼灭二层炮楼残存的守敌，四班利用炮楼死角登梯子爬上去，接着五班也登了上去。战士们飞似的冲向炮楼，五班长大声喊：“注意，避开敌人枪眼！”四班长贴着墙根，通信员许德盘开心地说：“我只见子弹在腿边转，却不见腿上有子弹眼儿。”18个英雄不断扔出一排排手榴弹，炸得敌人惊魂落魄、血肉横飞。

凶残的敌人在拼命抵抗着。他们从炮楼上面扔下许多手榴弹和砖头，从房屋地堡里射击千万颗无情的子弹。激战中，有几名突击员躺下了，江得华在东南角炮楼下流尽最后一滴血。剩下的9名队员中，只有段玉生和张金祥没有受伤。

敌人的机步枪火力在吼叫着。

“勇敢地爬上去！”二排长也在叫着。五班长段玉生和张金祥第一个向上爬。

“同志们，上啊，只要上去就是胜利！”文化干事赵强在鼓动着。

“牺牲的、受伤的由后面来照顾。”二排长边爬边喊。

李宽和王金保跟着五班向上爬。

“我们就要胜利了，冲上去呀！”文书把伤员扶起来，伤

## 台前

员们挥着手叫他不要管，新战士吴新山说：“你们去狠狠地打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冲上去呀，我们胜利了！”王金保一边换药，一边喊着。

四班长齐鸿臣和王德中跟着李宽向上爬，二排长和许德盘爬了上去。轻伤的也上去了。他们说：“死也死在炮楼上！”

突击队进入突破口，炮楼的里门门道里弥漫着灰、土和火药的硝烟，什么也看不清了……

炮楼下面受了伤的王金保同志在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后，壮烈牺牲了。李宽也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炮楼上。

战后军区通令嘉奖了清丰战斗的十八英雄：“我军5月29日夜，攻克清丰城，消灭了清丰境内之敌伪，对于保卫麦收、打击敌伪意义是很大的。在此次战斗中，我二分区二零四部队五连第二排长朱怀泉率该排战士段玉生、齐鸿臣、张金祥、李华、陈六品、朱子俊、杨继尧，许德盘、李宽、王金成、王中德、江德华、陈梦杰、刘从普、任福昭、王金保、王永志十八英雄，在敌人顽强抵抗，猛烈的火力下，夺取敌人最后固守之东北角上的主要调堡围寨及其巢穴。尤其是五班长段玉生、战士张金祥二同志，首先从调堡缺口突入，并能继续与排长朱怀泉四班长齐鸿臣、通信员许德盘、王中德等6同志顽强坚守碉堡。掩护后续部队攀登。他们这种英勇果断行动，对此次战斗的胜利，起着决定性作用。特此通令嘉奖。做为全区指战员学习的模范。并向烈士王金保、李华、江德华等同志，致以深切的哀悼。”（摘自1944年6月15日《战友报》第62期）。

城内激战中，我攻城部队进行巷战将敌大部歼灭。小围寨之敌在我英勇健儿猛烈攻击下亦大部被歼。残敌不甘灭亡，企图突围逃脱被歼灭的命运，我们也早已预设好“口袋”正等待着他们。

从西北角突围逃窜之敌，被清丰大队三中队、七团一、三连和清丰五、六区基干队拦腰切断，毙俘敌伪两、三百人。

卫河县大队在副大队长耿宏等同志指挥下，埋伏于城西韩桥一线。当清丰县城日伪军窜入韩桥南时，他们当即发起猛烈攻击，歼敌310多人。

另有一股伪军百余人企图向南乐方向逃窜，途经高堡村南，袁村地区时，观城县大队以一中队坚守阵地对南乐方向警戒，两个中队向逃至袁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猛打、猛冲、猛追，歼敌大部，只有30多名敌人钻入袁村村内，依靠院落顽抗。该大队迅速将村包围，逐院打通院墙，用进逼和攻心战相结合的战法，终迫伪军缴械投降。该大队报告：“仍有两名日本顾问，不投降缴枪，开始攻心战不缴枪也不答话。好家伙，死赖着。敌人也知道，不管怎样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好歹后来将枪扔出来，人仍钻在房子里。后来人出来了，耍赖皮不讲话，躺在地上死不肯走。我大队又没有翻译，什么也问不出来，没办法，只好用一辆牛车拉着，将他们送交分区俘虏收容所。连他们叫什么也不知道。”贾鲁峰副大队长高兴地说：“在分区的指挥下，我县大队共俘敌110余人，还有两名日本顾问，缴获轻机枪两挺，六零炮一门，长短枪百余支，这样大的胜利在我大队还是第一次。参加这次战斗使我县大队受到了一次实战锻炼，指战员受到了很大鼓舞。”贾鲁峰同志，山东省莘县人，年轻有文化，政治坚定、作战勇敢、有指挥能力、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好，是个有发展前途的好干部。

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记载：“5月29日，爆发了清丰事件。这是日军改变警备时的一幕悲剧。当天夜里，全体人员逐渐就寝，突然遭到共军袭击。保安队在城墙上布防时，县城已全被包围，立即全面展开了激战。夜3时，共军突破

## 台前

东关攻入城内，顿时，由各县抽调来的保安队东奔西窜，混乱不堪，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名取大尉命令全体突围，但是突破两三重的包围是非常困难的。名取大尉、日本联络员战死，薛道尹被俘。”

在西关外西小桥的南北洼地里，成群的俘虏集中在这里。清丰县大队副政委余飞龙忙于集中俘虏和清理各种战利品。县长袁士先对我们说：“我们正在组织人员清查俘虏中的首恶分子。伪道尹薛兴甫穿着毛织品衣服和几个日本顾问蹲在西小桥北边，显出一副无耻的可怜象。”余说“那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呢。一个高大胖子，满脸黑麻，他就是民族败类大汉奸张裕元。”

曾司令员、段政委、万里同志对我说：“到大街上去看看。”一走到东大街上，见到博学阶问：“怎么样，部分敌人向西北突围了，你们抓了多少？”

“看样子可能有千把，正在清查，还有不少武器。”

“有鬼子吗？”“有8个，战斗中还打死几个。”“还有谁？”

“还有伪道尹薛兴甫、伪县长张裕元。”

接着我们说：“目前大名敌人还没有动静，南乐敌人将城门关得紧紧的，估计今天没什么新情况。七团马上撤出城关到指定去。你们留在这儿要特别注意搞好城防，做好群众工作，彻底清查潜伏的日伪特务，收缴好各类物资，特别是各类武器。”

尚和县大队拔掉了永固集据点并全歼驻地守敌。至30日上午十时，战斗全部胜利结束。清丰县城重见光明，清丰县境获得解放。

“敌后战场伟大胜利的一年……冀鲁豫我军5月下旬乘冀南道尹召集13县干部于清丰城举行会议时，一举攻入了清丰城，将冀南道尹薛兴甫及13个伪县长、顾问，警备队长、新民会长等一齐话捉，并俘敌伪千余……（摘自1944年12月31日《解放日

报》) ”

这次战斗，活捉伪冀南道尹薛兴甫、伪县长、伪警察所长等伪官吏40余人。活捉日本顾问伪冀南道新盟会总会顾问河本定雄，调查委员会福田稔、肥乡县顾问竹腰常三、成安县顾问田本代勋、伪河北省技术顾问北岛薰及日军旅团参事官等30多人。俘伪军官百余人，士兵1200余人。俘伪冀南道“剿共军”第一军指挥官李铁山，毙伪道尹日本顾问本川、以及伪军200余人。缴获轻机枪21挺，步枪1500余支，子弹万余发，战马15匹，汽车两辆，还有大批物资。

怎样开走缴获的汽车，说起来很有趣。当时没有汽油，也没人会开，又舍不得甩掉，有人出个主意，用牛拉。我们找了4头黄牛拉着出了城。老牛拉汽车，慢悠悠走在胜利归来的队伍中间，引起大家阵阵笑声。

胜利轰动了清丰县周围的群众。人们奔走相告，“昨夜八路军打开了清丰，活捉了很多日本鬼子，伪军。”男女老少扛起锄头铁镐，自动去拆城墙、调堡，嘴里骂着：“看你龟孙还敢再来。”人们兴高采烈，有人高声唱起河南梆子，抒发胜利的喜悦。群众议论说：“这场面比前两天敌人看戏精彩多了。”部队押着俘虏走过来，老百姓指着他们鼻子责问：“还抢小麦吗？还要粮款吗？这是你们死心塌地当汉奸应得的下场。”这次战斗保卫了麦收，扩大了根据地，使濮、范、观、清中心根据地连成一片，壮大了地方武装力量，扩建了分区正规部队。为我抗战大反攻扩大了战场，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这一胜利对打击日军士气，瓦解伪军也有着重大意义。

## 五、打破刘本功的“铜墙铁臂”

郟城县城系一座古城地，位于黄河南岸的鲁西平原上。东临

## 台前

梁山（宋朝时，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聚义的地方），西依菏泽，是通往河南开封的要道，也是通往济宁、兖州、济南府的要道，该县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日寇侵占后，常住一个大队的日本兵，伪军刘本功依仗其日本主子的势力，盘踞山东鲁西平原上之郟城，他按照日本鬼子的旨意，筑碉堡、修城池、固守城垣。通常配合日本兵“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中心区。出身于地主、土匪、恶霸，原系国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部下特务队长的刘本功，是敲诈勒索老百姓血汗的蛀虫，投降日寇后，日本驻菏泽的长官就委任他为鲁西南防共自治军司令兼郟城县长，刘也极力出卖民族利益，疯狂推行日寇的“治安强化”运动。他到处招兵买马，搜刮民脂民膏，扩大势力发展到50个中队（约5000余人）。在郟城县辖区大的要点村镇、交通要道修筑据点、碉堡，深挖封锁沟。声称要把郟城地区变为“铜墙铁壁”，割裂封锁我根据地，不断到我中心地区安碉堡炮楼进行“蚕食”，屠杀我抗日军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人民群众对刘本功恨之入骨。

刘本功自持兵力雄厚，他曾给我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送来挑战书说：“曾思玉你是苏联走狗，蒋介石是美国的走狗，我是为汪精卫主席、大日本皇军建立‘王道乐土’、‘大东亚新秩序’的，你有什么力量向我进攻？而我随时可以向你们‘匪区’进攻……”这就是刘本功不打自招死心塌地做汉奸的铁证。

我军分区部队，根据军区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朝城伪军文大可部已南调，昆张地区战役、清丰战役战斗已取胜利，濮、范、观中心区东、西、北三个方面的局面已打开，严惩刘本功、彻底摧垮寿张、郟城、鄆城的封锁线，打开黄河以南局面，成了我八军分区主要斗争任务。我们军分区领导在一起研究决定用1个月的时间进行战斗准备，7月初开始集中七团、八团、基干团、

独立团以刘本功为对象，进行了高苗地战斗与攻坚战术演练，强化了投弹、刺杀等训练，进行思想政治动员，后勤补给工作的准备。地方党委、政府在保密原则下，在地委领导下进行了支前工作的准备。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向军区杨勇司令员、黄敬政委（兼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作了汇报，首长们批准了我讨伐刘本功的作战方案。

我们决心：集中七团、八团、基干团、独立团，鄆北、郓北、寿张、东平、濮县、清丰、南乐、观城、范县等县大队和部分精干民兵，在北线分割包围其沿大堤之封锁线和突出于我根据地边沿的据点，以主力七团团团长温先星、政委杨俊生率部，八团团团长齐丁根、政委李仕才率部首先攻取郓、鄆接合部大堤上的肖垓（敌称之“金堤”）、刘口等坚固的据点，先突破大堤的封锁线，然后，再攻取楔入我郓北根据地内最坚固的傅庄据点。各县大队和地方武装展开政治攻势，并夺取肖皮口、程四里屯及其他一些据点。

在南线则以基干团团团长李天德、政委关盛志率领和巨荷、临泽等县大队，置于郓、鄆公路南侧和郓城西南，防止菏泽、鄆城之敌增援，并以地方武装围困沈楼、刘寺、王老虎等据点。8月3日夜各部分路秘密插入郭城境内，独立团围困傅庄据点，并进行土工作业。

八团团团长齐丁根，政委李仕才率部，以一部兵力在分区特务连协同下围攻刘口，并将团主力置于刘口，郓城间准备打击郓城来援之敌。

郓北、郓东、郓南各据点，则由地方民兵分别进行围困封锁，以保障七团杨俊生、温先星部队夺取肖垓据点。

8月5日，杨俊生、温先星团五连经过近迫作业，在军分区

## 台前

九二步兵炮掩护下攻克肖垓，歼灭（金堤）刘本功两个主力中队。鄆鄆之间的鄆北基干大队也乘胜以政治攻势和军事威胁相结合的手段，拔除了红船口、张口、苗庄、冯庄等据点。

刘本功在鄆城内得到此情况，大伤脑筋，坐卧不安，惊慌万状，急急忙忙从鄆城城内挑选了12个精悍有战斗力的中队，向刘口增援，与八团阻击部接触，就利用青纱帐绕道窜入刘口据点内。打援部队回击，在军分区特务连的配合下向刘口攻击。刘口原是百多人据守的据点，猛增千多人，面积狭小，必然拥挤混乱，吃饭喝水很困难，更便于我发扬火力。

杨俊生、温先星率部将肖垓据点攻克后，部队正向刘口机动，在途中特务连连长唐子杰向我报告说：“首长，伪军千余人窜进刘口据点去了，我连与八团的迫击炮部队联络上了……”

我马上命令他说：“好，你们连和八团部队要扼守金堤（大堤），将敌围困好……”

齐丁根团长率部队飞速赶到金堤上，指挥部队执行此任务。

同时令杨俊生、温先星七团二营轻装前进，跑步赶到刘口，他们协同八团主力以火力封锁刘口据点的吊桥和大门，将敌四面包围，扎住口袋，把伪军围在刘口据点碉堡里，力求一网打尽。

“刘本功送货上门了，照例收下不打收条，这就是刘本功有力量向我根据地进攻的下场……”。战士们风趣地说。

敌人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狭小据点里，拥挤1300余人，在夏天炎热的烈日下，闷得汗流夹背，气都喘不过来，水也喝不上，饭也没得吃，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士气非常低落，刘本功的本钱也只这么多哟！

城内虽有日本鬼子1个中队，知道我军发动攻势恐慌异常，

自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有闭门固守。

刘本功向日本鬼子请求增援时，日本鬼子中队长说：“上级没有命令，不敢出城增援，若城失守我要受到军法制裁的……”。

“见死不救，这是什么日本皇军……”。刘本功气呼呼的说。

刘本功到此，无计可施了，自己带了两个中队的伪军躲在城东葡萄园里。这是事后刘本功的日语翻译供出的。

对刘口被围的敌人，我有计划地集中了数门迫击炮向据点内袭击，给伪军的有生力量以大的杀伤，又以冷炮结合政治攻势。

战士们对伪军士兵喊话说。“不要打西瓜皮了，不要上当消耗子弹了……”。（我守卫在交通沟内的战士，将老百姓慰问的西瓜吃了剩的瓜皮用棒子顶着放在战壕墙上引诱敌人打枪）。

“伪军士兵们，你们口渴了吗？你们想吃西瓜吗？肚子饿吗？日本鬼子是秋后的蚂蚱，蹦哒不了多久了！郟城的鬼子也不敢出城增援！你们不要替刘半湖卖命了，当汉奸为日本鬼子卖命遗臭万年！”“刘半湖自己不敢来，逼着你们送死！你们不投降，我们打炮轰你们啦！”我围攻刘口据点的战士在喊话。

8日拂晓，我们部队迫击炮、轻重机枪火力齐开火，掩护着八团三连突击排趁着硝烟迷漫之机以勇猛神速的动作占领了围寨东北角炮楼，居高临下，用手榴弹猛烈投掷，围子内激烈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加上各种武器的射击声“叭叭叭、嗖嗖嗖”好象爆花似的！

“八路军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时敌人吃不消了，喊叫着，从西北角炮楼枪眼内伸出白布，喊着“缴枪投降、缴枪投降啦！”吓得说话都结结巴巴！

“放下武器，双手举起来，一个一个乖乖的走到野地集

## 台前

合。”齐丁根团长、李仕才政委严厉命令道。敌人一个个乖乖地举着手走了出来。

“马上送水你们喝，还有西瓜呢！”看押俘虏的战士对俘虏说。

“你们要听民兵的指挥，不要抢水喝，一定给你们喝个够，送西瓜的大马车马上拉西瓜来，让你们吃个饱，”送水来的民兵也神气地对俘虏说。

“谢谢八路军”俘虏兵异口同声地说。

“还要谢谢咱民兵！”民兵说。

“谢谢二哥你们。”俘虏说。

“这还差不多，”民兵说着说着，忍不住笑起来。

战斗刚结束，齐丁根、李仕才、特务连连长唐子杰一同到据点里看了战场情景，敌人死伤累累，臭气薰天。敌人的重伤员躺在工事里、房子里炮楼里呻吟，有的哀求道“八路军救命啊！再也不敢当汉奸了！再也不替刘半湖卖命了！我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救救我的命吧！”

“等会儿我们的医务人员给你们上药包扎，抬你们去治疗，给你们吃饭、喝水、吃西瓜……”我们看守的同志安慰他们说。

“八路军是咱们的救命恩人”，俘虏纷纷感谢说。

“要记着，当汉奸、当伪军没有好下场！”战士们警告俘虏兵。

“是、是，再不敢当伪军了”。

9日那天，用了一天时间，组织民兵用担架抬了100余名重伤的俘虏兵，送到敌占区，尔后由敌占区百姓转送到郓城县城（重伤兵身上都装有宣传品）。这给伪军、伪政府人员以很大的震动。俘虏的轻伤员用大车送到郓城乡里。“共产党八路军真

好”，老百姓们纷纷传颂着。

9日黄昏后，我集中主力强攻傅庄，以九二步兵炮配属温先星、杨俊生团，掩护该团三连向东北角炮楼攻击，以强烈火力击毁炮楼，从被我击毁的炮楼洞口突入据点，登上围寨，以伤亡不到10人的代价，全歼伪军4个主力中队，结束战斗。

我军历经近十天的连续作战，在东起梁山，西至鄆城200余华里的战线上，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沿郓、鄆封锁线（黄河堤挖的封锁沟修筑的封锁墙、碉堡据点）共攻克扫除据点37处，歼灭刘本功部27个中队和鄆城的一部分伪军，俘大队长以下2600余人，毙伤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迫击炮步枪2100余件及其物资一部，平毁封锁沟220余里。解放村镇600余个，群众53万余人，敌人的封锁线，从郓城、鄆城全部被我摧毁。至此，刘本功号称的“铜墙铁壁”土崩瓦解，荡然无存了。根据地向南延伸60里，与游击区连成一片。战役中我基干团政委徐翼同志不幸牺牲。徐翼同志是郓巨县委书记兼基干团政委，辽宁宽甸人，学生出身，中等身材，有文化。作战勇敢，政治坚定的优秀干部。讨伐汉奸刘本功的胜利，打击了死心塌地的汉奸刘本功，也给周围各县的敌伪人员以极大的震动，为我进一步开展敌伪军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 六、讨伐顽军巩固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一贯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地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掠夺老百姓的粮食物资耕牛农具。我抗日军民不但要对付鬼子和伪军，还要对付国民党顽军。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使山东第二专区专员兼山东挺进军。1943年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使山东第二专区专员兼山东挺进军二十二纵队司令孙秉贤部辖巨（野）、菏（泽）、郓（城）、鄆（城）边自卫

## 台前

总团孙勋南部3000余人，占领山东菏泽城东北大吕楼、舜城集、徐胡同、刘楼、红庙等10余村庄。十六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张瑞亭、副专员兼保安副司令和保安二十二旅旅长张子刚部2700余人，占领菏泽东北芦庄、葛庄、马堂一带。定陶保安旅王杰部约2000人建调堡、修围寨，将所占的村镇，筑围墙高10余米，围墙外挖有外壕深两米、宽3米多，外壕外沿设鹿砦、敌设据点的村庄，人民群众敢怒不敢言，盼望八路军快来消灭那些害人虫。

44年11月初，我们决心集中军分区第八团、基干团、独立团，尚和、范县、昆吾、临泽等县大队和巨菏、鄆城、郓南县、区武装向进犯盘踞我根据地之顽军展开进攻，拔去顽军所设之碉堡围寨，消灭孙秉贤、孔助南、张瑞亭、张子刚、王志杰部，恢复我根据地。

我分区以主力齐丁根、李仕才团，李天德、关盛志团，李色芳、江昌华团和军分区直属特务连插入孙秉贤部之防御纵深，分别将郓、鄆边境之大吕楼、舜城集、徐胡同、刘楼、红庙等据点分割包围。齐丁根、李仕才团在炮火掩护下攻刘庄据点，战役向西发展攻徐胡同。军分区直属特务连攻舜城集。

八团于20日攻克了刘楼，歼灭了顽军保安二团和巨、菏、郓、鄆边顽军总团大部。又于12日连续战斗，进攻徐胡同。因初战大胜，有些轻敌，准备不足，未能突破敌围寨。

在重新准备夜晚攻击时，发现敌人突围，追歼战中俘敌一部。

我独立团李得芳、江昌华部，李天德、关盛志团及濮县、范县、昆吾、尚和县大队相继攻克菏泽东北之芦庄、葛庄、马堂一带。此次，保卫我根据地与土顽战斗中，计歼灭顽军保安二团和巨、菏、郓、鄆边自卫总团大部，国民党顽巨野、郓南县政府一部、俘孔勋南以下官兵1300人，击毙顽保安二团团团长马兆龙。另

歼灭张子刚部200余人。马兆龙，老百姓称他为“马虾龙”，他身材矮，小尖头，歪下巴，小眼睛，大鼻子，真是坏人无好相。他不打日本鬼子，专门联合伪军欺压百姓，残害抗日军民，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顽军是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的爪牙和帮凶，因此，顽固派都是不抗日，专门反共反人民，与人民为敌的，我抗日军民为了保卫根据地保护人民群众利益，采取“坚决反击，寸土必争”的方针，沉重打击了顽军，保卫了抗日根据地抗战果实，使顽军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 七、在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

1944年冬至45年春，抗战已进行7年多了。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和人民群众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日寇的人力、物力消耗很大，尤其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兵力牵制住三分之二，使日本帝国主义以战养战的政策失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兵力不敷分配，遂将我抗日根据地周围的兵力南调，冀鲁豫区周围除日本兵大部抽走外，还将伪军驻朝城的文大可部、驻濮阳的孙良诚部抽出南调，维护他的后方运输交通线。抗日战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我抗日军民正处于准备大反攻，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前夜。

近两年来，由于我加强了对敌伪军事进攻，拔除了根据地周围的大量敌伪据点调堡，解放了一些县城，使敌伪占领区不断缩小，我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面对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们加强了根据地内生产，加紧扩充和发展我军的力量，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冀鲁豫区与冀南、太行、太岳四大区连成一片。此时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统一了军事和政治斗争的指挥和领导，隶属晋冀鲁豫军区管辖。

冀鲁豫区党委、军区除抓紧部队军事训练外，为提高干部水平，在河南林县成立了党校，由黄敬同志兼校长、苏振华副政委为副校长，抽调区党委、各地委、军区机关以及各军分区和地方领导干部进行学习、培训。后来规模又更加扩大，为党政军培养了大批干部。

44年冬至45年春，我军区为培训部队团营干部和接收北京来解放区参军的学生，组建了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由军区王宏坤副司令员兼任校长，王宏坤同志是湖北省麻城县人，是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1933年就任红四方面军四军军长，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是我的老首长了。张光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是江西宁都县人，说起话来一口“老表”口音，脸型稍长。是红军干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战斗负伤，左臂残废，很受同志们的尊敬。由我（当时任第八分区参谋长）兼任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行政、教学工作。下设教育处，校务处、政治部。干部由各军分区抽调。学员队有：一队为军事队，培训团营干部，队长为齐丁根（学员兼原八团团团长），二队为政治队，队长黄铎；三队为北京等地来的新参军的学生，队长钟浦，指导员王嘉尧；还有测绘队，学员多为冀南区以及其他抽调来的青年学生。后来又组建了通讯、无线、报务员训练队。

说起齐丁根同志，也是我们的一个奇人。他是江西省进贤县人，是我们八分区有名的猛将。从1930年参加红军已负伤8次之多。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甘肃省曲子镇，与马家军五马的部队战斗一天，敌我双方形成对峙局面。他没有请示上级，夜里自己带一排人马，袭入敌人旅司令部里，生擒马家将“野骡子”旅长，奇迹般地取得胜利，既受到表扬，也受到必要的批评。他有次负伤，子弹射入和穿出的洞口却形状相同。还有一次，在反

“围剿”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的鼻羿上穿进穿出，然后又从左腮上穿进穿出。“创造”了一粒子弹头四个洞的“纪录”。有次在姚庄突围时，一粒子弹从他的左胸打进去，从右胸出来，离心脏仅差一公分，且是从两肋骨之间穿进穿出，未伤到骨头，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他从当战士开始就有一股不打败敌人，不歼灭敌人决不罢休的劲头。这次到随校来学习，就是要提高他的文化与战术水平。

学校校址设在濮阳县境柳下屯。此地是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是濮阳城到山东濮县的交通要道，抗日战争开始时是个大集镇，高大砖瓦房屋甚多，有许多商店、商铺，日本兵占领滑县道口镇和濮阳城后，在此安设据点，常驻一个中队的兵力，盘踞交通要地，连系清丰县城据点。另一方面对付我抗日根据地中心濮、范、观地区。

日本鬼子在柳下屯安设据点碉堡后，毁房拆屋，破坏得不像样子，到处都是残破房屋，街上的垃圾臭气薰天，加上敌人遗留的调堡，沟壕横七竖八，简直乱得没有办法通行。在这样的地方建校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困难摆在面前，就是全靠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动员新来学习的学员和教职员，编好队后，各队自己整理，自己建设校舍。整理校舍都是拆用日本鬼子的炮楼、据点围墙的砖木，学员没有桌凳，就用砖垒，表面用泥抹平，写字、读书报都适用。睡觉的床，周围以砖头垒整齐中间填上土就作为炕。干部、学员并不觉得生活苦，因为战斗在敌后，过艰苦的生活，已成习惯了。大家继承了抗大的校风，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学习劲头十足，干得热火朝天。

教材也是靠自己油印，翻译些马列主义著作印发给学员阅读印本很少，只是发给教员备课时用。土地法大纲、土改、减租减

息教材也是油印的。

简易的教学器材，也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学校在敌后，敌伪情况变化多端，情况复杂，一面教学，一面要同敌伪作斗争，在学习期间也常有战斗发生。没有条件，也不允许购买好的教具。黑板是用锅底下烟薰的黑灰，掺到泥里，在墙上涂成长方形，就成了一块“黑板”。我们还自造了单、双杠、木马。练习瞄准射击，用根棍子绑个三角架，吃了饭或者下课回来各自去瞄几枪。练习用的手榴弹是用木头削出来的木柄练习弹。因在敌后弹药缺乏，部队、学校都有规定，平时不准随意打枪，要注意节省弹药，否则要执行纪律的。学校一组建，就边授课、边修建和充实干部，扩大学校的培训量。

### 八、阳谷战役

1945年7月，我冀鲁豫军区为贯彻党的“七大”路线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于16日下达了组织阳谷战役的命令。我八军分区部队，以五、六、七团及分区地方武装和军分区九二步兵炮连以及九军分区炮兵连为攻城部队，军区骑兵团，特务团及其他有关的军分区为打援的部队。军分区的同志通知我回分区参加攻阳谷城的战役。我是军分区参谋长兼随营学校副校长，学校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规，还有许多事要做，真有些离不开。但作战事大，我将学校的工作做了交待安排，马上赶赴阳谷。

我于20日赶到阳谷城东南角的张楼，这是军分区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见到了段君毅政委、万里副政委，他俩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三人分工在指挥所，曾思玉司令员到第一梯队阵地去了，我们共同负责指挥全盘，先让司令部的作战股长向你讲讲攻城部署吧！”

分区的攻城部署是：以七团配属濮县、范县基干大队，为

第一梯队，归团长温先星、政委威先初指挥，争取以偷袭突破城墙，同时，准备如果偷袭不成以强攻突破阳谷城，歼灭伪治安军第九团。

五、六团配属寿张县基干大队，由曾长柏团长，赵欲樵（军分区组织科长）指挥，先歼灭阳谷城南关伪军会道门，为二梯队，尔后配合第一梯队攻城，入城后歼灭张秋、阳谷县伪军和伪县政府。

以基干团为第三梯队，由傅学阶团长、李彬政委指挥，在西门配合第一、二梯队攻城，突入城后歼灭朝城伪军和伪县政府。

九军分区炮兵，归我车分区直接指挥，任务是支援七团从东门攻城。我军分区之特务连、公安连为预备队。

朝城基干大队由邢大队长、徐政委率领围困王义之治安军据点，相机攻取之，并与一军分区打援部队取得密切联系。

军分区后勤处长朱苾卿同志和专署副专员统一负责兵站部的工作，转运站设在三十里铺。

组织城防司令部，由何光宇任司令、范阳春任政委。负责城防事宜。

我分区指挥所位置第一步在张楼，第二步前移到东关。

阳谷城城墙由石头垒成，高约10米，有护城河，城墙外有两道外壕，一道鹿砦，城墙设有三层火力，墙上设有碉堡、中层有火力点，城墙下有暗堡，城墙各突出部设有侧射火力点，城门楼及四角有堡垒，形成支撑点。大城内有小城，在大城内西北角，构筑有较坚固的核心围寨，围寨四周的民房已被拆除，围墙高，四角设有高碉堡，固守城垣之敌人每人担负5米地段，阳谷城面积约12平方公里，总兵力约2500人。

守城的主要兵力系原北洋军阀大汉奸、伪华北治安总署督

## 台前

办齐燮元部第九团。该敌武器装备优良，待遇高，人称“二鬼子”，有一定的战斗力，第九团团长张育焕曾任第三营长，固守张秋镇时与我部战斗过，善守卫碉堡据点。不善野外作战。

阳谷城内还驻有伪军张秋镇、朝城、莘县、阳谷县大队和伪政府，战斗士气低落。

21日对阳谷城开始总攻击，第一次攻击队受挫，重新准备第二次攻击。24日，突击部队一举攻击登城突破城垣成功，主攻、助攻部队突破城墙，各自按照任务区分，向纵深发展。指挥所将情况报告军区后，杨勇副司令员高兴地说：“望你们迅速扩大战果，彻底消灭敌人，解放阳谷城！”

25日，攻城部队包围歼灭了伪军伪县政府后，经过周密的组织勘察，仔细地察看治安军固守的小围寨的工事、兵力布置的情况，深夜对治安军展开疲劳战术，对核心工事实施佯攻，使守敌惊恐不安，军心动摇。

26日拂晓，分区特务连，七团，六团各一个连，对治安军核心据点围寨实施总攻击。七团营三连趁炮火和炸药爆炸的烟幕，勇猛攻击，一举突破治安军核心阵地围寨据点，占领了敌人大院内的大楼，敌人无法招架，即龟缩固守核心碉堡，企图死守待援。此时五连攻到院内，同治安军短兵相接，进行白刃搏斗。三连连长王金山同志端着机枪向反扑的敌人横扫，杀得敌死伤成堆。王金山连长壮烈牺牲，更激起了指战员为烈士报仇的决心。

同志们奋勇冲杀，一直打到伪治安军九团团长张育焕固守的碉堡，作恶多端的张育焕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残敌纷纷夺路向西北突围，遭我预先置好打突围和追歼部队全歼。这就是死心踏地汉奸的可耻下场！26日上午，阳谷战役胜利结束。

老百姓奔走相告，“八路军解放了阳谷城，阳谷、寿张、

莘县、朝城4个县的汉奸队、伪县政府、二鬼子治安军被一网打尽，八路军为人民群众报了仇。”

近两天来阳谷、寿张、莘县大小村老百姓男女老少敲锣打鼓，人民群众吃饺子庆祝阳谷城解放。还有的群众从几十里路外的地方，给子弟兵八路军送慰问品，有手提的、挑的、人抬、小车推、大车拉的，瓜类、猪肉、羊肉、蔬菜、粉条、鸡蛋、烧鸡等应有尽有。人们喜笑颜开，扬眉吐气！阳谷城周围的老百姓扛着铁锹锄头，踊跃来到城墙上，夜以继日地平毁阳谷城垣的碉堡工事。

经历了6天的阳谷战役，歼灭治这安军第九团，4个县的伪军伪政府。毙伤敌近千人，俘虏2000余人。活捉伪县长4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步枪1600余支、迫击炮、掷弹筒、汽车和弹药、粮食等胜利品。

在阳谷城6个昼夜的作战，各参战部队打得勇敢顽强，我军共伤亡500余人，七团一营营长黄世友、三营营长李华中、基干团政治处主任黎波等军政干部15人英勇牺牲。烈士们为了阳谷解放将热血洒在鲁西北古城阳谷，终于取得了阳谷战役胜利。除掉了敌人所谓的中心据点，粉碎了封建势力的堡垒，使我一、七、八军分区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壮大了我军力量，改善了装备，为我区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阳谷战役结束后，我未来得及参加战役总结，就告别领导同志和战友们。赶返濮阳县柳下屯随营学校，继续这里的工作。

《十五个春秋》潘焱著

红旗出版社 1996年8月

（作者简介：潘焱，见前文）

## 春梅晚唱

——一个女八路的自述

何 挺

###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当娃娃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炮响，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敌人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的助长下，日寇很快攻下了平津等华北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全国多地陷入混乱，老百姓四处逃亡。我们镇上天天都有难民经过，他们拖儿带女，狼狈不堪。镇上天天都有流言，今天日本人打下这儿了，明天日本人打下那儿了，反正是日本人离这儿越来越近。敌机天天轰炸，闹得人心惶惶，哪还有安身之地！哪还有课堂！哪还有书读！亡国之痛深深地刺激着我。这时，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发表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团结抗战。我家联络站的同志们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号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分男女老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一起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广大群众纷

纷响应，大家说，国不保，家不安，全国都这样，又能逃到那里去呢？要想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这一切，使我想起爷爷讲的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想起了老师们和俱乐部里的那些“哥哥们”讲的救国救民的道理。我也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各种活动，在街头巷尾张贴标语、宣传抗日的道理。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我也要为国家尽一份力量，我要参军报国，我要做一个宣传员，写标语、唱救国歌曲、演戏，把我所能给的一切，都贡献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

真正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我的哥哥和他的同志们，他们的言行，犹如春天的雨丝，早已无声无息地滋润着我的心田，革命的种子在我的心里萌芽。

1938年春，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放弃济南不守，逃亡到阿城，省政府就驻扎在海会寺内。他们带来了一个抗战移动剧团，我的几个同学在团里工作。他们见到我说，剧团还要扩大、招收团员。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告诉哥哥我要报考剧团，他很支持，便陪我到剧团所在地应考。接待我们的是位20来岁的女青年，学生打扮，朴素而文雅，她面带笑容地问我的姓名、年龄。我答，我叫涂月英，今年14岁。她又问，你为什么要参加剧团？出来后想不想家？我很果断地回答，我要抗日救国，不想家，有国才有家。她说，这样吧，我来弹琴，你唱个歌给我听。说罢，她走到风琴边坐下，我就唱了一首“渔光曲”。她点点头说，你唱得很好，可以加入剧团，明天来报到吧。愿望实现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在回家的路上，我忽然想，母亲要是知道了舍不得我走怎么办？哥哥想了一下告诉我：“这事你要保密，等你走后，我来和母亲说。”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对母亲说，和同学去看一位老师，要两三天才能回来。看母亲同意了，就赶紧带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离开了家门。

剧团住在镇北的一个祠堂里，进门我先到报到处，办完入团手续。有人发给我一套灰色军衣和一条军被，并领我到正屋套间，这就是我们的住处，我在里面的大干草铺上放下东西。随后，一位戴眼镜的老大姐给我讲团内的规章制度、注意事项和学习内容等，她就是我们的团长吴倩，她和我们女同学住在一个大草铺上。

从此我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和演出。每天早起练嗓子，学发音，早饭后正式上课，学乐理，学唱歌，排练节目。我学到了很多优秀的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其中《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第二部是“弃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第三部是“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人民民族战斗……”。还有《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尤其是那首“向前走别退后，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抢占，我们再也无法忍受。亡国的条件，我们决不能接受，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等等。这些振奋人心的抗战救亡歌曲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现在我还能唱几十首。这歌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团结抗战的热情，也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我们还排练了一些其他节目。我们边学习边演出，随团走遍了村村镇镇，每到一处都演戏唱歌，贴标语，群众给我们起个名字叫娃娃兵。我常常扮演一个父母双双死在日寇屠刀下的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沿街乞讨。演到动情处，我常常在台上痛哭失声。其他同志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是讲东北流亡的女孩街头卖艺，被老板打得死去活来的故事。这两个节目，观众的反应十分强烈，每次都还未演完，台下就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口号。

是年秋，有一天吴倩团长对我们讲，过几天省府又要转移，你们太小，怕行军跟不上，把你们几个人介绍到聊城范（筑先）专员政治部的剧团去。不几天，我和王万民等几个女同学告别了吴团长，来到聊城剧团，和那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起工作。

有一天，家中来信说母亲病了，组织上给我一周的假，回家探望。见到重病在床的母亲，我不知说什么才好。我扑到母亲怀里，哽咽地说“妈妈，我离家时，没有和你商量，怕你阻止我走。现在我回来看你，上级批准我一个星期的假，我要好好地陪你。”母亲不但没有埋怨，反而说：“我的病不要紧，有你姐姐嫂子照顾。你能回来看看，我很高兴。现在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门上来了，你还是早早回去，打日本鬼子吧。”就在第五天的早上，我告别了病床上的母亲。在返回的路上，见逃难的群众很多，一问才知道，日寇正在大举进攻聊城。就这样，我和剧团失去了联系。我只好在哥哥的联络站里一面暂时作些宣传工作，一面打听剧团的去向。

范筑先专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与我党关系密切，共同抗日，但他对“不死守一城一地，与敌人开展长期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很不理解。在强敌面前，他不愿撤退，要“死保”聊城。他说：“有我在，就有聊城在，聊城不在，我又有何脸面去见父老乡亲。”我党再三动员，他仍不撤，最后壮烈牺牲在鼓楼上。和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姚弟鸿等同志。我日夜想回剧团，但由于敌人的封锁，始终打听不到剧团的消息。这时寿张县委动员会也正需要人开辟工作，问我去不去。反正到哪里都是抗日，我就决定到寿张去。

1980年，我得知我们剧团的团长吴倩已是民政部副部长，已退二线。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虽已白发，但精神不减当年。她

见到我特别热情，握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她说，我从你这一双眼睛认出来，你就是当年剧团的小涂，涂月英。你改了名字，不知道你也在北京，可惜见面太晚了。我们俩谈起往事，她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当年在沈鸿烈那里，是党组织派我们去的。为了扩大党的后备力量，我们成立了剧团，把你们这些孩子招进去。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名义下，把你们培养成我党的力量，与国内外敌人开展斗争。后来沈鸿烈越来越反共，党组织决定把我们撤出来，所以就把你们几个娃娃转到范筑先部。范是个民族主义者，坚决抗日誓不投降，和我党密切合作抗日。他那里，政治部实际上全是我党领导的，还有好多部门，都有党组织，你们到那里可以受党的教育，我也放心。这么多年了，我们终于又碰到一起了。”我们俩畅谈往事，说起来没个完。提起这个战友，那个同志，我们俩都非常怀念当年剧团的工作和生活。可惜分别时忘了留下她的家庭地址和电话。过了些日子，我又往她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她已离休了，没有告诉我她的住址电话。后来我打听到她的住址时，她已不在人世了。幸亏上次见面她把剧团的一切都对我讲了，我才知道把我们从剧团转移到聊城都是组织上安排的。遗憾的是只见了一面，就和这位1938年就在一起的老团长永别了，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用以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 战斗中成长

1939年，我来到冀鲁豫边区寿张县动员会，简称动委会。动委会，实际上是我党的领导机关县委会对外的称呼，因当时党的领导机关还未对外公开，对内就是中共县委。当时这里的县城

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就住在偏僻的农村。这里贫穷落后，农民绝大部分都不识字，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生活。他们只知道耕地纳粮，到县城去交税，连县太爷的姓名都不知道。这里的妇女更没有独立的人格地位，是商品、玩物，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为了可以找个好婆家，女孩六七岁就得把脚缠起来，年轻妇女都不准抛头露面，尤其是在婚姻问题上，都是家庭包办，讲究门当户对。穷人家女孩子十四五岁就出嫁，她们的丈夫不是地主的佃户就是长工，有的俩人年龄相差十几到二十几岁。因为佃户和长工要劳动半生，才能娶得起媳妇，进门来共同过着贫穷的日子，这就是门当户对。也有的因欠了地主的债，把女儿卖给五六十岁的地主，往往是这些地主老婆不生孩子，买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做小老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富人家就大不相同了，男孩才七八岁的就给他结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以显示他家有财，早婚早生贵子，说什么四代同堂。等儿子长大了，姑娘也老了。当时我们用这样一首歌来启发她们的觉悟，其中有这样几句歌词：“抗日救国保家乡、动员丈夫上战场，人家的郎前线去杀敌，我的郎还没有枪长。”

我和路宾、吴燕等几个女同志刚到村时，村里人没见过短发大脚的妇女，见到我们都很惊奇，把我们当“洋人”看待。我们开始见到的，只是那些白发苍苍、耳聋眼花的老太太，她们见到我们时，交头接耳不知议论些什么。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工作，当时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动员广大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为便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改变平原作战的地形，我们动员群众拆桥断路。把所有的道路挖成宽2米、深1.5米的沟，我们称做交通沟。村村都通，我们

人和车、马都从这里通行，我们的游击队、民兵还可埋伏袭击敌人，并阻止敌人的汽车、坦克通行。

我们每到一个村就大会小会相结合地进行宣传。有一次，我们分路去开会，我到了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村长把群众召集到打麦场上，他看我小小的年纪，不像个干部，就对我说：“人都到齐了，请你们的上级来讲话吧。”我说，我就是上级派来的，边说边站在石碾上大声地讲开了：“各位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打到咱们家门上来了。他们到处烧杀、奸淫，抢占我们的土地，无恶不作，叫我们给他当牛做马。我们都是中国人，坚决不答应，大家齐心协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誓死不作亡国奴。”场内鸦雀无声，人们都不断地点头。接着，我又把我看见的、听到的逃难人群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讲到伤心处，我泪流满面。散会后，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别看人小，讲的话满有道理，这都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国民党不抗日，还是共产党行，能保住咱们国家。咱们老百姓，也应拧成一股绳，能干啥就干啥，为抗日救国，做点咱们能做的事。”我们还走村串户，在和群众共同劳动中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我们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他们对我们逐渐亲近起来，对敌人更加愤恨。他们认识到没有国也就没有家，要有家，只有抗日救国，才是惟一的出路。在此基础上，动委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了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民兵自卫队。在农村工人较少，我们把作坊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为工人救国会，把雇农、佃农和贫下中农组织为农民救国会。我们女同志的任务是组织妇女救国会，把各阶层的妇女组织动员起来，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这在封建落后的农村来讲，

要把她们从牢笼里解放出来，困难是很大的，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因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妇女受压迫凌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等的旧观念根深蒂固，连相当一部分妇女自己也认为理所当然，命该如此。经过我们大小会议和家访、苦口婆心、深入细致地宣传教育，共产党抗日救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压迫、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道理，使她们在政治上受到启蒙教育，思想逐步开了窍。为了改变传统观念，破除陈规陋习，提高觉悟，我们动员和组织她们参加妇女救国会、姐妹团、妇女识字班。农闲时，还办训练班，教她们学政治，学文化，学唱救亡歌曲，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和“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走”的依赖思想。要想男女平等、自身解放，首先自己要参加生产劳动，在经济上独立，为抗日救国作自己能做的事，如搞好婆媳之间、夫妻之间的和睦团结，使全家都为抗日救国出力。

经过教育，她们行动起来，自动地放了脚；有的报名参加自卫队，在村头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有的先进分子还加入了共产党，为支援前线，彻夜不眠赶做棉衣。我还记得有这样一首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秋风起，秋风凉，民族战士上战场，民族战士上战场，我们在后方，多做几件棉衣裳，帮助他们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打胜仗，收复失地保家乡，中华民族要解放。”还有“数是歌”：“惟有妇女最困难，天生两足多好看，为什么缠成小金莲，脚趾被折断，身体受摧残。”我们的艰苦奋斗、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工作的精神，也深深地感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把我们看做自己人，亲如一家。我们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敬佩。有什么任务，不

## 台前

管是扩军备战，送公粮，还是抬担架，她们都积极响应。自卫队放哨，盘查行人路条，儿童团传鸡毛信。妇女们动员丈夫、母亲动员儿子参军上前线，出现了母亲叫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抗日救国热潮，把根据地变成了铜墙铁壁。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也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自己的阶级觉悟不断地提高。我亲眼看到贫下中农的生活，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抗日救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以后，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使我更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一九四零年，经路宾、侯淑平俩同志的介绍，还不满十八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当时规定正式党员是十八岁）。

## 在鲁西党校学习

1941年春，我进入鲁西党校（后和冀南合并为冀鲁豫党校）学习，学期为半年。党校校长孙光，党总支部书记王镜如。党校下设3个科，组织科科长方志西，宣传科科长李我克，生活科科长张锋兼任大队长。大队下分3个队，一队队长吴亚南，二队队长张见一，三队队长杨鸣。我被编入二队，共12个班，每个班一个女同学，以防情况紧急时，夜行军女同学掉队。我们的课堂，晴天在村头树林中，雨天就在庙堂或祠堂里，背包是凳子，双膝就是课桌。党校没有专职教员，党政领导干部大都兼课。区党委的部长，如申云甫、张承先同志也常来讲课，有时区党委书记也来作形势报告。他们讲的课系统生动，理论联系实际，同学们在讨论

中都能热烈发言讨论，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同学们写的这样一首打油诗充分说明了师生关系的密切：

“党校马列理论讲，祠堂庙堂是课堂，双膝为桌背包凳，树林深处好会场，领导干部兼教师，言传身教好榜样，理论联系实际好，学员牢牢记心上。”

我们的学习课程，以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等。

通过学习，我进一步从理论上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它的必然性、规律性，认识到资本主义本质的腐朽性，帝国主义必然要灭亡。中国近百年是怎样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任务和对象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革命的动力是工农劳苦大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批判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他们宣传的“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反动谬论，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实质，坚定了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革命信念，进一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对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性锻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体会更加深刻。做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要经过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当前艰苦的环境中，时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要能过好五关：战场关，刑场关，法庭关，金钱关，美女关等，要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坚定不移的革命气节。

在党校这个革命的大家庭里，我们不光是学到了理论知识，

而且在生活实践中，我深深体会到了阶级友爱。从校长到每个学员，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胜过亲人，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一个地方住不了几天就要转移，行军时在那泥泞的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身强的帮助体弱的背背包，拿东西，有的还搀扶着走。为使女同学不掉队，每个班都有身强力壮的男同志负责帮助。有个女同学叫任风，她年纪较大，身体也不好，又是近视眼，每次行军男同学都主动帮她背背包，尤其在夜行军时还都搀扶着走。生活上虽然吃“钢盔”（高粱窝窝头，硬的像日本鬼子的头盔）、铺干草，可大家的精神却都非常愉快。一到课间休息时，我们的拉拉队就活跃起来了，这个班来一个，那个班鼓掌叫好，大家又笑又唱。我也是拉拉队的活跃分子，每次都在队前指挥。我们唱“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我们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等。那雄浑嘹亮的歌声响彻了课堂。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精神是愉快的，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完成党交给的学习任务。通过党校的学习，我对毛主席的英明论著、马列的哲学思想，还有辩证法、唯物论，联系实际生活中看到的地主对穷人的剥削压迫，从感性的同情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的高度，进一步提高了对认识论、方法论的理解，确定了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生观、世界观，加深了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的坚定信念，也更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这段学习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 在残酷的反“扫荡”日子里

学习结束后我仍回寿张县，组织上叫我担任县妇救会宣传部

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县妇救会主任是张露，组织部长吴燕兼七区妇救会长。我们在已有的村妇救会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提高妇女的觉悟，配合村党支部，发展妇女党员，使广大妇女进一步团结在了党的周围，发挥了她们的作用，为支援前线贡献力量。

环境越来越艰苦，军情越来越复杂，险情时有发生。有一次我们住在吕家村，前院住的是区公所男同志，我们几个女同志住在后院，半夜里睡的正甜，在梦中朦朦胧胧地听到“叭叭”的响声，还以为是谁家娶媳妇放鞭炮喽。我慢慢地醒来，看到窗外一道道火光，我这才完全醒过来，是枪声！不好了，敌人来了！正在前院和区公所的同志们打着呢，我说“敌人来了，快跑！”当时，如果打开后门进入交通沟是完全可以跑掉的。我们中年龄最大的李瑞青说，不要紧，可能是土匪来绑架房东！她们都爬在床底下，怕枪打着。我见她们不信，就迅速溜到厕所。这时听到房外有人说，“这屋里还有人。”有人朝后院走来。我在厕所里碰上房东父子俩正在翻墙，他们急忙把我也拉到墙外。他们跑了，因当时情况不明，我也不知有多少敌人包围了村子，只好就近藏在喂牛的麦糠堆里。我把嘴捂起来，因稍不小心，麦芒子就会吸进嗓子里。只听得村子里狗叫声，哨子声响成一片，敌人正在搜查。几个汉奸就从麦糠边走过去，险些踩到我，我捏了一把汗。天快亮了，村子才静下来，我扒开麦糠，从缝里往外看。自卫队员们正在议论，说是梁山的汉奸来了，昨晚打了区



1941年于寿张县妇救会

公所，但区长又被救出去了，只带走了后院的几个妇救会的女同志。听到这里，我才从麦糠里站出来。他们发现了我，高兴地替我掸掉满身的麦糠并告诉我，我们已有人去县委送信去了，我说，我也要到县委去。

我来到县委驻地，见书记高黎光、副书记陈亚琦等同志一边吃早饭，一边议论昨晚区公所被敌人袭击的事。他们已知道跑出来一个女同志，正在猜测是谁，大部分人都猜可能是小涂，因为她……话说完，我来到了他们面前，他们高兴地说，真猜准了吧。我把昨晚的情况详细汇报了一遍：“梁山的汉奸只知道前院住的区长，不知道后院有我们。他们打完了区公所又到后院才发现我们，其实在这个时间我们完全可以从后门跑掉，就是李瑞青估计错了，助长了大家的麻痹思想。我是房东从厕所里救出来的。”“能跑出来就不错了，快去洗洗吃饭吧！”同志们热情地打水端饭，这时我这颗心才放了下来，真是有惊无险。

幸亏被俘的女同志只在汉奸那里押着，没有上交日本人。汉奸们贪图钱，组织上就通过各种关系，先后把她们营救出来。但那个李瑞青嫁给了汉奸翻译，后来听说，她又带着那个翻译投降到根据地里来了。结果，我们之中有一个伙伴，她的家长不让她出来了。其他两个同志，仍然是坚定不移地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直到胜利。

1941年—1942年，是日本法西斯势力最猖狂的两年，敌人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目的在于强化日本对华北的占领，使华北变为日寇巩固的后方。他们的方针是以军事进攻为主，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的总体战，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和“蚕食”、“清剿”、“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敌人到处碉堡林立，分割封锁我根据

地，使我根据地逐步缩小。此时我冀鲁豫边区又发生严重的灾荒，雨水奇缺，河渠干涸，大地龟裂，又逢蝗虫四起，秋季的原野一片枯萎，使得灾区人民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地主老财囤积居奇，不但不拿出一粒粮食救灾，反而趁此机会拿粮食换大姑娘作小老婆、做丫环，一斤人换一斤粮食，姑娘们为救全家老小不被饿死，就在大街之上自卖自身；还有的新婚媳妇，改扮为大姑娘，丈夫相送。那种边哭边走的情景，催人泪下。

当时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召集地主士绅开会，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捐粮救灾。他们不但不拿，反而用反动的言论来攻击共产党，动员会成了辩论会。黄敬同志义正辞严地驳斥了他们。他们闭口不言，但始终没有拿出一粒粮食，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党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坚持对敌斗争，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宣传组织群众坚定胜利信心。我们一方面动员群众空室清野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一方面安置灾区灾民组织生产救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起吃糖咽菜，从口粮里节省下粮食救济灾民。当时男同志上树弄树叶，女同志就挖野菜。就这样我们共同渡过难关，战胜了灾害。

1942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以战养战”，把中国战场作为“大东亚神圣兵站基地”，更加疯狂地推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开始了所谓的“铁壁合围”。这就是冀鲁豫抗战史上的一次极为残酷的“九·二七”大扫荡。

9月27日早上，我还在小袁楼村（今属台前县侯庙镇）参加县委会议，自卫队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发现了敌人！我们急忙收拾文件，准备组织群众疏散。县委书记高黎光同志说，赶快组织群众疏散，晚上回来在这里继续开会。说罢，各自带领群众进入交通沟。我和村妇救会主任袁大娘，为帮助妇女儿童疏散走在

最后。敌人已进村，我们来不及走了。为了不连累大娘，我决定我们分开走。袁大娘却一把拉住我，就往她家跑，进了屋子。屋子里面只有一个土炕和锅、碗、瓢、盆等伙房用俱，无处藏身。袁大娘急中生智，叫我躺在她那黑古隆洞的炕头上，再用棉被把我包起来，她就盘腿大模大样地坐在炕上，假装残疾。这小屋长年烟熏火燎，窗户像豆腐块那么大，透过像萤火虫似的一点光，屋子里黑乎乎的，大娘蓬乱的头发黑瘦的脸，像无事一样坐在那里。不一会，人喊马叫，敌人来了。我在被子里又闷又热，喘不过气来，只听见自己的心砰砰地跳。我想如果被敌人发现，拼死也不能当俘虏，更不能牵连大娘。外面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一个汉奸进屋向大娘要碗筷，大娘平静地说：“我的腿瘫痪，下不去，你们自己拿吧。”外面鸡飞狗叫叮叮当当，是敌人在吃饭饮马。就这样乱了约有四五个小时。天快黑了，敌人滚蛋了，我才从被子里出来。敌人并没有走远，就在离这里三里路的红庙大村子里安营扎寨，那里灯火通明，鬼子汉奸跑来跑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也不敢外出，就和大娘一起吃了晚饭，饭后悄悄地走到开会的地点村支部书记家。等到深夜，县委副书记陈亚琦同志回来了。这时四周的大村子都住上了敌人，看来敌人明天会“清剿”。支书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转移，还是下地窖？”我们下定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下河东、到敌人后方去。就这样，我们俩拿着一颗手榴弹，如果碰上敌人，就同归于尽。村支书送我们到村头，我们俩顺着干枯的黄河故道向东而去。

我们走到离寿张县城三里路的小王楼村，在村支部书记家的地窖里住下来，准备下一步的工作。陈书记讲，敌人扫荡我们的根据地，我们也在他的后方开展工作。为减小目标，我们俩分开行动，第二天夜里我来到邓家楼。这是个大村子，有个党员住在

村后很偏僻的地方，晚上到这里来不容易被人发现。这个党员被派到附近小吴据点里当了名义上的汉奸队长，实际上是我们的情报员。一般情况下，敌人不会到他家来。我就在这里晚出早归，到炮楼附近的村子里召集党员开会，要求大家带领群众，克服当前的困难，坚定胜利信心，坚持对敌斗争。对汉奸作争取瓦解工作，叫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鬼子长不了，别做坏事，将功折罪，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做出贡献。就这样，我在党的领导下在敌人后方坚持反扫荡斗争。敌人在我根据地扫荡后回到据点炮楼，我也返回根据地工作。

有一天，我到小袁楼布置妇救会做军鞋的任务，又见到了袁大娘。她拉住我，关切地把我从头到脚看了好几遍。我俩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只是互相看着对方，渐渐地我们俩的眼眶都湿了。大娘还是那么积极地接受了任务，在她的带领下，妇女们用她们勤劳的双手做鞋做袜，保质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离开老区多年了，但同志们一提起“九·二七”三个字，当时小袁楼的村民、支部书记的身影就出现在我的面前，尤其是妇救会主任袁大娘那镇定自若的神情，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永远地怀念她。

## 战火中相识结伴

在那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加上战事频繁，很少能有时间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不像今天的青年情侣们，有频繁的情书来往，有亲密的公园约会，有花前月下卿卿细语，更谈不上有那种先恋爱再结婚的甜蜜过渡。我们大都是经战友们介绍相识，再经过短时间的互相了解，建立起革命的友谊，

这也就算我们的恋爱生活了。

那是1942年的初冬，残酷的“九·二七”大扫荡刚刚过去，我和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同志同在妇救会工作。那时，冀鲁豫边区的妇女救国会叫妇女救国总会，主任是郭军。各地委设妇女救国分会，万丹如同志是我们分会主任，边涛同志是分会的宣传部长。我是寿张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和边涛同志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可算是很熟了。战争年代，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军分区统一在地委的领导下，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军分区司令员是曾思玉同志，地委书记段君毅兼政委，副书记是万里，藩焱则是由抗大新调来的参谋长。藩焱在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中失去了亲人，他的爱人厂虹是一名军医，身怀有孕，突围时不幸被俘。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后来在狱中产后大出血，母女双双惨死在狱中。领导班子的同志对这位新来的参谋长都非常同情。尤其是副书记万里同志，在战斗和工作之余，常陪他下棋、谈心，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他的眼里，藩焱同志是个文武双全的军人，工作细致、全面，和地方工作的同志配合得很好。藩焱同志白天坚持繁忙的工作，晚上常因怀念妻子长夜不眠，是个多情的军人。他谦虚待人，即有军人的风度，又温文尔雅，在军事干部中是比较少见的。万里同志把这些情况向夫人边涛讲了。经万里、边涛介绍，我们相识了。

记得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早上，边涛同志对我讲，近来第二军分区新调来一位参谋长藩焱同志。万里同志了解他，此人处事周到，和地方的同志工作协调得很好，他虽然是军事干部，但很文雅，待人接物非常热情，我想请你们认识一下。那时我还很孩子气，根本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未

加思索地说，看看就看看，反正决定权在我手里。他如是个大老粗，就不谈。按说他俩的话一般都是真的，但毕竟是他们领导同志看法。过了几天，边涛同志叫我到她住处。这位军人真来了，一身整洁的军衣，面带笑容，进门先向边涛同志很有礼貌地行了个军礼，问候身体情况。边涛给我们二人做了介绍后，就推说有事出去了，让我们谈谈。

藩焱同志首先做了自我介绍，他自小家境贫寒，念过几年私塾，13岁参加红军，经过长征到延安，并在红大学习，后红大改为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调军分区，现年27岁……我也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告别了。我见他服装整洁，外貌英俊，又有礼貌，既有军人的风度，又文雅大方。简短的面谈，互相间的初步了解，我在心里基本上默认了。我觉得，不管他任什么职务，起码外貌端正，有文、武兼备的风度。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和边涛同志讲的基本一致。他果然军而不粗，但内心世界还有待进一步了解。后来只要是在战斗空闲，他就叫警卫员送来信，讲战斗、学习，讲思想。有一次他随信送来保存了几年的在抗大的笔记本，封皮是马恩列斯的头像，只用过两页，是写的学习心得。信中说，这是他心爱的学习本子，现在送给我，以表对我的爱……只有抗大才有这样的笔记本，它传送了我们的爱情。虽然在战争年代，没有那些温情细语，但从来往信笺中，我进一步了解到他是一个多情的军人，又有初步的文化基础（那时的长征干部大都不识字），外貌英俊，作风文明大方，不足之处就是身材矮了点、年纪大了点，这方面使我举棋不定。又经过几次的面谈和边涛同志的劝说，我才下定了决心。那时能有什么情书热恋！只是在战斗和工作的空闲里，争取时间，见个面而已。几个月过去了，双方建立了革命的友谊，这就算是

## 台前

结束了我们的恋爱生活。经过几个月的考察，由加深了解到建立革命友谊继而打下了爱情的基础。后来听边涛同志对我讲，他对我的印象也很好，他感谢边涛帮他找到一个意中人、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干部。我们每次见面只能是在打完了一个仗部队修整的时间，看见双方都很安全，就都放心了。再次见面的时间，谁也不可能知道了，那要根据情况而定。就这样见过几次面后，我们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1943年5月，部队在休整的时间里，我们买来了几斤花生和红枣，请同志们来玩玩，就算是结婚了。记得当天晚上，还组织了一次演习。新婚之夜，藩焱没睡多久，早早就起身组织演习去了。先在村头放两枪，部队紧急集合，队伍拉出去了。我知道这是



1957年10月于北京

是演习就没有出去集合。我因“近水楼台先得月”走了一个小小的后门，多睡了几个小时觉。部队跑了一圈又回原地吃早饭，这时女同志们发现队伍里没有我，才知道这是一次演习。后来她们一见到我就打趣，嘻嘻哈哈

笑个不停。这成了我们新婚之夜的纪念。

婚后我仍回原单位工作。

1943年，我与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参谋长藩焱同志结婚后，组织上为照顾夫妻关系，我被调入部队，离开了和同志们一起开辟的寿张县抗日根据地。

（本文文字资料和图片节选自《春梅晚唱》海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何挺著）



何挺，原名涂月英，汉族。1924年2月24日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1938年春，参加抗战移动剧团，走上革命道路。1939年，参加冀鲁豫边区寿张县抗日动员委员会。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春，进入鲁西党校（后和冀南党校合并为冀鲁豫党校）学习，随后任寿张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1943年初，到抗大陆中青年队学习，1945年1月，调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处工作。历任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部干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科长、第二野战军五兵团直属机关政治部组织科长、贵阳纺织厂军代表、南京市政府人事局人事科长、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党总支副书记、长春市朝阳区政府人事科长、北京市卫生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山东海洋学院人事处长、国家海洋局办公室主任。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2005年、2015年分别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2017年5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以上何挺简历资料来源于中红网北京2017年5月27日电）

## 我的革命生涯

陈亚琦

### 岁月的痕迹

我于1920年2月9日出生在北平通县，年幼随母亲到济南团聚。并在济南一师附小读书，毕业后考入济南省立女中。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时常到普利门书店去看杂志和进步书籍，特别喜欢看邹韬奋的《生活星期刊》，激发了我抗日救亡的热情。“西安事变”震惊全国，广大人民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女中英文教员彭畏三说共产党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红军愿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日。由于形势的发展，学校全都停课，一天看到省立第一师范门口有“181师招学兵队参加抗日”的告示，就报名参加了“181师”，1937年11月就离开济南开赴前线了。

### 晋冀豫党校的学习是入党后的里程碑

181师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是东北军。我党就利用北平东北救亡总会和东北中学的关系派东北籍的共产党员打入该部工作，成立了181师共产党工委，我的入党介绍人于克同志（是

原吉林省委领导)就是工委的负责人。师长石友三曾派东北籍共产党员张克威携师长的亲笔信去见毛泽东,要求派人到该部工作,毛泽东就派了20名男女党员到该部工作。国民党逐渐发现该部已变成粉红色了,就派了特工到该部,排斥和控制我党的活动,我党把公开派进的就全部撤出。该部党的负责人王乃天同志(曾留学日本,建国后任民航副局长)因不了解我已入党,竟让我担任女工队长,我不同意并向该部的负责人赵濯华(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同志提出去党校学习,他随即给邢台八路军办事处写了条子送我去晋鲁豫党校学习。派人把我送到了晋鲁豫区党校,毕业后即分配工作。我们这一批全部到山东省委工作,过平汉线就是冀鲁豫区党委,但是报到后立即通知我们全部留在冀鲁豫工作,我开始在二地委宣传部工作。1940年地委书记万里同志让我到寿张县任代理县委书记,寿张已有县长郭少川,组织部长李哲,我后来是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县委书记是一元化领导,县委委员深入基层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如对敌斗争问题、农民生活问题、支持游击队问题、内部卧底问题等,是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有分工有合作。我曾午夜带干部在河堤上和卧底见面,并把情报送给昆张支队吴忠队长。我代理书记两年,是很好的磨练,提高了能力,增长了知识,这是历史上最艰苦最愉快的一段。

## 一对恋人两个奇迹

奇迹一：子弹走弧形，从上腹进去却从下腹出来。

由于情报迟缓，敌人扫荡突然而至，随即分头率部突围，1941年段君毅就是率部突围时，因他个子高，目标大，骑马走在前头被敌人迎面打了一枪，他从马上摔下来说“敌人有埋伏，

赶快转移”，警卫员把他扶上马立刻向冠县转移，就在一个小村庄住下。晚上卫生员给他换药，白天就到青纱帐躲藏，因无消炎药，只是用盐水泡纱布条消毒，聊城专员王笑一同志给他做鸡汤面条，他说你们再这样我就不在你们这里住了。

笑一同志说“你不是受伤了吗，治好，好去工作啊！”这一枪也真是奇迹，从上腹部打进去的子弹却从下腹部穿出来，在肚子里走了个弧形，未伤及内脏，一颗子弹打了两个眼儿，等于高温消毒，愈合较快。冠县杨愚震同志（建国后任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还请中医给他治疗，段君毅任河南省委书记时中医李蓬州带着孩子去郑州看他，君毅很感谢他的照顾治疗。君毅到北京工作后也对杨愚震同志感谢并见了面。

奇迹二：历经艰险，机智逃出虎口。

1942年突然“九·二七”大扫荡，县委正开会，一听枪响立即散会，顺着沟向东跑，沟深，两侧全是高粱和玉米。这次扫荡规模很大，敌人出动日军一万余人、伪军三万余人，包围扫荡濮范中心区。我们跑着跑着就跑散了，我和少数人跑到高唐村隐蔽，该村距小吴据点只5里地，因为是“灯下黑”却忽略会有敌伪内线。敌人进村后就把我从棚子里拉出来，并把我带回据点。一个农民孩子因害怕跑回家，引起敌人怀疑，敌伪把他拉回来放在我面前说：是不是你的通信员？我说：我没有通信员，他是这个村的老百姓。我对他们说：都是中国人不能坏良心，你们兔子尾巴长不了，早晚是八路军的天下。到了敌人据点里新民会主任张子洁的老婆孙某曾在妇联干过，她见到我后说我认识你，我说我不认识你，我叫王新，她没说话就走了。敌人问我在八路军里干什么，我说在八路军里做鞋袜，我丈夫是八路军伙夫做饭，说明我们夫妻都是农民。又问我高唐的共产党的领导叫什么名字，

我一概说不知道。我的口供始终未变，他们还是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敌人把我放到汉奸家属院，是和孙某的母亲住在一个房间里，家属院住的有三家，翻译官李某夫妻，伪军队长孟某夫妇，第三家就是新民会主任张某夫妻了，前院全是汉奸兵，被捕一个月也是提心吊胆。事又凑巧，第二天孙某要把小孩送到邻村奶母家，她还有个包袱是孩子的衣服，我立即扮作保姆帮她拿包袱跟她走。门口有吊桥，白天可以出入，晚上吊起来防八路军。孙某走到门口，汉奸说你可小心，别让八路太太跑了。我紧随地沿沟边走，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内沟的沟角上有一棵大粗树，很多树根耷拉到沟底，拉着树根可以上来，再继续往前走又看到第二道外沟有坡可以走上来。对于两道沟的全貌我全看清楚了，利用此地形逃出来是毫无问题的，我下了逃跑的决心，利用晚上吃饭时逃跑。日军的院子和汉奸的院子是两个平行长方形的院子，我住的房间左侧紧靠两院结合部，是个矮墙，墙上有垛口可以踩着跳过墙就是内沟，平时已经发现而觉得有利，我住房的右侧有个岗楼，岗楼的窗口可观察有无八路军侵入。吃饭的时候岗楼哨兵跑前院去吃饭，所以我利用吃第二碗饭的时间伪装到厨房盛饭，我身轻胆大干净利索即从矮墙跳到内沟，沿沟边走到拐角处，拉着树根就上来了，随即我跳到外沟顺着坡走上来，已完全脱离据点。上来后如何走呢？毫不犹豫立刻远离正路，从田间走，玉米和高粱已收完了，只有红薯秧子还有小窝棚。我一面走一面趴地上听听看看有什么动静和变化数，忽然发现有两匹马过来，我立即脸贴地，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等敌人过去。

我跑出敌伪区到了六区的义合村，村干部正在烤火为给敌人送粮食做准备，他们认识我，我相信干部和老百姓还是白皮红心，我说我随大部队行军掉队了，你们派人把我送过河吧！黄河

改道全是沙子，村干部派了两个人把我送过河，住到薛庄关系户薛景春家同她母亲同住，第二天一早我即找到县委了，见到书记高黎光、县长郭少川、组织部长李哲。他们很惊讶：“你怎么跑出来的，我们想了许多救你的办法都没办成……”。

同志们是问到点子上了，确实是在两道壕沟围着敌人的据点，一个孤身女兵怎么跑出来呢？我曾做最坏的准备，可能政治生命彻底完了。在随时发生危险的环境里，竟意外发现有利的地形，还不趁机逃跑吗？就是有危险也豁出去了。梁山县委在党史中说我“机智逃出虎口”，我认为在万分危险之时确实是要有勇有谋，如犹豫不决就错失有利的机会，如果不敢冒险逃跑，哪有今天啊。

我被捕一个月，党组织未受到任何的损失，我立场坚定，历经艰险一个人机智逃出虎口，同志们普遍认为是奇迹。我自己也未曾想能逃出来，一对恋人两个奇迹，这就是抗日战争敌后斗争的写照。档案中又没有当时县委李哲写的原始报告，所以审查了四十六年，才彻底平反还我清白。我跑出来的消息，县委立即报告了地委，地委通知县委把我在被捕期间的表现调查清楚写出报告。组织部长兼敌工部长李哲同志通过内线了解我在被捕期间的表现：“我未暴露身份，党未受到任何损失，”报告呈报地委和区党委，黄敬同志见了我说，你可到沙区去调查研究，我明白区党委要审查清楚后才能研究我的问题。

### 曲折的婚姻

被捕前段君毅亲自登门相亲，虽然交谈过但未进一步考虑。我逃出虎口后李哲同志曾写我被捕后表现的报告我并不知道，段

君毅同志2004年3月去世后，2005年李哲同志到北京对我说怎么还审查，你逃出虎口后，万里同志即让我写了报告，“文革”中也找我调查了，我说“文革”中万里同志还对专案组说“陈亚琦没问题”，但也未平反。李哲同志从湖南农业厅长岗位上离休了，可是我的档案中没有他最原始的报告，他回长沙后又给我写了当时调查的情况，李哲同志对我当时在寿张工作时的叙述：“陈亚琦能写能讲，有一定的理论水平，马列主义书读的较多，有工作能力，原则性强，工作大胆泼辣……。”我将他写的信和调查情况交给了中组部，中组部同志对我说已将李哲信存入档案。区党委审查了县委报告后即通知了段君毅，他了解我被捕没问题，在1943年就和我结婚了。从1938年他到泰西任特委书记，他办了离婚手续五年后才考虑个人问题的，当时有个妇联干部对他婚姻问题的处理提出质疑。黄敬同志亲自对这个女同志说你思想要跟上形势。段君毅虽听说了这个情况，他竟然建议我去延安学习，我觉得很突然，他说“你放心，我等着你”，我在延安学习，他确实等了我两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濮阳，他一见面就拉着我去见他父亲，我给老父亲鞠了躬，并叫了一声“爸爸”，老人笑了。

### 关键时刻保护干部

“文革”期间，群众是广泛发动起来了。对每个人都是考验，段君毅对党组织成员交待，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质疑和批判一律说是部党组决定的，我是部长我负主要责任，他打电话给北汽党委书记冯克说：“运动如何发展还不够明朗，你要注意观察运动发展形势，分清是非，坚持党的原则……。”批斗所

谓“叛徒”汪道涵时，造反派说段君毅你为什么不举手，段说：

“我没有看到他的自首书。”汪道涵说：“君毅是大事清楚，小事宽容，因此干部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他在关键时刻坚持原则保护干部，是众所周知的。

袁振同志从山西来中央要粮时，问总理张霖之是怎么死的，总理说是他杀。对张霖之同志被迫害致死，段君毅深感悲痛。君毅于1970年将去四川工作。临行前他请示总理还有什么指示，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走。一天总理办公室通知段君毅晚上来，总理问他张霖之是怎么死的？君毅说总理可调公安部照片审阅，他遍体是伤，只穿一条秋裤。段君毅曾和民政部商量，张霖之应定为烈士，民政部不同意，段君毅就找了中组部，中纪委。又请示了彭真、乔石、薄一波等同志，于1993年12月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追认张霖之同志为革命烈士，历时28年。霖之同志夫人李蕴华同志说：“君毅同志为霖之同志恢复名誉，十余年奔波操劳，此事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 午夜敲门

一个深夜，周子健同志带着儿子骑自行车来家和君毅交谈，共同分析形势，商量对策。

我是时刻关心和维护君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天午夜有人敲门，我开了门，是北京汽车厂一个工人，开一辆吉普车来了。他对君毅说你跟我走一趟，段君毅已经睡了，家中只有我们夫妻两人，如果拉走凶多吉少，我意识到危险的兆头。我立即到办公室拨通了红机子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情况，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你让他和我通电话，我说总理办公室要和你讲话，即把电话

交给来人，总理办公室对他说总理指示不能随便把人带走，如果带走一切后果你负责，要批斗你明天和一机部联系，来人放下电话就走了。段君毅说生命竟然没有保障，太危险了，我说这是周总理救了你。

### 段君毅是跟路线不跟人

“文革”中段君毅在人民大会堂，偶然遇见江青，两个人走了个对面，真是狭路相逢。江青对段君毅说，咱们是不是在中央党校一块儿学习的？段君毅说你记错了，你比我高两个班呢！江青说“噢啊，”记不起来了。其实段君毅和江青在学校不仅是一个班，还是一个组。段还曾对她说：“你记得臭俞吗？（指黄敬的外号）”江青赶紧说“你不要说，这里没人知道”。在一组学习，她已记不起来了，当时她还不认识毛主席，现在江青“四人帮”兴风作浪，君毅清醒地千方百计地回避，否则大祸临头啊！老同志对他事情的处理说：“老段是跟路线不跟人啊！”

### 老百姓送我三尺百寿图

因为和杨汉斋家的联系，村干部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村里不通公路，生产无法发展。我建议他们汇报县委和省委解决，但是他们跑了多次不能解决问题，对我说我们自筹资金吧。我想村子小，人口少，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即捐了两万元，然后又给中共济宁市委写了信，只是以普通离休干部名义写的信，没想到市委书记孙守刚非常重视，派人考察了情况，投资20万元解决问题，并给我回了信。该村老百姓很感动，就送我一个三尺“百寿图”。

## 远涉重洋的一课

我在“文革”后任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副经理，两次去日本学习考察，第一次是1979年和一机部共同组织15个人，去日本小松制作所学习全面质量管理的经验，回来在北京和河南作了两次汇报，受到欢迎和好评。第二次是1980年我一个人去日本，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派十五个人在日本五十铃公司所属车体株式会社打工，日本称研修生，分到装备车间，油漆车间等干活，他们均表现好，还有合理化建议，但日本给的费用不够，我去向日方交涉增加费用，在日本的生活费用从上交企管协会的费用中扣除。我在日本交通往返从不坐出租车而是地铁或公交，在车体株式会社举行告别宴会，是我和研修生自己做饭，把我带去的酒、字画、磁器、茶作为礼品送给车体株式会社的领导，经我交涉，日方又给了127万5千日元，全交到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我回到北京后，经委一个女同志打电话让我去算账，她竟然不知经委是如何批准的，我说就是一张往返飞机票，没有任何其他费用，算什么账呢？她也无话可说，把电话挂了。

##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1958年到北京市机械局任副局长，主管人事，但听说有人写信给北京市委说陈亚琦被捕过，因此改任主管技术和产品质量的副局长。因为被捕一个月冒险逃出虎口，每次审查都不相信是自己逃出来的，一直控制使用任副局长长达30年，直到1987年中共梁山县委整理党史对我写了两段：一是“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二是“机智逃出虎口……”，我把原件交给北京市经委和电子工业部，两单位都承认几次审查结论不一，难免不影响使用。

1988年12月，中共电子工业部审查决定如下：

经查阅，中共梁山党史大事记和向中共山东梁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高玉春同志等调查证实：陈亚琦同志在被捕期间，对敌斗争坚决，敌人威逼她说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地下干部，她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咒骂他们是汉奸，“兔子尾巴长不了”，在敌人的威胁下，拒绝承认高玉春是她的通信员，并且说“咱们都是中国人，说话办事不能坏良心”，保护了群众，使高玉春同志免遭逮捕。在敌人审讯中，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在关押期间，她机智灵活地侦察好地形，勇敢地逃出了虎口，“机智脱险”，一个月后回到革命队伍，找到了中共寿张县委。陈亚琦同志，在被捕期间表现很好，这段历史应予肯定。

由于陈亚琦同志被捕问题结论的历次变化情况，在长期使用中很难不受一定影响。为此决定陈亚琦同志作为正局级干部离休。

2009年中组部决定陈亚琦同志享受北京副市长医疗待遇。

我离休后是经信委老干部处管理。我在2007、2008年获得荣誉证书，2010年又获得荣誉证书，2009年8月经信委党委对我做了政治审查报告，原文如下：“经审查，陈亚琦同志在历次政治事件中，头脑清楚，立场坚定，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治上没有问题。”这是对我70年革命历史的盖棺定论。

由此我想起中央在段君毅同志生平中写道：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把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又说“他心地善良、待人

## 台前 革命生崖

宽厚，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我们俩人均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真是殊途同归。我们二人不在一个单位，不是一个时间，这就不但是共同语言，而是意志相同、心心相印、能共同生活六十一年。今天借用周总理的两句话：“患难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啊”！

《革命生崖》编写组 编

姜鸿树 编

陈亚琦，1920年2月出生，1937年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读书时开始投身革命，17岁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被派往山东，曾任寿张县代理县委书记。现任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

## 杨勇同志在冀鲁豫

赵健民

杨勇同志逝世以来，我们这些曾经和他多年相处的战友，常常沉浸在悲痛的回亿中。杨勇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他的英雄业绩、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杨勇同志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他不仅治军严谨，作战果敢，而且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和杨勇同志相识，是在开辟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初期。1939年春天，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罗荣桓政委、陈光代师长率领下挺进鲁西。杨勇同志任第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那时，日寇开始“扫荡”我后方，津浦路以西的山东西部是日寇进行“扫荡”的地区之一，在泰山西地区，我党发展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在鲁西北地区，由于日寇的进攻，同我党合作的抗日将领范筑先壮烈殉国，我党领导的地方武装改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菏泽、济宁、郓城等鲁西南地区，为日伪军盘踞，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杨勇同志到达后，指挥部队经过一夜战斗，全部歼灭了郓城北部攀坝伪军1个主力团，俘虏伪团长以下570多人，并重创前来增援的日寇。这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鲁西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大大鼓舞了鲁西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39年3月，一一五师继续东进，杨勇同志率第六八六团一部留在鲁西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部队，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七月初，第六八六团扩编为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独立旅，杨勇同志任旅长兼政委。8月1日，日寇一支400多人的部队进犯我梁山地区。我独立旅第一团三营和师部直属部队两个连，经一昼夜战斗，全歼敌人于梁山附近独山庄，毙敌田中少佐以下400余人，生俘日军20余名，缴获野战重炮3门。梁山战斗，是我军在兵力与敌相等而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全歼日本侵略军的一个模范战例。8月底，我军又在梁山与日伪军5000余人激战一昼夜，粉碎了日伪军的大“扫荡”。这一胜利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为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梁山战斗后，一一五师进入鲁南。从此，杨勇同志率领一一五师独立旅，在鲁西区党委的领导下，率领鲁西地区的人民武装，发展鲁西抗日根据地。到1939年底，建立了14个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鲁西北和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杨勇同志兼任第一鲁西行政督察专员，初步统一了政权的领导，并在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和民主选举政权。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老牌汉奸石友三向我冀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并将高树勋部调到鲁西北濮县、观城、范县一带。盘据在鲁西和冀南地区的丁树本、李树椿、齐子修、朱世勤等顽固派，也蠢蠢欲动。1940年2月中旬，石友三部在冀南遭我痛击后窜到清丰、南乐、濮阳和濮县地区。为了粉碎顽固派的进攻，我军在程子华、宋任穷同志指挥下，进行了冀鲁豫边区第一次讨逆作战。一一五师独立旅和冀鲁边区第五支队组成了左翼纵队，杨勇同志为纵队长。3月4日攻占了濮县县城，歼灭高树勋新六师一团一部及李树椿保安部

队大部，迫使其他顽固派军队向西溃退。4月间，杨勇同志率领的一一五师独立旅改为黄河支队，并沿用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番号，同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同志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肖华同志为旅政委兼军区政委。经过1年多的斗争，鲁西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并逐步巩固。

1940年冬，日寇在我百团大战中遭到惨重打击后，对我根据地的“蚕食”、“封锁”、“扫荡”日益加剧。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冀鲁豫边区的顽固派也日趋嚣张。为了反击郟城日伪军对我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1年1月7日，杨勇同志指挥一一五师教三旅第七团和鲁西军区第二分区人民武装，在潘溪渡以“围点打援”战术，全歼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大队，毙日寇软原少佐以下160余人。潘溪渡战斗是梁山战斗后，我军在鲁西平原全歼日本侵略军的又一个模范战例。

潘溪渡战斗后，日寇由陇海、津浦、平汉三线，集中步、骑、炮兵7000余人，汽车300余辆，坦克、装甲20余辆，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由济宁、菏泽、临清、大名分几路出动，向我鲁西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在莘县苏村地区与我军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在杨勇同志指挥下，与区党委、行署机关一起，突破敌人的包围，胜利地粉碎了日寇的“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杨勇同志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指挥下，参加平汉战役，收复了菏泽、濮阳、鄆城、巨野、成武、曹县。他和他所指挥的部队在著名的陇海战役及巨（野）金（乡）鱼（台）战役中，围歼国民党反动派主力部队，为人民立下战功。

杨勇同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贯认真严肃。在鲁西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他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执行得很出色。为了回击同我党进行磨擦

的顽固派，他打击了深入梁山腹地、对我危害最大的齐子修部，中立了冯寿鹏部等。在汶上西部，则消灭了勾结日寇建立伪组织的汉奸武装，争取了开明士绅、郓城保安副司令祝璧臣，孤立并驱走了日益反动的郓城县长兼保安司令张培修。

杨勇同志在创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但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而且重视和支持地方工作，支持地方党的建设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39年春，菏泽、郓城、鄄城、寿张、汶上、梁山一带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郓城中心县委很快成为鲁西区第七地委。同时还开展了濮县、范县、观城、朝城、莘县一带的工作，使贫穷的濮、范、观飞沙扑面的黄河滩，成为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

杨勇同志在努力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整顿地方武装。当时，鲁西地区地主、土匪武装较多，地方同志对创建武装缺乏经验，杨勇同志热诚地派主力部队和部队干部协助地方，对分散的武装进行整顿和训练，使区队、县大队以及基干团等地方武装迅速成长壮大。

杨勇同志非常关心和体贴地方干部，经常听取地方同志的汇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在同地方干部一道工作中，很尊重地方干部，总是同大家一起平等商量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地方同志。他的这些优秀品质，给我们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

杨勇同志和冀鲁豫边区人民同生死共患难，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建立了血肉的联系。杨勇同志与世长辞了，冀鲁豫边区的老战友深切地怀念他，冀鲁豫边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切地怀念他！

（本文来源于《巍巍丰碑》——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追忆，主编：贾凤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赵健民（1912年6月—2012年4月8日），曾用名吴培强，山东冠县人。1932年到济南入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求学。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该校任中共支部书记。1933年7月起，任中共济南市委北区巡视员、市委书记。1935年冬起任中共山东省工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36年5月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同年9月在济南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8年被派往鲁西，在聊城抗日游击司令范筑先部工作，曾任中共鲁西特委书记，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所部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编第八旅，曾任营长。1941年赴山西辽县，入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1942年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参与领导该区军民参加反日伪军“扫荡”。193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冀鲁区党委副书记兼冀鲁豫军区政委，曾参加出击陇海路战役和豫北攻势作战。1947年7月起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鲁西南战役。1948年任第十七军政委，8月兼任军长。参加了渡江战役。随部进军西南地区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曾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局长。1952年12月调任铁道部副部长。1955年1月起，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三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监委书记。1956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1963年4月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曾任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8年4月起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1年12月起任该部顾问组组长、航天工业部顾问。1982年9月、1987年11月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12年4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 冀鲁豫边区革命史（摘录）

乔丹阳

### 序 言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边区又及时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从而在广大地区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的土地关系，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解放出来，满足了他们获得土地的愿望。进一步焕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积极参军、参战、发展生产、支援战争，这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获得了无穷的力量源泉。邓小平同志曾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到哪里都有饭吃，都有翻身农民的支援。”这是对冀鲁豫边区的高度赞扬。

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我们逐步摸索出一些适合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首先，要大力发动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形成抵御敌人的“人山”和淹没敌人的“人海”。其次，改造地形，使敌人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施展，采取适合平原特点的作战方法，如利用村庄进行村落战，利用青纱帐同敌人周旋；勤于侦察，严密警戒，封锁消息，采取灵活的集中与分散，声东击西，声南走北，经常转移位置；多进行夜战，出敌不意，攻其不备，等等。第三，根据边区地处冀鲁豫皖苏五省结合部，日、伪、顽、会、匪交错杂处的特点，灵活掌握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因势利导，拆散他们之间的联合，从而变不利为有利，加

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

为了抓住武装斗争这一主要矛盾，边区着重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一切为了前线胜利”。大力发动群众参战，制定符合作战需要的各项人力、物力征集使用制度，建立适合游击战、运动战特点的兵站、粮站组织，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军队的人员补充和军需供应。第二，建立主力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军多相对集中地使用，地方与民兵多分散活动，三者相互配合、支援，并可根据形势需要而灵活转化。第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军事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并结合冀鲁豫平原地区的特点，使之具体化。这三条，保证了军事斗争的核心地位，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冀鲁豫区整风运动健康开展，胜利完成1944年5月，冀鲁豫与冀南两区正式合并之后，冀鲁豫中央分局决定成立分局党校，并抽调一部分干部集中进行整风。分局党校设在太行山下之林县临淇镇一带。党校校长开始由分局书记黄敬兼任，黄敬去延安后，由副校长苏振华任校长，王宏坤任副校长，李玉兼任教育长，张玺兼任秘书长。参加分局党校学习的学员多是地方县以上、部队连以上的干部。到1944年9月，分局党校学员达2000多人，其中，原冀鲁豫分区五个大队约1000人，原冀南区五个大队约1100多人。

1945年春，冀鲁豫分局党校集中整风基本告一段落。这时，党校迁到边区中心区，一部分学员进驻濮阳境内，继续进行个人小结；组织上对其中某些有历史问题的同志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或甄别；一部分学员到滑县，参加正在那里进行的群众运动。到1945年6月，冀鲁豫分局党校整风结束，各地委举办的各

种形式的短期整风班也基本告一段落。与此同时，边区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也基本结束。全区整风运动至此胜利完成。

晋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历时四年，在党中央、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的正确领导下，发展健康，收获很大。经过整风，全区各级干部和党员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深刻认识到“三风”不正的严重危害，初步懂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及军阀主义等倾向有了很大克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整风运动教育了边区广大党员干部，使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重要的是通过整风运动，帮助了那些在抗日高潮下涌进革命队伍的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脱离小私有者的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为下一个新的革命阶段，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以保证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顺利地将革命继续推向前进。

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具体来讲主要的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收获：首先，联系边区实际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边区整风运动真正成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较早地提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把整风和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自觉地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冀鲁豫边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其次，强调领会和运用整风文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剖自己，检查工作，从而促进了党员干部世界观的转变。

第三，整风密切结合边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各项实际工作，有利于促进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第四，学会正确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了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边区的整风运动，虽然起步晚，但由于各级领导及时吸收先行单位整风的经验和教训，认真贯彻执行“惩

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因而避免了走弯路，使边区整风运动一直比较健康的发展。

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战争支援工作卓有成效，冀鲁豫区奉命于7月下旬组建以行署主任段君毅为司令员，军区副政治委员赵健民为政治委员，武委会主任乔明甫为副司令员的晋冀鲁豫军区后方战勤总指挥部，直属野战指挥部领导，负责统筹指挥和协调同野战军作战有关的战争支援工作。

刘邓野战军在从1946年8月到1947年6月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坚决而灵活地贯彻“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原则，在冀鲁豫军区部队、民兵的广泛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下，首先奇袭陇海铁路汴徐段之敌，策应中原我军突围，而后在冀鲁豫战场腹地实施大踏步前进和大踏步后退，在运动中寻找战机，在敌军兵力占有巨大优势并向我军分进合击的情况下，连续取得定陶、巨野、鄆南等战役的胜利，并初步取得了内线作战的经验。在敌军继续纠集重兵北犯的情况下，刘邓野战军避实就虚，在进行滑县战役之后，再次出击陇海铁路沿线敌人守备薄弱之后方，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和豫皖边战役，调动北犯之敌和准备入华东战场作战之敌回援，变被动为主动，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

陇海战役又是冀鲁豫区支援野战军作战的一次总预演。前后方一致奋力支前，为这次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于8月7日成立的第三、五分区战勤指挥部，立即在人民群众中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和支前的物资准备。第五分区在两周内即组织全区1/2以上的大车，全部牲畜和15万余名翻身农民参加支前。第三分区也动员5万余民工，其中金乡县抽调民工数占全县青壮年总数的90%左右，整个战役中共动员2万付担架，2万辆大车，15万余民工，随

## 台前

野战军开赴前线，另有10余万民工负担后方勤务，1万余民兵随军掩护物资运输和参加破路，全区参战人数近27万人。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又深入敌占区100余里，民工民兵们不畏艰险，车拉肩扛，仅面粉运输最多时即日达100多万斤。从后方到前线，担架往返，车轮滚滚，铁路沿线拆除铁轨的劳动号子伴着前方枪炮声此起彼伏，展现出一幅极为壮观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场景。

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曾带慰问团亲赴冀鲁豫前线，代表晋冀鲁豫边区人民对前线部队和冀鲁豫区的支前民工、民兵进行慰问，并对冀鲁豫区的人民群众在陇海战役中做出的巨大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通过支援陇海、定陶、巨野、鄆南、滑县、巨金鱼和豫皖边战役，冀鲁豫区战勤工作，从不熟悉到熟悉，在实践中取得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建立、健全、完善各级战勤工作机构和各项战勤规章制度，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长期战争的战勤工作体制。1947年2月，战勤总指挥部在豫皖边战役结束后，召开第二次随军办事处主任联席会议，再次对战勤工作加以总结，并围绕如何长期支援战争进行认真的讨论，会议要求加强战勤的组织工作，做到战勤工作的经常化；扩大战勤负担面，调剂民力负担，照顾人民群众利益；战勤工作必须与土改、生产、扩兵等工作结合进行。同时，会议还研究制定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长期支援战争的具体实施办法。会后，战勤总指挥部于3月12日发出《关于战勤结合生产的指示信》，冀鲁豫行署也分别于2月12日、3月10日、5月27日颁布《修正供给标准》《冀鲁豫区参战支差条例》《战勤供给制度》等条例和训令，对战勤机构参加生产，各级战勤指挥部及随军办事处、各食宿站和参战群众、伤员的供给标准做了详细的规定。这些具体的措施，促进了战勤队伍的建设，保

证了战勤任务的胜利完成。

太行、冀鲁豫两区共同承担豫北攻势的支前工作。这一攻势主要是在敌占区进行，10余万部队连续行军连续作战，条件十分艰苦。冀鲁豫区出动10万民兵和20万民工参战，其中6000付担架随军转战千里，支前队伍空前巩固。有的民工宁愿挨饿也不动用一粒公粮，有的用身体挡住敌人炮火以救护伤员。广大民兵押送俘虏，护送伤员，清理战场，看守仓库，分配、转移、埋藏缴获物资，圆满完成配合作战的任务。这是由于在全区已普遍开始实施土地改革，并结合土改掀起参战和扩军热潮，翻身农民为保家保田，支前情绪十分高涨。同时，战勤总指挥部根据作战特点，实施新区借粮的新办法，动员新区的车辆、粮食，保证了部队和民夫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区的民力负担。

如此多的军队在此作战，战勤任务异常繁重。在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战勤总指挥部的组织发动下，全区人民，不分男女老少，所有能动用的人力，几乎都动员起来，支援前线。刘邓野战军渡河之前，黄河北各级党组织和政府，为大军渡河挑选和训练水手，赶造木船，筹运物资，整修道路，做了充分的准备。先后在高固（北坝头）、李桥、张庄、林楼、孙口、位山、齐河等处设立5个航运大队，如期建造120只大木船和许多小木船，组织并训练负责大军渡河任务的干部、战士，民兵和水手3000多人，可供部队同时渡过8000人。在抢渡过程中，全体水手和民工不顾敌人的炮火与骚扰，不怕疲劳和牺牲，争分夺秒，昼夜抢渡，受到刘邓首长的通令嘉奖，赞扬他们为祖国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野战军渡过黄河后，各县担架队也蜂拥而至，第七分区仅在郟城、金乡、济宁三次战斗中即有2300余付担架奔赴战场。第三分区单县、成武县，本来分配的任务是100辆大车，500付担

## 台前

架，但群众自愿增加到200辆大车850付担架。

在刘邓野战军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准备挺进大别山的前夕，邓小平在郓城向冀鲁豫行署副主任韩哲一，军区参谋长付家选作了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陈粟野战军要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作战，这个地区有可能出现大拉锯局面，因此我们要用脚板拖住敌人。你们随陈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行动，要同鲁西南党、政、军，民一起，为华野部队服务。韩哲一、付家选向区党委，军区作了汇报。冀鲁豫区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一重要指示。

（摘自《纪念乔明甫同志诞辰百周年》主编：乔丹阳）

# 昆张支队

王定烈

## 一、插进敌人心脏

宋徽宗时，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位好汉，在水泊梁山高举义旗，替天行道，演出过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活剧。特别是以此为原型，施耐庵、罗贯中写下的《水浒传》，更使梁山水泊以及栩栩如生的一百零八将的形象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了一代又一代。可是，由于他们只反贪官，不反天子，所以皇帝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于以悲剧告终。



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和梁山地区人民恰巧就在这块具有反抗精神的土地上团结奋斗，英勇杀敌，浴血奋战，打击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新的壮丽篇章。

早在1939年3月，八路军一一五师就在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的率领下，由晋西挺进至梁山一带。3月4日首克樊坝，歼敌伪800余人；5月11日在陆房歼日军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8月2日在梁山西南独山庄歼日伪军400余人……

8月，鲁西军区成立，随后和其他兄弟部队一起，进行了讨

## 台前 在七九

伐石友三之战。1941年1月8日，我教导三旅七团在潘溪渡击毙日军原软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俘伪军130余人，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这年秋天，我教导三旅八团在寿张县之郭魏陈庄伏击，缴获炮1门，机枪3挺，掷弹筒3具。7月1日，军区部队先后反击顽军孙良诚、齐子修部，攻占了颜村铺及小马庄，接连进行了东北庄、古云集、八公桥等战斗。我们的部队在敌后真是无日不战，无日不在硝烟中度过。

自1941年春天，日寇实行其第一次“治安强化”以后，又于当年7月、11月和1942年3月连续发动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凶残的“治安强化”运动，梁山地区首当其冲。这里，历来是有名的“土匪窝”，日本人一来，有些土匪摇身一变就成了伪军，并与封建势力互相勾结，互为利用，麇集在日寇的卵翼下，共同反共反人民。

日寇步步为营，先后在大安山、戴庙、宋圈、刘圈、司里山、王连坡、十里铺、许桥、王府集、大侯庄、袁口、赵固堆、孙口、蔡楼、斑鸠店、王家庙、任李庄、齐岗、黄河崖、二道坡、田庄、郭楼、杨岱、西金山、路那里、师集、杨营、岳庄、焦村、北大圈、大路口、寿张集、西小吴等地安设据点，先由日军防守，后逐渐变成日军守大据点、伪军守小据点。日伪军警纠合在一起，不断对我根据地蚕食扫荡。

1942年9月27日，日寇纠集1万余人，用“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战术进行“大扫荡”，施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妄图消灭我党政领导机关和抗日武装。

10月，敌人又实行了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昆山、张秋（即梁山地区）进一步采取了分割、封锁手段，强迫人民替他们修碉堡、筑公路、挖壕沟、垒围墙、架电线，形成“五里一碉，十里

一堡”的一个个“格子笼”。登上房顶四望，就可以数上15个以上的“炮楼”。当时流传一首描写这种情景的诗句：“驻军碉堡下，夜观敌营灯，行军必过路，天天有枪声。”

日寇还沿着黄河大堤由郟城的肖垓、刘口、潘溪渡、肖皮口、小吴、黑虎庙、孙口至寿张一线，挖了五米宽七米深的一道封锁沟，并把挖出的土堆起夯实，筑成一道封锁墙，用以隔断我昆张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的联系。同时，又修了由东平县至大安山、戴庙、大路口、小吴，由郟城至梁山、张坊、侯寨、程四里屯、肖皮口的公路，把各据点联接起来。

敌人凡修路必筑堡，必挖沟，必架电话线，形成了一个信息灵通、交通方便、合围迅速的碉堡群、交通网、通信网。在此基础上，日伪军强迫群众组成“自卫团”、“护路队”、“情报网”，昼夜放哨、巡更，一旦发现八路军就鸣枪报警；有八路军驻扎就要立即向碉堡日伪报告，否则坚决要你“死啦死啦的”。敌人对他们的惨淡经营非常得意，宣称：“八路进入昆张，就等于虫子被缚于蛛网！”气焰何等嚣张！

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敌进我进”的方针。敌向我根据地侵蚀，我向敌占区进攻，以粉碎敌人的阴谋。

斗争的残酷使大部队作战困难重重，只能化整为零，用小部队对付敌人。

同年冬天，冀鲁豫军区八分区党委决定派八团营长吴忠和工委书记邵子言、特派员管学思等，带领小部队（四连）化装进入昆张地区活动。当时我和郟北县委书记左宏奇率领七团二连（即郟北支队）在郟北地区活动。

1943年5月的一天，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令我进入郟东配合吴忠、邵子言，以加强梁山地区的斗争力量。

一听说要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到敌占区搞它个翻江倒海，全连指战员无不欢腾雀跃。这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部队，从参加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五次反“围剿”，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平型关痛歼日寇，是一支打不散拖不垮的钢铁部队。曾有一首赞颂七团部队的诗这样写道：

从不收起战斗的翅膀！  
从不放下胜利的旗帜！  
我们歌唱您，  
人民敬仰的七团，  
您是党的一支坚强的力量！

接受任务后，我们立即进行政治动员，把体弱有病的同志安置妥当，把心爱的八路军军装换成当地老百姓常穿的紫花布便衣，还给我多发了一件长袍大褂（解放后每当看侯宝林说相声时的衣着，我就不由得想起我那件大褂），部队一律轻装。根据吴、邵小部队的经验，我们用粗大的南竹竿、牛皮条绑了三乘轻便梯子，每排一乘，以便越墙翻沟。

一切就绪，我们在“黄河两岸度春秋，不灭鬼子不罢休”的誓言中，向“牛魔王”的肚子里钻去……

此时，接近麦收季节，到处传来“噢—噢—”的吆喝声，“哒哒—哒哒—”的梆子声，“轰—轰—”的土炮声，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

6月1日傍晚，我们在小吴以南秘密接近那条长龙似的封锁沟、墙。当自卫团的梆声稍远去时，我们立即竖起梯子，下到沟底上沟堤，上了沟坡再上墙。就这样，在炮楼与炮楼的间隙中，在敌巡逻队的眼皮下，神速地钻进了敌占区。

在后来的斗争岁月里，正是这支小部队，神出鬼没地活跃在

梁山地区的昆山、张秋、东平、汶上、郟（城）东一带，犹如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搞得敌人如坐针毡，使“大日本皇军”的“铜墙铁壁”一步步“锈、蚀、烂、垮”，走向了覆灭的道路。

## 二、势变我变

进入敌后，情况远比预想的复杂。过去，我们驰骋在广阔的战场上，激烈的战斗成为我们的拿手好戏，打得痛快，打得解恨。可现在却要尽量避免打仗，整天偷偷摸摸，溜村串乡。

由于敌人的据点、炮楼遥相呼应，信息灵、交通方便，所以我们每到一地，多则几个小时，少则几十分钟，敌人一闻风声就会合围而来。有时被追得连吃饭的空也没有。敌人千方百计地找我们打，我们却不能恋战，一恋战，很快就会被围死，很难找到立足之地。敌人不可一世，我们憋了一肚子火。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们重温了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深深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向群众做宣传工作，揭露敌伪罪恶，宣传我党抗战政策，提高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打击日伪的清剿、征粮、征税活动，才能站稳脚跟，有所作为。根据当时的情势，我们在军事上采取了“拣最坏的打”，对围攻我之敌，“拣弱的打”，歼其一路然后远走高飞。

这年初秋，我一、二中队在袁口附近之朱庄，全歼伪军（潘衡忠）一个中队，我伤亡排长等6人。接着又在荆口附近之村庄，消灭伪军两个中队，枪毙了叛徒朱士清（伪中队长），打开了汶西局面。当我转移到梁山附近之小姚庄时，突遭日寇村上讨伐队的袭击。为掩护主力转移，一中队班长郭志光、副班长张振

玉等同志光荣牺牲。

在对敌斗争中，我们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不断地改进斗争方法。如：我们行军经常被敌探发现；进入宿营地时引起狗叫，一个村狗叫，连锁反应又引起别的村的狗叫，或者因为老乡分辨不出是什么队伍，乱喊乱叫，惊动了敌人。还有诸如化妆不够群众化，衣服单一，侦察方式老套等，被敌发现，造成被动局面。

智慧来自群众。经过热烈讨论，集思广益，我们研究出一些新方法，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提高。如行军时，前卫排派三四个尖兵组，情况紧张时，一线疏开，遇敌时马上变成冲锋队形，缓和时则成一路纵队跟进。在后卫班之后，还设一个“捉敌探小组”，行军前规定两三处集合点，以便万一队伍被冲散后容易集合；行军路线采取绕路走，走小路，不走同一条路，或野地散开前进等方式；请向导不中途换人，后卫人员穿上倒钉掌的鞋，或拖上树枝清除部队足迹，使敌探无法很快判明我真实去向。

我们转移通常都在夜间进行，两头不见太阳。接近宿营地时不急于进去，而是先把路口封锁起来。等天明狗不叫了，我们就化整为零地从各条路口陆续进村，或者干脆隐蔽在村庄一角或一个大院内，哨兵则把枪藏在附近的柴草内，背上粪篓、柴筐、佯装着拣粪拾柴，看似游游荡荡，漫不经心；有的则扮成小商贩，做起买卖；对来往的伪军、伪组织人员不进村、也不可疑的即不过问；对进村的伪军警政人员，待其进到村里后，才将其缴械，集合起来上政治课，不杀不辱，不收财物。但要记下姓名、家庭住址、亲人姓名及其表现，留下“清单”，然后放其回去。

我们也从不久驻一地，每夜总要变换一两个地点，而且欲东却西，真真假假，让敌人无法有计划地“围剿”。

再如侦察，我们通过秘密建立的情报网，特别是在紧靠大据

点的村镇建立的情报点，使我们的耳目灵敏起来。此外，派侦察员直接监视敌人，捕捉敌伪单独外出人员，还搭线偷听敌人的电话。所以，我们从不轻易破坏敌人电线，以期获得信息。敌人并不知道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现在想起来都感到非常惬意。

战术上，我们采取“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等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手段多种多样。伏击时，打敌人措手不及；奔袭时，兜大圈子，“打了就跑”，不到不得已不硬拼、不恋战，曾在汶上之鱼王庄、孙村，郛城之徐庙、任刘庄、崔庄、陈楼，寿张县之金斗营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成功的战斗。

7月6日，分区以八团主力，集中数县的县大队发起朝（城）南战役。朝城是汉奸文大可的巢穴。这家伙在日寇的卵翼下，把防御体系筑成蛛网形，以其巢穴为中心，伸向我根据地构筑几圈碉堡，碉堡之间筑有公路，与中心连接，并设机动部队，哪里有事，就立即赶往驰援。

战斗前，曾思玉司令员令我率领二连从梁山附近迅速赶到寿张县以西的金斗营集结，参加朝南战役。可是，由于侦察员送信找部队耽误了时间，当我们昼夜强行军130华里赶到金斗营时，战斗已经打响。

我军主力正在攻打朝南外围据点。这时，分区的后方机关、电台、卫生所均在此地。寿张县王楼据点的100多鬼子和200多伪军，企图袭击我后方，引我主力回师救援，以解朝城之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二连正好赶到，把背包一甩立即投入战斗。敌人自恃人多势众，十分疯狂，从正面压来。我判断，如果与敌正面硬顶，敌众我寡，势必吃亏。于是，我命令一排迂回敌人左翼给它拦腰一击。我们用火力压住正面的敌人，一排长丁西珍带全排猛扑过去，和敌人展开白刃战。敌人万万没想到会从斜

刺里杀来一队人马，顿时乱了阵脚。仅十几分钟，日寇一个警戒班被全歼。敌人羞恼交加，转身反扑，这下正中我意。我们死死牵住其牛鼻子，使他不能脱身，掩护了后方转移。此役，我主力部队一鼓作气拔除敌30多个据点，歼敌2000余人。王楼之敌见势不妙，也急忙撤回原地。

### 三、晓明大义

我们在新的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基本站住了脚，并搞得敌人惊魂不定，为我们更好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们每到一村，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群众大会、村干会、房东座谈会、伪军家属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更重要的是我军的实际行动影响着群众，部队吃的穿的尽量不向群众摊派，而是向敌人要。

梁山人民注重讲一个“义”字。每到一村，老乡就给我们烧火取暖，有的还盛情地给二两白干喝。我们知道老乡燃料奇缺，物资匮乏，都婉言谢绝。为了保护群众的利益，我们宁可担风险在村外野地摆战场，除非不得已才在村里打了仗，我们也要让群众出面保释俘虏，并让群众将敌伪死伤人员和物品送还敌人，送个“顺水人情”，以免敌人加害。敌人向村里征粮，我们就让老乡按数交，待运粮时，我们埋伏在半路上打几枪，再把粮夺走，秘密分还给群众，然后让村长向敌据点报告，说“八路抢走了征粮”。

我们对伪军也是花了很大力量和心血来进行教育、争取的。在战斗中或平时，我们抓住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就进行教育，然后放回。一年功夫，本地区的伪军被我俘虏又释放的十有六七。表现好的就发给他们“关云长头像”证，乃“身在曹营心在汉”之意。凡

持有此证者，第一保证其生命安全，第二保证其家庭财产不受侵犯，都收到很好的效果。此外，我们还注意配合地方党政干部调查伪军、伪组织人员的家属，给他们做工作，不但不歧视他们，保证他们的安全，还给他们一定的任务，如送宣传品，送情报、叫子索夫回家、与我建立关系等等。

在宣传上，我们则义正辞严地指出汉奸出卖民族、为虎作伥的可恶。如我们教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打杀汉奸歌》：“打杀汉奸，打杀汉奸，汉奸是心腹大患，不肃清抗日阵线，自怎救得当前民族危难……”

杨岱据点的伪中队长周庆丰出身小地主家庭，曾被我军俘虏后放回。我们经常做其家属成员工作，对他触动很大。特别是对我军不动他的家产更是感恩不尽。有趣的是，他那个中队的三个小队长九个班长大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物。

他曾问我：“我可不可以当中队长？”

我说：“可以继续当你的中队长，但必须听我们的。”

从此，他对我们更是言听计从。

一天，小安山据点伪中队长王永宪对我们说，日寇对他有疑心，并说：“我不好办了，日军要我打你们，不打不行，怎么办？”

吴忠说：“打就打吧，我们来一次假打，你好向上司交差。”

那天，由于战士们不明意图，假打结果变成了真打，打伤了他的人，还缴了他几条枪。事后我们做了些补救工作，鬼子对他更加信任了。

其他像二道坡据点伪中队长林成彦、戴庙据点伪中队长王课亭也表示愿为八路军多做些事。不久，各个据点差不多都有我们

的工作关系人。从此，我们的情报来得更快，也来得更准确了。

我们对伪人员如此，对日本人也做到以人道主义政策对待。我们在东（平）、汶（上）公路上，伏击了一辆汽车，车上有一名日军顾问被我击毙。事后，我们将他的尸体进行了简单整容，写了封表明我军政策的信，花钱雇人抬着送回东平城。不少日本兵见了，翘起大拇指说：“八路大大的好！”后来，就有日本士兵被俘后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当了炮兵射击手，立下了功劳。

当然，对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是严惩不贷，谁最嚣张就先收拾谁，而且说到做到。

小吴据点伪大队长、判徒涂戴德投敌后认贼作父，作恶多端，专门对我根据地进行猖狂破坏。我们派出武工队长刘金池，带队潜入小吴庄等了三天，寻机将其除掉。接着又除掉了侯集据点伪军队长薛成、肖皮口据点汉奸队长外号“大洋马”和“红纱灯”，然后广贴“告示”，在伪军中引起很大震动。此后，伪军内部常常起誓说：“谁如果干了坏事，叫他一出门就碰上武工队。”群众则到处传说：“武工队会飞檐走壁，会双手使枪。”

由于我们在实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开展大量对敌工作，所以使伪军普遍不愿意和八路军打仗。过去，他追着我们打，我们前脚到，他们后脚跟。现在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日寇逼得紧就动一动，不紧了就装不知道。有些据点的头目公开下命令说：“八路军不竖梯子攻炮楼不要开枪！”有的还常给我们通风报信，共同商量对策。

9月的一天，杨岱据点来人送信，说上面派来两个“催粮委员”，坐地征督，对伪军和群众很凶。我们即派侦察员韩天明、赵二虎等身穿伪军服，带着短枪，让关系人带进碉堡。入夜，我又派一个排埋伏在炮楼外给伪军上“夜课”——这也是我们做日

伪工作的重要方式。

我们从四面八方喊道：“弟兄们，不好办了，快投降吧，赶走小鬼子过好日子吧！”

由于有“委员”在，所以伪军们故作姿态，枪口抬高二寸，向我方开枪，打得很是热闹。这两个“委员”亲自上围墙督战。韩、赵二人贴近他们，故作惊慌之状。“委员”还要威风骂人哩！韩、赵趁双方射击之乱，把这两个宝贝的头穿了几个窟窿。伪军向上级报告时，说：“两名委员在同八路军交火时，壮烈牺牲。”这两个宝贝恐怕到了阴曹地府也不明白是怎么死的。

经过一年多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人心的天平渐渐地倾向了我方，局势的天平也渐渐地倾向了我方，正如孙子兵法中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四、节节胜利

形势对我越来越有利，部队开始也由化整为零向化零为整发展。为便于统一指挥，我们活动在昆张地区的两支小部队奉命合并为昆张（地区）支队。吴忠任支队长，邵子言任政委兼工委书记，我任副支队长，常志义任参谋长，田平任总支书记，管学思任特派员（后胡定伦继任）。支队下辖四个中队：一中队（原八团四连）中队长郭瑞功，政委刘享银；二中队（原分区独立营）中队长王权，政委张景华；三中队（原七团二连）中队长郟晋武，政委孙连捷；四中队（原昆山县大队）中队长窦增荣，政委侯平一。

合编后，全体指战员摩拳擦掌，士气高昂，练兵习武，交流经验，决心开创新局面，把昆张抗日根据地尽早夺回来。

我们频频向敌人展开进攻，战斗相当频繁。有时一天在奔袭中打两三仗，采取的方法仍然是以分散活动为主，以便更好地配合地方党、政府开展群众工作。必要时集中兵力打敌一点，速聚速散，神出鬼没，越打越得心应手，几乎全是胜仗。此后，先后打的战斗就有三官庙袭击战、齐岗袭击战、周楼伏击战、八里湾伏击战、东平城夜袭战等。

9月下旬，袭击三官庙，将平日作恶多端的伪警察所全歼。一次，东平伪政府派了四个“催粮委员”，在装备精良的伪军第八中队（李子华）的掩护下先到了周楼，妄图第二天到大路口武装抢粮。我们得到情报，来了个彻夜急行军，在离杨岱据点南仅1000米的小村（李乔）设伏。

第二天，他们大摇大摆地沿着封锁沟前进。万万没想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就埋伏着八路。当敌钻进我200米之内的火力网时，轻机枪突然开火封锁其首尾，同时发起冲锋。仅10分钟，除一人逃跑漏网，其余被全歼，我无一伤亡，消耗子弹百余发，缴获了近万发。

随着我战斗的节节胜利，部队思想上一度产生了轻敌情绪。八里湾伏击战是支队打得最不好的一次战斗。上次敌人吃了大亏，不善罢干休，伪治安军齐燮元部一个营加东平伪军两个中队共700余人调来杨岱，寻我报复。

9月29日晚，我乘敌将返东平之际，调一、二、三中队去十里铺、八里湾之间设伏。天亮了，还不见一中队前来（原来他们在田大店附近接到命令迟了，没能及时赶到）。这样实际上我只有两个中队长王权队。当时部队斗志昂扬，由于歼敌心切，我未能适时改变决心，调整部署。上午，敌大安山一个小队西来，被我二中队打退。

约10时许，敌主力由西接近我十里铺阵地，与我三中队交火。经过激战，因敌众我寡，暂时无法摆脱，我们只好利用堤埂、房屋坚守到天黑，才主动撤出战斗。此战，我伤亡35人，丢失枪19支。

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大势所趋，许多伪军向我投诚。

10月11日，汶上县袁口镇据点伪中队长高庭甫派人前来联络反正。高庭甫是汶上县齐岗人，他一家老小都在我游击区的边沿。我地方干部出出进进，游击部队常来常往，他是两头担心：既怕八路军打他，抄他的家；又怕日本人说他私通八路，杀他的头。我地方工作同志通过其亲属劝他弃暗投明，不要再当日本人的走狗。我们保证他本人和全家的安全，并送给他一纸关云长的头像。他那个中队里当地人多，其中有两位班长，常给我方通通消息，也劝高庭甫早下决心。眼看日寇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他动心了，表示要反正，参加八路军。

11月初，我们约他夜里在袁口镇西北六七里路的荒野地里见面，双方不带部队。我和特派员管学思只带几个侦察员去与他商谈如何反正的事宜。他提出的条件：一是愿意参加我军，但不能用起义、反正的名义，要求我用武装挟持的形式；二是部队要完整，不要给他编散了；三是伪警察所三四十人枪，他指挥不了，也不敢打，要我想办法。

我听了他那两面讨好的三条，说明他既要落个反正的光荣，又不得罪日本人。为了拔除袁口镇敌伪据点、动摇敌人阵营，我当即答应他的条件。同时给他规定了三条；一是每天晚上必须把镇围墙西北门的岗哨撤掉；二是每天早操都不许带枪，只做徒手动作，把枪放在碉楼内或架在一起；三是何时行动暂不确定，但

必须随时准备好，见机行事。这三条，他也认可了。

为了察明虚实，看他是否履约，我们又利用内线关系，观其动静。他回去几天，前两条也都照办了。为了防止意外，我方行动一律不通知他。我们采取奇袭方式，既要把他的中队拉出来，又要把警察所一网打尽。

10日夜，我率支队一、三两个中队，轻装由齐岗附近出发，乘着夜色极其隐蔽地从袁口镇西门潜入大砦西面那个大庙内，一直呆到天明。砦内的敌伪军包括群众全都在睡梦中，毫无察觉。

天渐渐亮了，在人声、鸡鸣、狗吠声中，突然听见伪军的口令声。等他们正在喊：“一二三四……”之时，我立即下令“出击”。

按预定方案，郭瑞功队长、刘霞政委率一中队直插伪警察所；郟晋武队长、孙文轩政委率三中队，以两个排包围操场，一个排直逼碉堡，封锁进出大门。

高庭甫发现我军已到时，即下令“集合”，“不许拿枪抵抗”。可是，留在碉楼放哨的一个班，还是放了一阵枪，企图顽抗，结果被我俘虏了。那个警察所的全班人马，都在睡大觉，听见哨兵放枪，在惊惶之中，连裤子都没穿上，全部当了俘虏，一个也没跑掉。这次速决战总共花了15分钟，消耗子弹70几发，我无一伤亡，把敌人一网打尽。

我们动员群众，把碉楼内的东西全部搬走，连砖瓦也拆了……然后，带上伪军中队、押上俘虏离开袁口北去。

高庭甫那个中队，经我政治教育，组织调整，兵员、武器上加以补充后编为昆张支队第五中队。

接着，我们又打玉皇庙、攻任李庄、克朱庄，在二十里铺伏击敌汽车等等，进行了一连串胜利的战斗。

1944年元旦夜晚，我集中了一、二、三中队夜袭东平城，一举攻入城中，消灭了伪政权，缴获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3万余斤，牵制了敌人对我中心根据地的扫荡。待敌回师反扑时，我又早已化整为零，消失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敌人只能望“洋”兴叹了。

这时的昆张支队，已经远远不是当初钻进“牛魔王”肚子里时那种被动挨打的境况了，而日寇则龟缩在碉堡里不敢轻举妄动。伪军更是人心涣散，士气消沉，竭力想讨好、巴结我们，以求有个退路。我们只要一个纸条传进去，叫他们向西他们不敢向东，不少伪军干脆弃暗投明参加了我军。

2月，正值新春佳节之际，工委为了更好地振奋民心，慰劳我英勇的支队战士，决定在张博士集召开有五县县长、县委书记参加的工委扩大会议，总结斗争经验。会后，军民联欢，共庆佳节。战士们来自湖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和本地的，大家扭秧歌，唱家乡小调，玩杂耍，出洋相，节目丰富多彩。

颇有戏剧性的是，仅距张博士集300多米处的村西北角，就有一个敌人的碉堡，驻着伪寿张县的伪军中队；东面六七百米有一个伪军中队驻扎的碉堡。他们早已接到我们的通知，老老实实地看着我军民狂欢，那当汉奸的滋味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还是给他们送去了一些烟、酒、肉和鸡蛋，让他们也过过年，别忘了华夏祖先，别忘了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

## 五、夺牛战

1944年，正是我军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垂死挣扎之时，鬼子不仅到处杀人放火、强征粮食、棉花，抓青壮年去日本当劳

工，还想出一个新招数，就是抢走老百姓的耕牛。

这年春天，敌人在东平县计划抢500头牛，并勒令限期在东平城内集中，再经汶上到济宁，装上火车运走。还扬言谁敢反抗，皇军就要叫他“死啦死啦”。那些汉奸、走狗忙着下乡，见了谁家牛长得肥大，牵上就走。谁要说个不字，当场就得挨鞭打，还要罚你亲自送进城才算了事。

原来，日本鬼子在东三省有个牛肉加工厂，他们将抢去的牛宰杀加工做成罐头，专供侵略军食用。牛赶进城后，敌人就在牛的右后大腿上，打一个大圆圈火印，里面有个“军”字，以表示是给日军专用的。这是敌人最恶毒的经济掠夺，我们决定以牙还牙。

3月6日晚，我率支队第三中队在梁山东北的西柳村宿营。半夜里情报员跑来报告说，日本鬼子在城里集中了100多头牛，第二天就要押到汶上去。因接到情报太晚，当我们赶到汶上县沙河镇北面的公路上时，敌人已经无踪无影。

经查明，原来是东平县伪军两个小队60多号人，赶了120头牛，他们怕我军伏击，半夜三更就出城向南去了。这次让敌人占了便宜，我们很不甘心。我断定，敌人既然南去，就一定会北回！

7日晚，我们东去30里，一面让敌发现我们向安驾庄方向走，一面留人就地监视敌人动向。8日晚，我们又隐藏地折回沙河附近设伏。

果然不出所料，9日上午将近10点钟，那两个小队的伪军摇摇晃晃地从汶上方向回来了。正巧，钻进了伏击圈内。我们突然开火，敌人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没死没伤的，举起双手乖乖地投降了，一个也没跑掉。打了这个小胜仗，总算解了心头

之恨。可是，那批牛毕竟被敌人弄走了，而且抢牛的事，还在到处横行，我们耐心地等待新的时机。

20多天过去了。4月1日，我们又得悉：敌人第二天要押送160多头牛去汶上。经我第一次打击之后，敌人就谨慎多了。这次是日军一个小队加伪军两个中队护送。

这次，我们得到的消息早。我一、三两个中队一起，兵力也多一倍。当天黄昏出发，一夜走了70多里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敌二十里铺据点东面二里之遥的乔村。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早已严阵以待，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还有“八路”。

2日九点半左右，我站在乔村西北角砦墙上，用望远镜一看，嗨！敌人浩浩荡荡地从三官庙方向来了，队伍拖得很长，尘土飞扬。原来敌人把牛3头一组编在一块，160多头就是50多组，加上200多日伪军，漓漓拉拉地拖了足有二三里长的一字“长蛇阵”。

我们按预定方案，由郭瑞功、刘霞率一中队拦其头；由郗晋武、孙文轩率三中队打其尾；韩天明（支队侦察排长）带侦察员负责牵牛。

敌人快接近到二十里铺碉楼时，我一声令下，快速进入战斗。在我突如其来的前后夹击下，敌人只顾抵抗，那里还顾得牛呢？

说起来蛮有意思，那些披枷戴索的畜生，被枪声惊作一团。我们那些穿便衣的侦察员们冲入牛群，砍断绳索。它们好像明白自己被解放了一样，翘起尾巴，跟上那些穿便衣的“八路军”狂奔起来。那群押送的日伪军被我们活捉了30多人，有的只顾逃命，有的钻进“乌龟壳”（碉楼）里打枪……

我看看怀表，指针已过10点钟了，即令司号员陈登寿吹起

“操号”（即撤出战斗）。那些不会说话的“劳动者”，边跑边叫个不停，也不知它们是因未遭受宰割之苦而高兴呢，还是肚子里没有东西饿了。

回来后，我们动员群众，把牛腿上的“军”字刮去，分散到各村各户，再回到农民家中耕地去了。

而敌人呢？第一次虽然占了便宜得了牛，却丢了人和枪；第二次既丢了牛，又丢人丢枪，只好躲在“乌龟壳”里，再也不敢出来抢牛了。

## 六、摧枯拉朽

宋代苏询说过：“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经过抗日军民奋勇斗争，春节之后我又进行了大刘庄、苇子河、辛庄、陈庄、开庄、棘针园、北程子、徐堂、百忍庄、沙岭、夏谢、兰花店等一系列袭击、伏击战斗。仅我支队1944年5月上旬统计：共作战9次，俘日军3名，伤2名；俘伪军591名，缴获步枪553支，短枪16支，子弹9159发，掷弹筒弹106枚。

我军的力量越来越大，敌人的势力越来越衰弱。把敌人赶出梁山，让人民当家做主人的这一天终于如瓜熟蒂落，不久就来到了。

5月中旬，分区派主力八团进入昆张地区，与我支队一起发动了昆张战役。

主力部队越过黄河大堤封领沟，一夜之间荡平了8里湾，又进攻张秋镇据点（未克）。昆张支队四面出击，有的以武力逼敌投降，有的则通知他们“出来集合”。五天之内，就拿下了大路

口、侯寨、司里山，戴庙、杨岱、邢那里、路那里等近20个据点。此役共歼、俘敌1200余人枪（含伪军投诚）。接着又拿下大安山、小安山、开河、荆口、北二十里铺、三官庙、沙河镇、南城子、须城等30个据点，共歼敌150余人，俘敌1056人枪（含伪军投降）。我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这里仅举荡平岳那里据点的情景，足可见摧枯拉朽之势。

11日黄昏，我支队指挥所设在张博士集距离敌据点（岳那里）300米处，责令伪军中队长杨振春：“今晚我们就要拔炮楼了，你务必严令士兵不准开枪。违者绝不宽待，八点钟准时出来集合。”

谁知才七点多，赶着300多辆大车奉命前来拆炮楼的几千群众就把据点围得水泄不通。他们等得不耐烦了，就一呼百应，蜂拥而入，把鹿砦拆光，进入外壕以内，拆砖、掀吊桥，伪军只好请求我们提前出来。当伪军一离开，群众就一拥而上。这些曾危害人民已久的“乌龟壳”，顷刻之间荡然无存。

为进一步适应形势和任务的需要，6月间，昆张支队和八团合并，一中队归建，其余各中队扩编为县大队（二中队为昆山大队，三中队为东平大队，四中队为张秋大队，五中队为汶上大队）。齐丁根任八团团长，邵子言任政委兼工委书记，我任副团长，常志义任参谋长，杨劲任政治主任。部队整编后，我们继续活动在昆张一带。

八团团长齐丁根，我早在随肖华挺进冀鲁边时就认识要好了。这个江西老表是军区有名的“钉子”、“猛将”，从1930年当红军到1944年已负伤八次之多。我在七团一营当教导员时，他是二营营长，现在我们俩人又到一起并肩战斗，有说不尽的高兴。

八团，原为晋西独立一支队，亦称陈（士渠）黄（骅）支队

第二团，它是我党在山西建立起来的一支新军，后来编入一一五师。这支部队中初、高中生很多，政治文化工作相当出色；归师建制后，又来了一批战斗作风顽强，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红军当骨干，所以进步很快，1940年从山西挺进鲁西。

我一来到八团，便把八团自编自唱的团歌学会了：

“我们生长在吕梁，  
战斗在太行和冀鲁豫平原上。  
替天行道，歼寇在水泊梁山，  
胜利歌声，传扬在东平湖畔。  
昆（山）张（秋）寿（张）阳（谷）日伪胆寒，  
郛（城）东郛西人民颂扬。  
啊，黄河，连着我们的故乡吕梁，  
哪怕光荣牺牲，我们也要守卫在黄河大堤上。”  
歌声嘹亮，气势豪迈，旋律昂扬，令人热血沸腾！

不待我完全熟悉情况，军分区率主力七、八团和各县大队于8月5日发起了郛（城）北战役，矛头直指日伪“华北模范县长”刘本功。

我分工率两个连和东平、昆山两个大队相机进攻程四里屯，威胁刘本功的右翼。

刘本功是鲁西南赫赫有名的铁杆汉奸、敌伪“模范县长”，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他原是韩复榘手下的团长，拉杆子，搞武装全不外行。他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是一条凶残的走狗。当年为了尽快地修碉楼、挖封锁沟、铺公路，他这个县所有能动弹的人都被逼去服劳役，限期完工。由于群众磨洋工，保长们没办法，工程进度很慢。刘本功便在肖皮口专门召开了现场会，把肖皮口的一个保长活埋至脖子下。当这个保长血充到头上，隐憋得

发紫发黑时，刘本功举起日本人赐给他的指挥刀从保长头劈下，血“刷！”地喷起丈余高，像花柱一样。众保长见状，早已吓得瘫在地。

他一边擦着战刀，一边优哉游哉地说：“这叫‘放花’，看见了没有？‘放——花’！嗯？还想看的你就给老子磨洋工！”此后，众保长不惜血本，干得又快又好，得了全华北第一。

几年来，由于刘本功手段毒辣，统治极严，一直没吃过大亏。

程四里屯是郟城东北方向的主要据点。我带着排以上干部从正面（北面）仔细地侦察程四里屯的地形、工事，发现主炮楼、围墙、外壕以及所配属的众多的碉堡群构筑在村子南面的野地里，距民房200多米，地形开阔，易守难攻。再仔细观察敌人火力点的配置，成立体、交叉、密集网状，相当讲究。

我们很快一致地找到了破敌之策。原来，据点北面面临我梁山根据地，为敌人重点防守方向；而东、西、南三面，都对着刘本功的大本营，所以防守要比北面差些。据此，我们定下了一条欲擒故纵，声东击西，奇兵出击的妙计。

当晚，我军在北面开阔地上，开掘交通壕，逼近敌人外壕。凌晨，由北面发起猛攻，这正合敌人的预想。双方在正面打得不可开交，我军一次次被“打退”，敌人甚是高兴。然而，我一支奇兵却正在敌人自鸣得意之时，秘密由外壕潜到敌围墙西面，搭着人梯登上围墙，以迅猛的动作冲入敌阵。出其不意的攻势使敌营大乱，正面攻击部队乘机以锐不可当之势一举攻入营内，仅一小时，歼敌500人，我仅伤10人。

历时一月，分区各部队你追我赶，扫平了郟北所有据点，歼灭了刘本功一半生力军，迫使刘本功龟缩在郟城县城内，再也不敢狂妄了。

昆张战役之后，彻底宣告了日伪在昆张地区的惨败，梁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光阴似箭，转瞬就在梁山度过了两个春秋。仲秋的一天，我团回到梁山山寨（前后集）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翌日，我早早地起了床，登上梁山之顶，深情地举目眺望：鲁西平原犹如碧绿的海洋，果实饱满的高粱、谷子、玉米随风拂动。远处大安山、小安山、四里山像一个个忠诚的哨兵，警卫着丰收在望的田野和宁静的村庄。俯视着梁山这块了如指掌、洒下八路军战士血汗的大地，我这个曾身负重伤、陷入绝境也很少落泪的硬汉子，也不禁潸然泪下。多少战友，没有牺牲在五次反“围剿”中，没倒在长征路上，却为了梁山人民的自由和幸福，长眠在这里。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梁山水泊一片鲜红。想到将要投入的艰苦战斗，顿觉力量倍增。

正是：

群英热血洒梁山，创业千辛与万难；  
遥望征程崎岖路，斩首降丁再夺关。

## 七、痛失王汉卿

11月，分区又发起反攻，打击盘踞在菏泽东北的顽匪孙秉贤部。顽匪聚有五六千之众，据有方圆数十里之地，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战役发起，我团担任主攻。第一天，夜晚插入敌人防御的大王砦，对其实施包围。拂晓前扫清了进攻道路外围小据点（红庙），进展十分顺利。第二天中午，强攻大王砦，开通道路，歼

敌800余。敌人在各处失利后，将三个团3000人马猬集在壕深墙厚的田胡同旗，准备死守。

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命令八团第二天下午必须发起总攻，拿下田胡同。我团连夜进行土工作业，但一直挖到天亮还是未能与围墙外壕沟通，尚有50多米的一段距离。

下午两点，准时发起总攻。一连在全团轻重武器猛烈掩护下，沿交通沟迅速接近敌人外壕。然而在未接通的这50多米除几棵粗柳树外全是开阔地，一连伤亡很大，只有两个排的兵力冲进了外壕，组织被打乱，一时无法发动攻击。敌人居高临下，拼命往外壕甩手榴弹，使我进入外壕的部队处境十分困难。

后面指挥所不了解外壕里的情况，非常着急。曾思玉司令员也来了，我们更感到一种强大的压力。齐丁根大喊：“手榴弹雨了没有？”他的口头禅虽然语法不通，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一营长朱德发从江西就跟曾思玉、齐丁根他们在一起，当然知晓他们的脾气。一听团长嫌攻得不猛的话出了口，二话没说，亲自上去组织进攻。他刚刚从交通壕跃出，不幸腿部中弹。他撕碎衣服扎住伤口，爬到一棵老柳树后面，待恢复了一下气力，又向外壕冲去。“哒哒哒哒”一阵机枪的连射，朱德发被打倒，再也没有起来。

齐丁根双眼血红，怒骂一声，用手枪往后一顶帽子，就要往上冲。我双手拽住他，自己跳下交通壕。警卫员王汉卿、通信员张友福紧跟上去，飞速沿交通壕跑到尽头。

守敌当然清楚我军在前后失掉联系的情况，上来的一定是指挥员，便猛烈封锁交通壕的尽头。子弹像雨点一样泼下来，打得砂土飞扬，溅在脸上还发烫。

我此时才知道情况很糟。开阔地上躺着几十名烈士的尸体；外壕里爆炸声不绝，可以想象在狭窄的壕沟里，一连同志多么艰难，多么危险，而且伤亡必定不小，否则他们是会发起攻击的。怎么办？要过这片开阔地再跳进外壕，将是九死一生；要从交通壕里退回去，对前面的战士将产生如何的影响？

我说：“你俩等在这里！我上去。死了，或者死不了，进入外壕，你们都快回去告诉曾司令员、齐团长，建议晚上再发起进攻。现在继续进攻是不行了。”

“那咱们一起回去还不一样吗？反正白天不攻了。”

王汉卿、张友福这些“小老八路”，岂不知这阵势的危险？都不让我上。

“听话！”我厉声制止住他们。

我瞅准敌人换梭子的一刹那猛地向上一跃，谁料被早做好准备的王汉卿一把拽住腰带拉了下来。

我用手猛甩王汉卿拽我腰带的手。

王汉卿低着头，一声不吭，一眼不看，用两只手死死拽住我的腰带。

我深知跟了我三年的这个警卫员的粘劲。

“快放开，耽误了事我枪毙你。”我一边甩打，一边威胁，都无济于事。王汉卿把头垂得更低更低，双手紧攥，暴起很高的筋。

“好，好，你等着，我回去跟你算账。没见过你这样碍事的家伙！”我一边气咻咻地说，一边悄悄地把前面的腰带扣松开，猛然一放手，蹿上交通沟。

王汉卿忙拽我的衣服，却扑了个空。他把腰带甩给张友福，飞速地跃上去。俩人一前一后，忽而匍匐，忽而跃进。子弹在周

围落下，砂尘使人睁不开眼。我手被爆炸的弹片击伤，咬紧牙关，终于爬到一棵大柳树后面。回头一看，王汉卿脸上全是鲜血，已看不清本来的面容，但他还是艰难地往这里爬。

敌人火力严密封锁住这棵树，旁边朱营长的遗体上，又不断地落上了弹。王汉卿终于也爬到树后。原来他的一只耳朵被穿透，头皮被穿破，流血不止，他只是把血从眼部抹了了事。大树被打成蜂窝状，时刻有被打断的危险，要从这里跃出去，只有死路一条。离外壕还有20米，这20米比地狱还难以越过啊！

后面，我军猛烈开火，以掩护我们过去，无奈敌人一刻也不放松对这里的封锁。

“啊——”突然，王汉卿举着驳壳枪，向右方斜刺出去，边喊边冲边射击。

我剧烈一震，但瞬间就明白了一切，马上利用王汉卿以身吸引敌人火力的机会，向左一跃而去，连打几个滚，终于滚进了外壕。

王汉卿在与敌对射中，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之中……

天黑之后，全团重新开辟了突击点，经过一夜激战，终于打下田胡同。齐丁根愤怒地在俘虏面前端起机关枪，幸好被分区领导夺了下来。

我向朱德发和众战友沉痛告别之后，便默默地走到王汉卿遗体面前。一个只有17岁的可爱的孩子，就这样死了，是在挨了我的骂，挨了我的甩打之后，永远地去了！在蒙山脚下，沂水河旁，小王的娘把儿子交给我，就和当年母亲送我当红军、忍着泪水笑着送别的情形一模一样。几年来，小王跟我寸步不离。仗每打到激烈的时候，就紧紧地拽住我的腰带，任我发脾气，甚至粗鲁地甩打，他总是低下头，一声不吭，一声不争，手死死拽住腰

带不放。平时我的衣服脏了，扣子掉了，他就洗净、缝好。没有烟，也没钱买，小王就在人家收完烟叶的地里拣丢掉的嫩叶子、碎梗子，甚至烟叶根，拿回来晾干、烤过、捣碎，装到亲手缝好的小荷包里给我抽，连小烟袋杆里的烟油，也经常掏洗得干干净净。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时，我吃了矮子面煎饼，胃痛得死去活来。他就去给老乡打工，换点小米，熬汤给我喝。沂蒙山里蚊子特别厉害，咬得我夜里无法入睡。为了让我休息好，小王彻夜在我身旁驱赶蚊子……知热知冷，知疼知爱，整整三年！有小王在身旁，我多么充实！多么快乐！可是从此，形影不离的两兄弟，却再也不能见面了，我哭天无泪。

“我的好汉卿！好兄弟！”

“哒哒哒——”成千发子弹射向天空，为牺牲的战友们致哀，为他们送行……

（本文源自《沧海一粟》，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王定烈，1918年11月生，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导弹学校校长，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主编《巴蜀将帅》，著有《地狱归来》等作品。

## 郟晋武戎马一生

郟晋武

### 抗日战争（1937年10月—1945年9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10月的一个夜晚，我从老家绕县城越过冶河，赶到孟贤壁投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游击第一大队，从此开始了精忠报国的戎马生涯，在八年浴血奋战中练就一名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基层部队指挥员。1937年10月，任115师游击第1大队战士。115师游击第一大队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共同抗日，部队名称改为“八路军”。我在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里茁壮成长。

部队曾驻扎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温塘镇的鹿台，有个温泉澡堂。那时，晚上在连部门口站岗后，就去洗个澡，再去睡觉。2007年4月应邀参加西柏坡革命纪念馆落成仪式而来到平山县城，凭借着70年前的记忆，4月17日下午，带着女儿步行10余里寻找到当年的遗址。

1937年11月至1938年9月，先后任115师第5支队3营10连副班长、班长（排政治战士）。入伍不久，我们游击大队编入以685团2营为基础的115师第五支队，我任副班长，继续在战争中成长。1938年5月2日，到冀南参加攻打威县的日寇，学会了给枪上

## 台前

子弹。1938年5月中旬，参加冀南讨伐反动会道门“六离会”的战斗中，锻炼出夜间在死尸旁站岗的胆量。

1938年参加山东高唐县尹集战斗，由我这个副班长带领全班突击，战斗中我提着几十斤重的捷克式枪追敌几里路，胜利完成任务。一周后，我被提拔为班长，同时担任文化课的教员。1938年9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党支部青年委员，1938年10月，任5团2营营部青年干事，1938年10月，5团举行青年演讲比赛，我代表3营演讲获得第一名。演讲比赛后，上级调我到挺进纵队政治部，在青年科学习做部队青年工作，一个月后分配到5团2营营部任青年干事、党的分总支青年委员，党随连队战，同时做连队政治工作。1939年初，随五连参加曾国华支队长指挥第二次攻打灯明寺战斗。之后又跟随7连前卫班参加孔家访驱逐日寇，占领寨墙战斗。1939年5月，随六连参加袭扰南皮县城敌人。

1939年7月，任冀鲁豫边挺进纵队5支队2营7连副指导员经过几个月的锻炼，部队安排我正式担任2营7连副指导员。上任一个多月为部队招兵近200人，到纵队一个新兵连担任指导员，直至新兵分配完后归队。

1939年9月，任乐陵支队1大队指导员，1939年秋后，我5团2营在挺进纵队直接深入到日寇、汉奸、顽固派控制较严的山东省商河县、惠民县、阳信县、无棣县一带进行活动，加强和充实我地方政府及武装力量。在平原地区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改造地形，破路、挖沟，还普遍挖上深一米七八、宽两米的“抗日沟”，建成四通八达的网络，以滞迟敌人汽车、坦克的行动，方便党政军民开展游击活动。

1939年初冬的一个夜晚，左家战斗中我个人缴获日军一挺歪把机枪。1940年元月，任鲁西独立旅5支队2营5连指导员。当时

我连没有连长、副连长，连干部只有我和支部书记刘桃林。1940年7月12日夜，范县闵墓一带反顽作战中，我营全歼敌人伪专员邵鸿基的一个团。

7月15日夜，在范县吴桥参加2营向顽军181师驻守的攻击战中，胸部中弹昏死过去，被战友救回，初闯鬼门关。

1940年12月，任冀鲁豫教导3旅通信队上尉指导员。伤愈出院后，到教导3旅的除奸部工作几个月，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上级调我到旅部通信队任指导员。

1941年1月7日，参加著名的鲁西潘溪渡战斗。1月15日，参加反日军报复性“大扫荡”。2月9日，参加反攻顽军高树勋部所占领的随时栖风楼、魏胡同战斗。4月17日，参加古云集战斗。

通信队在每一次战斗中都保证了部队上、下通信联络畅通，有时敌人逼近，部队已经转移，但还未收发完电报，我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电台结束收发后再撤离。1941年7月，任冀鲁豫教导3旅7团炮兵连指导员，调回7团参加组建炮兵连。潘溪渡战斗中缴获的日本鬼子的九二式兵炮，就配置在我炮兵连一排。此炮的射击教员保谷政治（水野靖夫），原是战场上投降的日本兵，后又自愿参加中日反战联盟，成为我们的战友。

1941年7月24日凌晨，参加我7团攻占大吴庄，全歼敌一个团。紧接着奉命支援8团进攻小马庄，我连以准确猛烈的炮火歼灭敌人。我亲自打了两发八二迫击炮弹，均命中目标。1941年8月，任冀鲁豫教导3旅7团9连指导员，团令我到9连（红军连）任指导员，到任随即打了几场胜仗。

8月26日夜，参加攻占阳谷县王官庙伪据点，歼敌一个中队及部分伪区、乡政府人员。8月29日夜，突袭官良门据点的日伪军，打死打伤鬼子8人，打得伪军吓破了胆。1941年9月20日，参

## 台前

加8团与我2营配合完成的任集伏击战。1942年1月，任冀鲁豫边抗日游击军区7团2连政治指导员。1941年12月，八路军2纵队和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有关指示，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7团原2、7、11连编为2连，我任政治指导员。

1942年我红2连在郟城南、北，浦县城南单独打游击5次，还参加了吕胡同、肖皮口、孙楼、沈楼、邵垓、高屯等大小战斗16次，破坏敌人的通信线路3次，破坏敌人的公路一次，破路垓围砦一次。到小吴、侯集、杨集等地进行武装宣传5次，催粮、掩护地方人员到敌战区开展工作数次。战斗中共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枝弹药和军需物资装备我连。1943年1月，任冀鲁豫边抗日游击军区7团2连政治委员，为了加强党在军队的领导作用，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为了八路军的纯洁性，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官兵的政治教育。

1943年2月中旬，按照冀鲁豫边区高干会议制定方针，我2连组建郟北支队，由7团训练大队长王定烈任支队长，郟北县委书记左宏奇为政委，开始了深入敌后的游击战。

6月份，王定烈支队长率我连进入郟城、汶上边界活动，与昆张支队联合作战。6月5日拂晓，在寿张县薛屯诱敌来袭，予以歼灭。6月10日，在汶上鱼王庄伏击了汉奸刘本功的武术队。1943年6月，任冀鲁豫边抗日游击军区7团2连连长，6月14日，组织上发现我更合适担任军事指挥干部，安排我改任连长，从此走上了军事指挥岗位。

1943年7月3日拂晓，在郟城徐庙巧妙挑起几个方向的敌人内部混战，挫败敌人合围我之野心并消耗其有生力量。

最成功的救援突袭——金斗营战斗。1943年7月6日拂晓，讨伐顽军文大可战役中，我连夜行130余里，刚到东台头村，遇见

耿王楼据点（今台前县后方乡耿王楼）约90余日军和数百名伪军正追击我旅机关的后勤工作人员，情况危急。在尚未联系到上级的前提下，王定烈大队长果断率领我连不顾疲惫饥渴，在金斗营拦腰插入日、伪军的队伍，几经肉搏打退了敌人，避免了我旅后方损失。我2排副王钦明、1班长范振典、2班长刘同庆、3班长郭金岭、战士王忠义同志光荣牺牲。此战以少胜多，丰富了袭敌的经验，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7月31日，佯装伪军袭击伪自卫团团部驻地崔庄。8月20日晚，奔袭20余里外的孙村守敌。1943年9月，任冀鲁豫军区8分区昆张支队3中队队长。9月，运西地区党委和军分区作出决定，将郟北支队和刚刚组建起来的昆山县大队合并为新的昆张支队，下辖4个中队，相当于团的建制，我队编为昆张支队的3中队。

9月29日夜至9月30日，八里湾、十里铺反敌征粮的战斗，我连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10月10日，袁口接收伪军投诚。1943年10月，任冀鲁豫军区8分区东平县大队队长。

10月23日，昆张支队领导指示我连进入东平县，组建县大队，统一番号为昆张支队3大队，原3中队为东平县大队1中队，我任大队长兼1中队长，县委委员。从11月起，正式对外使用县大队番号，主要活动在东平的区乡。在东平县委、政领导的动员上，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我队在较短时间得到充实壮大。

11月8日，玉皇庙战斗，击毙伪区长。12月10日，乔村截汽车战斗，我县大队成功伏击护送日本顾问的汽车，日本顾问自杀，俘伪军9名。1944年1月10拂晓，我县大队在刘庄吃早饭的过程中打了一场袭击战。

1944年2月份起，我中队跟支队一起行动，参加了分区组织

## 台前 徐家堂

的讨伐土顽孙秉贤的鲁西南战役；战斗中我带1中队向西急进，于拂晓赶到，正赶上8团4连在外围打援，战斗情况异常危急。我中队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晚攻击西边的刘举人庄，我县大队全歼敌一个连。

战后配合8团攻入刘庄，敌突围南逃，我1中队歼敌一部，活捉敌副司令孔庆南。

3月9日拂晓进到郝诚营，抓住了伪军帮日寇运送耕牛的机会，成功打击了一次敌人。

3月下旬，我带1中队进入徐家堂战斗，歼敌护卫班，拔掉了徐家堂伪区长王鸣韶家的临时据点。

4月2日早9时，我支队提前潜入乔村，等一百多个日伪军押送着抢来的一群耕牛快要接近二十里铺时，突然夹击，打得敌人范荒而逃，帮老乡们夺回百多头耕牛。

5月1日，肥城龙洼战斗痛歼日伪军。此战毙伤敌20余名，其中日军6名，还有日军指挥官、机枪射手，伪军特务队长、小队长、中队长各1名。我伤亡14名。

5月7日夜半时分，攻打夏谢伪据点，活捉两个恶贯满盈的汉奸头子——伪区长和伪中队长。

5月11日，攻打拔除花兰店敌伪据点。

5月16日晚上，我率部包围伪军十里铺的据点，通过喊话，一百多名伪军缴枪投降。

随后，我部包围东平与汶上两县交界的沙河站据点，伪军中队舍命突围，被打得落花流水。到6月2日，我部趁热打铁拔掉多个敌据点。



郟晋武，1920年12月生于河北省平山县水碾村。1928年秋—1932年夏在本村小学、县职业学校读书，后因交不起学费失学务农、打工。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10月—1939年6月，先后任115师游击第1大队、第5支队2营战士、副班长、班长（排政治战士）、营青年干事。1939年7月任连副指导员，期间曾两次任扩军指导员（3个多月）。1939年12月任连指导员。1940年10月实行军衔制，授上尉军衔。1943年元月改任连政委，6月改任连长。1943年10月任东平县大队长、5团营长、副团长（1945年8月分区和3支队组成郟（城）北梯队，任副梯队长）。先后参加了建设和保卫晋察冀、晋东南、冀鲁边区、冀鲁豫根据地的打击日伪顽战役、战斗。四次负伤导致二等甲级伤残。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2月任晋冀鲁豫、中原军区野战军7纵、1纵20旅58团，2野5兵团18军52师154团团长。1952年评级为准师级团长。参加了出击陇海、龙凤、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赣南、湘南、湘西、进军大西南，解放西藏等战役。战斗负伤一次。在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鲁西南战役中，我团得到62团一个营加强，首先攻占郟城南关，全歼敌87团及222团一个营，为攻城创造了条件。

进军西藏我团担任先遣部队，直到边防重镇亚东。在昌都战役中执行千里迂回，完成围堵昌都地区防敌西逃任务。昌都战役后，为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谈判，打击敌人有生力量，我团受命出击歼敌7代本残部、4代本一部，迅速占领了边坝、丁青

地区。

1953年5月任西藏军区53师副师长。1955年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9月授上校军衔。1957年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8年12月任15军29师第一副师长兼参谋长。

1962年授予大校军衔，7月任昌都军分区司令员。1962年10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与54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组成“丁指”，任副司令员，此战役基本歼灭了瓦弄地区的印军第11旅。

1965年3月任西藏军区副参谋长，1965年取消军衔套改行政10级。先后在1965年4月封堵境外叛匪回窜斗争、1966年亚东边境斗争、1966年10月挖潜特、潜台斗争、1969年11月平息暴乱斗争中历任军区指挥部指挥长。1970年12月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9月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党内任职：中共西藏军区党委书记，1977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补选为候补代表）。1983年5月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兵团职顾问，1985年12月离休。

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 英雄营长刘玉清

王振亮 杨萃民 高黎光 王之信 李 哲

刘玉清（寿张县第六区），台前县刘楼村人，现属马楼镇刘楼村人，后随父迁居——郓城县黄集乡三合村。他生于1914年5月，从小受父亲的教诲，勤奋好学，高小毕业后考入曲阜师范。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亡日益严重的时候。玉清同志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血，投笔从戎，于1936年和本村姜德道二人同时考入南京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平津、沪、杭相继失守。12月日寇又大举进犯南京，国民党腐败无能，守城军不战而逃。12月13日南京失守，玉清同志只身堕城突围，后有追兵，前有长江，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找了一块门板，强渡过江，沿途乞讨，历尽艰辛回到家乡。经此事变，他深恨国民党腐败误国，完全打消了依靠国民党抗日救国的幻想，联合地方进步人士李景汤等人，拉起队伍，守土抗战，很快组织了三十多人枪的小部队，玉清同志任队长。

### 坚决抗日，成绩卓著

1939年初，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挺进鲁西，这时玉清带领人马去黄河西迎接。他向罗荣桓、陈光汇报了这一带的敌情，并积极筹备军需，配合杨勇部队首战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继之梁山

## 台前

大捷，歼灭日军400余人，民心大振，鲁西地区掀起了空前抗日高潮，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于8月1日宣告成立。刘玉清同志也于此时毅然率队参加了八路军，部队编入寿张独立营，玉清同志被分配到抗日政府工作。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玉清同志参加革命后，历任交通站站长，县交通局局长。1943年刘玉清同志任一区区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玉清任反攻营营长。

玉清同志在寿张工作期间，团结干部爱护群众，埋头苦干，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在担任交通局长时，不仅负责本地区的上下联系，还担负着党中央和山东地区的部分交通任务，传递文件，护送干部，每次都要通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玉清同志兢兢业业，周密部署，遇有重大任务亲身执行，因此几年中都顺利完成任务，没有出现任何差错，曾受到县政府和冀鲁豫交通总局的多次表扬。

1942年，日寇“九·二七”铁壁合围，那时正是中秋节过去不久。当时大豆棉花秋包谷还没有收割，党政军机关以及群众团体，都住在七区清水河附近。县委、县政府县大队住棘针园村，县委在此开会，讨论部署秋季工作问题。九月二十七日拂晓前，县大队游动哨报告发现黄河东南方向有枪声，这时县委书记高黎光同志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听取汇报，大队领导人沉着扼要地说道，军分区首长指示说这次敌人扫荡是“铁壁合围”，四面发现敌情，敌人正在向旧城方向推进，情况紧急。四面敌人便逼进，步枪机枪，炮兵一齐射击，边射击边前进，四面望去，到处都是太阳旗，十几步一个敌人，在飞机掩护下，步兵骑兵齐头并进，飞机不停地扫射。在旧城周围二十多里，聚集了二十多万群众，还有寿张、郟城、范县、鄆城、阳谷等。当时敌人的每一颗炮弹落下，几乎都要伤人。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来不及救自己

的同志，只能把负伤的同志隐藏在棉花地里。八路军看到伤员情况，更加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万里指挥主力部队，在旧城南摆开了战场，冒着敌人的炮火，集中一切火力，勇敢地向敌人冲杀，在突围时交通员李怀刚牺牲。县交通站长刘玉清同志为了掩护军区首长，腿部负伤，自己包扎好后。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他说服大家，把李怀刚同志的尸体掩埋好，又走了十多里路，然后又率领全体人员顺利突出重围，安全到达清水河附近中心地区。他这种对牺牲战友的负责态度和深厚的阶级感情，博得了同志们的尊敬。

### 英勇果敢，屡建奇功

1945年11月，寿张反攻营编为分区独立五团三营，1946年5月编入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二团三营，1947年7月编为晋冀鲁豫第11纵队31旅92团三营，刘玉清同志初任副营长，不久升任营长。他一贯关心战士生活，但他自己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喝一锅粥，没有叫炊事员单独炒过一次菜。有一次他发高烧，几顿饭都没吃，司务长满怀三同志用伙食节余的钱买了一只鸡，叫炊事员炖好送给他吃，玉清同志严肃地批评司务长说：他病了买鸡吃，战士病了是否也能买鸡呢？伙食节余是大家的，我个人不能占大家的便宜！然后用自己的津贴，把买鸡的钱还给了司务长。当时营的干部编制有匹马，但玉清同志除紧急任务需要外，行军很少骑马，把马让给病号骑。战士们称赞说：刘营长的马背上驮的是战士。特别是刘玉清同志作战勇敢沉着，指挥灵活果断，是全营干部战士爱戴的好营长。

反攻营编入正规部队后，在刘玉清、王村、王之信三位同志的带领下，参加了平汉战役。打曹州、战济宁、围东明、攻拓

城，三次出击陇海路，经过大小数十战，锻炼成为一支能攻能守的主力部队。在冉固堆、张风集、万福河等几次大的阻击战战斗中，在强大的敌人进攻前，刘玉清同志毫不畏惧，指挥三营坚决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出色完成了任务，受到纵队和旅首长的多次嘉奖和表扬。

1947年11月，陇海路黄口车站攻坚战是刘玉清同志指挥三营成功的战例之一。1947年7月，刘邓大军横渡黄河进行鲁西南作战，歼敌9个半旅以后，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刘邓首长指示，11纵队留在鲁西南，大张声势，迷惑吸引敌人，策应主力南进。随后陈毅、粟裕将军率华野主力部队到达鲁西南，从此11纵队暂归华野指挥。9月，刘邓大军已在大别山战略展开，解放县城23座，消灭敌人24000余人。蒋介石为了拔掉大别山这个钉子，清除他的心腹之患，调集14个整编师、33个旅共30余万人，对我大别山根据地进行全面围攻。党中央、毛主席命令陈粟野战军和陈庚谢富治兵团对陇海、平汉两铁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击战，斩断敌人交通命脉，寻机歼敌，策应刘邓作战，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经过三昼夜的破袭，拆毁铁路800余里，攻克城镇20多座，消灭敌人25000多人，迫使敌人从大别山调出，包括11师、40师等主力部队，10个旅逃返，大大减轻了敌人对大别山我军的压力。在这次战役中31旅的任务是攻克徐州西边的黄口车站，92团三营是主攻营之一。在刘玉清同志的指挥和带领下，三营首先突破敌人阵地，配合兄弟部队，经过反复冲杀。全歼守敌一个团和一个交警大队，共15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是一次漂亮的攻歼战。

### 壮烈牺牲，名垂青史

黄口战斗胜利后，部队转移到湖西地区休整。敌新5军和75

师34师等部向陇海路进犯。其先头部队已经进至沛县以北王双楼，据侦察员捕捉的俘虏供称，进至王双楼的敌人是吴化文94师的两个营。纵队命令31旅消灭这股敌人，旅决定91团从村北，92团从西北角进攻。92团首长把西北角的主攻任务交给了3营，9连为突击队，8连为二梯队，7连跟进。11月23日凌晨3时，9连和8连在刘玉清同志的指挥下，以迅猛的动作突破敌人阵地，占领房院十多处。正待后续部队上来向纵深发展，但突破口却被敌人堵死。战前没有料到，当天下午敌人换了防，34师两个营撤走，换了新五军20师的一个团，敌人火力很强，天空照得如同白昼，后续部队被敌火力压制在突破口外无法前进。为了接应已打进村的部队，团长张心田同志亲自指挥两次攻击，终因敌人火力太强未能成功，团长也负了重伤。拂晓前村外部队撤出战斗，天亮后突破口外停止了枪声。刘玉清同志指挥八、九连打通墙壁，构筑工事作好固守待援的准备。敌人从上午9点开始，用迫击炮、六0炮向我三营占领的房屋轰击，打得墙倒屋塌，并发动多次集团冲锋，均被我英勇战士用手榴弹刺刀压了下去。战斗坚持到下午两点多钟，我们的子弹、手榴弹已快打完了，阵地只剩下一处院子，最后只剩下一座堂屋，进来的两个连，连伤员在内也只剩下十二、三人。刘玉清同志也负了伤。这时敌人在窗外指名喊话，叫刘玉清同志出来投降。玉清同志激昂高呼，血战到底，誓死不投降。我们的战士用最后几个手榴弹回答了敌人，刘玉清同志为了保持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气节，用最后一粒子弹打进自己的胸膛，壮烈牺牲了。刘玉清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永远活在战友们心中，他的英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王振亮、杨萃民、高黎光、王之信、李哲回忆刘玉清烈士。

## 浴血抗日

——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

冀鲁豫边区军民英勇抗击日寇侵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经过许多曲折之后而结出的一个伟大果实。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更加丰富和发展的时期，它为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开辟了道路。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在党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在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下，在兄弟地区的配合下，边区军民经过长期英勇顽强和艰苦曲折的斗争，其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曲折发展过程，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高举武装抗日旗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城西南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驻军在中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正式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也于9月23日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由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在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实行的单纯由政府 and 军队抗日的片面抗战路线，一条是共产党主张的动员全国军民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10月，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随后，均相继开赴抗日的战场，同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 日军在边区的累累暴行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久，日军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平津沦陷后，日军沿平汉路、津浦路南进。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于10月10日占领石家庄，继而占邢台、邯郸、安阳、新乡。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初进占德州，继而占平原、恩城，12月下旬相继占领济南、泰安。1938年1月占领兖州、济宁，5月中旬占领菏泽。

5月19日徐州沦落，6月6日开封沦落，冀鲁豫苏皖接壤区逐步沦为敌占区。

日军所到之处，实行烧杀、奸淫、抢掠。1937年10月24日，日军攻占成安县城，在40余天中，杀害平民5718人。11月15日，日军制造了邱县惨案。12月13日，又制造了观城惨案，除大肆屠杀未来得及撤退的守城官兵外，还屠杀无辜平民150余人。1938年初，日军占领长垣县，杀害平民1700多人。4月8日，日军血洗了滑县陈营村。5月中旬，日军制造金乡惨案，屠杀民工和平民3347人，烧毁房屋670余间。1937年5月，日军侵占菏泽后，疯狂杀害无辜平民，造成菏泽城尸骨累累。5月19日，日军攻占徐州，又造成大批平民逃难。整个冀鲁豫苏皖接壤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 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冀鲁豫苏皖接壤区的共产党组织，在中共山东省委、河南省委领导下，抓紧恢复、整顿与重建党的组织。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作为省委代表到聊城后，成立了新的中共鲁西特委，刘仲莹、赵健民、徐运北先后任特委书记。1938年6月，以临清为中心，成立了中共鲁西北特委，张承上先任特委书记。1938年5月，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泰西特委，段君毅任特委书记。1937年11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古城镇成立，朱则民、王从吾、郭森先后任特委书记。1937年11月，中共鲁西南工委（特委）成立，白子明任工委书记。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边区特委成立，王文彬、白子明先后任特委书记。各地在恢复、整顿与重建党组织的同时，还积极大量发展党员，随着党员人数的迅速增加，党的力量大大增强，从特委到各县、区乡、村，各级党的组织逐步建立起来，从而为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冀鲁豫苏皖接壤区的中共党组织，还积极主动地与少数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官员和地方部队合作

抗日，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员纷纷撤退，鲁西北的局势极度混乱。在中共山东省委和冀鲁豫边区特委的领导下，鲁西北地方党组织挺身而出，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积极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共同抗战，开创了鲁西北生机勃勃的抗日斗争局面，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配合八路军津浦支队等开辟了卫东地区。

中共直南党组织一方面发动组织民众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扩大抗日武装；一方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民党河北省第十行政区专员兼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令丁树本共同抗战。

1937年11月底，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成立了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邀请中共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等共产党人参加动委会工作。自此，徐州西北地区中共党组织通过动委会更为有力的展开统一战线工作。

这个时期的地方党组织，还放手发动民众，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为发动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 抗日烽火遍燃边区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太原召开华北地区省委书记及部分市委、特委书记会议，讨论配合八路军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与政策。9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刘少奇、杨尚昆、朱德，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北方局据此确定，坚持全党搞武装，抓政权，放手发展自己力量的方针，并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号召。

北方局太原会议后，冀鲁豫苏皖接壤区党组织纷纷创建抗日武装，发动武装起义，抗日的烽火燃遍冀鲁豫大平原。

1937年10月，中共泰西临时县委在城东篦子店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关于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人民抗敌自卫团”的名义，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2月上旬，中共山东省委派从狱中出来的老同志张北华和共产党员程重远到泰西，与已在泰安、肥城的崔子明、远静沧、复震秋等会合，1938年1月1日，以10个人、11支枪在泰西的夏张镇举行抗日武装起义。1月11日，起义人员在肥城县空杏寺正式成立了山东泰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推选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葛静斋任副主席。

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在与范筑先将军合作抗日中，一方面协助范收编遍布鲁西北的各种游杂武装，并派出政工人员对其进行改造；一方面建立直接领导的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第二十七支队、第十三支队、第十二支队、第三十一支队等万余人的队伍。第十支队于1938年1月31日正式成立，张维翰任司令、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装备第十支队，中共鲁西特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节减开支，捐献部分个人津贴，购买了15挺机枪，建立了第十支队机枪营。

1937年11月，中共直南党组织在征得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高树勋的同意，建立了党直接领导的河北省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唐明哲、刘大风先后任支队长。另外，王从吾等人于1937年10月间，在濮阳一带建立了百余人的抗日武装，刘晏春等于1937年11月建立了濮县抗日游击队。

在国土丧失，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湖西、鲁西南各地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也开始发动和带领群众，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5月中旬，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成立，张光中任总队长，何一萍任政治委员。1938年6月，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郭影秋先后任政治委员。

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鲁西南各县也先后建立了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邹县县委在南亢埠成立了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同月，部分共产党人和鱼台县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鱼台县抗日自卫团。5月，中共郓城中心县委成立了抗日自卫团，当地民众亲切称其为“窝窝头队”。同月，中共曹县县委成立了抗日自卫大队。

## 开创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4月，毛泽东、洛甫、刘少奇等发出《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从1938年开始，冀鲁豫苏皖接壤区的共产党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泰西、鲁西北、直南豫北、湖西等抗日根据地。

### 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泰西地区党组织动员组织民众，团结各阶层人士，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泰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月28日，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夜袭津浦铁路上的界首火车站，乘敌人熟睡之际，用大刀砍死日军七八名。

1938年3月下旬，为配合台儿庄战役，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在北集坡车站附近焚毁日军火车一列，焚伤押车日军20余人。这

次破袭战，使敌人一星期未能通车。泰西地区的党组织率领抗日武装，进行多次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1938年11月下旬，根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党委的指示，泰西人民抗敌自卫团等部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刘海涛任司令员，张北华任政治委员。第六支队建立后，全力开辟泰山、大峰山、平阿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21日，第六支队一团团长陈伯衡在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泰西党组织率领抗日武装，连续袭击日本侵略军，挫败国民党地方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开辟了泰西抗日游击根据地。

### 与范筑先合作，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诞生

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作出关于创建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冀鲁豫边区党委的领导下，鲁西北地区党组织与范筑先合作抗日，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范筑先原系西北军军官，1936年任国民党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他为人正直廉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做好范的统战工作，1938年10月，山东省委从第三路军政训班中挑选了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政训服务员240名到聊城参加抗日工作，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也陆续派干部到聊城。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十分关心鲁西北的抗战，都对鲁西北的统战工作做了重要指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也分别于1938年6月和9月两次会见了范筑先。在徐向前和鲁西特委的帮助下，范筑先于1938年10月，召开了第六区军政联席会议，

通过了《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战时经济政策》和《整军方案》3个文件。

共产党和范筑先在鲁西北合作抗战后，积极对日作战，同日伪军进行了8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歼灭了不少日伪军。其中主要有：南镇战斗、范（县）濮（县）战役、黄庄战斗、济南战役等，狠狠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在鲁西北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广泛建立起民众抗日团体。在聊城失陷前，鲁西北有组织的群众达20余万人。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十分重视宣传、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先后创办了《抗战日报》等30多种抗日报刊，翻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等抗日书籍30多种，还创办了六区政治干部学校和军事教育团等学校，成立了抗战移动剧社等文艺团体。根据地内活跃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推动了抗战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成为鲁西北抗战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共产党和范筑先在鲁西北合作抗日，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1938年7月，美国友人埃文斯·卡尔逊到聊城访问。卡尔逊回国后，撰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专门介绍了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月14日，日军第114师团秋山旅团千叶联队，配有汽车、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进攻聊城。15日拂晓，敌猛攻聊城，范筑先指挥部队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范筑先与著名共产党人张郁光、姚第鸿等700余名守城将士壮烈殉国，聊城随即失陷。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破坏。

范筑先殉国后，各党派纷纷发来唁电。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周刊发表悼念文章。朱德、彭德怀和吴玉章、董必武分别给范筑先送了挽联。国民党政府也特令褒扬范筑先。在范

筑先殉国50周年时，邓小平为“民族英雄范筑先殉国处”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 直南豫北、湖西两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下，直南豫北地区党组织利用合法形式，动员民众，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开展游击战争，为创建直南、豫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8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与丁树本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公开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种群众抗日救国会迅速建立起来。为了加强对各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1938年5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六塔集召开了各界抗日救国会代表大会，成立了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安法乾为总会负责人，各种抗日群众团体总人数达到30万人。

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河北民军第二路第四支队建立后，积极对日作战。1938年3月9日，第四支队在小濮州与日军骑兵20多人遭遇，将敌击溃，毙敌4人。11日第四支队配合丁树本部在小常庄击退日军的报复行动，毙、伤敌250人，沉重打击了日军，从而增强了丁树本抗战的信心。

1938年8月下旬，为配合武汉保卫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第三八六旅政委王新亭、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率部发起漳南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以东、卫河两岸、漳河以南、滑县以北地区的伪军和土匪，开辟创建了安阳、内黄、汤阴、浚县、滑县等5县根据地。

在中共河南省委和苏鲁豫皖边区党委的领导下，湖西地区党组织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萧县黄口召开会议，传达

贯彻洛川会议精神。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特委成立。特委成立后，在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8月5日，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六大队在丰县华山附近截击日军。9月，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联合丰县、沛县国民党地方部队，由第二总队长李贞乾指挥，讨伐驻丰县北郊的土匪武装王献臣部，连续攻克宋寨等村庄。

抗战爆发一年来，冀鲁豫苏皖接壤区的中共党组织开辟了鲁西北、泰西、直南、豫北、湖西、鲁西南等若干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 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豫

1938年10月21日、27日，广州、武汉先后被日军占领。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此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部分主力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陆续挺进冀鲁豫大平原。

###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鲁西

1938年12月2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直属队和第三四三旅、六八六团（杨勇任团长兼政治委员）主力部队以东进支队名义，由晋西出发，于1939年3月2日，到达鲁西郛城一带。接着师主力一部到达泰西，成立了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

## 台前

桓任书记。3月12日，罗荣桓、陈光在东平县常庄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第六八六团到达鲁西后，在团长杨勇的指挥下，一举攻克樊坝，全歼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开辟了郓城、鄄城地区。

由于第一一五师主力连续打击日伪军，引起敌人重视。

1939年5月初，日军调集5000余人，汽车、坦克100辆，火炮100余门，分9路围攻东进支队。5月11日，第一一五师机关和鲁西区党委等被日军包围在肥城县陆房村一带方圆20华里的狭小地区。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陈光代师长指挥部队在歼敌1300余人后，胜利突围。陆房战斗杀伤了敌人，保存了革命力量，是一次胜利的突围，对坚持冀鲁豫边区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1939年7月底，日伪军400余人对梁山地区进行“扫荡”。8月2日，陈光、罗荣桓指挥第一一五师部分部队发起梁山战斗，全歼日伪军400余人，其中击毙日军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以下300余人，俘日军24人，缴获野战炮2门、九二步兵炮1门，机枪15挺，创造了八路军与日军兵力相等，而八路军装备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模范战例。到1939年底，泰西抗日革命根据地、运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 冀鲁豫、苏鲁豫两支队成立

1939年2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奉命率部到达直南豫北地区，在此组建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并确定了“依托直南，坚持豫北，开辟鲁西南”的方针。3月，部队开赴鲁西南。

冀鲁豫支队到达鲁西南后，不断打击日军的进攻，连续粉碎敌人的三次“扫荡”。一年中，共与敌进行大小战斗101次，毙

伤日军684名、伪军1375名，缴获重山炮、迫击炮9门、轻重机枪65挺、各种枪支19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扭转了直南、豫北、鲁西南的混乱局面。

为了加强湖西地区的对敌斗争，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五八团，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晋西出发，1938年12月底到达湖西地区，组建了八路军苏鲁豫支队。12月29日，苏鲁豫支队分3路突袭丰县西北崔韩庄，将公开投敌、为害丰县、沛县一带的汉奸王献臣部一举歼灭。战斗结束时，丰县日军300余人在炮火掩护下出动增援，被苏鲁豫支队第二大队击退。此次战斗的胜利，使八路军在苏鲁豫地区的声威大震，群众颂扬苏鲁豫第二大队为“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乘胜进至鱼台以南、徐州西北地区，全面开展活动，发展武装，打击伪军、伪政权，在湖西地区迅速形成了以八路军为主的抗战局面。

1939年8月，苏鲁豫支队第四支队又挺进南阳湖东邹县郭里集，打开反动地主固守的石圈子，然后协助地方党开展工作。9月，又粉碎日军对郭里集、南阳镇一带的“扫荡”。从此，湖西、湖东连成一片，苏鲁豫皖四省结合部20余县均成为抗日武装驰骋的战场。

###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挺进鲁西北

范筑先殉国后，中共中央即发出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1938年12月，刘伯承、邓小平到达冀南，在威县落户张庄召开冀南、鲁西北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巩固冀南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会后，相继成立了八路军平原纵队，袁仲贤任司令员；筑先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先遣纵队，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9年1月，中共中央

北方局鉴于聊城失守后的局势，决定建立鲁西区党委，下辖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张霖之任书记。

### 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

(1938年11月24日)

朱、彭、左、刘、向前、朱瑞：

范筑先如确牺牲，我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其部队，并实际帮助范区作战。因此，除同意朱瑞电外：

(一) 路东应派大员率领去范区，人选以向前、任穷二人之一为宜，队伍以青年纵队全部两个团去为宜。

(二) 即范未死，亦应派队去配合，表示共患难之意。

(三) 迅速促成以十支队为基础的团结其他部队组成纵队，成为鲁西北抗战及团结范部之核心。如同意请徐、宋执行。

毛、王、杨、滕

中共中央对范筑先部工作的指示

为了扭转鲁西北极度混乱的形势，1938年12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第七七一团、补充团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进至馆陶、冠县、邱县一带。12月24日，陈赓指挥部队一举歼灭盘踞在曲周县东目寨的王来贤顽杂部队1500余人。1939年1月10日，陈赓率部向盘踞高唐县城的日军发起攻击，从而初步稳定了鲁西北的局势。

1939年3月初，鲁西区党委和先遣纵队根据上级关于开辟泰西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确定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分区活动。先遣纵队以大峰山为依托，面向平原，在运河以东开创抗日根据

地；筑先纵队继续在卫河两岸坚持斗争。3月5日凌晨，先遣纵队和鲁西区党委在茌平县琉璃寺被日军包围，经过激战，先遣纵队和鲁西区党委机关安全突围出去，转移到大峰山区。琉璃寺战斗中，鲁西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不幸被俘牺牲。

在卫河两岸坚持斗争的筑先纵队不断出击，打击了日军。1939年10月1日，筑纵第三营发现4000余名日军由贾镇南下桑阿镇。营长赵建民率部在冠县陈贯庄伏击日军，毙伤日军110余人。从此，“赵三营”威名大震。

1939年12月12日，莘县日伪军四五百人袭击驻莘县西北魏二庄的先遣纵队一部。李聚奎司令员指挥先纵一个营和筑纵第五营与敌激战，歼灭日伪军100余人，打退了敌人。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挺进鲁西北后，稳定与发展了鲁西北的抗战形势。

### 鲁西、冀鲁豫边、湖西抗日根据地形成

1939年1月15日，中共鲁西区党委在馆陶县成立，张霖之任书记，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3至6月间，上述3个特委撤销，先后建立起7个地委。1939年8月，鲁西军政委员会决定建立鲁西军区，由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杨勇兼任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段君毅任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1940年3月，恢复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的番号兼鲁西军区，肖华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第三四三旅政委和军区政委，杨勇任旅长兼鲁西军区副司令员，辖黄河支队、运河支队和4个军分区。1940年4月鲁西行政主任公署成立，肖华、段君毅先后任主任，辖泰西、运西、运东、鲁西北4个专署。

1940年4月，为加强直南、豫北和鲁西地区的领导，在清平县成立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王从吾、张玺先后任书记，初辖4个地委，后调整为3个地委。本月，八路军第二纵队和冀鲁豫支

## 台前

队统一整编。仍称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同时成立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兼任政治委员。6月，黄克诚南下后，由杨得志兼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下辖独立团、民军第一旅、新二旅、新三旅及3个军分区。1941年1月，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晁哲甫任主任，辖3个专署。

随着湖西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1939年5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特委改为苏鲁豫区党委，白子明任书记，辖湖边地委、鲁西南地委和沛县、萧宿水、金嘉巨3个中心县委。1941年3月，建立湖西专员公署，李贞乾任专员。

### 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大“扫荡”

1940年，日军加强了对鲁西、冀鲁豫边、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决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保卫了根据地。

1940年6月14日，日军突然包围中共运东地委机关驻地茌平县张小庄。经激战，除少数人员突围外，有30人被捕，地委书记刘培桐、组织部长董景平等36人壮烈牺牲。

在此期间，日军还深入鲁西和运西地区进行突然性合击，企图消灭当地党政领导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6月25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新八旅二十二团二营，被3000余名日伪军包围在朝城北耿楼。二十二团政治委员史钦琛和127名指战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0年9月2日，日伪军出动2800余人，分6路向沙区合击。冀鲁豫军区党政军机关，军区第四团和南进支队一部在濮阳县坟台头、西王寺之间，与敌激战6小时，毙伤敌300余人，打破了敌人的合击计划。

从1940年9月起，日军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扫荡”。12月，金乡县日伪军采取夜间包围，拂晓攻击的办法，向驻守在巨南大刘庄的八路军黄河支队第三团发起攻击，第三团在当地村民配合下，毙伤敌200余人，突出重围。

### 根据地军民英勇反击顽军进攻

从1939年12月起，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各根据地军民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了顽军的挑衅和进攻。

为了保卫冀鲁豫边、鲁西抗日根据地，1940年，八路军对顽军石友三部进行了两次反击作战。3月4日根据党中央和集总的命令，宋任穷、程子华统一指挥冀南、冀中、冀鲁豫、鲁西地区的主力部队共25个团，对从冀南退至冀鲁豫区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石友三部发起反击，至5月中旬，第一次反击石友三战役结束，共歼敌石友三等部顽军51000余人，控制了有10个县城在内的广大地区，使冀鲁豫和鲁西两个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0年6月底，顽军石友三部在日军配合下，又重占濮县城及濮阳、清平、观城、范县之间的根据地。根据集总命，由宋任穷、肖华统一指挥鲁西、冀鲁豫、冀中、冀南主力部队，于7月10日开始，发起第二次讨石战役，至17日，其毙伤顽军2700余人。从8月开始，八路军采取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双管齐下、长期斗争的方针，经过斗争，石友三部发生内讧，高树勋、孙良诚将石友三处死，这就是“石高事变”。历时半年的讨石战役结束。

当边区西北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战役激烈进行之际，鲁西

南地委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依靠群众和少量武装，打击、分化、瓦解30倍于己的各路国民党地方顽军，胜利地坚持了以刘岗、曹楼、伊庄等3个村为中心的根据地中心区，这一斗争被称为“三村”斗争，是边区反顽斗争的一个成功范例。

1940年6月，正当冀鲁豫地区第二次反击石友三部战役进行之际，湖西地区顽军乘机发起进攻，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竟下令开枪杀死请愿的群众代表，制造了震惊湖西的“六·一三事件”。为了打开局面，刚刚到达湖西的八路军黄河支队，于6月4日拂晓，对侵占孙庄、便宜集的丰县常备队发起进攻，歼灭顽军800余人。接着，又3次出击，粉碎了顽军的联合进攻，最后终于站稳脚跟，坚持了湖西抗日根据地。

### 抗日根据地建设不断加强

在抗日反顽斗争中，鲁西、冀鲁豫边、湖西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党政军建设和经济、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使根据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湖西抗日根据地因错误的“肃托”而丧失了大好局面。

1939年，随着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冀鲁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各地区的党组织也迅猛发展。鲁西地区的党员由4800人发展到15800人，直南豫北地区由1800人发展到2万人，湖西地区由1200人发展到1万人左右。党员的大发展，大大增强了党的力量。但是发展中也出现了忽视质量的现象。1939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0月，鲁西区党委、直南地委和豫北地委分别作了传达。但由于只是一般号召，因而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1940年2月，鲁西区党委在范县钟固堆召开扩大会议，就巩固党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部署。1940年2月至11月，各地区先后进行了三次巩固党的工作。通过巩固党的工作，

党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一定提高，但在审查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伤害了部分同志。

1940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要求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完全民选的、以及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参加的抗日政权。3月，又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我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四月北方局高干会议提出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任务，鲁西地区先后建立了濮县、范县、朝城、鄆城、观城、聊城、东阿、夏津、武城、冠县、郟（城）南、张秋等12个抗日民主县政府，连同先前已建立的，共计30个县级政权单位。在此基础上，4月5日，成立了鲁西行政主任公署，统一了鲁西各界抗日政权的领导。这时，在鲁西36个县166个区中，已有30个县80个区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政令。在冀鲁豫区，先后建立了清平、曹县、南乐、大名、长垣、滑县、濮县、东明、考城等抗日民主县政府，连同先前建立的，共计10个县级政权单位。4月，成立了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从此，统一了直南、豫北两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

1939年11月至1940年7月，湖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取得较大进展，首先恢复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充实加强沛（县）滕（县）办事处，随后相继建金乡、单县、丰县抗日民主政府。

7月建立湖西专署，从此统一了湖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

1940年鲁西区的群众工作有了较大发展。为加强对各抗日群众团体的统一领导，从3月至5月，相继建立了鲁西妇女救国总会、职工救国总会、农民救国总会、青年救国总会。

各救国会成立，进一步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据不完全

统计，到1941年4月，鲁西区有组织的群众约50万人。冀鲁豫区发动群众的工作，自抗战以来一直是比较好的。至1940年四五月间，相继建立了冀鲁豫区工、农、青、妇抗日救国总会。全区参加各救国会的会员数达30万人。1940年湖西地区的群众工作，重点是消除湖西“肃托事件”造成的不良影响，重建和整顿工农青妇抗日群众团体等。

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是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开展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经济的特点。在抗战时期，冀鲁豫军区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所需经费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财产来解决。

随着抗日武装力量和党政群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及时提出了“合理负担”政策。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合理负担办法和财政制度也逐步完善统一。如鲁西行署1940年制定了《整理田赋地亩暂行办法草案》，规定人均1亩半为起征点和3级累进税。适应开征赋税的需要，1939年秋至1940年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发行了鱼台县地方流通券、泰西银行钞、鲁西银行钞、冀南农民合作社兑换券等四种“抗钞”。在鲁西的泰西、鲁西北、运东、运西等工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建立了许多生产消费、信用合作社，开办了一些小型民用工业。为了加强党对财经工作的领导，还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财经委员会。

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和教育事业发展很快，新闻出版工作在抗战初期相当活跃。鲁西区党委创办《灯塔》杂志、《鲁西日报》，鲁西军区创办了《挺进报》，中共冀鲁豫区委创办了《卫河日报》、中共苏鲁豫特委创办了《团结日报》，各地委也都先后创办了自己的报刊。同时，各级党的宣传部门还组织翻印和编印了许多重要理论著作、政治理论教材、时事教育读物及大量宣

传品。文化艺术团体是活跃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生力军。各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团体，对活跃、丰富根据地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鼓舞抗日斗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有相当的发展。八路军推进到冀鲁豫平原后，各种训练班和干校逐步走向正规化，主要以办干校、党校为主。1940年后，随着各级抗日政府的建立和鲁西、冀鲁豫、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向全面、正规化发展。根据地内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生动景象。

1939年前后，湖西、鲁西、直南根据地先后发生了错误的肃清托洛茨基匪徒的事件。这是在当时对“托派”组织及其作用的错误估计下发生的错误，在“肃托”中，一些干部无端遭到逮捕和杀害，造成了大量历史冤案，给抗日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1939年11月，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等得到消息，立即赶赴湖西处理“肃托”事件。1941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湖西锄奸错误的决定》，198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湖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报告。198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又作出为鲁西“肃托”事件彻底平反的决定。至此，三个根据地的“肃托”事件得到彻底解决。

## 抗日根据地经受严峻考验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美军基地，随后整个世界都卷入了空前规模的战争之中。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和“蚕食，到处制造“无人区”，国民党顽固派也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41年1月，国民党

军队袭击皖南新四军，制造了“皖南事变”，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

### 抗日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

位于华北南端的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起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在敌祸、天灾交加之下，根据地日趋萎缩。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根据地军民艰苦奋斗，努力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1941年1月，八路军第115师教三旅一部，采用围城打援战术，在郓城县北部潘溪渡附近伏击日伪军，取得全歼日军160余人的重大胜利，并缴获九二步兵炮1门，这是入侵山东日军仅有的三门九二步兵炮之一。

潘溪渡战斗后，日伪军对鲁西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报复性“扫荡”，1941年1月17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三旅特务营一部在朝城苏村阻击敌人，126名指战员英勇牺牲，仅负重伤的副教导员秦昌银等10余人生还。日伪军在“扫荡”鲁西根据地之后，调集1万余人，在飞机、重炮、坦克掩护下，于1941年4月12日，分5路疯狂“扫荡”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八路军第二纵队一部为掩护大部队突围，被敌合围在井店东北的永建地区。经激烈战斗，200多名指战员牺牲，部分指战员突出重围。日军“扫荡”过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回旋余地大为缩小。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区对敌斗争形势日趋紧张。

### 鲁西、冀鲁豫边两根据地合并

面对日趋紧张的对敌斗争形势，为了统一对敌斗争力量，以利于长期坚持冀鲁豫、鲁西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区党委在观城县红庙村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张霖之任书记，张玺任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7月7日，合并后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得志任纵队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政治委员兼军区政治委员。9月初，新的冀鲁豫行署成立，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两区合并后，立即加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建设，注意斗争策略，主力部队摆脱顽军钳制，推向边沿区展开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力争军事斗争的主动权。

根据新的部署，1941年7月下旬，八路军教三旅第七团、八团分别强攻与日军勾结，进攻根据地的顽军齐子修部盘踞的在平县南大吴、小马庄，共歼灭齐部1000余人，南大吴、小马庄战斗的胜利，改善了运东根据地的形势。这时，顽军主力孙良诚、高树勋部乘机进犯抗日根据地，反动会道门在湖西地区发动暴乱。1941年8月2日，金乡县南部无极道徒数千人突然进攻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大冯庄，杀害抗日军政人员。1941年冬，昆山实验县徐楼一带也发生红枪会暴乱，八路军部队反击两股顽军的进攻，平息了反动会道门的暴乱，保护了根据地。

泰西、湖西抗日根据地经历异常艰苦的环境。泰西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直接威胁着敌战略据点济南、泰安、兖州和南北大动脉津浦铁路，引起了敌人的极大重视。

1941年1月至3月，日军数次疯狂“扫荡”泰西抗日根据地。在艰苦斗争中，许多党员干部壮烈牺牲。1941年1月2日，日军杀害了泰西地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刘仲羽。3月12日，日伪军包围中共泰西地委、泰西专属机关驻地肥城县莲花峪，突围中，地委宣传部长黄白莹等牺牲。4月，日军杀害中共宁阳县工委书记许国，并将其头颅铡下悬挂在城门上。5月29日，八路军泰西军分区后方医院伤病员和医务人员96人被日军杀害。1942年

## 台前

2月，东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崔宜平在开展抗日工作时被日军杀害。3月，中共泰西地委副书记王晋亭在召开会议时被伪军包围，突围中不幸牺牲。10月，平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熊善隆被伪军包围，饮弹殉国。

泰西军民在严酷的环境中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941年6月25日，长清县第十区游击队在反“围剿”中击毙日军少将、大尉各一人。但是，敌人继续增派驻军，加强对泰西地区的控制。一直到1943年6月，泰西地区的形势才开始好转。

1942年9月27日，日伪军1万余人、坦克10余辆，分8路合围冀鲁豫边区的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后又分区“清剿”，历时18天。部分八路军部队、地方干部、群众被日伪军合围在甘草固堆一带。教三旅政治委员曾思玉率部与敌激战，掩护部分被围的干部和群众突出合围圈。

从1942年12月中旬开始，日伪军1万余人，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式“扫荡”。湖西党政军机关遭到严重损失，专员李贞乾、教导第四旅十团团长沙明等牺牲。

由于敌人一连数月对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连续“扫荡”、“蚕食”及分割、封锁，边区大部分地区变成“格子网”，1942年夏、秋季一度缓和的形势又变得十分严重。

## 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刘少奇多次指示，要求进一步转变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并加强了区党委的领导。1942年冬召开的边区高干会议，为扭转困难局面起了关键作用。高干会议之后，经过艰苦斗争和

工作，扭转了军事斗争的被动局面，使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时期。

### 转变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

1942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4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到山东抗日根据地指导工作。7月下旬，刘少奇离开山东抗日根据地到冀鲁豫地区。9月中旬，经湖西、鲁西，到达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他在沿途了解了各地情况，又听取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后，就革命战略和策略、当前工作、群众运动、党内斗争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为边区转变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

194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再次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指示》，并决定调原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员会书记。

1942年11月至12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了题为《边区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作了《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的报告。这次会议，标志着边区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是全区扭转困难局面的关键会议。

会议结束时，又实现了党的一元领导和第三次精兵简政，调整了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班子。

### 反“蚕食”恢复发展抗日根据地

冀鲁豫边区的对敌斗争，在高干会议精神指导下，采取内线和外线相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达到了坚持根据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目的。

1942年底的边区高干会议，将建设小部队提到战略的高度，并对建设小部队的一系列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决定。会后，边区各地根据不同情况，派遣小部队到敌占区和接敌区，积极进行反“蚕食”斗争。

高干会议后，第二地委及军分区，根据区党委和军区指示，组织了昆（山）张（秋）支队，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区斗争。昆张支队三进昆张地区，经过艰苦斗争，到1944年5月，将变质为敌占区一年多的昆张地区恢复为抗日根据地。昆张支队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边区各地借鉴昆张支队经验，广泛派遣小部队，展开对敌斗争。1943年，全边区共派遣小部队142支，深入敌占区和接敌区，形成对日伪顽夹击之势，转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阻止了敌人的进一步“蚕食”，坚持了根据地，扩大了解放区。

1943年，敌人对边区的“蚕食”基本上是以伪军为主。对边区进行“蚕食”进攻的大股伪军，是文大可部和杜淑部。

1943年7月5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指挥第二、三、四军分区部队，发起朝南战役。战役历时7天，歼灭伪暂编第三十一师文大可部700余人，改善了边区北部的形势。

1943年7月30日，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第十六团、二十一团、新四路、卫河支队、骑兵团一部及部分地方武装，发起卫南战役，此役，歼灭伪杜淑部5600多人，收复、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标志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反攻的开始。

1943年秋，日伪军为围歼八路军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摧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掠夺秋粮，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规模“扫

荡”。第一阶段，以11100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10路包围湖西、鲁西南地区。第二阶段，以15000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13路包围中心区范县以及滑县、长垣。冀鲁豫军区部队和群众积极主动反“扫荡”，在20多天的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35次，毙伤日伪军1374名，俘日军两名、伪军2744名，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秋季反“扫荡”中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朱程、专署专员袁复荣牺牲。此次反“扫荡”，不仅体现了冀鲁豫根据地转变斗争方针的成效，而且也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日军秋季大“扫荡”末期，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疯狂“蚕食”根据地中心区。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16日，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八公桥战役。此役，攻占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毙伤敌数百人，俘伤第二方面军参谋长以下官兵3200余人。后又扩大战果，拔除敌据点100余处，歼敌数千人。至此，边区的中心区同第二、四、五军分区连成一片。

1943年，冀鲁豫边区加强了民兵建设。各地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他们平沟、毁墙、围困据点，拔除炮楼把“挤”进来的敌人再“挤”出去。南乐县东节村民兵拔掉日军据点的事迹，在边区传为佳话。1942年7月8日，东节村民兵在县大队配合下，趁敌人要民兵修炮楼之机，一举拔掉日军炮楼，打死日军9人，缴获一批武器。杨得志、苏振华传令嘉奖东节村民兵说：“你们的行动，轰动了边区，震撼华北。”7月30日，日伪军包围东节村，制造了有名的东节村惨案。

在平县张楼村很早就组织了民兵联防，曾多次给日伪军以打击。1945年3月31日，日伪军3700多人进攻张楼村，村联防队

和群众奋起抵抗。因众寡悬殊，村子被敌攻破，群众被杀死333人，伤271人，被捕264人。后来该村被誉为“英雄村”。

广大民兵还积极维护根据地的社会治安，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特别是基层民主政权建立后，民兵便成为保卫和巩固新政权的重要支柱。

1942年秋，八路军回民支队由冀中经冀鲁边到达冀鲁豫边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回民支队为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44年2月上旬，回民支队在杨得志率领下开赴延安。2月7日，回民支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病逝。遗体送至莘县张鲁镇安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为马本斋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同志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边区争取、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在1939年8月梁山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本桥等组成“觉醒同盟”，1944年又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冀鲁豫协议会”。同时，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加强了政治宣传和改造培养工作，制发了“回心抗战记”、“公民证”和“抗日同情证”等。全区还积极开展情报工作，设立了情报站。一部分伪人员也积极提供情报。

冀鲁豫边区是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通向太行进而去往延安的必经之路。因此，建立通往各根据地的交通线，至为重要。边区先后建立了四条通往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交通线，两条通往山东分局的交通线，一条通往水东根据地的交通线，并建立了沙区办事处。冀鲁豫边区地下交通线的建立，在沟通联系、护送干

部、传递物资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 反击顽军李仙洲入鲁反共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从3月至10月，蒋介石集团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命令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苏鲁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李仙洲率部入鲁反共。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和山东军区协同发起反击李仙洲部战役。此役从5月4日开始至8月25日结束，前后共进行战斗69次，毙伤敌1450人，俘敌3570余人，开辟了东西约140华里、南北约100华里的新区，粉碎了李仙洲入鲁反共的企图。

### 自力更生发展根据地经济

进入1941年，边区抗战经过4个年头。长期的战争，敌人的摧残，极大地削弱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资基础。在此情况下，边区又出现持续的干旱，造成严重灾荒。边区军民为了生存，为了坚持抗战，积极开展以生产自救为基本方针的救灾运动。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和经济、财政建设。

1943年，冀鲁豫边区根据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指示，加强了财政经济工作。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发展公私贸易，建立公营商店。边区自1942年秋起，先后建立许多商店。如1942年秋在高陵县井店集建立的“德兴隆”商店，在顿丘县顺河集建立的“德兴长”商店等各地商店，在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加强财政经济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扩大货币发行，开展货币斗争，建立统一的“抗钞”市场。冀鲁豫行署规定冀南票、鲁西票、北海票等“抗钞”为本位币，严禁伪币和法币在边区流通。到1943年秋，在边区中心区建立了统一的“抗钞”市场。

1944年3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召开全区生产工作会议。随后又掀起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全边区军民因地制宜、确定生产项目，积极行动起来，掀起一个以春耕和防旱为主的农业生产运动。广大农村把一切劳动力、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投入春耕生产，及时整地、增施肥料，扩大种菜植棉面积，多种早熟作物和大麻，同时发动妇女搞好纺织等家庭手工业。第二军分区机关建立起生产基地，做到蔬菜基本自给。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张国华率领机关及部分部队开荒地1万余亩，并帮助群众熬盐。第五地委成立了机关家属工厂，纺纱织布，生产肥皂，磨面，造纸等。

在大生产运动中，冀鲁豫边区的军工生产也发展起来。第一军分区在平阴县建立了炸弹厂，第二军分区建立了军械修理所、手榴弹制造所和能生产九二炮弹、山炮弹的炮弹所。至1944年底，军区建有兵工厂，各军分区都建有小型的军械修理、制作所。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有效地改善了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从根本上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为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物质保证。自此，边区的财经建设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 开展整风运动加强党的建设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和《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从此，全党开始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

冀鲁豫边区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上半年开始的，至1945年6月基本结束。前后大致经过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2年上半年至1942年底，主要是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整风指示，逐步开始学习整风文件。冀鲁豫区党委铅印了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发至各级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组织学习。区党委、军区及各地委、军区都组织了直属整风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第二阶段：从1943年初至1943年底，主要是在全区开展比较系统的整风学习，区党委首先抓了地委一级和区党委直属机关干部的学习，这是边区整风学习的基本对象。其次，抓了边区各地区的县、区级干部及广大党员的整风学习。第三抓了军队干部的整风学习。这一时期，军队系统的整风学习由于领导有力，干部自觉，因而开展得比较好。

在整风学习中，冀鲁豫边区较早地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11月15日，《战友报》发表了非文（姜思毅）的《加紧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专论。1944年6月30日，《战友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3周年，发表了题为《把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全军中去》的社论，社论由姜思毅撰稿。

第三阶段：从1944年初至1945年6月，是全区广泛、深入地进行整风阶段。进入1944年，随着客观形势的好转，区党委决定在全区各级党政军群干部中，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整风运动。2月，抽调地委以上干部50余人组成脱产整风队，在区党委直接领导下进行整风学习。1944年5月，中共冀鲁豫分局成立后，为全面、深入开展整风学习，决定抽调部队连以上，地方法县以上在职干部建立党校，进行整风。党校设在太行山林县，分局书记黄敬兼任校长。6月，党校负责人带领一千余名学员到达林县，集中进行整风学习。党校整风学习历时近一年。到1945年6月，冀鲁豫分局党校整风结束。全区整风运动至此胜利结束。经过

整风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增强党的战斗力的目的，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准备。

### 民主民生运动促进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

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6月30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要求边区全党全军必须了解“中心的一环是发动群众，党必须以全部力量进行这一工作”。9月，刘少奇对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充分发动群众等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指示，冀鲁豫边区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领导开展民主运动和民主建政工作。濮县、范县是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县。区党委书记黄敬在两县民主民生运动工作总结大会上发言，认真总结了他们的经验。

经过1942年濮县、范县民主民生运动的试点和此后在鄆（城）北、鲁西南、湖西地区的试点，以及在全区的普遍展开，边区的民主民生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冀鲁豫边区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出现了两个热点地区，直南豫北地区是其中之一。这一地区的滑县，发动和依靠雇佣贫农，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为全区民主民生运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1944年10月，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写了《滑县的群众运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一文，总结了滑县的经验。

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另一个热点地区是运西。在运西地区的濮县，从上到下，普遍建立了各级雇佣贫农代表会，有的区还建立了农民联合会，成为党联系农民群众，集中群众智慧的桥梁。地委副书记万里在运动中发表了《继续贯彻大胆放手的领导方法》的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

通过开展民主民生运动，数千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发

动起来，进行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觉醒了的农民群众要求当家作主，他们用“豆选”的形式，来选举自己的村长。通过这种方法，民主选出能够代广大群众利益的村干部。

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冀鲁豫边区根据“三三制”和民主原则，加强了抗日政权的建设，从而不但极大地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还为更大范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 根据地各项事业建设全面加强

冀鲁豫边区的宣传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很大发展。

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分别创办了《冀鲁豫日报》和《战友报》，各地区也分别有自己的机关报。另外还有《冀鲁豫妇女》和《文化生活》，也都是很有影响的刊物。

冀鲁豫边区的文艺团体一直是一支很活跃的宣传力量。

“大众”剧社、“新民主”剧社和“战友”剧社是最有影响的几个剧社，影响较大的部队剧社还有“前锋”、“挺进”“烽火”等。根据地的业余剧社和民间文艺团体也十分活跃，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轻骑兵的作用。

边区的教育事业是随着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时期，全边区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一些抗日中学，到1944年底，全边区抗日中学发展到11所，在校学生达2000人。边区抗日中学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大批革命干部，这些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

边区的抗日小学教育在这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为使更多的农民子弟能够读书上学，冀鲁豫行署拨出专款，积极鼓励和创办小学。到1944年底，全边区小学有3万多所，在校学生130多万人。冀鲁豫边区在发展学校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兴办发展民众教育，使边区形成一个全民性的学文化的热潮。

## 大反攻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讨关于打败德国后的形势和苏联对日作战等重要问题。5月9日，德国投降。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举行会议，通过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与此同时，中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收复了大片国土。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

### 适时建立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为了统一和增强对敌斗争力量，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鲁豫边、冀南两区工作。翌年5月，两区正式合并。1943年11月26日，中共冀鲁豫分局在观城红庙村召开高干会议，历时47天。会议总结了1943年的工作，提出了1944年的任务。黄敬、宋任穷、苏振华、张霖之、徐达本分别作了报告。这次会议对推动边区根据地的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局部反攻，壮大边区抗日根据地

从1944年4月18日开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对敌发展夏季攻势作战。从1944年5月中旬，八路军第八军区发起昆张战役，共拔除日伪军碉堡、据点50多处，消灭伪军1200余人。随后，又乘胜于5月29日夜袭清丰城，毙伤日伪军数百名，俘伪冀南道尹薛兴甫、日本顾问及官兵1000余人。

1944年8月5日，第八军分区又发起讨伐郟城伪县长刘本功部战役。此役历时7天，共攻克刘本功部据点37处，歼灭其27个中队，毙伤俘大队长以下官兵2600多人。

1944年8月11日和8日，第七军分区部队两次收复莘县城，并解放莘县全境。此役俘伪县长刘仙洲以下官兵2000余人，从而使聊城、阳谷之敌直接暴露在八路军面前。

在边区军民开展春夏季攻势的同时，1944年7月底，八路军第十一军分区部队与鲁西南部队，联合向微山湖地带的顽军发起反击，取得很大胜利，新开辟砀山、华山、沛（县）铜（山）等4个县，并分别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

从1944年11月起，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冬季攻势作战。此次作战到1945年1月结束，共攻克县城2座，据点10余处，歼灭大量日伪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

根据毛泽东《1945年的任务》和中共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冀鲁边区部队从1944年底开始进行整训。为此，冀鲁豫军区颁发了整训训令。整训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以政治整训为主；第二期为军事整训。在政治整训中，各军分区普遍举行坦白大会，干部战士登台发言，充分发扬民主精神，批评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和教条主义及不关心战士的倾向。连队中，还普遍进行了拥干爱兵誓约活动。在军事整训中，广大干部和战士发扬不怕苦的精神，白天、黑夜加紧训练。军区领导亲临现场，与战士一起操练、射击，官教兵、兵教官，共练杀敌本领，呈现出官兵互教互学的感人景象。

在空前残酷的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冀鲁豫边区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民兵英雄、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召开英模

大会，总结英模经验，推选出出席全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人员。1945年3月1日，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开幕。大会经过三天的民主讨论和评定，共选出全边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等共258名。大会发表了《冀鲁豫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宣言》。这次盛会，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了一次有力的思想动员。

1945年初，中共冀鲁豫分局、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决定开展春夏季攻势作战，进一步扩大解放区。在春夏季攻势作战中，著名的有南乐、东平、阳谷三个战役。

1945年4月24日，冀鲁豫军区以第八军分区部队为主，由第九、七、三军分区部队配合行动，发起南乐战役。此役历时3天3夜，歼灭日军一个小队35人，歼灭伪军等共3400余人，攻克据点32处，缴获大批轻重武器。

1945年5月17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集中第一、八、十一等军分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及第九军分区骑兵团一部，发起东平战役，一举攻取东平、东阿，粉碎了日伪军抢麦计划。此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俘日本顾问1名，日兵3人投降，歼伪军10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至此，冀鲁豫边区的泰西、运东、运西、湖西等几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东平战役胜利结束后，八路军乘胜扩大战果，于1945年7月20日，以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部队为主，第七军分区部队担任阻击打援，发起阳谷战役。此役共俘伪军等2000余人，毙伤伪军等300余人，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和军用物资，阳谷获得解放。至此，冀鲁豫边区第一、四、七、八分区间，除聊城至临清一线尚为日伪军盘踞处，其余广大地区已连成一片。

水东地区在1943年1月划归冀鲁豫边区后，根据地不断巩固

和扩大。194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和军区决定派部队南下水东，开辟水西，扩大根据地。随着水东斗争形势的好转，本年秋天，冀鲁豫分局调整了水东地委，随后，将水东联防办事处改组为水东专员公署。1945年2月，在水东建立了第十二军分区。水东地委和专属分别改称冀鲁豫第十二地委和专署。为了进一步加强水东、水西抗日根据地的领导，统一指挥豫东部队对敌作战，1945年6月20日，冀鲁豫分局决定成立中共豫东工委、豫东指挥部、豫东办事处。豫东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后，即带领该区军民积极投入全区战略大反攻，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全面大反攻，扩大抗战胜利成果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大反攻阶段。8月10日、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对日受降及展开反攻等七道命令，刘伯承，邓小平也电令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迅速准备夺取敌占城市及交通要道。

遵照毛泽东、朱德关于大反攻的指示，中共冀鲁豫分局、行署和军区也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命令。1945年8月中旬，冀鲁豫军区组成南路、北路、中路三路反攻大军，向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1945年8月21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部队攻克封丘县城，9月15日攻克滑县城，18日攻克曹县城，29日攻克汤阴县城。至9月底，经过一个半月的反攻作战，八路军在纵横千里的广大地区，已控制了75座县城。全区地方武装和主力兵团由原来的4万余人，增加到10万余人。

## 台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全区损失物资折合法币约计45028亿元，折合小米约450.28亿斤。全区人口死亡、失踪等共133万多人。

八年的抗日战争，全区党政军民共控制县城75座，创建了约2000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本文源自《巍巍丰碑》——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追忆，主编：贾凤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

## 一身是胆，战功卓著

——深切缅怀段君毅同志

曾思玉

2004年3月8日看新闻联播，突然播出段君毅同志逝世的噩耗，我的心情非常悲痛。我和段君毅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1939年冬，我和段君毅同志在山东东平县岱庙第一次见面。他高高的个头，挺拔的身材，长长的眉毛下镶着两颗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他讲起话来声音洪亮，铿锵有力。然而，他在说话之前又总是面带微笑，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这是段君毅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

他当时是一一五师独立旅副旅长、鲁西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同志任旅长兼政委（杨勇同志还兼任鲁西军区司令员、政委）。我们从此就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了。

当时，我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他兼任鲁西地区行政公署主任，在敌后斗争中，创建平原抗日根据地。那时情况复杂，日军、伪军、顽军、反动会道门以及一些地头蛇、恶霸等反动武装异常嚣张，对我八路军都是妄图以打跑、挤跑、消灭而后快。在这种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出身官僚家庭的大学生段君毅同志（他父亲是一名开明绅士，在当地是很有威望的）却义无反顾地投身

到革命的洪流中，成长为我军一名高级领导和优秀指挥员，在创建鲁西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了扩大八路军的队伍，他把地方武装成连、成营、成团地输送到部队。尤其是在残酷的斗争中，战斗异常频繁，部队伤亡甚大，为了使部队保持旺盛的战斗能力，把地方武装抽掉补充到战斗部队是他经常做的事。他常说：“你们是正规部队，在作战中是主力，你们不怕牺牲，勇敢战斗，你们的兵员由我们地方来补充、来支援，是我们地方党政负责同志的分内之事，这样才能形成军民合力，军政团结。”

为了生存、为了抗日、为了取得抗战的胜利，坚持创建和开展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就尤为重要。当时，党政军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如改造地形（破路、破围寨）使部队行动自由，便于利用抗日道沟，同敌人周旋。特别是对阻止日寇坦克、汽车、骑兵横冲直撞，保持我军有生力量起到突出作用。

段君毅同志积极主张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要建设好地方政权，建设好各级群众组织机构。

1943年秋，环境比较恶劣，时局比较动荡。冀鲁豫地区黄敬、段君毅等领导同志在红庙地区召开了冀鲁豫士绅名流、进步人士座谈会，讨论时局、三三制政权问题。当时情况到了最艰苦时期，一是日寇采取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敌人扫荡“蚕食”，根据地一天天在缩小环境极其恶劣。再加上多年旱灾严重，蝗虫成灾，老百姓将树皮都吃光了。在朝城、莘县、观县地区有的老百姓全家都饿死在炕上，无人收尸掩埋。我们部队再次进行了精兵简政，采取了正规军地方化，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部队都穿起了便衣（长袍子、穿、睡都是这一件衣服）。党号召：党政军民要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坚持抗战到底。

在开展战胜自然灾害、抗旱灭蝗的斗争中，段君毅同志身为政委、行政公署主任也一样冲入第一线，身先士卒带领群众一同抗旱灭蝗度过困难，落实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指示，这给人民群众和部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2年9月27日，日寇对我党政军民实行“铁壁合围”，直到年底冀鲁豫部队与鲁西军区合并。以后，冀鲁豫与冀南又合并成冀鲁豫边区，黄敬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宋任穷任司令，王宏坤、杨勇任副司令，苏振华任副政委，阎揆要、曹里怀任参谋长，朱光任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任副主任，段君毅任二地委书记兼二分区政委，后任八地委书记兼八分区政委，我任八分区司令员。我和段君毅在李楼、颜村铺多次召集吴忠、邵子言等同志开会，研究组织昆张支队，明确坚持武装斗争，进行小部队活动，坚持隐蔽斗争，深入昆张、东平、寿张、郟城以东、梁山等地区，开展敌后斗争。

1943年麦收时节，七团一部与八团、昆张支队进行武装保卫麦收，发动攻势把几十个炮楼、碉堡、伪据点一扫而光，又恢复了抗日根据地。

同年12月13日，是日寇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冀鲁豫边区。我们组织以两个连为一个梯队，采取你打进来，我们就打出去的战法（你来扫荡我根据地时，我乘敌后空虚打到敌占区去）摧毁伪组织，消灭敌人。段君毅同志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我们形成一致意见后，他总是积极地贯彻抓落实，使我们部队总能形成一个铁拳头。

12月12日深夜，我们从颜村铺转移到黄河大堤吕集待机。13日早晨日本鬼子从吕集以东向颜村铺扫荡。这时，段君毅同志就问我：“曾司令，打不打？”我说：“敌人来势凶猛，不能

打，我们趁敌扫荡，从抗日道沟隐蔽向阳谷方向机动。”全体指战员露营休息，作战股长李觉和侦察股长邱克难前来报告说：

“司令员、政委，据情报员报告，阳谷城里还有敌人的汽车部队和坦克、骑兵。”当时我们考虑这里不能久留，要立即向东转移。段君毅政委非常赞同地说：“对、对、对、主动的转移利多弊少。”我们就立即带两个连和分区直属队，争取在拂晓前通过阳谷——寿张间公路。果然，敌人的汽车部队沿公路由阳谷向寿张地区运动。我们顺利地突破了阳谷——寿张间公路日寇的封锁线，奋勇向东转移。这时敌人的炮楼和汽车上的鬼子用掷弹筒和轻、重机枪火力向我军猛烈射击。段君毅政委和李觉率领的特务连、直属队脱离了危险区，我率四连阻击敌人。时间很短我们就会合了。次夜，我们就赶到了昆山庄休息了两天。

在昆山庄与吴忠、邵子言率领的昆张支队会合，又开了紧急会议，要粉碎日寇向濮、范、观中心区扫荡。我们已经跳出来了，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到敌人后方去。我说：“段政委、你在泰肥山区工作时间很长，熟悉情况。”他就问我：“你的意见是不是到泰肥山区去？”我说：“对。”他说：“到泰肥山区摧毁敌人伪组织，拔掉敌人据点。”大家个个心情激动，兴高采烈，决定次日就出发。当部队刚行进到夏谢附近，就采取了突然的行动，借风向用火攻的做法，把夏谢伪军炮楼攻克并以速成的办法教育俘虏，当汉奸没有出路要遗臭万年的。段政委要昆张支队田主任立即召集夏谢村的群众开大会，宣传我党我军对俘虏的政策，让群众很快地到俘虏中找出自己的家人，部队做到说话算数，立即放人。

第二夜，我们决心再一次扩大战果，乘胜偷袭东平城。段君毅同志说：“偷袭东平县城可能会给日本鬼子很大的震动。”经

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偷袭东平城，推毁伪组织，捣毁敌人粮食仓库。当夜，七团四连和昆张支队从东平城西南角芦苇地偷袭一举成功，消灭了南门城楼的伪军和伪警察所。日寇和伪军惊恐万状。掷弹筒在轰鸣，曳光弹在东平城上空形成一道道白色银线，相互交织。战至深夜，我们就主动撤出战斗，烧毁东平城南门城楼，火光冲天，并烧毁了敌人粮食仓库。我们分区梯队和昆张支队立即分开，昆张支队到敌后去袭扰敌人，配合中心区反扫荡。分区梯队从东平湖（干湖）田地里，急行军到独山休息。次夜，返回颜村铺。

鬼子得知情况后，迅速派部队乘汽车去增援东平城，而我们的部队已经撤离，扫荡根据地的敌人败兴而归。我们分区梯队回到颜村铺休整。这时，七团徐仲禹副参谋长和总支书记惠毅带领两个连在内线执行反“扫荡”任务。他们得知分区回到颜村铺后，立即前来汇报他们在内线的反“扫荡”情况。只见他们有说有笑，非常高兴，他们深有体会地说：“大部队化为小梯队作用非常大，机动性强，行动灵活，说打就打，说走就走。”有天夜里，鬼子住在玉皇庙，把抢来的麦子堆在打谷场里，七团派出小分队在夜里偷偷地接近打谷场，把沙土扔在麦子堆里，并袭击了敌人。

次夜，敌人撤至中心区。这时我告诉七团杨俊生政委，通知各梯队回到龙王庙地区休整。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敌人扫荡蚕食我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决定先打弱的，后打强的，首先集中兵力，从东边开刀，并把九二式步兵炮挖出来（敌人扫荡时，就把步兵炮埋了起来），打掉了寿张伪军孙广勋在候庙和莲花池设立的据点，再打朝城文大可伪军。对孙良诚进占濮县和鄆城、刘本功在刘口地区设立的据点，组织军民联防加紧袭扰，保卫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这时已进入1944年5月中

旬，我和段君毅带领部队从保卫麦收战役胜利地返回到颜村铺。

不久我们就接到清丰县基干大队傅学楷、政委李斌送来的情报，要求我们消灭日本顾问团，解放清丰城。段君毅政委一看，非常积极，主张攻打清丰。他一再说：“曾司令，这是一个好战，抓住这个战机，消灭日伪军，解放清丰城，武装保卫麦收。”我同他说：“段政委，我们一面上报军区，一边机动七团、分区特务连、炮兵连到六塔集结，由七团政委杨俊生、参谋长徐仲禹统一指挥，乘敌立足未稳奇袭清丰城。”段君毅同志的最大特点就是积极支持军事指挥员果断定下决心，做好战时政治工作。我们一举攻克清丰城，俘获冀南道尹薛兴甫、伪县长等5人、日军旅团参事官等10余人、伪军官百余名、伪军士兵1500人，击毙伪冀南道“剿共”第一军军长李铁山部200余人，还缴获轻机枪21挺，步枪2000余支，子弹万余发，战马15匹，汽车2辆。

1944年冬，我分区团以上军政干部参加军区召开的民主大会。大会结束以后，我们八分区以团为单位召开连以上干部会，传达冀鲁豫军区民主大会精神。我们正确地分析了坚持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流，并分析了不足之处，发扬民主，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开了一个心情舒畅的团结大会，掀起了练兵热潮。

1945年春，军区下达了郭小砦、南乐、东平、阳谷等4个战役命令，连战皆捷。以后，八分区又进行了郟北战役攻打汉奸刘本功。胜利之后，段君毅同志奉冀鲁豫军区命令率八团（团长王定烈、政委李仕才、参谋长常志义）进至豫东（也叫水东）十二分区，执行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段君毅说：“老曾，我们一起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共事非常愉快。上级调我去豫东十二地委工作，我只有服从命令。

但我非常舍不得离开八分区，舍不得离开你曾司令。”我说：

“哎，君毅同志，你率八团这个拳头到那个地区一定会打开好局面，发扬你做群众工作的特长。我们见面机会很多嘛！我们还是老规矩，四个菜一个汤，欢送你，我们的好政委！”

全国解放以后，段君毅同志在国家机关工作，任过一机部部长、铁道部部长，还担任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期间他还为建设第二汽车厂作出过贡献。我去北京开会就去登门拜访。回忆往事，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平易近人、体贴人、关心人，尊重老干部，善于团结人，乐于助人。他一贯坚持艰苦朴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原则，工作认真，敢于负责，清正廉洁。他任过国家几个部门的一把手，都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个损失。他的离开，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战友、好同志、好政委。他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段君毅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北京市委《段君毅纪念文集》（下）编辑组编，北京出版社）



**曾思玉**（1911年2月2日—2012年12月31日），汉族，江西省信丰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28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共，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343旅股长、冀鲁豫军

## 台前

区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四纵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2012年12月31日逝世，享年102岁。在鲁西的六年抗战中，曾思玉所率的基本部队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三旅第七团，人称“老七团”，其前身是由南昌起义部队保存下来的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中央苏区时期是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林彪、陈毅曾分别担任过这个团的团长和团代表。这支战功赫赫的红军老部队，在曾思玉带领下纵横驰骋于鲁西古战场，打得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在与日寇无数次血战中，最有名的是奇兵突袭八公桥战斗和本文记述的甘草垌堆突围。

## 在寿张参加革命

李月贞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74年了，那时候不讲阳历，讲阴历。1943年10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也挺简单，因为我有一个继母，她的弟弟（我舅舅）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后来他就带着一帮人跑到解放区去了。到了解放区以后，他是个进步的人士，让他当寿张县（今台前县）七区区长。

那时候，我家是寿张县（今台前县）城东师里庄的，我姓师，我的姥姥家姓李。我们家门口，也盖了一个小碉堡。我记得我是在东北（吉林省四平）长大的，14岁才回到家里。家里很穷，我母亲死的早，我父亲又找了一个。我继母原来的丈夫在济南，可能是个先进人物，结果叫国民党给枪毙了，因为这个，她来到寿张。她娘家在寿张，就是我说的那个舅舅（叫岳川）家。我父亲也是比较进步的（日本侵略东北时，在东北抗日），所以给他商量了一下，说我是在东北的时候念了两年书，识几个字，他说行，那来吧。我父亲就把我送到他那里，那时候还有姥姥，姥姥领着就把我送柳园那里去。县政府就在清水河，县委书记就是高黎光，高黎光是濮阳人，县长是个年轻人，忘记了叫什么名字，他（县长）的爱人是叫吴燕，吴燕是七区的妇救会主任，我们县主任是董先峰，董先峰后来跟黎光结婚了。我参加工作呢，有两月吧，那时候按

阴历，阴历快到11月底了，日本鬼子抢粮过年，那叫“11·2”，也就是11月以后，当时抢粮，男的可以拿起枪来上前线，来回周转（游击），女的靠老百姓掩护，就是当老百姓家的人。我刚去，人家都没人认识我，怎么掩护呢？我们的妇救会主任说你回家吧！我夜间就跑回家，那就12月了，快过年了，我想着过年前，鬼子扫荡完了，再回去吧。当时我的奶奶哭，快过年了，我就没去。过了年半个多月，我就回单位去，没过两三天，就是“三·八”节，我的印象是。我入党那时候一般不填表，因为敌情挺严重，都没人填表，就是入党的时候我觉着写什么时间呢。那时候我不计较写什么时间，当时是3月，我就写1944年3月，我的历史上写的是1944年3月。我去了以后，主要是发动群众，组织妇救会。几个村里头组织妇救会、儿童团，那个时候抗日时期，给地主、富农还是搞团结的，那时候还不反对党，要求他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能照顾老百姓把饭吃饱，共同抗日这是个目的，如果你好的话还可以是绅士、好的进步的人士，所以不分男女老少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的。我先参加的七区，清水河七区，后来半年以后，调到二区（在侯庙），当时做妇女工作。到二区工作时，当时有一个妇女主任，叫杨建荣，后来过了两月就调走了，她是三区莲花池那边的人，我过去了没几个月，就公布我作为妇救会主任，我说我刚来那么短时间，我懂嘛？就是给妇女组织团体活动、抗日教育，强调男女平等。解放思想，男人不能对妇女实行家庭暴力，另外婚姻自由，不搞家庭包办，再就是小女孩缠足，动员不要缠足。可是有的人迷信，认为不缠足，两个大足，将来嫁不出去，偷偷地晚上把脚缠上，妇救会里规定发现缠脚就罚。罚啥？罚棉花，那时都兴纺棉花，逮住一个缠脚的就罚棉花。这里还有一个故事，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武口村原村干部武良用，查到他家时，他的一个近门子，

他阻止，要面子不愿意让罚，我是村干部，脸上不好看。结果妇救会不同意，查你的家你不同意，查别人家就行，你是为你的家，还是为整个社会当干部，还是个党员，结果妇救会派人找我，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罚他，我们就解散，这那能行呢？我好不容易才组织起来的，那个村又不太小，那么多的妇女我都组织好了，为他这一个事解散，我去了我就给他说明，武良用不愿意，就给我吵架，我说你那里告我都行，我绝对保证不能让妇救会解散，你参加革命工作，为得什么？

我是1945年7月1日入党，当时我入党时，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介绍人还问我，你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好，我没法回答。到入党的那天，大伙都笑我，你还不知道，你还入党啦，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在农村哪知道谁好啊？没有人给我说，哪知道谁好，不过我在东北时，那时是一九三几年，那也是起来反对日本的，也是抗日的，东北有的学校里教日语，有人说别听，听了以后学会了，把你们弄到日本去，所以女孩子都不去。再说我已经十三四岁了，我还有一个妹妹，我哥哥也在那里，我母亲死的时候，我才6岁。我父亲为了生活就把我们姐妹俩寄存在一个同乡家里，生活能好的了吗！冬天脚手都冻破，头上都长虱子。

参加革命，后来发动群众。到1947年时，中央召开第七次中央会议，决定土地改革。土改时在我们住的那个区试点，那时候工作比较“左”，我的工作是在后张。那地方有一个地主，叫张某春。当时一听说我们土地改革，他跑了，跑到外面去了，家里就剩下他母亲，他母亲挺顽固，农会到她家去的时候她就骂，并且说将来蒋介石来了挨个砍你们的脑袋，这些话把农户给激起来了，能饶她吗？去了把他家给收拾了，把老太太给折腾死了。还有一个不算地主，富农也差点，这个人呢？在他庄上大白天连

干灯也借不出来的人。开始土地改革呢，他先骂街，谁敢怎么着我？他富一点，那时农会也比较“左”，就把他给拴起来，关到一个屋子里，他本身有病，谁也不知道他有病，什么病也不知道，过了两三天他死了。我在那里搞土改时就死了那么两人，当时我也挺害怕，我向地委汇报，说没关系，现在对地主可以扫地出门，那是“左”，不准他在原来那里住了，赶了出去。我心里才安定下来。我在那村比较大，属于重点村，地委来的人大部分都到这个地方来看，军队上也有一部分人来的。地委的干部也来，刚土改完了。1947年底，我们整党，在山东省阳谷的不远的一个村，各地区都是搞土改的人都集中那里。王均宇在那里搞土改那里太“左”了，他是四川人，他的老婆叫陈兰，也在后张待过，还带着个小孩。

整党之后，我就调离了七区，在寿张就结束了，我被调出寿张到了革区工作队，检查整改工作情况，到工作队两个月，工作队在舍利寺。中央华北党校，我自己也要求去学习，被送到中央华北党校，住在王母村，在平山县西柏坡，党校一共六个部，一部是高干部，二部三部是南下部，四部五部就是我们这一部，成员是地方县委委员、区委书记、妇联的、农会的、青会的人，还有个第六部是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进步势力、地下工作者。这大部分都是青年部，好像有两三万人。开会的时候，晚上坐那个大操场里，谁去的时候个人带座，上大课时只是晚上，那时候没有电，都是气灯，一个气灯照好远。邓小平是我们的校长，还有好几个教员，教员我就不记得了，还有教员后来成了“右派”。在那里学习时，安排定的是一年，结果由于东北的胜利，当时天津情况，在东北的林彪过来进关以后，和地方抽了几个师，就围攻了天津，解放了天津，当时天津是陈长杰。当时先把塘沽给围

上了，怕陈长杰从那里跑掉了，先打塘沽，所以解放天津也很容易，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作了不少工作。所以我们这个党校，就提前结业了，那时候干部很少，没有多少干部，为了这，一批干部就提前结业，天津解放基本上接近全国解放了，那是1948年，解放了天津，接着就解放济南，以后南下就过江。

从我个人讲，我的经历，从华北局党校回到原来的我们的地方新乡，有一部分人来接收天津、北京，我们三四个回到新乡，重新搞新区的土改，接着天津解放，一批革大学生（革大学生成份也比较复杂，革大很大的，有小学生二十来岁、十八九岁，闲散人员都可以到革大报名，也有四五十岁的旧警察，也有国民党的的小官、说书、唱戏的。）分到那里（新乡）去搞土改，当时我是队长。新区的土改与老区的土改政策就不一样了，新区的土改政策是什么，就是对地主不是扫地出门，给他们也同样留下一份生产资料，叫他自食其力，成为劳动者，变成这样的政策了。搞了几个月的土地改革。

特别有一些伪特务警察，国民党的乱七八糟的都有，还有妓女，所以在那里搞了一段土改，后来就安排到汲县，在汲县城管局工作。到了1951年，我的爱人他是部队里，1947年在寿张结婚，结婚后，部队里后来不是成立空军吗，没有人，他就去了。

结婚时，我们在寿张搞土改的时候，我在侯庙后面赵庄结婚，结婚主要是我们的区委书记主持的。他叫我们结婚，我就不知道，也不换衣服，穿了一冬天的破棉袄，叫我去干吗，说今天组织上给你们定了要结婚了，别的没有好日子，现在大伙都在这里开会，开完了，凑这机会。把我父亲也弄去了，我一看，我父亲怎么来了？因为那里有我同村的一个人，他给通知的。我就不知道。我们区委书记叫宋化海，赵庄住过几天，结婚后就走了，

我结婚的对象是部队的，也是到那里搞土改的，别人都调走了，就把他留了那里了。他是广东人。我父亲到处转悠，见识多，他比较开通，他说这是革命人员，别管是哪里都是共产党领导下，都是革命，他只要是好，我们就不管他是那里人啦。我父亲同意，这样我们区里就定下来了。当时我23岁，他30多岁了，他瞒着岁数，他是广东人。当时的介绍人还有七区的地委书记高志旗，他在中间撺掇的不少，他说我们区里一定把这个工作作下来。这个人比较忠诚，硬把这个婚姻作了主，后来他到部队，到了北京，被空军给调去了，空军人少，当时刚成立17师吗，17师的政委罗宾，刚开始时在杨柳青机场，后来人调齐了，成立了一个飞行大队（航校），航校毕业学生，就能驾机起飞了，就搬到唐山去了，在唐山修了大机场。

我是1951年到部队的，正式参军，到了部队当时没给安排工作，就把我安排到一个科里，分发文件，发报纸，待了一年多。到1952年，就调到北京空军政治部去了。空军政治部有一个直属部，就管各个师里飞行员的吃喝穿戴等，还管干部家属，小孩保育问题等等都管，我调去以后就安排当女校当教员，后来部队实行低薪制，1953年底就都解散了，实行低薪制。个人都能养家了，后来直属工作部又成立了转业学校（转业大队，那时候没有退休制度，转业大队里有退役的飞行员，不适合在部队里的年龄了，40岁以上后人员，一般的连长都不超30岁。那时转业大队就成了三期，我在那里政务室（党务室）任助理，这三期有两期分到天津，有一期分到山西大同，这三期以后没再培训，转业大队也没有解散。当时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命令，女同志除了报务员，医生、飞行员以外，其他统统转业。有的还转业到农村去。我是1955年5月份转业来到天津，我来到天津也是低薪制了，工资大概100多块，到了地方成了

62块，当时问我这怎么办呢，我说为了工作，又不是为了钱。过了年以后，又给我涨了，涨到八十九块。我到红桥区那年，粮食工作提前改造，粮食比较紧缺。原来粮食属于私营管理，有一个大的经营粮食叫万春斗店，区里先把万春斗店拿下来了，变成公家的，区里派出一个科，粮食科；资本家当经理共同管理，后来全区有不少的粮店（粮店有小业主，资本家等），都被公家收回，把他粮店资产折价。存入银行30年，给利息。当时他们哭的厉害。后来，都给他们定工资了，都算国家的职工了，每人都按粮食，小米定，实际算起就是几十块钱，三十多块钱吧，那时候钱还值钱。

我是19岁参加工作，当时我家门前不是有一个炮楼吗，日本鬼子没有几个。其中有治安军，在东北培养的铁杆治安军，再一个就是地方的汉奸。汉奸最坏了，大部分汉奸都是周围村的不远的地方，搞的很熟。我这个人可以说是洋学生，从东北来的，有的人给我介绍队长的儿子，去他娘的，我才不认这个呢！因为我上学时，就反对日本鬼子。所以说我就去他那里，他给七区时说了一下，七区就在清水河，我去了以后，他们还欢迎我。我的舅舅家在黄河南沿李楼，（我的哥哥嫂子是从东北回来的，他没有参加革命，入了党啦，是村干部，村支部书记。）我回到家来没有事干，我父亲给我买了好多书。那时炮楼里汉奸跑来这里借书，又不能不借给他，借给他还时书里写的乱七八糟的，后来我就说没有书了。

说到抗日呢，我没给日本鬼子打过一仗，就是解放阳谷，我是亲历现场了，解放阳谷是在日本投降前，1945年割完麦子四、五月份。当时打阳谷时有地委有驻军，还有当地方的三支队，和当时寿张县的大队，准备解放，阳谷敌人没有多少日本鬼子。主要就是治安军，治安军特坏，再就是一部分汉奸。后来，准备一天就解决的时候，马一叫唤，惊动了城里。所以说就不方便了。那里边就把

## 台前

老人、小孩都弄到城墙上，没法打了。后来司令员下令，是杨成武（杨勇）我记不下来。先把四门围着，别让他们跑了。靠东南角有一个敌人的炮楼，所以，他们靠着那个炮楼观察，向外打。当时呢三里庄就住着我们的大队，采取了挖地道，七尺以下对着他那个炮楼挖地道，挖了整整一个礼拜。我去干嘛去呢？乡下都是慰问品，有大饼、馒头、有鸡、猪肉、西瓜还有油条等吃的东西，各地方都去送，满满的一大车。有四个民兵护着车，我们就一块去，先到的三里庄。到三里庄很静，什么动静也没有，清静极了。刚下过雨，走路沾脚，吃过饭了，人家有的休息，没有女同志，就我一个人。我就在外头逛游着玩，我看着一个小兔子，离我就两三步抓不着它，就跟着跑。说是离阳谷三里，其实没有三里，也就一箭地意思。走着走着离炮楼不到一里啦，追小兔，始终没有追着它，它在山芋地里跳。后来后面就有一个人喊：“那个同志赶紧趴下！”我看了看没有人，“那个女同志你赶快趴下，”我知道说我，我就赶紧趴下，刚趴下没有几分钟，就听到轰的一声，把我震的十分钟都没反应过来，震的耳朵什么也不知道，等我醒来时，天上黄沙满满的，小砖头满地都是，可是战士们都向城里冲啦，开始攻城了，连枪响、手榴弹都响起来了，炮楼里可能有部分人死了，它后面还有一个营房，部队都进城去了。后面是担架队，民兵都进城。我起来拍了身上的黄土，也进城去了。进城一看，可能那是亭子里头，轻伤的、有的眼睛、有的腿受伤的，还有一部分家属女的，都坐到一个麦场里，刚下过雨，地上还湿湿的，里边还在枪响，还在打。我也不敢向里头去，我这个枪不管事，小五虎，只能打五米远，我上里头不倒霉吗。就在外头转游。站岗的就那里站着，看着场里的那帮人，街道挺乱的，死的人也不少，老百姓来了一大帮，要打这帮人，战士们护着他们，对他们说“不要打了。这帮人等于死老虎

啦，打死他们怎么办，最后有人替你们出气。”我转了一圈看了看。太残了，有一个人嘴巴掉下来啦，拿个碗又向他嘴里灌水，我就不敢看啦，也不敢往里去，这时可能天已经十二点多，大部队都往城里进。我们四个民兵一块来的也进城里，他们背着枪，到了三点多啦，也该出来啦，从阳谷到侯庙也有三四十里路吧，我觉着天太晚走路不方便。我等了一会，一个人出来，抱着一帮女人衣服，我就告诉他，赶紧找他们三个去吧，一会天都黑了，走路就不好走了，他进城找了半个多小时，找回来啦，除了拿武器以外。其他的什么东西随便拿，有的拿了报纸，那个人还拿了几个罐头盒子。还有我没仔细看。我们走到三里庄也有十几分钟，我们就出来啦。我看见抬担架的不少，抬的有的都是重伤，没见一个日本人，除了汉奸，就是治安军，还有老百姓伤的。把他们都抬了后方医院去了，从那回到侯庙碱场驻地，天快黑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日本鬼子面对面的，原来都是躲着，藏到青沙账里。

我刚参加工作时，那里豆棵子，也是六七月份，挖了地沟好路都挖成壕了，日本人去哪里扫荡都开着坦克车，一挖地沟，他就不能开了，坦克进不去。所以，我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晚上有一个老同志还有一个女的，我们三人进到这村准备开会，不大会西村来人告诉我们，日本鬼子要来讨伐来了，赶紧别开会了走吧！我们那个老同志戴着大烟袋，他就去看看，像一个老农似的。村里的妇女让我们跟着走，她们家有墙头，我们跳墙头出来，一块的女同志先跳出去了，我跳的时候一下子碰挂到一个石头上，把腿挂破啦，就流血，我摸了一把粘糊糊的，怎么办呢？我们跳出去是一个大脏坑，坑边种着大麻（蓖麻），我抓了一把脏泥把伤口糊上，用麻子叶就包着，然后就在豆地里爬出去了。也不知道爬了多远，一个坟地里有一个大石头，我们俩人就坐在那里，坐了一晚上，迷迷糊糊

地睡着了。到了转天的下午那位老同志来找我们，两口袋里装着窝窝头，两块咸菜，两人吃的很香。腿上的伤也没有发炎，过了两三天就好啦。

还有一次危险的时候，我们在华北局党校，傅作义进攻（毛主席住的地点）平山县，当时的学员，男的都拿起枪上了战场，我们这帮女的、有病的、岁数小的，有三十多个人，我们得躲，学校很明显，有几处房子，他们随时要轰炸的。我们有几辆车，平山往北是灵寿县，有一个大山，一上一下四十里，山上都长着酸枣，没有正式路，拽着酸枣树上山，手上都拉的尽是血口子，结果到我们回来时，给养车也被炸了，美国的两架飞机替傅作义轰炸平山。把朱总司令的门楼给炸了，平山炸死一个小学生，回来又炸我们来啦，找我们，幸亏有水冲的那个山下有廊沟，前面有很高的墙，还有树。飞机围着我们就扫射，他从南面扫射，我们就跑到南面墙地下来，他倒过来又从另一面，我们又跑到这面，墙就挡住他们，最后我们捡到一大把的子弹壳，那次是最危险的。把给养车都给我们炸了，马、人都不知道跑了哪里去了。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天，山下有一家卖豆腐的，做豆腐的，这男的都跑到那里帮忙，为了吃一口，我们这几个女的，帮不上忙，坐在一边树底下就等。女的吃柿子树的小柿子，弄点山下边水喝点，待了好几天。从那以后我们几个人都闹胃病，这就给我们做下了记忆，记得一生也忘不了。

（田开沐、钱登文根据李月贞口述整理）

## 追忆甘草垌堆

——怀念敬爱的父亲何光宇将军

何绍全

甘草垌堆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地处豫鲁交界的河南省台前县黄河北岸，黄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几近90度的弯，至今河边的道路还为乡村公路。村子里不过百十户人家，要不是黄河大堤上的那块斑驳陆离的“甘草垌堆革命老区纪念碑”记载了村子的历史，人们可能会毫不留意地从村旁经过而不回头。

可是这个村子是我父母经常讲述的故事发生地之一。他们的故事有千千万，但“甘草垌堆”的故事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记忆之中。2018年5月8日，我终于来到了我父母讲述的故事的这个小村庄。当我们走下车来时，竟然被发生的场景惊呆了：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都集合到了村口，要见见当年救过他们性命的八路军的后代。当得知我是何光宇的儿子时，一位88岁的老人紧紧拉住我的手不肯放，把我看了又看，急急地询问我，何司令在哪里？现在怎么样？一阵寒暄后，我终于明白了父母亲为什么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有那么深刻的记忆，他们曾在那里经历了面对强大日军的一场生死拼斗。

甘草垌堆是我党在鲁西北地区最早建立党组织的村子。早在1933年就建立了村党小组，这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由于地理

交通的便利条件和稳固的群众基础，这个村逐渐成为我党的重要活动区域，担负过鲁西北和泰西地区的情报交通工作，为后来成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2年，鲁西军区2分区进驻甘草垌堆。当年9月27日（阴历八月十八日），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日军第32、59、35师团主力及骑兵第4旅团和纠集的17个县的伪军3万余人，出动坦克30余辆，汽车400余辆，飞机10余架，分兵8路向冀鲁豫根据地实施合围。敌人相继占领了边区的南乐、清丰、濮阳、内黄、东明、寿张、朝城等县的部分地区，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只有濮县、范县、观城还完整地掌握在抗日民主政府手中。随着日军“铁壁合围”的压缩，被敌人占领的县区政府机关后方人员，陆续撤退到了这一小块地区，而甘草垌堆正处于“濮范观”核心区域之中，将发生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也就不可避免了。

1942年9月27日拂晓，侦察报告，在甘草垌堆村周围的小树林、沟道中发现日伪军活动。时任鲁西2分区政委的曾思玉手里只有4个连的兵力，要硬拼已毫无胜算，当即决定，趁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前，组织有效兵力实施突围。上午9时许，敌人打着红、黄、蓝、白、黑的标志旗向合围中心区围来；下午3时，敌人已形成对黄河故道北岸的合围态势，我抗日军民被压缩在甘草垌堆附近的平原和黄河故道沙滩之中。敌机对着密集的人群狂轰滥炸，惊慌的百姓四处奔逃，枪炮炸弹声、呼救声混成一片，情况已经十分危险了。曾思玉政委带领部队节节抗击围过来的敌人，寻找着突破口，终于在黄河故道南面发现了敌人的薄弱点。随即下达命令，由曾思玉政委带部队攻击西北方向之敌，造成突围假象，吸引敌人兵力。由何光宇副司令员组织所有人员，越过黄河故道向南突围。我父亲何光宇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人员，把后方医

院行动不便的伤员就地隐藏（后来在甘草垌堆的乡亲掩护下，大部伤员、医护人员得以生存），丢掉辎重，能拿武器的一律编入战斗部队。战斗人员在前后断路，机关政府人员、老百姓在中间。为使行动不便的人员能够统一行动，他们用背包带、绑腿连上，5人左右为一组，规定行动时，死也不准松手。人员隐蔽在黄河故道附近，准备趁黑夜敌机无法起飞、敌坦克无法过河时迅速行动。

天渐渐黑了。此时，甘草垌堆的北、西北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曾思玉政委悄悄地从阵地上抽回了部分兵力，在南面黄河故道上歼灭了100多鬼子，撕开一个600米的缺口，此路人员按照预先的组织，迅速突出了包围圈。当时一些老百姓走迷路了，见着部队就求救。曾思玉政委喊道，跟着部队跑就有活路！老百姓死活跟着部队跑，终于跑出了包围圈。

9月27日那一夜，是我母亲终生难忘的一夜。突围时，我父亲边指挥部队人员行动，怀里还抱着曾思玉政委刚出生不久的孩子，马上驮着物资和曾思玉政委的爱人洪林阿姨。我母亲因近视，夜间行动不便，死死地抓着马尾巴，跟着跑了一夜。事后，我母亲说，那天天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看不清走的什么路，只能死死地抓着马尾巴，松手掉队就可能牺牲了。一夜跑下来，口干舌燥，嘴边全是干了的白沫，浑身早已无力，全凭着求生的信念，也不知跑了多远，才终于突出了包围圈。

突围后，部队掩护群众，越过黄河故道，进入了梁山县的李集、杨集附近安全地带才得以喘息。至此，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秋季合围”计划，但我冀鲁豫根据地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据战后统计，冀鲁豫军区后方机关和地方武装人员伤亡279人、被俘116人、失散873人；地方武装干部失散552人；被抓群众600人，

## 台前

牺牲无法统计；损失牲畜千余头、大车300辆。鲁西军分区副司令徐秋、政治部主任魏金山、参谋韩国栋壮烈牺牲。正如后来曾思玉在回忆录中所述，1942年9月27日的日军“大扫荡”，是我冀鲁豫根据地损失最惨重的一次。

事隔70多年后，我面对当年的战场，依然唏嘘不已。在广阔的平原上，面对装备飞机、坦克、大炮的万余名日伪军，仅凭手中的4个连的兵力，掩护了数以万计政府机关、后方人员、老百姓而突出合围，需要何等的大智大勇！八路军个个都是长坂坡的赵子龙，革命信念第一，抗日救国第一，天下百姓第一，不畏生死，反复拼杀，才突破了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那个难忘的年月，牺牲了很多革命志士。让我们记住他们：为掩护群众突围而牺牲的徐秋、魏金山、韩国栋等烈士；为掩护八路军伤员而牺牲的甘草垌堆村民张兆明、陈广乾、陈广济、王伯颇父女；从甘草垌堆拼杀出来的生死搭档连长张平（张荣堂）、指导员李玉……是他们用生命撑起了当年甘草垌堆要塌下来的那一片天，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事隔76年了，当我第一次踏进甘草垌堆村的时候，已经激动不已，当年父辈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情景，均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淡去，欣慰的是，当地政府没有忘，当地百姓没有忘。值父亲逝世10周年，写此文祭奠我的老父亲吧。

（2018年6月11日，源自《冀鲁豫儿女忆父辈》李春光主编，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何绍全**，1952年12月出生，湖北省人。1968年12月入伍，1971年至1974年就读于总参谋部重庆通信兵工程学校。1972年6月入党，历任38军战士，兰州军区第一通信总战分队长，兰州作战部，通信部参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师级）。2000年退休。

## 深情永系冀鲁豫

李 林

2018年仲春的一天，冀鲁豫边区纪念馆的四位同志，驰行数百公里，到石家庄来看望正在住院的我的父亲李玉庆。走进病房，父亲在睡着。我坐在床边，轻轻呼唤，父亲睁开眼，看着我，睡意还未完全消退。我俯近父亲耳旁说：爸，有朋友来看您了。父亲问：谁呀？我说：是冀鲁豫纪念馆的朋友。一听“冀鲁豫”，父亲顿时来了精神，抬头望着，继而紧紧握住来者的手，响亮地说：冀鲁豫，我是老冀鲁豫啊！

我拙，真的难以描述父亲当时的心情、表情和状态。我只能说，那情那景，让我不禁热泪盈眶，感动不已，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冀鲁豫”，永远在父亲心里，刻骨铭心！那是父亲革命生涯开始的地方，那是父亲从一个未成年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忠诚坚定的八路军干部的地方。

### 我要当兵打鬼子

父亲生长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庭，在当地可谓大户。父亲的爷爷不仅良田数百亩，还有绵延数里的不知哪个朝代的祖辈

留下的几百棵老枣树。家里还开有药房，是镇上的唯一。父亲是家中老小，上面有四个哥哥、两姐姐。听说父亲最受我奶奶的疼爱，也最恋母，偎在奶奶的怀里吃奶吃到好几岁。父亲从小体弱，身瘦无力，性情温和，沉稳好学，哥哥姐姐们对这个小弟也是疼爱有加，极为照顾，基本不让他干什么农活，给他的主要任务是坐在树下看守大枣树。父亲小时候被家里驹蹶子的小毛驴踢了眼睛，把全家吓坏了。家里人二话不说，直接就打死了小毛驴。几十年后父亲说起来，还可惜那头小毛驴。

父亲在村里读完四年初小，考到县城里继续读高小。县城离家远，只能住校，不能天天回家厮守老娘。父亲读了一年多就不去了，因为他舍不得离开他的母亲。父亲从小爱学习，即使不上学堂，也从来没放下书本。去看护老枣树时，挎着篮子装满了书，坐在枣树下，一看一大天。

父亲最不幸的，是他幼年丧父。我的爷爷去世时，我父亲才十一二岁。我的奶奶非常坚强，她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不要让人看着是没爹的孩子。听我父亲说，那时农村里已经有些不好的风气，有些人抽大烟，打牌赌博。但是李家的孩子个个本分、厚道，勤劳，从来不让娘操心。我奶奶是个大好人，乐善好施，遇到上门讨饭的人，她从来都慷慨施舍，并且交代家人，给人家馒头，一定还要给菜；如果给人家生米生面，一定别忘了给柴火。这种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善良，是李家的家风。

李家的那些个大枣树很诱人，南来北往赶集的人，远远就看得见，把这当作了落脚点。他们走得累了渴了，就在大枣树下歇息，还顺手打几颗鲜枣吃，负责看枣树的父亲从来不干涉。他觉得人家走长路累了，吃点枣能解渴，只要不是打掉很多带着走，

吃点又何妨。这种根植于心底的善良，是那么自然而然，乐善好施的习惯延续了一辈子。遇到哪里遭了灾，需要捐款捐物，父亲总是干休所里捐得最多的。遇到周围人有困难，总是要帮助，哪怕是不良人欺骗。

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铁蹄踏入华北大地，平静的生活被打破，冀中平原沦为敌占区。村里的老村长因为不配合日本鬼子被活埋杀害。父亲的大哥在张学良的部队，父亲的二哥是学堂先生，有文化，被逼迫当了村长。他不想干，没多久就离家偷跑了。对日本鬼子的强烈仇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使父亲这个17岁的少年忧国忧民。父亲说，那时只有一个想法：打鬼子，坚决不能当亡国奴！

这时，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进入冀鲁边区。父亲毅然决然地离开深深眷恋的老娘，找到部队去当兵。征兵的干部问他，为什么要当兵。父亲觉得的问话很奇怪，国难当头，还问为什么要当兵？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为了打鬼子，不当亡国奴！征兵人又问，打仗会死人的，你不怕吗？父亲说，那有什么可怕的，打仗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如今父亲回忆这些往事时对我说，开始听到征兵干部的问话，觉得莫名其妙，怎么那样问呢！后来一想，明白了，他那是为了考验我。

当兵后，父亲在军政干校学习。学习结束后，领导找他谈话，考虑到他瘦小体弱，却又有些文化，就让他去给东进纵队政治部的参谋处长当勤务兵。父亲不干，说当兵就要上战场打鬼子。领导问，你不怕吗？父亲说，我怕，但是鬼子也怕，你们给我枪我就不怕了，谁勇敢谁就能战胜！后来，虽然领导没让他去当勤务兵，却也没让他下连队，而是留在了纵队政治部当文书。从此，父亲开始了他在冀鲁豫的八年抗战。

## 转战冀鲁豫

抗战八年，父亲一天都没有离开冀鲁豫，在这片被称为“破饭罐”（濮县、范县、观城合称“濮范观”的谐音）的贫瘠土地上，在这片沙土漫天的黄泛区，在这冀鲁豫的中心地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我自感非常愧疚的事，就是没有系统记录下父亲的故事。我曾多次动员父亲写点什么，父亲拒绝了。父亲总是说，个人微不足道，不过是革命大潮中的一分子。重大军事、政治事件都有正规的史作，我没有资格说什么。再说了，想想那些牺牲的战友，心里难受。我理解父亲的心情，但也觉得他的想法有失偏颇，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记述个人亲历呀。我那时整天忙于工作，父亲的身体状况也非常好，我总觉得还有长远的时间可以来慢慢做这件事。可是，没料到，一场突发的意外摔断了父亲的7根肋骨，随之而来的各种并发症一下把他的生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坚强的父亲最终以他93岁高龄创造了奇迹，竟然慢慢恢复了过来。但从此，我再也不敢说让父亲写点什么了，只是默默记录着父亲平日的聊天和讲述。

一般来说，男孩子在关注父辈、记载历史方面好像更特长。可是我父亲没儿子，只有女儿来讲讲，还只能是碎片，——惭愧。

1940年12月，父亲离开纵队机关，到了鲁西军区2分区。1947年7月鲁西军区并入冀鲁豫，鲁西2分区编为了冀鲁豫8分区。父亲先后在分区直属4连、基干团2连、特务连任指导员，在范县基干大队、范县独立大队、分区基干团教导队、郟钜基干大队任组织干事、支部书记，后任军区独立2旅独立团1营政委。

父亲曾讲：范县、郟城、鄆城、冠县、菏泽、甘草垌堆、颜村铺、戴庙、刘寺……，这都是他们经常“活动”的地方。

他说：范县是个沙土窝，风沙很大。有一次，我骑自行车去执行任务，赶上刮大风，铺天盖地的沙子差点把我埋住，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还有一次刮大风，刮起满天沙。第二天起来，床上的沙土厚厚一层，出去一看，两尺高的麦子只剩麦穗还露在外面。

不过大风沙也有好处，和敌人打游击的时候比较方便。部队白天在黄河滩里挖个洞，把病号藏在里面，夜晚敌人过去了再出来，很安全，耍得敌人团团转。利用沙土，还可以隐蔽重武器。部队打郟城时缴获了一门步兵炮，那是冀鲁豫惟一的一门炮，敌人“扫荡”的时候就找那门炮。部队把炮埋在沙里，谁也看不到，日本鬼子更找不到。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1942年，日军为了迅速推毁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空前残酷的大“扫荡”，爸亲身经历了“九·二七大扫荡”。他说，甘草垌堆是1942年9月27日日寇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的中心点。在那一带，疯狂野蛮的敌人屠杀了被其驱赶到合围圈里的大批群众和地方机关干部，及我军部队非战斗人员。一时间，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制造了令人震惊的大惨案。当时，该地被合围的几个连队，在时任我军独立旅政委曾思玉率领和指挥下，英勇无畏，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并带出了大批被围群众。当时，我在范县独立营工作。“9·27”这天，我营位于范县北部一村庄，当发现北边敌情后，遂向南转移。途中又得知南面和东西两面皆有政情，又发现敌机在范县上空盘旋。这清楚地表明这是敌人对我范县的四面合围，情况极其危险。根据对敌情的判断，我营决

定回头向北突围。由于敌人的合围中心在旧城，因而对我营没有进行有力的堵截，从而，我营顺利地突过了子路堤，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部队也无大的损失。

我们在庆幸之余，得知“9·27”在旧城、甘草垌堆一带发生的惨烈悲壮的事件，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多少年来，一直在我脑海中浮现。我想，凡是身临其境或知道这一事件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父亲说，几天后，他去到甘草垌堆，亲眼目睹惨状。在道沟里，都是被杀害的百姓和同志。当时正是秋老虎，天气很热。牺牲者遗体开始腐烂，有的被野狗撕咬，那情形真是惨不忍睹！部队已经转移了，当地的老百姓就把牺牲者的遗体集中起来，在甘草垌堆的西南角挖了3个大坑，埋了3个大坟。

“我经常回想起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永远都不会忘记日寇令人发指的罪行！”

听到这儿，我回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夜里，突然听到父亲愤怒地吼叫“滚出去”。那声音之大，把睡在楼上的我惊醒了。我吓了一跳，赶紧去看父亲，原来他是在做梦。我唤醒他，问他怎么了，父亲说，让日本鬼子滚出去！都几十年时间了，他对日本鬼子的强烈仇恨丝毫未减！

十多年前，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后，80多岁的父亲写了多篇文章，《有关加强抗日战争历史教育的几点建议》（托人带至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纪念胜利，居安思危——评〈抗日战争——国人必须增强战胜国意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兴我中华》《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大陆抗战史观出现新视角〉读后感》……。

父亲在文中写道：“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具有崇高的民族自

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决不容忍任何势力再来凌辱我们的民族，侵害我们的祖国。但我们又是有理智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民族复仇主义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重提往事，不是要人们记住仇恨，伺机报复，如果那样，就将陷入冤冤相报、互斗不息、两败俱伤的可悲境地。我们重提往事，是要提醒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如果我们忘记历史，忘记‘落后就要挨打’、‘内乱分裂必遭外患’的历史教训，就难以建设一个国强民富的祖国，从而不能有力地应付当前国际上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和敌视我国的势力，不能有力地应付日本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给我国带来的威胁，不能有力地应对“台独”分裂势力可能造成的紧张形势，等等。总之，我们要居安思危，以保我国长治久安。

一个老兵的拳拳爱国心，淋漓尽致！

### 重返第二故乡

父亲说，他此生有两个大心愿，两个小心愿。大心愿一是看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二是看到把美国从霸主地位上拉下来，不能再横行霸道。小心愿一是重回老部队，二是重回老根据地。

2001年，父亲整八十岁，我陪他重返冀鲁豫，实现了他的这个愿望。父亲把冀鲁豫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心心相念！

“我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长期在范县、濮县、郟城、鄆城等地活动和战斗，是曾在当时的范县独立营工作过的老八路。由于较长时间在范县工作和活动，因此，我对范县的乡村和田野的熟悉程度和感情，胜过对我家乡的熟悉程度和感情。范县不啻是我的第二故乡。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军离开了范县，北上南下，

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怀念着范县的大地和人民，一直想重返第二故乡……”

冀鲁豫一行，得到当地部队的大力帮助。那时，除了菏泽有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抗战纪念馆外，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纪念设施，很多旧址已是破壁残垣。当地军分区、武装部的同志找来地图，根据我父亲的记忆和要求。一一落实要去的地方，有些小村庄他们工作在当地都不知道。父亲说，那都是当年“活动”的地方，要去看看，看看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了。此行，父亲走访了大大小小20多个市县村庄和纪念地：聊城、莘县、范县颜村铺、孟楼乡、龙王庄、杨集、黄河大堤、李桥渡、濮城镇、张庄乡闵子墓村、古城镇（旧范县）、毛楼村（台前县马楼镇毛楼村）、甘草垌堆（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垌堆）、梁山、戴庙、郓城、鄄城、前刘寺村、左营、闫什镇、菏泽、抗战纪念馆、濮阳。

每到一地，父亲总要进村民家里看看，聊聊过去和当前。父亲说，战争年代老百姓无私地帮助我们，做出了很大贡献和牺牲。现在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如果还没有过上好日子，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

在颜村铺，父亲说，这是我们的司令部，曾思玉首长在这里。司令部旧址还在，只是非常破旧，摇摇欲坠，屋顶倾斜，围墙倒塌了一半。但是房前立着的碑非常醒目，“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颜村铺革命旧址”。今年我们再去颜村铺，焕然一新，但碑还是那块碑。

甘草垌堆，这个黄河边上的小村庄，父亲在村里走了一圈，看到这里依然很贫穷，到处沙土。村民们听说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都来看望，非常热情，相谈甚欢。一位90岁的老人家，抗战时期的村长，他说：“打鬼子那会儿我正当年呢！”他头上现

## 台前

在还留有日本鬼子打的伤疤。他和我父亲聊得非常热乎，说起当年的民谣，还都记得，不约而同地念叨“高粱窝窝就辣椒，吃了就长膘”。他还一定要留下我们吃午饭。父亲看到老百姓日子并不好，心里很难过。一位80岁的老大娘说，没办法呀，黄河一发水，我们就得跑，水退了再回来，家里就没个像样东西。今年，我们再去甘草垴堆，却大变样了，有的人家还盖了楼房。村里有活动室，村外黄河边有防洪措施，乡里还有长远规划。

在刘寺村，父亲说当年在这里打鬼子炮楼，要去看看。但是当地武装部的干部都不知道刘寺村。后来找到张当地地图，才终于发现了刘寺村，遂一路打听来到当地，却被告知有前中后东4个刘寺村。问了当地老人，才弄清当年鬼子建炮楼的是前刘寺村。到了村口，父亲说，就是这里，村的样子变化不大。进了村，遇到几个在一起打牌的老人，都是七八十岁，提起当年的事都记得。他们与我父亲热情交谈，又带我父亲走到当年鬼子炮楼旧址，共同回忆起打炮楼的情景。村民说，鬼子炮楼在这盘踞了5年，终于被八路军打下来了。

在从古城去台前的路上，父亲看到地里的农作物长势很好。父亲说，原先这一带是黄泛区，都是沙土窝子，土地贫瘠，农民很苦，现在土质改善了，可以种多种作物。他一直不明白如何改变了土质，就停车下来查看。父亲走到地里，用手抓起一把土，仔细捏着看着，与田里老百姓聊着，他弄明白，原来是利用黄河淤泥漫灌所起的作用。那时正是秋收季节，父亲时常要下车来看看老百姓的收成。看到丰收了，他由衷地高兴。

现在的时髦词：不忘初心。我不禁问，什么初心？谁的初心？看到我父亲，我觉得，共产党人的初心，简单说就是心里始终装着百姓，让百姓过好日子。

冀鲁豫一行，父亲很满足，终于了却了心愿。但是父亲也有很牵挂的事情，就是纪念碑。父亲回来后，就‘9·27’惨案发生地甘草垌堆的纪念碑一事，多次给范县县委和有关部门写信，现摘录片段如下：

“在‘9·27’大惨案发生地，竟看不到任何与事件有关的痕迹和标志。据我访问过的几位当地老人讲，‘9·27’后，被敌人残杀的群众的遗体，被其家人运走；牺牲的我军人员的遗体，由当地群众挖了三个大坑掩埋。然而，这三个烈士大墓，在前些年为执行省里关于平坟的要求时被平掉了。我想，这样下去，当年‘9·27’所发生的日本法西斯在该地屠杀我大批同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突围部队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其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救群众于战火之中的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将被人们遗忘；甘草垌堆这个具有特殊历史意义、足可以作为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也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而变得平淡无奇，成为平庸之地，这将是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因此，去年我从范县回来后，即给范县人武部写去一封信，并请他们转交县委。信中建议在‘9·27’惨案发生地或其他合适的地方，搞一纪念建筑，记述和展示当年‘9·27’事件所发生的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以供人凭吊、追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后人。但此信寄出已年余，至今未有回音。故今特再写此信直寄县委。望县委的同志慎重考虑，予以重视，采取适当措施。是为至盼！”

字字句句，都是一位抗战老兵的“初心”！

后来，台前县真的把纪念碑立起来了，来信告诉我父亲，请他再回去看看。可是，我没能抓紧时间再陪父亲，又是一个深深的愧疚。

## 生死搭档一世情

张平叔叔，68军军长，冀鲁豫战斗英雄。他是平山人，落叶归根，临近离休时调到了石家庄高级步校任顾问，为了熟悉情况，他翻看全院干部名册，赫然看到我父亲的名字。当即拨通电话，惊雷般地大声喊：我是张平，你是李玉庆吗？当年冀鲁豫的！就这样，两个分别40多年而彼此毫无音信的老战友，在花甲之年竟又奇迹般地走到一起，携手共赏夕阳。从此，他们一起聊天，一起散步，一起回忆，一起聚餐，彼此挂念，相伴了30多年！

当年在冀鲁豫，他们是同一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是好搭档，生死战友。那时，他们刚20出头。连长是典型的军事干部，果断，勇敢，暴躁，能打仗，说一不二。指导员是典型的政工干



后排左一李玉庆

部，温和，平易，沉稳，坚持原则。在我父亲没去之前，这个连队好长时间没有指导员。张叔叔说，有过几个指导员，我和他们搞不来。你爸好，从来不向上“告状”，我们俩好（这就是老人的朴素语言）。张叔叔对我说，你爸是好人，耐心、细致、忍让、讲道理。他从来不对战士发脾气，就是叨叨叨，叨叨叨，不厌其烦，做思想工作，大家都说他好。

“有一次战斗，忘了是攻打什么地方了。我没在，你爸带着突击队就出发了。等我赶回来，一听说指导员带突击队走了，立即撵上部队，不让他去，我得带突击队。他做政治工作的，打仗不行，我不能让他出事。”说到这，张叔叔对着我父亲说，我这连长当的可以吧！俩人相视一笑。

父亲和张叔叔的固有称呼就是“老伙计”，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两家住在同一栋楼，出去散步也要约在一起。两个轮椅并排推着，两人手拉着手。后来父亲住院了，只要病情稳定状态好，我就常接他回家看看，每次回来父亲定要见见“老伙计”。每次俩人一见面，双手就紧紧握在一起，始终不松开，还互相比着谁的劲儿大。父亲说，你当年打仗很厉害，我服你。可是现在要是打起架来，我可是不怕你，我不见得打不过你。话音未落，张叔叔用劲儿紧握了一下，父亲感觉疼了，说，你还这么有劲儿！天色渐晚，父亲得回病房了。张叔叔不放手，说再待10分钟。再次要走时，又说再待5分钟。终于，他俩松开手，道别。那种发自内心的深厚情谊和彼此相依，真真切切。

张叔叔爱喝酒，每天两顿茅台。每次生病住院，只要病情稍有好转，就急着出院，谁都拦不住，就为回家喝酒方便。终于张叔叔又住院了。我用轮椅推着父亲去探望，看到老伙计虚弱地躺在床上插着管子输着液，父亲难过极了。父亲紧紧握着张叔叔的

手，话语硬咽，“老张啊老张，你怎么也躺倒了……”

突然，父亲大声喊：“老张，有情况！”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同事，躺在病床上的张叔叔竟立即回应：“走，集合，打他狗日的！”顿时一副英雄气概，仿佛又回到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有情况”，这是他们那个战争年代的特殊语育。几十年过去了，一句“有情况”仍然唤起这两位90多岁老人的强烈反应！接着，父亲又故作轻松玩笑地说，你装什么样子呀，还躺着干什么，快起来吧！

看着这当年的连长和指导员，我心里特别感动。虽然岁月无情，虽然他们已踏入人生末路，但是当年的英雄豪气丝毫不减，那满腔忠诚依然激荡。真希望他们永远不要老，永远健康，永远保持着对“有情况”的敏捷反应。

今年3月，张叔叔走了，享年96岁。张叔叔以往总是说：不容易呀，那么多老伙计们，现在就剩咱俩啦！咱俩还能在一起！可如今，最后一位老伙计也走了。父亲更加形单影只。我当然不敢讲真话，只说张叔叔去北京住院了。

王叔叔，16军政委，老冀鲁豫。二野进西南，王叔叔和我爸是同团搭档，团长和政委，那时他们都不到30岁。率团参加成都战役后，回师南下，进乌蒙山区剿匪，144团驻叙永。当时每解放一地就由部队建立政权，团长兼任县长，政委兼任县委书记。那时。剿匪任务非常重，团长率部队进山剿匪，回旋征战。政委负责建立政权，做征粮征兵、宣传群众、土改工作。五十年代初，团长和政委先后离开部队，这一分别，就是50年。后来，团长从军事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回了16军。政委在政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再没有回16军。

2000年，近80岁的老爸重回老部队，探望老战友。这相隔整

整半个世纪的再相聚实在难得。当年不到30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白发苍苍。相见的那一刻，他们格外激动！每天，他们聚在一起，说不完的话，当年哪次战斗，谁牺牲了，都还记得。但是你要问他们，今天早饭吃的什么？不记得了。父亲参观了16军军史馆，仔仔细细了解老部队的发展壮大，还拿了一些军史资料。他终于满足了重回老部队的愿望。长春相聚后，王叔叔又和我父亲一起去游览了本溪、沈阳，格外开心。

几年后，我陪父亲重回川南，再次走进乌蒙山，他要去看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去了泸州、纳溪、叙永、古蔺，祭扫烈士陵园。在那里，他一块块墓碑仔细看，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在从泸州去叙永的路上，父亲说，记得有个叫江门的地方，山高谷深，道路狭窄，部队在那里遭到伏击，牺牲了一位副指导员。后来在叙永烈士陵园，果真找到了这位烈士的墓碑，碑上写明是在江门战斗中牺牲的。可见父亲对当年的事情记忆是多深刻！

父亲和冀鲁豫的叔叔伯伯阿姨们，都是冀鲁豫这片热土上培育出的英雄儿女。如今，老前辈们渐渐离去，带走了他们的辉煌，带走了他们的时代。老一辈们已经不可能相聚，但是前辈们的深厚情谊，他们浓浓的冀鲁豫情结留传给了我们。我们共聚在冀鲁豫的旗帜下，共同弘扬冀鲁豫精神！

今年初夏，来自各地的冀鲁豫子弟相聚一起，重返冀鲁豫，去追寻父辈的战斗足迹。英雄冀鲁豫，永远在心里。

（2018年8月30日，《冀鲁豫儿女忆父辈》李春光主编，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李玉庆，1921年生，河北盐山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东进抗日

挺进纵队政治部文书，115师343旅政治部文书，鲁西军区2分区（冀鲁豫军区8分区）直属4连、基干团2连、特务连指导员，范县基干大队、范县独立营、分区基干团教导队、郟钜基干大队组织干事、支部书记，军区独立2旅独立团1营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1纵直属队（热河）总支书记，二野1纵直属队政治处副主任，16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6军48师144团政委。先后参加过羊山集战斗，千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成都战役，川南剿匪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144团政委身份兼任叙永县委书记，1951年任48师泸县军分区后勤部政委。1952年任四川省公安总队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四川省军区南充军分区副政委。1955年作为第一批学员入读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出任中国军事专家组副组长派驻国外。

1969年，政治学院解散，任四川省军区内江军分区政委。1978年军队院校恢复后又回到院校工作。1983年在石家庄高级步校离休。



**李林**，白求恩军医学院教授。1969年3月入伍，昆明军区一三九野战医院战士。同年7月，出境老挝，参加援老抗美战争。1970年7月回国。就读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1973年毕业后任成都军区总医院军医。1979年调至院校任教，直至2012年退休。荣立三等功2次，荣获“军队育才奖金奖”、“军队育才奖银奖”、“总后优秀教员”、“优秀党员”。主编参编专著及高校教材15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获科技进步二等奖项，三等奖2项，军队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

## 一个冀鲁豫老兵的拳拳初心

李 林



我爸李玉庆是共产党的同龄人，还有几个月，就99周岁啦！

老爸记忆力减退，但是头脑清楚，思维明晰。尤其在“政治大事”上，不糊涂，态度明确，立场坚定。直到现在，仍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每天看报，《参考消息》天天读。

每当走进老爸病房，爸总是问：外面有什么新闻呀？每每听完我的讲述，爸总是非常明确利索地说出他的见解。美国一直在台海闹事，我告诉爸：美国军舰到台湾啦，台湾“总统”去美国啦，他们一再突破底线，咱们打不打？爸简洁地说：不到时候！前段时间香港闹事，爸说：“香港是中国的，当然中国要管！”“闹独立？中国领土允许你独立？凡是闹独立的人，开除，回你英国闹去！”

这就是我的老爸。

我爸性情温和，善良忍让，这一辈子，始终是他人口中的“好人”。

我形容爸是“三无老爸”：无斑、无病、无求。

老爸近百岁，脸上手上没有一点儿老年斑。从无心梗脑梗肿瘤等重大疾病。生活简朴，没有奢求。淡泊名利，不求待遇。很多年前，我陪爸去看望他冀鲁豫时期的一位老领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老爷子对我说：你爸是好人，从来不争名不爭利，不计较职务待遇，无私欲，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是当下最流行的词句，既是对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一种热望与希冀。每每听到这个词句，我总是禁不住地想：什么是初心？谁的初心？怎样才是不忘初心？

老爸并不知道当下这个新的热点词句，但是我从老爸点点滴滴的日常平淡中，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一个具有81年军龄的冀鲁豫老兵、一个具有8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拳拳初心！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日本鬼子的铁蹄蹂躏下，17岁的爸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在冀鲁豫这块热土上，开始了一生的革命征程。转战“濮范观”；“9.27”反“扫荡”；刘寺打炮楼；“北上南下”；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成都战役；川南剿匪……一路走来，无所畏惧，坚定不移。

如今，战火散尽，霞光大地，莺歌燕舞，祥云丽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了，共产党诞生近百年，老爸离休也三十多年了。但是，在爸心里，始终不曾忘记过去，不曾忘记战友，不曾忘记老区的父老乡亲！这，是不是就是“不忘初心”？！

### 点点滴滴看“初心”

**战友情义。**

爸和张平叔叔在冀鲁豫时曾是同一连队的老搭档，他们共

同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战争年代，部队流动性大，人员更替频繁，经常是不知什么时候互相就分开了。他们共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却结下了一世的战友情缘。自冀鲁豫分别几十年后，彼此毫无音信的两为老人，竟又奇迹般地在晚年相聚在同一个干休所，又相伴了几十年。他们在一起，回忆过去，回忆老战友，成了主话题。张叔叔爱喝酒，每天三顿，一次都不能少，爸却是滴酒不沾。他们一起吃饭时，爸总是用手握住空酒杯，比划着仰头举杯，“一饮而尽”，为的是陪老战友高兴。

当年48师在成都战役后挥师南下泸州，144团在川南大乌蒙山区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48师没有随16军入朝作战，而是留在了川南军区。十多年前，那年爸84岁了，他想旧地重游，去看看留在四川的老战友和当年剿匪战斗过的川南地区。我陪爸去了四川、云南等地。在成都有很多144团老同志，大家得知老政委来了，欢聚一堂，无比亲热。之后爸又去家里一一看望了身体不好而没能参加聚会的战友。此后又到内江、泸州、隆昌、叙永、古蔺，重庆、玉溪等地，去一一看望留在那里的老同志。泸州的阿姨说，当年李政委调走时，我们都哭了，都舍不得啊。叙永的陈阿姨冒着大雨赶到武装部来探望，紧紧拉着我爸的手。在我爸离开四川几十年后，重庆的杨叔叔、玉溪的缪阿姨专门来石家庄看望老爸。都说，李政委正直磊落，坚持原则，我们都佩服他，尊敬他。他善良厚道，爱护下属。即使非常严厉的批评，我们也心服口服。

在叙永、古蔺，爸到烈士陵园献花圈祭战友。他一块块墓碑仔细看，静默致哀，那有很多是在川南剿匪中牺牲的144团指战员。

**常念过去。**

前年国庆节第二天，细雨霏霏，气温降低。爸望着窗外，

## 台前

突然缓缓地说：我记得渡江战役时就是这样的天，阴着，还有小雨。虽然战斗很激烈很艰难，但是战士们士气高涨，因为要解放全中国了。

我推爸在外散步时，爸说：你这么走路能打仗吗？成都战役时，我们昼夜行军二百多，那速度，你们赶不上。我们必须要把敌人堵住，不能让他们逃往云南。那时战士们也不觉得累了，就是困，有的走着路就睡着了。团以上干部都配马，但是我从来不骑马，把马让给需要的同志。骑马走过的干部们看我始终徒步跟着部队行军，都冲我竖大拇指。

我想，可能正是这样的“被动锻炼”，练就了爸的好身板，也是长寿原因之一吧。至今我们仍然坚持让爸自己每天推着轮椅走一走。

爸说官兵关系：“那时的官兵关系非常融洽啊。我在纵队文书股时，部队的所有文件、学习材料都是我们自己刻写油印的”。爸说着还比划了一下油印的动作，问我，你会吗？有一次纵队政治部王辉球主任来文书股看看材料印出来没有，有个文印员，叫刘定一（音），拉着王主任开玩笑，说：主任主任，您猜个谜吧，“天子打烂球~打一人名”（天子，意为“王”，烂~灿烂，意为“辉”）。王辉球主任听了笑了笑，说，淘气！一点儿也没有生气。

那时部队每到宿营地，干部总是要去看看战士们，有没有脚打泡的，有没有生病的，对受伤的战士尤其关心。干部对战士，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兄弟。

爸说军政关系：“那时候就是一心打鬼子，哪有同志之间闹矛盾呀。部队到了村子要宿营，连长去号房子，指导员就集合部队讲评，讲注意事项，各自负责”。张平叔叔说，“你爸脾气

好，大事有原则，小事不计较，从来不告状。我赶走好几任指导员，有一段时间就没有指导员，你爸来了才好了”。晚年时，爸和张平叔叔一起散步，张叔叔又讲起过去的故事。说有一天吃饭时，他到屋里来要和我爸一起吃，可是我爸却端着碗到班排去了。张叔叔生气，把一碗面条摔在地上。直到晚年说起这事，张叔叔还“气哼哼”的，爸却淡淡地说，不就吃个饭嘛，还把碗摔了。

爸说军民关系：那时的军民关系真好呀，现在想起来都想掉泪。老百姓把战士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一进村就把战士们往家里拉，把最好的房子让给部队住，把结婚的新房都让出来。有的战士脚冻伤了，小媳妇们揽过来就捂在自己的怀里。部队也把老百姓看做自己的父母亲人。那时候村子里男人很少，都去支前或者当兵了，家里缺少劳动力。部队一到村子里，战士们连背包都顾不得放下，就帮老乡扫院子，清理猪粪鸡粪，把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挑水把水缸都盛满，那叫“满缸运动”。我最初听到爸说“满缸运动”，还很奇怪，就是挑个水，怎么还成“运动”了？去年我们寻根冀鲁豫，在当地纪念馆，还真看到了专门介绍“满缸运动”的栏目，配有图片。我这才理解，挑水，不简单，这是军民关系的具体体现。

爸最常说，没有老百姓，哪能有我们打胜仗。我真想再回去看看，看看老百姓现在生活的怎么样了！

## 晚年的强烈愿望，一片赤诚爱国心

2001年，老爸八十岁。我的妈妈已远行而去。老妈在时，老爸寸步不离，照顾得无微不至。现在没有了牵挂，他终于抽身回

到魂牵梦绕的冀鲁豫，走访了他当年经常“活动”的二十多个市县村镇，圆了自己的平生大愿。

冀鲁豫之行，爸有两个最强烈的目标：甘草垌堆和颜村铺。前者是“9.27”大“扫荡”时鬼子铁壁合围的中心，惨案发生地。后者是他们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

那时的冀鲁豫，只有菏泽一个刚建不久的纪念馆。其他旧址统统是断壁残垣，没有任何纪念建筑。颜村铺的房子还在，但破砖烂瓦，摇摇欲坠，围墙基本倒塌。甘草垌堆依然是黄河边贫穷的小村子，老百姓家徒四壁。村里的老大娘说，每年都得“跑水”啊，大水来了就跑，水退了再回来。爸看得心里很难过。尤其给爸带来强烈心理冲击的，是村子里平掉了当年“9.27”反“扫荡”的三座烈士墓。

爸是“9.27”大“扫荡”的亲历者。几十年过去了，对日本鬼子的强烈仇恨，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思虑，从未有丝毫减退。

从冀鲁豫回来后，爸的心情再也不能平静。此后的许多年里，以他八十多岁高龄，先后给有关单位写过十多封信和提案，好几万字。爸一直呼吁要建立抗战纪念建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那种竭尽全力的呐喊中，爸的内心很煎熬！

今天，翻看爸当年写的那一大沓子信件文稿，禁不住泪流满面！在那涂涂改改，反复誊写，字迹沧桑的纸面上，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冀鲁豫老兵的一片赤诚爱国心，那么强烈，永远不死！感人肺腑！

同时我还看到爸的那种急切、痛苦而又无奈的心情。爸的信件中，除了极力呼吁，苦口婆心，还想方设法提建议出主意，他一心盼望能留住历史痕迹，教育启示后人。

以下摘录部分信函。

## 爸写给范县的信

中共范县委员会：

同志们，你们好！

请原谅我的唐突和冒昧。首先让我做些自我介绍：我是抗日战争时期曾经长期在范县、濮县、鄆城、鄆城等地活动和战斗，并曾在当时的范县独立营工作过的老八路。由于较长时间在范县工作和活动，因此，我对范县的乡村和田野的熟悉程度和感情，胜过对我家乡的熟悉程度和感情，范县不啻是我的第二故乡。

自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军离开了范县，北上南下，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怀念着范县的大地和人民，一直想重返第二故乡，看望范县的大地和人民。我这个多年的愿望，终于在去年十月实现了。我去了聊城、菏泽军分区的几个武装部。蒙他们热情接待，并陪同我访问了几个县。在范县，用了两天时间访问了几个乡镇。没有想到，今日的范县大地和村庄，与昔日相比竟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使我极为欣慰！

范县之行，我特意去了甘草垌堆。甘草垌堆是1942年9.27日寇向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的中心点。在那一带，疯狂野蛮的敌人屠杀了被其驱赶到合围圈里的大批群众和地方机关干部，及我军部队非战斗人员。一时间，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制造了震惊人心的大惨案。当时，该地被合围的几个连队，在时任我军独立旅政委曾思玉率领和指挥下，英勇无畏，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出了敌人的重围，并带出了一大批被围群众。

当时，我在范县独立营工作。“9.27”这天，我营位于范县北部一村庄，当发现北边敌情后，遂向南转移。途中又得知南面和东西两面皆有敌情，又发现敌机在范县上空盘旋。这清楚的表

明敌人是对我范县的四面合围，情况严重。根据对敌情的判断，我营决定回头向北突围。由于敌人的合围中心在旧城，因而对我营没有进行有力的堵截，从而，我营顺利的突过了子路堤，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部队也无大的损失。

我们在庆幸之余，得知“9.27”在旧城、甘草垌堆一带发生的惨烈悲壮的事件，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多少年来，不时地在我脑海中浮现。

我想，凡是身临其境或知道这一事件的人，都不会忘记它。正由于此，驱使着我范县之行一定要去事发当地，去进行凭吊和访问。然而，结果大出意外，令人非常失望。在“9.27”大惨案发生地，竟看不到任何与事件有关的痕迹和标志。

据我访问过的几位当地老人讲，“9.27”后，被敌残杀的群众的遗体，被其家人运走；牺牲的我军人员的遗体，有当地群众挖了三个大坑掩埋。然而，这三个烈士大墓，在前些年为执行省里关于平坟的要求时，被平掉了。我想，这样下去，当年“9.27”所发生的日本法西斯在该地屠杀我大批同胞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突围部队英勇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其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救群众于战火之中的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将被人们遗忘；甘草垌堆这个具有特殊历史经历，足可以做为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也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变得平淡无奇，成为平庸之地！这将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

因此，去年我从范县回来后，即给范县人武部写去一信，并请他们转交县委。信中建议在“9.27”惨案发生地或其他合适的地方，搞一纪念建筑，记述和展示当年“9.27”事件所发生的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以供人凭吊、追思，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后人。但此信寄出已年余，至今未有回音。故今特再写此信直

寄县委。望县委的同志慎重考虑，予以重视，采取适当措施。是为至盼！

为帮助了解当年“9.27”在旧城和甘草垌堆一带所发生的事件的真实情景，现将根据曾思玉司令员的回忆写成的《曾思玉将军历险记》书中有关章节摘录寄去，请阅。另外，贵县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范县历史大事记》第55-56页中的有关“9.27”事件的记述，想早已阅过，不另送。

望回示！

此致

敬礼！

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干休所

李玉庆

2002年11月17日

## 爸给全国人大会的提案

有关加强抗日战争历史教育的几点建议

（已托人带至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

鉴于多年来日本政府及其首脑，对于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动的给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造成巨大人员牺牲和物资损失的野蛮的侵略战争的罪行，一直没有向我国及有关国家和人民表示深刻反省和诚恳的谢罪之意。反而不顾我国及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再顽固地坚持每年一次的参拜其供奉二战时的战争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公然煽动其大和民族主义，为其军国主义招魂。尤其当今日本首相小泉，今年在参拜时竟说他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反对他的参拜行为，并表示今后将继续坚持其参拜的行

动。这种顽固态度和言论，是向有关国家和人民的挑衅，这令人非常愤慨。

近年来，日本政府又公然违背战后日本宪法的有关规定，派兵派军舰出国，显示其军事实力，并妄图侵占我固有领土钓鱼岛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日本今后政治和对外政策发展走势与方向的关注与警惕。

去年，我国齐齐哈尔发现当年侵华日军遗留下的毒气弹，并使十多位我国同胞受伤。在该事件发生后，在我一再督促下，日本派员来查看，他们表现的那种怠慢冷漠的态度，事实上是日本政府和一些日本人对当年侵华战争罪责的轻视和冷漠态度的反映。

至于去年在我国珠海发生的数百日本人集体嫖娼的事件，更是一些日本人对我国和我国人民的一种公开无耻的羞辱。而我国数百妇女集体卖淫这种卑劣行径，除了表明我国有些人不仅不要人格，不顾国格，缺乏应有的民族自尊心之外，而也反映了这些人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蹂躏我国大片国土，屠杀我国二千多万同胞的滔天罪行和我们广大同胞所曾遭受的惨痛灾难的历史完全忘记，或根本无知。这实在令人可悲。我想，这种“忘记”和“无知”的人，尤其在青壮年及少年中为数不会少。此种现象很值得我国各级领导重视。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我国广大干部和人民联系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进行和加强不忘历史，不忘国耻，居安思危，树立忧患意识，奋发图强，强国富民，以免悲惨历史的重演，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实属必要。

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及其方式方法，极为丰富多样。现仅就有关抗日战争史实为题材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1.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在我国多处多次的大施屠杀我国同胞，犯了滔天的战争罪行。为了教育人们不忘历史，不忘国耻，建议在各惨案发生地修建相应规模和各种形式的纪念建筑，（如南京修建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山东海阳县以数百万元巨资修建马石山惨案纪念馆。为修建该馆，山东籍的老干部自动集资近二十万元；全省二十万大学生在长达数十米的长幅上签名以示支持该馆建设，怀念死难先烈）以记述当年日本法西斯的暴行，记述当年为国捐躯先烈的壮烈事迹。

2.在每年的“九.一八”、“七.七”及各地惨案发生的时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带头并组织干部学生等广大群众，到各纪念馆地，对当年死难的同胞和英烈进行祭拜悼念。这不仅是为了教育人们不忘历史，不忘国耻，而且也是对日本多届政府首脑顽固的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对我国及有关国家和人民恶意挑衅的一种有力回应。同时，对各地悼念活动，中央和各地各种新闻媒体及时地予以报道。

3.创制记述和反应有关“九.一八”、“七.七”及重大惨案的电影电视（有如中央和山东电视台去年摄制的纪念1942年日本法西斯在山东海阳马石山等地大肆屠杀和掳走我大批同胞，歌颂我抗日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军搏杀的电视影片）以在有关时日播放。

4.在各种学校的历史教材中编入记述有关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些情节。

2004年初

## 爸给何挺阿姨的信

何挺同志：

你好！

你托小林带来的银杏茶已经收到了。谢谢！你赠小林的《春梅晚唱》也已拜读。对书中所说的一些故事和情景倍感亲切，对书中提到的一些领导人，有的我认识，并且相当熟悉，有的虽未见面，但也耳熟。

人老了总爱回忆往事，过去工作忙顾不得，离休后事少了，就不由自主的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尤其是对抗日战争中的一些经历和情景，特别是对你书中提到的“9.27”大扫荡的一些情景，时常在我脑海中翻腾。

2001年秋，我去了鲁西一次，到了范县。在范县转了两天，并特意去了当年“9.27”大扫荡敌人的合围中心点，范县的甘草垌堆，访问了当年目睹敌人大肆屠杀我抗日军民滔天罪行的两位老人。据他们回忆，敌人走后，村里的乡亲把被杀害的抗日战士和地方干部的数百具尸体，集中起来，挖了三个大坑，进行了掩埋。其余数不清的被杀群众的尸体，被家人运走。被敌掳走的群众更不知其数。

这种种惨状，至今我一直难忘而又不想去想。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实在太凶残太残暴了。类似这种惨案，在1942年发生了多起。先是在冀中，当时震惊抗日根据地军民的“5.1”大扫荡，敌人的疯狂屠杀、抢掳，使冀中人民遭受了空前劫难，造成了“村村有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极为悲惨的情景。同年11月，敌人又对山东的胶东地区进行了“铁壁合围”，又屠杀和掳走我大批群众，制造了马石山惨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累累

血债实在太多！实在太大！罄竹难书！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者，但也不能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不能忘记国耻！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和不可理解的是，上述“9.27”惨案发生地的甘草垌堆，前些年为执行河南省的平坟通知，村里竟把掩埋抗日烈士的三个大坟平掉了，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对此，我心里很不平静。回到石家庄后，我给范县县委写了一封信，建议他们在惨案发生地或合适的地点，建一座纪念建筑，以记录和展现当年“9.27”事件的那种惨烈悲壮的情景，以供人民追思、凭吊。进行勿忘历史，勿忘国耻，奋发图强，建设祖国，以免昔日历史重演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后，我又给他们有关部门去信，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可是，他们至今仍无任何行动。这真让人失望，又无可奈何。

但是，我总不死心，觉得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台海形势以及美日台的种种动向，不能不引起我们严重关注。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结合有关历史事件和经验教训，对我们的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们居安思危。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这些战争幸存的遗老们，理应关注此事，有义务有道义责任努力促成此事。然而，现在我感到身单力薄，推不动当地的“当权派”。在此情况下，当我拜读了你的回忆文章，感知你是富有怀旧情感的老八路、老鲁西，又经历过“9.27”大扫荡的险恶环境。如果有你出头联络更多的曾在鲁西（冀鲁豫）战斗过的老同志，如当时率部队顺利突围的曾思玉司令员，当时任突围部队团参谋长的王晓等老同志，一起向范县和他们的上级濮阳市、河南省领导去信，呼吁他们像山东对马石山惨案那样，重视并行动起来。

我想，这样人多势众，一起努力，也许会有成效的。如果这样还不行，我考虑是否可以把我们的这一呼吁在报纸或网上等有关媒体发表，以争取更多人们的支持，对有关当局也施加一些压力。总之，千方百计促此事有成。以了却我们的心愿。

以上想法是否妥当，你还有何高见，请赐教是荷。

.....

李玉庆 2004年6月17日于石

### 爸给何挺阿姨的第二封信

何挺同志：

你好！

.....

关于范县之事，我们已经通过电话和写信交换了意见。你对此事的积极参与，我甚感鼓舞与感激。

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我国周边形势，越来越使人感到，加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不忘历史，不忘国耻，居安思危，奋发图强为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很为重要。

.....

就此看来，我们现在关心范县之事，积极努力千方百计的想法推动他们重视起来，这是符合中央精神，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不过，看来此事困难不少，已经拖了快两年了。如果这事再拖下去，我们也日益年老体衰，那时怕是无能为力了。趁当前我们尚有些气力，当竭力积极为之。

鉴于范县对修建纪念“九.二七”惨案工程一事本不甚积极，再加他们的财政确有困难（连工资有时也发不出，得向濮阳市借钱），他们就更为消极。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发动他们很快

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设法帮他们解决钱的问题。你提出动员和请求健民老出面，这办法很好。

赵老德高望重，过去又在河南主持工作多年，我想，他一出面讲话，其作用可就大不相同，事情可大有希望。赵老年事已高，不能给他添更多的麻烦，只是希望他能给河南省委（书记李克强）、濮阳市委（书记吴灵臣）写一信，建议和要求他们对范县修建“九·二七”惨案纪念馆一事，予以重视，推动范县，并在财政上帮助范县，做到这一步就可以了。

至于其它有关事情，我们可以去办。比如，我想等赵老给省市的信发出后，我们可以向省市有关报社去信，建议他们在今年“九·二七”之前发表一些有关“九·二七”惨案的资料和纪念文章，并为修建纪念工程募捐。同时，我们把上述有关活动情况向范县通报，建议他们积极行动起来，主动向有关方面进行联系。

……

（2004.7.13）

## 爸给濮阳日报苏斌的信

苏斌同志：

你好！

……

现将曾思玉将军回忆录中有关1942.9.27日在范县甘草垌堆率部突破敌人铁壁合围的《突破合围死里求生》的章节，约八千多字的复印件寄去，请收。另外，把2002.11.17日我给范县县委的一封信，2003.1.18日给范县党史研究室赵瑞华等同志的信，及2004.3月给全国人大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提案《有关加强抗日战争历史教育的几点建议》等信件也一并寄去，请收阅。从这些信件

中，我想你可以会了解和理解我这个老八路在近几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为了同一事情一再连续不断地给范县有关同志和组织写信的原因理由，以及我的心情和心愿。

这些信件不只是反映了我的怀旧心情，而更重要的是有感于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我国周边形势，觉得很有必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对我国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近来中央决定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一再强调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最近，还知道中央电视台专门成立了《抗战》小组，拍摄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影片。我想我们这么做，是符合和贯彻中央精神和要求的。

.....

“九.二七”快到了，希望在此前将曾思玉将军的《突破合围死里求生》一文在贵报刊出，作为纪念“九.二七”的一个重要举措。祝你们成功！

.....

(2004.9.10)

### 爸给濮阳日报苏斌的第二封信

苏斌同志：

你好！

来信及《濮阳日报》均已收到。谢谢！对贵报决定明年抗战胜利60周年时，刊载有关纪念文章，并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这很好，甚为高兴！这样做，很有意义。预祝你们成功！请你们考虑是否向范县有关部门邀些稿件。

读罢贵报寄来的范县专版，对贵报介绍的今日范县之进步与繁荣景象，深感欣慰！回忆当年的范县，冬春之际，举目远望，黄沙漫漫，村落稀零，辽阔的原野，不见树木，荒凉至极。风起

处，黄沙遮天蔽日。记得1942年4月的一天，大风刮了一天一夜，人们不能出屋，什么事也不能做，连饭也不能做。尽管门窗紧闭，窗子上还挂上被单，但沙土还是一直往屋里钻。大家只能躺在床上盖上被子蒙起头，睡大觉。直到第二天夜里风才停止，天亮起床一看，被子上地上，都是厚厚的一层沙土。到村外一看，麦子被埋得只露出一一点麦穗，“抗日沟”完全被土填平。本来已是绿油油的田野，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白茫茫。类似的情景还有几次。今日的范县，从报纸上看，与昔日的范县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尤其看了范县县委书记和县长两同志的文章，他们那种要彻底改变范县面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雄心壮志，至为高兴和钦佩。我衷心预祝他们成功！

今后若有机会和可能，我将再次去范县亲眼看看今日范县的繁荣景象。此外，我对范县还有一个希望，就是前几年我给范县同志的信上所提出的，关于修建“九·二七”死难烈士纪念建筑的问题。我觉得修建一个纪念建筑（亭、馆、堂、园等）以便长久的供人凭吊，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样还可以有效的提高范县的知名度。可是几年了，他们至今仍未有动静。这真令人着急而又无奈！

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不知他们对此有无考虑。

……

（2004.10.15）

读着爸十多年前的文字，看到的是爸的那颗心。始终不渝，忠诚坚定，忧国忧民，不忘初心！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那年我陪爸在昆明疗养，爸每天除了吃饭，哪也不去。饭后稍微散散步，就回

## 台前

房间写文章。那次他完成了一片长文《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兴我中华》。老爸那时84岁啦，看着他每天那样辛辛苦苦地写，我心疼，劝爸不要太累。爸说，敌人磨刀霍霍，我们哪能懈怠！

那个时候，正是有些媚上的歌手们大唱“今天是个好日子，赶上盛世享太平”时，谁能理解一个老兵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拳拳初心？！

今天，终于，拨云见日。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转变。

在爸竭尽全力呐喊呼吁了15年之后，范县终于在当年“9.27”反“扫荡”中部队成功突围的方向，即甘草垌堆村子的南边，黄河大堤内，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很有规模，庄严肃穆。

去年冬，我专门去了那里，去替老爸看一看终于立起的纪念碑。站在纪念碑前，我百感交集！



河南范县“9.27”反扫荡纪念碑

爸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只是它来得太晚，爸已经没有体力精力来亲眼看一看了。我拍了照片，回来洗印出来拿给爸看。爸戴着老花镜细细看着，嘴角动了动，半天没有说话。一会儿，自己反复念叨着：甘草垸堆，甘草垸堆。

他为之多年奔走呼吁，他的心太累了。

（李林 2019.8.31）

（作者简介：李林，见前文）

## 孙厚甫同志在鲁西

陈兆殷

孙厚甫同志是一位忠诚的革命教育工作者，他短暂的一生所表现的革命精神是感人至深的。1942年，他担任冀鲁豫军区扩大分校教育处长时，日寇与大批伪军对我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9月27日，厚甫同志在反“扫荡”战争中，英勇牺牲于黄河北岸范县的甘草垌堆（今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垌堆村），年仅三十六岁。他生前是中共党员。

孙厚甫名承光，字厚甫，笔名成照。1906年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县城内一个小职员家庭。少年时，他在本县上过中学，192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昆明东陆大学，仅就学半年，因经济困难又入成都高等师范（即今川大）学习，之后又转学南京中央大学教育系，于1928年毕业。

南京中大毕业后，他曾任徐州中学小学部教务主任，后又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中华教育界》主任编辑。1932年回云南，在昆明省立师范学院及昭通中学、女子师范任教数年。

1935年5月，孙厚甫同志重返上海，经舒新城的介绍，到武昌省立实验中学任教导主任。这一时期，他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日夜苦心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37年4月，他抱着观察与研究的心情，到山东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在那里任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的铁蹄踏入我华北大片国土，厚甫同志遂动员我带着两个孩子回云南原籍谋生，他决心个人留在鲁西和广大人民共同战斗。我返云南后不久，他即不惮长途跋涉到革命圣地延安以及河北南宫八路军东进纵队参观学习。通过这些活动，他对我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及民族统一战线策和军事上的游击战术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孙厚甫在鲁西郓城救亡工作团工作时，曾在我党的领导下，多次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训练抗日骨干，并向延安输送了不少知识青年。为了扩大抗日宣传，他主编了综合性期刊《鲁西吼声》。后来，我党地方组织逐渐发展壮大。1939年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到达鲁西后，党组织委派他担任郓（城）东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政权形式发动抗日，为部队筹集经费，开展统战工作等。在这些方面，他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秋季，厚甫同志曾任鲁西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副处长。1940年后，鲁西军区成立，他担任军区教导大队（军区军政干校）教育长。

孙厚甫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对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7月30日，菏泽、定陶、曹县等地又遭受大地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

蒋介石被迫抗战，因抵抗不力，指挥无能，日寇长驱直入，我华北大片国土沦陷。德州失守，济南告急，反动军阀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管人民死活。县、区两级政权还大肆搜刮民财，征粮、征款、抽丁、要枪，军政人员纷纷南逃。接着日寇深入鲁

北，人心浮动，菏泽乡村建设研究院经费无着，迟迟不能开学。学校人员部分随校迁移，其余自动离散，民族命运危在旦夕。厚甫同志忧心如焚，但他并未等待观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每天深夜收听新闻，记录广播内容，及时进行报道；同时集中在校同学上战时课，讲民众组织及训练。这时他一面总结自己以前的经验，一面探索新的奋斗方向，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内有军阀豪绅的压榨剥削。政治腐败、经济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家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蒋介石还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滥调，各地教育大权操纵把持在地主豪绅反动顽固势力手中，进行教育改革，阻力很大。稍有变革，即遭诬陷、排斥、打击。国难当头，一些同事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动摇，纷纷辞职返乡。而现实是日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大举进犯我国，其目的在灭亡我中华民族，客观环境怎容许你去办好教育？因而教育救国的思想不现实。而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救亡，全国人民积极响应。由此可见，厚甫坚信我国是有五亿人口的大国，只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定能驱逐日寇，打倒军阀贪官污吏，振兴中华！大敌当前，正是报效国家、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好时机，他决心留在山东。

他经常对我说：“……救国救民是我们的宏愿。我外出工作，你抱着孩子外出读书，为的什么？为的是救国救民！我们曾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共同抢救失足溺水者，现在是民族和国家有难，我们能睁着眼睛不管吗？当然，我们如有半点自私，回到家乡凭我的资格和能力，吃饭穿衣总不成问题。但没有衣穿、没有饭吃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坐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带着孩子回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养国家的小主人，将来为社会服务。我留下来，也好为抗战尽自己的一份责任。我们虽不在一起，但我们的目

标是一致的。我被他爱祖国、爱人民的忠诚所感动，毅然携子女回云南老家，他只身留在鲁西。那时长女祖庄不满四岁，次子祖同不满两岁，小女祖蘅还未出生。

厚甫留下后，首先带领一部分青年学生，直接参加山东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筹组的游击司令部政治部，开始培训政工人员，开展军运、民运工作。他们常常每天步行四、五十里路去执行任务；经常披星戴月出没在民间底层，宣传动员民众团结抗日，保家卫国。他说：“当年的爱国志士，均荷枪实弹、自愿前来投效参加抗日别动队的行列，在洪（红）庙一带密林中活动。他们豪爽讲义气，如果问起；来此何为？他们会直接地答复：‘抗日’！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全中华的儿女们，都团结起来了。”

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周围缺乏帮助，但这并无损厚甫同志的革命斗志。他说：“灰心失望是弱者的表现，颓废是自私的行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不敢不努力工作。为了全民的生存，为了不辱祖先，为了子孙不做奴隶，我们必须不惜一切牺牲，生活的艰苦是不会难倒我们的。目前，只有准备当汉奸当亡国奴的人，才不愿吃这些苦头。我决心献身社会，为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人类奋斗。”并以坚定的决心写下诗句：

我愿意接受一切的苦楚，  
因为它是磨炼我的红炉。  
我有的是不钝的笔头，  
我要尽量地将它写出。  
我相信我所受的苦楚，  
能代表世上多数人的命运。  
我有的是不哑的喉舌，  
我要大声的向世界高呼！

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怀着一颗不平凡的心……我不敢菲薄自己。自信是个光体，我只是一根灯草。但愿脚踏实地地凭着自己的努力，有多少热，发多少光，凭它的力量，照耀它的周围。”又说，“我们愿意困顿，愿意别离，愿意接受磨炼，为了什么？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自古以来，有不少牺牲一己以为人群的人，这些人正是富于爱心、富于骨肉之情的人。……难得你放心，鼓励，使我能专其心意地爱祖国犹如情人，孝顺祖国象孝顺母亲。”

1937年11月，在红庙工作时，厚甫同志初步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交谈中得知，陕西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各阶层人士，连妇女在内都发动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他们说：“游击战术并不纯粹是军事工作，十之八九是政治工作，也即是组织民众并武装之、借以粉碎敌人进攻的抗战工作。”

为了提高自己的革命理论水平和有效地开展鲁西抗日民众工作，1937年12月，他到了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进行参观学习。经有关组织的介绍，他又到了陕北三原县安吴堡中共办的西北青年训练班学习（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他接受党的使命，和同在三原学习的张国维同志（在郑州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现已离休）及另外两位同志（刘仰月、周凯）随身携带几本小册子，于1938年春节前后化装成农民潜回鲁西。他在给我的信中，感慨地谈到广离敌二百里路，耳闻炮声隆隆，求其可以为桥梁工作者而不可得，深感发动群众之重要。”又说，“我对旧年毫无感触。如有的话，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年过，战区的同胞流离失所，甚至肝脑涂地……”

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厚甫不仅在抗日理论的认识上有很大提高，而且也学得了一些工作方法，因而方向更明，信心更足，斗

志更加坚强了。他和张国维同志在郓城皇姑庵小学分手，互相作了临别赠言。厚甫给张国维同志的赠言是：“杀身成仁，打到鸭绿江边去。”

这时，中共地方党组织知道厚甫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是热心救国的无党派人士，便动员和支持他到驻郓城的国民党二十三师担任政治部主任。

厚甫在二十三师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军官们很佩服他的学问和见解。这年五月，日军坂垣师团进攻郓城，该师抵抗坚决，打得很出色，群众评论很好，但却触犯了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结果该师被调走，师长被撤职，群众对此深为不平。

厚甫留下与张长欣同志（现在山东阳谷二中，已离休）到郓城西南五十里路的黄安（现在黄安镇所在地），找到了桑平伯、许贯中等同志，暂时在黄安小学落了脚。接着，姜伯棠、高赞非（原菏泽师范教育长，解放后任济南市教育局局长，后任曲阜师范学院院长，十年浩劫中受迫害致死）、裴雪峰、宋乐颜（原菏泽师范教员）、张星如、张训斋、刘秋航等爱国人士，也先后到达黄安小学，于是就成立起“黄安救亡工作团”。

那时，他们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四下奔走，各方联络，召集会议，游说动员地方各阶层人士联合抗日，并配合其他抗日组织，与黄河北岸范筑先部队相呼应。他经常与八路军工作人员接触，向他们求教。

工作团自筹经费，创办了《鲁西吼声》刊物。厚甫同志是创刊人，主编撰稿人，每期都有他的文章，如《鲁西父老在怒吼！》《保卫大武汉！》《汪精卫绝地国人！》等。他写的文章短小精悍，文笔犀利，感情充沛，给人以启发、鼓舞，深受读者喜爱。刊物在菏泽地区颇有声望，受到地方党组织的重视和支

持，不断为《鲁西吼声》提供一些宣传抗日的好文章，如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就在《鲁西吼声》中转载过。该刊对稳定群众情绪，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团结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他在黄安救亡工作团的工作，至今还给同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全心全意为革命。他一天到晚想的、谈的、做的都是抗日救亡，除此以外，他似乎再也不想什么。有一次，他接到家信，别人关心地问：“家里情况怎样？有什么困难吗？”他回答很干脆：“现在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的困难解决不了，休想解决家庭的困难！”他整日东奔西跑，团结和发动抗日力量。他不怕风雨，不顾疲劳，别人都为他的健康和 safety 担心，而他却满不在乎。有一次，他从郟城地方武装负责人祝壁臣那里回来，已经半夜。别人说：“以后不要深夜活动了，还是警惕一些好。”他回答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咱们做抗日工作，和各阶层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怕什么？”的确，他整天考虑的是抗日，是革命，从来不考虑自己。

（二）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更重要。厚甫同志对别人关怀备至，却从不把自己放在心上。有一次，刘秋舫同志病了，厚甫同志请医煎药，照顾得非常周到。他把仅有的一件毛衣脱给秋舫同志穿，宁肯自己穿得单薄些。秋舫同志不肯穿，厚甫说：“你穿上，我身上的衣服薄了点，但心里却热火一点了；你不穿，我身上的衣服厚了点，但心里却冷了一点。”有一次，听说黄安街上客店里来了一个八路军病号，厚甫立即跑到店里找那人攀谈，问长问短，请医煎药，关心备至。隔了一天，那人要到巨野去，厚甫同志给那人雇了人力车，还把自己仅有的六元钱送给那人做盘缠。那人感激地说：“革命到处是一家，我从厚甫同志身上，深

深懂得了这个道理。”

（三）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厚甫同志是外地人，口音虽然与鲁西方言有差异，但群众却都喜欢与他攀谈。他给群众讲革命道理，谈论生活，把话说到群众心坎里，群众把他看作“自家人”。

厚甫特爱与少年儿童交朋友。他到黄安小学不久，虽没有教过课，但黄安小学的学生把厚甫同志当做自己最敬爱的老师，听厚甫同志讲革命故事，跟他学唱抗日歌曲。只要厚甫在家，就不断有孩子在他屋里嬉笑谈天。有一次，厚甫拿“王老五当兵打日本”的漫画讲给孩子们听。听了之后，一个孩子天真地对厚甫说：“你叫上级发给俺每人一支枪，俺不就是兵吗？不也就能打日本了吗？”厚甫爽朗地笑了。另一个孩子接着说：“有了枪，咱今晚就去摸鬼子的营盘。”厚甫哈哈大笑问：“你们说，打鬼子就这么简单吗？”有个孩子以坚定有力的口气说：“只要你领着干，俺什么都不怕！”

（四）生活朴素。厚甫同志从来没讲究过吃穿，他经常穿着那件破旧的蓝大褂。裴雪峰同志给他做了件新的，他不但不要，还生气地说：“你把我当成衣架了么？”为了联系工作，他经常骑车外出，有时没有车子，就干脆步行，从不因此影响工作。有一次，在一个风雪夜，他从梁仞仞同志（梁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后病逝延安）那里步行回来。裴雪峰同志要给他做点饭，他执意不叫，跑到伙房，拿起干粮就啃起来。同志们对他的评价是：没有条件，他艰苦；有条件，他也一样保持艰苦的本色。

1938年，厚甫在黄安工作的时候，中共郟城中心县委（包括菏泽、巨野、郟城、鄆城）已经建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即以鲁西救亡工作团的名义，在郟城县五区飞哲集开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

干部，发展党员。厚甫是训练班的任课教师，那段时间共办了三期训练班。这三期训练班，在该县党的建设上起了重大作用。当时环境很艰苦，常常是露天睡觉，吃的是杂面窝窝头，咸菜或盐水代菜，所以当地群众称“窝窝队”。对郟城来说，“窝窝队”实际上就是一支抗日战争的创业力量。当时，厚甫和学员们同吃同住，随时学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讲党的统战工作和政策，亲自教唱抗日歌曲……这期间，他不曾虚度分秒时间。他说：“困难压不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热情。”他孜孜不倦地培养造就了大批吃苦耐劳、热心救亡的军政干部。该县“三八”式的老干部，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训练班学习过的。

许多青年在厚甫的鼓励下，奔赴陕北学习，后来成为抗日工作中的骨干。如在延安抗大第五期毕业的李义钦同志，在晋察冀剧社任儿童队队长，1941年日寇扫荡时被俘，囚于北京南苑机场监狱，至死坚贞不屈；陈真（现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五级干部，职务不祥）、杨巨晨（杨烈，现任河北省出版事业管理局顾问）都曾在陕北学习过。有的在他的启发下，积极支援抗日团体，捐钱捐物，帮助解决抗日团体的困难。郟城南邵集的杨巨晨还自筹经费办训练班，请厚甫去宣讲抗日道理，举办战利品展览，大大鼓舞了群众斗志。

他培养教育的学员，在校与出校后的表现，都能令社会人士满意。他说：“尽管物质生活上忍受着从未有过的艰苦，但在精神上却感到相当充实，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彼此相敬相爱。他们相信我，并听从我的，实际上比之一般的师生关系密切多了。虽然我以前不曾认识他们，然而在抗日的旗帜下，我们已融成一个心了。”

厚甫同志在讲课中，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当他讲到日寇

惨无人道，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广大骨肉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学生们往往被感动得泣不成声；当讲到大敌当前，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应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时，他又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志如钢铁，表现了他火热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38年夏，为了寻求真理和学习救亡工作的经验，孙厚甫和桑平伯、高赞非、许贯中等“黄安救亡工作团”的同志到冀南大名、南宫参观。当时那地方是我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驻地，党的力量较强，已掌握了军队、政权。参观时他们受到徐向前、宋任穷、李青玉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给他们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回来后，厚甫同志除创办刊物加强抗日救国的宣传和配合郟城中心县委培训抗日骨干力量之外，还以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奔走地方上层，促进各方势力联合抗日。

1938年5月，日寇第一次占领郟城撤走后，郟城上层人物为了自身的生存，组织了地方抗日武装，叫“郟城县抗敌自卫团”。县长王念根兼任司令，副司令祝壁臣（原是地方团队武装指挥部司令），这支武装的实权是在祝壁臣手里。自卫团共有九个大队，每个大队五百人，司令部直接领导的还有一个独立营，一个骑兵连，总共五千余人。中共地方党组织，推荐热心抗日、有正义感的厚甫到自卫团办了个军政干部学校（也有叫训练班的），地址在郟城县第一小学校内，县长王念根是名誉校长，厚甫任教育长，实际负责的是厚甫同志，高赞非同志也在里面担负一定的工作。这个学校每月训练二十多天。那时，王念根的口号是：“不管哪党哪派，只要在我领导下抗日，我都要。受训人员多数是自卫团的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也招收部分知识青年。受训完，毕业分配到各区武装当政工人员和文书。这个军政

干校办得很正规，规模不小，经费全部由县里负责。祝壁臣与厚甫同志接触后，很钦佩厚甫的学识和为人，把厚甫当作政治上的参谋。训练班办完，厚甫同志的声望进一步提高，这却遭到国民党地方势力的嫉恨和反对。厚甫离开郓城，仍到黄安一带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工作。他和副司令祝壁臣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不断做祝的工作，所以八路军到鲁西后，祝和八路军合作得很好。之后，郓城抗敌自卫团大部分人员，都加入了杨勇同志的部队。

### —

1939年春（旧历正月），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到达鲁西，当时正值日寇第二次占领郓城县城。日军修筑工事，企图长期盘据，并派五百名伪军在郓城西北樊坝建立据点，一时人心惶惶，国民党县政府及地方武装不知所措。八路军一二五师六八六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敌伪重要据点点樊坝，敌人全部被歼。自此，八路军声威大振，民心得到安定，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战情绪，为创建鲁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樊坝战斗结束后，东进支队继续东进，留下第一团团团长杨勇率部以郓城、范县、寿张、鄆城四个县的结合地为中心，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整个鲁西形势急转直上。

这时，中共郓城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和厚甫也都转移到这一地区来，配合第一团建立根据地。当时各界抗日力量都集中在我军周围，郓城县委也从秘密转为公开。那时的主要任务有三个：1、积极扩大八路军；2，建立区、乡抗日动员委员会（这是群众团体，后改为农、青、妇抗日救国联合会）；3、从事政权建

设，争取改造区、乡政权（那时的区、乡政权都是当地上层人物组成，属国民党政权体系，和日伪无关系）。

因此，既不能提夺权，又不能提消灭，所以只提改造旧政权，即把区、乡政权牢固掌握在共产手里）。

1939年秋，第一团扩大为独立旅，杨勇任旅长。为了工作方便，厚甫担任了独立旅政治部交际科长的职务（主要做统战工作）。秋末，郓城二、九、八三个区的区乡政权全部改造完毕。在此大好形势下，为加强这些政权的领导，县委已考虑建立全县政权的必要性。但当时县城被敌人占领着，国民党的县区政权仍在农村活动，我们力量还小，干部也很少，建立全县政权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决定先在郓东建立个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是政权性质的机构），为建立全县政权创造条件。县委考虑到当时的统战环境，觉得郓东办事处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在上层和群众中有一定影响，能够团结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经县委慎重考虑，决定由厚甫任郓东办事处主任（党领导下抗日政府的前身），厚甫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委托。郓东抗日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以政权形式动员抗日，为部队筹集经费，开展统战工作等。在工作中，他做出了显著成绩。1939年冬末，成立郓城抗日县政府，民选县长，原中心县委改为运西地委，县委书记任梁仞仟被选为县长。郓东抗日办事处使命结束，厚甫到鲁西行政委员会（鲁西行署前身）任教声处付处长（处长管大同，主任肖华，付主任段君毅）。1939年八路军到鲁西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壮大，各地逐步建立武装根据地，并成立了鲁西军区。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接着成立了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或叫鲁西区军政干校），训练部队的连排军政干部、地方政权的干部和民运干部，厚甫又在教导大队负责讲课。

1940年6月，抗大一分校由晋东南迁至山东。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山东抗大分校直接归军政委员会领导，以周纯全、李培南分别任校长、政委。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改为抗大一分校一校；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或军政干部学校）改为抗大一分校二校；胶东军政干校改为一分校三校。接着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决定，鲁西军区和冀豫军区合并，称为冀鲁豫军区。厚甫任抗大一分校和二校教育处长。同志们高兴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42年春，部队根据形势的需要，实行“精兵简政”。为培育造就一支有知识、有文化的部队，学校接受了一大批老干部（多为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学习文化的编制称陆军中学。从鲁西军政干校到抗、陆中，厚甫同志一直担任教育长和教育处长。他为培养干部、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期间，厚甫同志在党的直接领导教育下，革命事业心更强了。他精力充沛，专心致志地施教，废寝忘食地工作。他在艰苦环境中，对待困难始终是乐观向上，凡和他共过事和接受过他的教育的人，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年的老战友，至今怀念他，追述他在抗大的情况。

曾任过他的秘书的贾萍同志（现在海军工作）以及教育股长、语文教员许柏亮同志（现在北京军事政治学院工作），共同追述他在抗大的情况时说：“由于在敌后战斗环境里，学校驻地要常常转移和夜行军。每到一个新宿营地，天都很晚，他总是等大部分同志有了住处才进房子，而进了房子，他便不顾行军的疲劳，马上打开行李，投入工作和学习。

“在寒冷的冬天，他常常在小油灯下工作、学习到深夜，有时我睡醒一觉，看到他还坐在灯下，一会伏案挥笔，一会搓搓

手，呵呵气，思考问题，计划下一步或第二天的工作。

“每当他下队讲课、作报告或准备召开会议以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丝不苟。有时一边吃饭、一边执笔，边吃边写，小米饭和菜汤都吃光了，他的调羹还握在手里。每次送他审阅各队的课程进度表时，他都反复斟酌，亲自调整修改。遇到矛盾，就找有关主任教员商量解决。

“厚甫同志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时的教材都是他和教员亲自编写的。他又有着广泛的知识 and 兴趣，各科教学都有很大的改革。如数学则主要是联系部队的实际，要学员学习运算。他虚心和教员共同研究教材，尊重教员提出的意见，认真和教员分析教材内容。当读到文章的题目的重要性时，他认为一篇文章有个画龙点睛的题目，是可以使文章分外生色的。当时讨论的一篇散文，内容是写一只母鸡带领一群小鸡啄食的情景，而母鸡怎样精心护理小鸡们还随时谨防兔子喂拢来。这本是一篇普通的小故事，但是文章定的题目却极为醒目，点睛叫做“亲恩”。一篇普通题材的散文，却因此题而增色了。他们自己编写的语文课本，分作三册石印出书，当时大家都把石印的书看作宝贝，倍加珍爱。

“厚甫同志从不满足自己已有的知识成就，孜孜不倦地学习新东西，以适应革命事业的需要。那时抗大只发了三本莫斯科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他得到一本，视为宝贝，整天带在身边，并把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出现的“斯达哈诺夫运动”（即向先进生产者学习的运动）运用到抗大评定学习成绩之中，把学员学习成绩优秀者评称为“斯达哈诺夫”，以鼓励学员的进取精神和学习热情，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时学校有不少图书，学校专门配备两匹骡子在行军时驮

书。厚甫同志非常爱护这些书，经常对管理员小赵同志和秘书贾萍同志说：‘这些书是我们的宝贵财产，要好好保管，一本也不能丢！’有时他亲自参加整理图书，他的确把一颗心都放在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上去了。

“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厚甫同志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群众同甘苦，不搞特殊。按照他当时的地位和原来就在这个地区工作而且熟人多的情况，想搞点特殊，是可以的。但他对上不伸手，对外不乱拉关系，坚持同大家一样吃小米饭，穿粗布衣，有时还喜欢穿破布编织的草鞋。这对于生长生活在大城市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尤其他那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仅从他的笑咪咪的脸上可以看到，也可以从他朝气蓬勃、任劳任怨的工作中得到证明。

“不管是对教员，对一般干部，还是对学员，厚甫同志从不摆架子。他平易近人，习惯以同志式的态度对人，他耐心启发帮助同志一道搞好工作。他对经常打交道的下级，更是体贴入微地关怀帮助。有一次，厚甫同志要熬夜工作，要贾萍同志写一条子派通讯员去伙房要灯油。贾萍同志在条子上写‘事务长……’他拿在手里看了一下说：‘写错了一个字。’于是就动手把‘事’字改为‘司’字。”

张长钦同志读到：“在黄安救亡工作团时，厚甫同志要张星如刻印一件宣传材料，星如同志字刻得挺好，就是好出错字、漏字。这次厚甫同志特别告诉他：‘刻好后仔细对一对，不要出错。’星如同志刻好并核对之后，就准备付印，正好厚甫同志走来，他拿过蜡纸看了一会，就指着一个地方叫星如同志看：‘这里把个‘不’字漏掉了，原来这个句子是否定语气，现在成了肯定语气了。这个‘不’字，可掉不得啊！’他拿起笔来改了，并

亲切地对星如同志说：“任何工作都不能粗心大意，粗心大意是我们工作中的蛀虫，我们要有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他这种耐心亲切的教导，循循善诱的态度，使同志们很受感动。”

厚甫的性格是非常开朗和乐观的。同志们回忆起当时在行军途中，厚甫同志常常和大家一起边走边谈，或研究问题，或讲些故事，说些笑话，使行军途中充满了乐观爽朗的笑声。在1941年元旦行军途中召开的全校新年团拜会上，要他讲话，他很风趣地讲了他从云南到四川路上遇到的一件事：“一队劳动的年轻人，挑着东西要翻一座山梁，大家显然疲劳了，坐在地上不愿再起来。这时，一个似乎是领头模样的人，先站起来“鼓动”其余的人说：‘起来走吧！前面就是山梁，咬咬牙，翻过山梁就到村庄了。’大家立刻振作精神。”讲到这里，厚甫同志说：“同志们！我们也走吧！”他讲这番话的情景和“我们也走吧！”这句话，大家感到这是一个“启示”。当时正是敌后艰苦之时，我们咬咬牙关，渡过困难，胜利就在眼前了。果然，在以后的战斗岁月里，形势逐渐好转，看到了打败希特勒，看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同志们还忆起了1942年春节前夕，伙房里改善了一下生活。除夕晚上，秘书贾萍和图书管理员小赵，还有小通讯员，各自坐在点着小豆油灯的风房里休息，村子里不断传来鞭炮的声音。厚甫怕他们想家，热情地说：“来！咱们在一起谈谈，我来讲个故事！”于是大家就坐拢来，他把云南过团年的情景讲给他们听：云南过除夕时，风房里用松叶铺成一圆形的垫子，全家围坐成一圈。他把如何守岁，如何过年的风俗讲给大家听，给同志们宽心。他也在遥念自己的妻儿，更加埋头于现实的工作。

二

1941年以前，厚甫同志还是一个在领导岗位上的非党员。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决心为民族事业献身。因为他积极参加民族解放事业之时，就是抱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的。他抛家离子，忍饥受冻，在极端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仍保持着革命者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战胜利。”

厚甫同志到抗大之前，不仅积极组织了地方的抗日救亡工作，而且与党保持密切的联系，得到党的信任。那时党组织还未公开，许多党组织不便出面去办的事情，都由他去办。他在组织上虽未入党，但却时时处处把自己与党联系在一起。

他对党始终抱着一个真诚热爱的尊重态度。抗大的战友们回忆说：他日常讲话办事，总是处处尊重学校党组织的领导，及时请示，大胆负责，积极维护党的利益。他开口闭口总是我们的党如何如何，一片亲切热诚，看不出他是一个非党同志。每当过党日的时候，对在他领导下的党员，便不分配其他行政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保证他们按时参加党的活动。在规定的党员活动时间里，他自己也经常主动学习有关党的建设的资料，自觉提高对党的认识。党的方针政策，他带头执行，各种规定、纪律，他认真遵守。如每次部队迁移驻地前，他催着把老乡们的东西还上，把房子内外打扫干净，借用老乡的东西损坏了，他提醒及时赔偿。

到抗大以后，他更加严格地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检查自己之不足。他对工作更加积极负责，任劳任怨，与党的负责同志一样。上至军首长杨勇（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何德全（参谋长），下到一般干部，都对他非常关

心、尊重。首长们见了他，总是问寒问暖，热情认真地听取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意见，没有把他看作外人。他从来不把自己和军区首长的关系挂在口头上夸耀，从不向组织上伸手。杨、苏二位首长亲自对政治部主任赵风歧同志说：要注意解决厚甫同志的入党问题。后来经过实践的严峻考验，1941年，军区首长指示郑思群同志（接任赵风歧同志的抗大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西南党校校长。1953年，调任重庆大学校长，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介绍，光荣地入了党（预备党员）。

1942年9月27日，敌伪对鲁西进行残酷的大扫荡。由于寡众悬殊，在反扫荡战斗中，厚甫同志不幸牺牲在黄河北岸范县的甘草垌堆村（今台前县清水河乡甘草垌堆）。牺牲后，冀鲁豫边区党委作出决定，追认孙厚甫为中共正式党员。

厚甫同志已牺牲四十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深深留在群众中的记忆中，人民永远怀念他。他的英雄形象和光辉事迹，将和所有革命先烈一样，求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为之献身的伟大理想，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已开始成为现实，革命烈士用血浇灌的鲜花更加艳丽。

愿烈士英灵为之自豪吧！

八十高龄，原黄安救亡工作团战友许贯中同志写诗歌颂厚甫同志，兹抄录如下：

厚甫先生，籍贯云南。

为了抗日，奔赴前线。

到达鲁鄂，择居黄安。

救亡工作，大为开展。

《鲁西吼声》，唤醒青年。

组织武装，准备抗战。

联系八路，南宫参观。  
谒见徐宋<sup>〔注〕</sup>，找到靠山。  
抗大分校，教务勇担。  
训练干部，更有贡献。  
残酷日寇，扫荡范县。  
是役之中，英勇抗战。  
不甘被俘，自尽敌前。  
高呼口号，惊破敌胆。  
壮烈牺牲，谁不称赞。  
追认党员，人民心愿。  
我对先生，深有所感。  
身材虽小，意气冲天。  
生活朴素，待人温暖。  
工作认真，勤奋自勉。  
平易近人，群众感染。  
精通马列，信仰共产。  
热爱祖国，忍抛家园。  
不顾妻儿，只恨敌残。  
至今口号，响彻云端。  
情神不死，永活人间。  
如此牺牲，重于泰山。  
略述真情，实非过赞。

（注：徐宋即徐向前、宋任穷。）

1980年8月1日于郟城武安乡

附记：

我是厚甫的爱人，有责任和义务编写厚甫的传略，但由于云南解放前，我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放区来往的信件，经常受到特务机关的检查、没收，故难以掌握真实情况。解放后，我很想通过调查、访问，把厚甫同志的事迹记录下来，搞个传记，给青少年以教育，也告慰烈士英灵。谁知1957年我被强加罪名，划为“右派”，遭受打击、迫害二十余年；十年浩劫中更是是非界限混淆，眼见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惨遭迫害，被打伤、致残，不少人死于非命。生者尚且如此，死者死矣，又何足挂齿。因此，为厚甫同志写传略的事，迟迟搁置，没有形成文字。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重视搜集、整理烈士传记、遗物、手迹。1979年10月，成都电业局局长王洁如同志（山东郓城人，“窝窝队”时期厚甫的老战友）来昆开会，通过同乡李瑞亭同志（原黄安小学学生，原名王同钦，《鲁西吼声》的好帮手，现任云南省水电设计院党委书记）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们一家的下落。并积极热情地向我们作了厚甫生前事迹介绍及牺牲经过情况介绍，还介绍了一些了解情况的老战友。同时，他鼓励我为厚甫写传略，协助我各方联系搜集材料。厚甫家乡——云南昭通县民政局领导又亲临寒舍，要求提供有关革命烈士斗争史料。作为革命烈士家属，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经过一年时间，在我省走访林超副省长（原参加郓城飞哲集训训练班，厚甫窝窝队时的战友）、前任教育厅长赵凤歧（原抗大政治部主任）、省水电设计院党委书记李瑞亭及厚甫的同乡、同学浦汉英、马逸飞（均系省交通厅顾问）、费炳（省水利厅干部，省政协常委）等同志，又和鲁西、郑州等地许贯中、张长

欣、张国维等同志通信联系。1980年4、5月间，我又到杭州、济南、北京等地亲访了厚甫的战友。尽管时隔四十余年，但厚甫同志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光辉形象，还深深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如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山东省副省长徐雷健（原任郓城县委组织部长，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郓城县委书记），还联系到其他几位同志，如李廉力（济南铁路局干部）、祝英（山东农业局干部）、张丕（抗大女生，曾任济南历下区党校校长）合写了一份厚甫早期菏泽、郓城一带宣传马列主义、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的材料，在北京访问了军事政治学院许柏亮（原抗大教员，教育股长），访问了在海军工作的贾萍（原厚甫秘书），吴耕书（原抗大政治部主任郑思群的爱人，抗大政治、语文教员。解放后任西南党校教员），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厚甫的同乡、同学，在上海时期的文化教育界挚友），河北出版事业局顾问杨烈等，他们给予了大力支持，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还有解放后高赞非、桑平伯等同志来信，杨勇同志也亲笔来信，并致函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同志，高度评价了厚甫对革命的功绩，使我们一家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长女祖庄在重庆大学毕业，次子祖同在贵阳师范学院毕业，小女祖衡昆明农学院毕业，现均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特附笔告慰！

另外，根据厚甫留下的部分书信及我们共同生活中的回忆，尽管自己才疏学浅，文章写得拙劣，但这些都是真实的记录。正如王洁如同志所说：“这些资料，对革命是史料，对亡友是怀念，对子女是教育，对人民是鼓舞又是教育”，对我是了却自己的心愿。在编写这个材料时，同志们给予大力支持，提供了宝贵材料，在此谨表衷心感谢。并请将不尽之处和错误的地方指出

来，以便改正。

陈兆殷1981年12月

孙厚甫，（1906——1942年）原名承先，云南昭通人。1928年大学毕业。1937年赴山东菏泽县任乡村建设师范教师，同时参加了抗战工作。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旅政治部交际科长、鲁西军区教导大队教员、抗大二分校教育处长。1941年入党。

1942年9月27日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一位饱读诗书的非党文化人，不远万里，从云南昭通来到山东郓城，为的是抗日救国，年仅36岁为国捐躯。《孙厚甫同志在鲁西》一文，以细腻生动的笔触，客观、完整、准确地还原了以郓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景，感人至深。以个人的小历史见证时代的大历史，此文堪称精品。

（本文源自菏泽《百年名人大观》（先驱英烈），主监管玉田，团结出版社出版。）



年青时的孙厚甫和妻子

## 怀念父亲刘晏春

刘东林

我的父亲刘晏春，河南省濮阳县五星集人，1903年12月18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因家乡遭受黄河水灾逃荒在外，到14岁才上初小。192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濮阳县高级小学，因家境贫困，加上年景不好交不起学费，半年后辍学回家随祖父务农。但他酷爱学习，在劳动之余坚持读书自学，不到一年，被聘在本村小学代课，半年后成为正式教员。他边教书边学习，凭借自己的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濮阳县师范讲习所”。在上学期期间，刘晏春读了陈独秀的《毁除偶像》等几篇文章，还读了一些进步小说。1930年初又读了《少年漂泊》《短裤党》《拓荒》和《两个策略》等书，受到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5年秋，刘晏春从“濮阳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先在“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代课半年，后到季家寨教书一年半，此间获得县教育局传谕奖。1927年下半年，梁秀凯的北伐军进驻学校后学校被迫停课，刘晏春回家务农自修近一年，后又到“濮阳第一模范小学”教书。

在这几年的教学生活中，刘晏春经常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在学生中成立了“读书会”，在教员中成立了“教学法研究会”和“运动竞赛会”。

从1929年初起，共产党员徐仲三经常和刘晏春谈论革命思想，向他讲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对他进行革命影响。刘晏春多次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1930年7月初，凭着他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徐仲三秘密介绍刘晏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暑假期间，刘晏春介绍王文涛、王子震等人入党后，在“濮阳县第一模范小学”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刘晏春任书记。他带领支部用各种方式积极开展工作，组织盐民反盐捐、抗盐税，指导“读书会”的会员向贫苦百姓进行革命宣传。

1931年春，刘晏春在“教学法研究会”和“运动竞赛会”的基础上成立了“濮阳县教职员联合会”。还在学生中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宣传队”“粉笔队”，指导他们在节日和纪念日的前夜，用街上散、院里投、门缝塞等方式发传单，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并在城外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

“九·一八”事变后，刘晏春领导党支部转入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工作，带领学生在城内外怒斥（宣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共同抵制日货。1931年“古刹大会”的前夜，刘晏春组织学生把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第二天一早整个县城一片哗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

1931年9月，中共濮阳县委改为濮阳县中心县委，刘晏春任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负责领导城内各校的党组织，带领他们开展工作。当年冬，刘晏春等县委领导研究讨论后，认为抗日救国必须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盐民斗争。按照县委分工，刘晏春负责动员和领导城内的盐民、组织各校学生积极配合、打探政府和警察局的消息，了解他们对盐民的动态等工作。刘晏春带领县城内的党员和积极

分子在城区的盐民中进行动员，组织盐民成立“民生盐会”，帮助盐民除掉“卖私盐是违法”的传统观念。

1932年农历3月19日一早，3000多盐民在刘晏春等县委领导的带领下冲向“盐巡”驻地，“盐巡”闻讯逃跑。“盐巡”队长来不及逃走，躲在屋内紧闭房门。刘晏春在王家大院门前痛斥“盐巡”的罪恶，进一步激起了盐民的愤怒。盐民们高呼着不“不打倒‘盐巡’决不罢休！”的口号，一齐拥上前，推倒院墙，捣毁“盐巡”的驻地，痛打“盐巡”队长。随后，盐民们重整队伍在城内游行，齐声高呼口号，要求免除一切盐税，取消“盐巡”。各校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入到行动之中，跟随队伍一路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打着旗帜随队助阵。盐民们激昂的情结，坚定的决心，迫使国民党县长孙培基答应了盐民提出的条件。

1932年暑假后，刘晏春到新习集模范小学教书，在工作之余对教员开展要求增薪的工作。10月，刘晏春组织起700多名“濮阳县教职员联合会”的教员到县教育局、县政府请愿要求增薪。国民党当局对教员们的请愿几次推诿不予答复，教员们随即宣布罢教，喊出“不增薪决不复课”的口号，全县小学一致行动，罢教持续了半年之久。此次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对后来革命斗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2年夏，刘晏春在濮县彭楼村（今属范县辛庄乡）利用亲朋关系秘密开展建党工作。9月，在彭楼村建立了濮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年底发展党员11名。1933年春，刘晏春到范县甘草垌堆（今属台前县）一带发展党组织，到了冬天，中共甘草垌堆村党小组成立。1933年底，濮阳县的10个区建立了99个党支部，绝大部分乡村都建立了党组织。

1934年2月，刘晏春任濮阳县中心县委书记，并领导山东省

的濮县，范县工作。当年秋，刘晏春在濮县彭楼村组建了中共濮县县委。

同年秋，濮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刘俊贤、党员张惠之被捕，刘晏春随即封闭了二人与党员组织和党员们的关系。后派王子震探视二人，转告二人要坚强，组织上正积极设法对其进行营救。10月，刘、张二人叛变，刘晏春闻讯后迅速从城内转移到乡村坚持革命斗争。反动当局发出了通缉令，悬赏缉拿刘晏春。刘俊贤带领警察到白堽抓捕刘晏春，刘晏春因在前一天夜晚去濮县检查工作幸免。

从1933年秋到1934年秋，黄河连续在长垣决口，多个县遭受灾害，大片农田颗粒无收，灾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濮阳中心县委发动灾民进行“反饥饿”斗争，要求反动当局设粥锅、发棉衣，动员盐民支援灾民。刘晏春负责在濮阳北部和濮县领导“反饥饿”斗争。1934年农历腊月，濮县县委成员在刘晏春的带领下，带领大批灾民涌入县城，在县政府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国民党县政府放粮、放款。轰轰烈烈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答应了灾民们的强烈要求。

当年冬天，刘晏春在一名党员家落脚，后这名党员害怕受到牵连，不顾风雪交加逼迫刘晏春离开，刘晏春迎着鹅毛大雪，扛起自行车，踏着没过膝盖的积雪来到农民张金榜家。张金榜将他迎进家中，让他换下湿透的棉衣，燃起炭火让他取暖。刘晏春利用风雪天敌人不便行动的时机，让张金榜把附近村子的党员召集过来，向他们布置工作。

1935年初春，刘晏春到濮县的李桥村开展工作。当时正值青黄不接，很多贫雇农断粮断炊，群众要求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刘晏春了解到黄河渡口有奸商用船向外地倒卖粮食，立即安排刘

培岑、刘茂斋组织起以游击队员为主的抢粮队。当晚，刘晏春带领队伍奔赴黄河渡口抢到大批粮食，帮助群众度过了春荒。

1935年暑假期间，在济南乡师上学的郭从文向刘晏春汇报了他与同学赵健民发生了党的关系和济南乡师的情况，刘晏春根据郭从文的汇报分析山东党组织与上级没有联系。郭从文回校后把他与刘晏春见面的情况告诉了赵健民，经郭从文介绍，赵健民到濮县见到了刘晏春，两人交谈了两天，刘晏春让赵健民按照自己说的情况写了一个报告，并让他回去后多发动和领导灰色组织开展斗争，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建党工作。刘晏春将赵健民的报告转给了北方局，要求北方局派人与山东党恢复关系。

1935年9月，刘晏春任直南特委巡视员，领导濮县的游击战争。刘晏春了解到国民党二区区长赵守纪家有两支长枪和一支手枪，趁赵守纪到县里开会的机会，刘晏春集合起二、三、四区的游击队员夜袭赵守纪家，夺取了枪支和部分财物。

刘晏春领导这支游击队白天分散务农了解敌情，夜间接到命令迅速集合起来整体行动，队伍频繁活动在濮县与濮阳县交界处，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1935年冬，刘晏春领导濮县徐庄、温庄党支部开展抢粮斗争，这两次斗争不仅使群众分到了粮食，还获得了两支长枪。河北省委根据刘晏春在工作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绩，对刘晏春给予了车头怀表等物质奖励。

1936年3月间，濮县反动分子张连山、王德海向济南国民党反动政府报告了濮县党组织的活动情况。敌人出动军警在六个地方同时行动，县委书记王士希、组织部长刘培岑等等8名党员和群众被捕，刘晏春迅速切断了被捕人员与党组织和党员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政府再次广发对刘晏春的悬赏通缉令。到了8月，形势略

有缓和，刘晏春集合濮县、范县两县的党员，在范县冯固集进行了一次武装斗争，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大家的情绪，扭转了被动的工作局面，使工作又逐渐开展了起来。

1936年4月，上级派刘晏春等人与山东党组织恢复关系，并将濮县、范县、观城划归山东省领导。经北方局同意，山东省委建立了鲁西特委，刘晏春任特委书记，直接领导“寿张县省立第八乡村师范学校”党的工作。暑假后，该校的党员由原来的七八人发展到十七八人，使寿张县八乡师党组织在恢复和发展山东党组织的工作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为日后建立冀鲁豫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年秋天，刘晏春到了博平县的远家店，通过谢鑫鹤在博平、茌平两县建立了点线关系，又通过于子元在鲁西南的曹县、菏泽地区发展了党组织。

1936年10月，刘晏春任山东省委委员、组织部长兼鲁西特委书记，并领导鲁西北特工委和鲁西南的工作。

“七七事变”后，多数群众特别是学生中产生了“恐日”病，刘晏春根据党的指示反对“恐日”逃跑，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张积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

濮县县委在刘晏春的领导下成立了濮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出钱、出枪、出人，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刘晏春还组自建立了“抗日义勇队”和“地方自卫团”等抗日武装队伍。

为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刘晏春深入到濮县、范县、观城一带的乡村，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动员大家积极参加抗战。他将“儿童团歌”的歌词作了修改，把它改编成一首抗日歌

曲，并对儿童团和少年进行教唱。

1937年8月，刘晏春重新组建中共濮县县委。当年秋后，刘晏春和张霖之利用共产党员刘兰和国民党26路军31师师长池峰城的联贴关系，向该师进行打入派遣工作，先后打入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100多人。

当年11月，刘晏春领导濮县和范县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和中共北方局太原会精神，部署发动群众、组建革命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2月，刘晏春带领濮县二、三、四区的地下武装，夜袭驻扎在高提口多东池子村古庙内的反动民团，行动中未开一枪，缴获长短枪90余支。刘晏春连夜带走队伍，次日将队伍拉到范县马路口村，正式成立了以刘茂斋为队长、刘培岑为指导员的“濮县抗日游击队”，并为游击队布置了任务，制定了纪律。

1938年3月，北方局又将山东的濮县、范县、观城重新划归为直南特委领导，刘晏春任特委常委，宣传部长。

4月，直南特委领导的八路军4支队在濮县王辛店进行整顿。刘晏春带领濮县、范县游击队加入4支队，使4支队的指战员增加到六七百人。

濮、范两县的抗日游击队升编到4支队后，刘晏春在大赵庄召开濮县县委会议，成立了“民众抗日义勇队”。不久，范县县委也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同月，刘晏春在濮县张称湾村召开濮县、滑县、东明、长垣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成立了以进步青年抗日组织“通俗学社”为基础的濮、滑、东、长四县“抗日教国会”。

1938年5月，刘晏春任直南特委组织部长，他连续开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充实了县、区党组织机构，使党群工作得到进一步开展。

刘晏春利用国民党专员范筑先部27支队司令王义得是中共党员这个有利条件，派党员张延斋担任27支队政治部主任，后又加派祖化石、王贯一去27支队政治部工作。他亲自与王义得联系，把通过王义得搞来的20多支枪送到4支队。

为壮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刘晏春非常注重掌握和改造土匪队伍的工作。为了能把山东曹州府（今菏泽市曹县）王希太一支约300人的绿林武装转变为党的队伍，刘晏春派于子元打入王希太部对王开展工作。经过于子元的说服，王希太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直南特委任命王希太为八路军陇海抗日游击支队司令。在此后的斗争中，这支队伍成了鲁西南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抗日队伍。

1938年夏天，范筑先想收编“濮县抗日义勇队”，刘晏春等人为了避免党的武装成为国民党的队伍，决定以濮、范两县“抗日义勇队”为主，组建一支规模较大的抗日武装。经徐向前同意并亲自为部队指定番号，直南特委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黄河支队”，刘晏春负责为支队筹备给养。

9月，直南特委在濮阳县刘辛庄举办区以上干部训练班，刘晏春到训练班上讲课，培训党员干部60多人。

1939年2月，刘晏春到北方局党校第一期学习班学习，9月结业后任豫北地委书记。他到任后首先召开了县、区干部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六·八决议”精神，纠正了此前在对国民党专员丁树本的统战工作中出现的右倾思想，批评了部分党员的错误想法，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动群众，掌握政权，集中力量建立和扩大武装，并规定各县都要建立一个青年武装大队。独立大队和豫北大队归地委直接领导并进行扩大整顿，同时布置了扩大教导大队的工作。当年底，刘晏春又集中力量，支援了我军对石友三的讨伐战役。

刘晏春得知共产党员张惠僧和国民党滑县县长贾心斋是世交，且关系密切的消息后，便派张惠僧、杨锐、贾潜做贾心斋的工作，争取贾心斋到我党一方。刘晏春在得知贾心斋决心投奔共产党后，随即指示杨锐、贾潜向杨得志请示具体接收事宜。1940年3月下旬，我党在滑县建立了政权。

1940年3月初，中共北方局决定由王从吾、刘晏春、杨得志、崔田民等人组成冀鲁豫边区党委，刘晏春参加了组建工作。4月7日冀鲁豫边区党委正式成立，刘晏春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他领导出版了《冀鲁豫日报》，举办党员训练班，编写党员教材和宣传教材。7、8月间，区党委组织召开“反扫荡”会议，会后刘晏春到三地委指导工作。

1941年7月1日，中共北方局根据斗争需要，将冀鲁豫区与鲁西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区党委，刘晏春任区党委常委、民运委员会书记兼妇委书记，领导工、农、青、妇、文教团体和人民武装部的工作。

1942年，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了民运部，刘晏春任部长兼妇委书记，领导和发动群众进行对敌斗争，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等运动。

1943年7月，刘晏春当选为冀鲁豫区中共“七大”代表，10月赴延安，年底抵达后在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接受组织审查。党校支部书记徐运北，小组长周绍华（军队干部）审查了刘晏春的全部历史。审查重点：濮阳党遭到破坏后，刘晏春为什么还能在该县坚持工作；濮县党遭到破坏，敌人抓捕刘培岑时刘晏春为什么没有被捕；向池峰城的部队做派遣工作是否有失立场。

审查结束后，组织上给刘晏春作了“历史清白，无任何问题”的结论，刘晏春成为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之后他参加了甄

别小组的工作，在甄别工作中，刘晏春坚持实事求是，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白天参加党校学习，晚上翻山越岭到各关押点向被关押的同志了解核实情况，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和为被冤屈的同志作证明，解救和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在七大会议期间，刘晏春为此遭到康生的威胁。

1945年9月下旬，刘晏春带领最后一批冀鲁豫干部离开延安。12月底抵达冀鲁豫后任区党委常委、社会部长（现公安机关的前身）。刘晏春为建设公安工作举办了数期公安干部训练班，充实了公安干部队伍，并带领干部到新收复的南华、菏泽、定陶地区开展工作。

此间，区党委决定走雇、佃、贫路线，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新区不少雇、佃、贫群众在干部进村后外逃，个别接近群众的群众有的被恶霸杀害，有的失踪，使很多贫苦群众顾虑重重，群众难以发动。刘晏春根据此情况向区党委提出：“日寇投降后新收复的地区与老区不同，单纯走雇、佃、贫路线面太窄，为使雇、佃、贫不孤立，应先以他们为骨干，开展反奸诉苦来带动减租减息运动。”他的观点在区党委争论了很久，个别地委也有争论，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明确解决，直到减租减息工作走了弯路之后才被迫转向。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配合部队的行动，刘晏春带领群众坚壁清野，破坏敌人的交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选派优秀干部打入敌军，对敌军进行分化瓦解。

在土改工作中，一些区、村不经上级批准就随意杀人，有的区一次就杀四五十人。不少地方在分地主的作坊时把中农的作坊也给分掉，严重违反了“打击地主、斗争富农、保护中农”的政策。1947年初，在区党委会议和罗海干部会议上，刘晏春都反

对把批准杀人的权限下放到县和大量杀人。他指出：“我们消灭地主是消灭阶级，不是消灭肉体。”对破坏保护中农的政策和破坏工商业政策的行为，刘晏春提出了“把地主的粉坊交给贫农集体经营，中农的一律不得再动”的建议。对全区普遍出现拆房、伐树（部分小树也被挖掉）的现象和区党委允许贫农把地主、富农的房子拆掉分砖另盖的问题，刘晏春又提出：“要制止拆房伐树，把没收的房屋分给贫农居住或换住”的建议。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时，刘晏春组织支前大军，为晋冀鲁豫野战军运送粮食弹药，救治伤员病号。他不顾敌机的扫射和轰炸，亲临现场指挥民工修路架桥。

1947年7月，刘晏春任冀鲁豫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妇委书记。到任后，他首先明确了要执行选用“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土改运动中，他培养提拔了一批干部，为1949年3月南调3500多名干部打下了基础。

1948年初，全区的整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区党委在得到中央局要求纠正的指示后，指定由刘晏春全力领导全区的复议工作。他在复议工作中稳定了干部的情绪，并对干部作了适当的调整。

1948年春，区党委在布置土改地区的工作时，刘晏春针对这些地区群众思想混乱、大吃大喝不安心生产、普遍酝酿要来二次土改的问题，提出了“为了巩固土改、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要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迅速扭转这种不健康的现象”的想法，区党委在此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争论。刘晏春写信将问题向中央进行反映，朱德总司令到冀鲁豫了解情况后说：“晏春同志的主张是对的。”

关于冀鲁豫的土改工作，刘晏春在《自传》中写道：“我认为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土改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是次要的，我在这一阶段工作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大胆的。”

1949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部署，动员和组织大批干部南下。为了加快外调干部工作的步伐，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地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1月8日，刘晏春代表区党委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他提出：“对接受和组织此次南调干部任务的有利条件和困难问题，要有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足够的认识，才会有信心地来进行细致的组织工作，继而来保证完成这一伟大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配备选拔干部时，要注意干部的优缺点及全部历史，发扬干部的长处。要从工作的全局出发，审查干部的全部历史要避免简单化和单纯性、片面性，不能只看干部一时的表现好坏。选择干部的主要条件是：工作好，立场稳，执行政策路线正确，党性强，作风正派。”“各地委立即召开县委组织部长会议，将外调干部的任务分配到县委，对党、政、军、群干部普遍进行政治、阶级和形势教育，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保证完成外调干部的任务。”

1949年8月，平原省成立，刘晏春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兼党校校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河防汛指挥部政治委员。刘晏春到平原省工作后不久，亲自给冀鲁豫老区的有关组织写信，信中写出烈士的名单，让他们认真查找烈士的家属，要求他们在烈士家属的生活上和工作上尽力妥善照顾。他还亲自看望烈士的子女，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在“三反”运动中，刘晏春分管公、检、法和“三反”运动。他认真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严格区分是非真伪。在运动期间，王兴、马福全因贪污罪分别被

判处死刑和15年有期徒刑，刘晏春签字后即可执行判决。刘晏春调来此案的全部案卷认真查阅，发现案情有重大疑点，重新组织人员调查。结果证明王、马二人均被诬陷，刘晏春随即给二人平反，并严惩了诬陷者。

1952年12月，刘晏春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负责扩大纪委机关，建立健全办公、会议制度，组织清理积案。

1953年5月，刘晏春负责对太原钢铁厂职工张宝桐案件进行调查。刘晏春让太原办案人员和与此案有关的人员分批到北京汇报情况，为防止他们统一口径搞攻守同盟，刘晏春让回太原的人和来北京的人在两地同一时间上车。经过调查了解，查明了案情的真相，为张宝桐彻底平了反，恢复了党籍、厂籍，补发了工资，对制造冤案，挟嫌报复的王自生予以严惩。1955年3月4日，《人民日报》对此案发表了题为“骄傲自满的恶果”的专题社论。

1954年8月，刘晏春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主持了1954年12月中纪委召开的厂矿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和1955年3月召开的农村纪律检查工作座谈会，两次会议均获得圆满成功。

1955年，刘晏春任中央监察委员会监察员。他受中监委常委的指派，负责对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案进行调查。经过艰苦的工作，按计划查清了王斌在党内的一切违法乱纪问题。

1956年，刘晏春受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的委派，对黄河水利委员会的袁隆冒充党员、陷害王鹏程一案进行了查处，纯洁了党的队伍，维护了党的尊严。

1957年9月，刘晏春兼任中央监委河北、山东、河南三省检查组组长。在工作中，他发现河南省委办了一些错案，刘晏春认为这会影响到一个同志的一生，本着对同志的负责，他让河南省

委给这些同志平反，并坚持要求看到平反结果，省委书记潘复生对此极度不满。

1958年3月，中央任命刘晏春担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刘晏春到河南之前，洛阳市一个副市长将一位女护士强奸，洛阳市委没有处理这个副市长，反说女护士“腐蚀”领导干部，将女护士送到西华农场劳动改造。市法院院长孟淑庆因替女护士鸣不平也被打成“坏分子”而撤职，行政14级降至17级，在单位打扫卫生。孟淑庆多次到省委告状，省委均维持原处理结果。刘晏春到河南后，孟淑庆向刘晏春讲述冤案的经过，刘晏春排除干扰，将女护士接到郑州，查清案情后为女护士平了反，给孟淑庆恢复了原职原级，将洛阳市副市长撤职查办。

1959年，河南省发生了大批农民被饿死的“信阳事件”。当时，基于极左思潮，不少人不敢向上级报告，而刘晏春向中央报告了实情，中央让他进京直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1963年，刘晏春到南阳地区检查工作，在乘车去火车站时，一位中年农妇扑到车前，手举状纸跪在地上拦车喊冤。刘晏春下车听了农妇的哭诉，丈夫遭人诬陷被活活打死，女儿又被凶手强奸，她四处告状均无人受理的冤情，刘晏春当即决定处理此案，并亲自参与案件的调查，在查明案情后严惩了凶手。

三年困难时期，为了尽快解决河南人民的吃饭问题，1963年10月，刘晏春不顾疾病缠身，带领“要粮队”奔赴广东。为了省钱多购粮食，他坚决不住广东省委领导为他安排的高级宾馆，说：“我是个大要饭的，是代表河南的灾民来要粮的，不能住这么好的宾馆，还是省点儿钱多买些粮食吧！”为了多购粮快运粮，刘晏春动员大家放弃回家过年，把节省下来的路费和时间用来购粮和运粮。为了让大家安心工作，他电话通知河南省委买好

年货，送到要粮人员的家中，代他向他们的家人进行慰问，并嘱咐省委对购粮队同志的家庭多加照顾。

刘晏春带领这支“要粮队”深入乡村海岛，足迹遍布广东各县，不厌其烦地向广东省的各级领导讲述河南的灾情，希望他们大力支援河南的灾民。由于身体长时间过度劳累，在返回郑州的第二天即患多发性神经炎，全身瘫痪，省委紧急通知省人民医院进行抢救。中央得到通报后迅速用飞机将国内著名专家送到郑州为他会诊，并要求河南省委每天向中央汇报他的病情。1964年10月，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的关注和关怀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刘晏春战胜疾病痊愈出院。在上海华东医院复查期间，他写信给濮阳县水利局长王仙洲，就治理濮阳县清河头集南金堤河的问题提出具体的治理方案。

“文革”期间，刘晏春遭到“四人帮”爪牙的残酷迫害，备受折磨，但他仍坚决同“四人帮”进行顽强的斗争，对他们的诬陷和摧残不屈不服，不畏不惧。

1971年6月，刘晏春病情加重，在去世的前几天，他把家人叫到病床前，对他们说：“我在冀鲁豫担任领导几十年，许多老干部的历史我都清楚，我们应该保护这些老同志，如果现在不把他们的情况写出来，将来我不在了，这些同志的情况就搞不清了。”刘晏春连续五天向家人详细讲述了许多老干部的历史情况，让家人一一记下，他嘱咐家人：“这些同志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不能让他们蒙受冤屈，我不在了，有人来调查这些同志的历史，就给他们抄一份，绝不能让这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

1971年6月9日，刘宴春含冤逝世，享年68岁，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他的一生。

1979年3月23日，中共河南省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批示，为刘

晏春举行了降重的平反昭雪大会，宣布推倒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为刘晏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肯定了刘晏春卓著的革命历史功绩。

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万里、薄一波，生前好友杨勇、陈再道、崔田民、钱正英、黎玉、平杰三、张承先、赵健民、申云浦、韩哲一、杨蔚屏、杨珏、王庭栋、郭超等以及省委有关领导同志送了花圈。

王从吾、刘子久、宋维静、李光禄、王兴等同志从北京和外省市专程赶到郑州参加刘晏春的平反昭雪大会，沉痛悼念这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本文源自《冀鲁豫儿女忆父辈》，李春光主编，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 怀念父亲管大同

管汝胜 管小英 管北河

我们的父亲管大同，原管重华，笔名纪衡、同明等，1913年4月22日出生于山东潍县高里村一个农民家庭。13岁时，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读完高小，后因家境拮据而辍学，到济南一家医院当了一年多学徒。16岁时，父亲由他的叔父接济，考入济南第一中学。

当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熏陶，父亲已初步接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参加进步的学生活动；同时写写文章，有些文章还发表在报纸和校刊上。

1930年，父亲考入高中，由于他经常带头抨击腐败的旧社会和反动政府，在同学中已崭露头角。

### 一、在学生运动的舞台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消息传出，举国鼎沸，群情激奋。济南学生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一样，纷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然而，蒋介石却叫嚷着“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其卖国行径深恶痛绝，当年12月初掀起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在济南，为统一行动，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联合会，父亲当选为主席。他不但

组织学生罢课、游行、宣传、抵制日货，还在济南抗日团体领导下组织济南高中、一师、乡师、育英、正谊、女师等13所学校同学成立了“济南中学生赴京请愿团”，准备开赴南京。

12月7日，父亲和“请愿团”的同学们冒着雨夹雪到了济南火车站。但是，当局禁止学生集体赴京请愿。学生们又气又恼，痛斥当局的反动罪行，不顾天寒地冻又雨雪交加，为扩大影响而卧轨阻拦列车，从而切断交通。他们的棉袍、大衣都淋湿了，浑身冻透。尽管如此，他们仍高唱进步歌曲，呼喊抗日口号。8日下午6点多，反动当局终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在南京，同学们迫使蒋介石出面接见，父亲慷慨激昂地当面驳斥蒋的丧权辱国谬论。18日，当局突然派出大批军警宪兵，将父亲一行强行推上闷罐车厢，押送回济南，父亲和于笑虹（时名于占奎）等人，旋即被开除学籍。

1933年春，父亲到北平求学。起初只是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旁听；1935年，考入中国大学经济系。中国大学地处西城，在西城党组织领导下，学校有党的组织开展各种抗日救国的活动。学校有不少进步教授和老师，如李达、黄松龄、徐冰、张友渔、齐燕铭等；更有很多党员学生，其骨干为段君毅、杨易辰、王其梅、任仲夷、高元贵等。为唤醒千百万劳苦大众，父亲和他们一起创办了《现实》《抗战日报》等报刊。为给这些刊物撰稿、油印，父亲常常工作到深夜。而白天，他又和段君毅、刘达等人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和杨易辰同志为中国大学的领队，高举旗帜，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列。1935年，在火线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父亲被选为党的北平学联中国大学组织负责人。北平学联常委。

1936年6月，父亲和清华大学代表郭健代表北平学联到天津，同天津学联代表一起到南京，找到南京学联代表狄超白。他们联合上海各界救国会的代表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社会贤达，向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父亲还参加了新闻界的招待会，代表中国大学学联发表了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声明。

### 二、就任山东省寿张抗日县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寇又把战火引向华北各地。在此情况下，党组织派父亲作为北平学联代表，和一些平津流亡学生到济南开展革命工作。

在济南，父亲被中共山东省委分派到聊城。随后，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范筑先将军（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派他到寿张县建立山东第六区政训处驻寿张办事处，并任命他为少校干事。其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建抗日群众团体和抗日武装。

寿张县地跨黄河南北，县城在黄河北岸。梁山在黄河南，属寿张县境（今寿张改设镇，归阳谷县属；梁山设县）。当时，国民党军队、政府官员纷纷撤退到黄河南岸的梁山一带，只有国民党县长齐体元（北洋军阀齐燮元之弟）还没跑，县政府机关还存在。但到11月底，因传说鬼子兵已侵入距寿张不远的地方，齐体元也率县政府官员退往梁山，不久又离职潜逃。

为稳定局势，发展抗日武装，范筑先委任父亲继任寿张县县长、委任林茵如（时名林友身，1966年任陕西省副省长兼延安地委书记）接任政训处寿张办事处的负责人。

父亲到任的当晚，就和政训处寿张办事处的同志们商讨组织政府领导成员，并就七个方面作出了布置，即：施行财产累进

税；救济灾民：废除苛捐杂税；推行抗日教育；举办抗日干部培训班；加强对县武装的纪律整顿；组织群众性抗日团体，而参加县政府的成员，除第一科（民政）科长礼聘一位旧人员外，其余全从政训处的同志中推选；第二科（财政），由岳树梅任科长；孙思白任县府秘书；李宗白任会计主任；杜宗禹任金库主任兼监印。其后不久，又把那位礼聘的旧人员辞退，由于笑虹任第一科科长。这样，新县府的重要部门全被共产党人接管。

随着工作的开展，原有政训处的人员已人力不足，不敷分配。同时，也需要培养和使用当地人才。于是，又开办了寿张县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训练班的日常工作由许法负责，课程主要有游击战术、政治常识、统一战线、中日战争和帝国主义论，原政训处的干部兼课任教。经考试，第一期招收将近100人。

在县长任上，父亲忠实地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提出了为建立抗日民主廉洁的县政权而奋斗，并为之带头执行，率先垂范，其中包括自动降低薪水以支持抗日武装，打破门禁制度，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深受民众的欢迎和拥戴，人们都亲切地称他“咱们的管县长”。

与此同时，他领导的抗日政府十分注重武装建设，不但对现有武装的改造常抓不懈，而且组建了寿张县抗日骨干武装——警务大队。

然而，县府的一些惠民措施却受到寿张封建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他们暗地里派出头面人物姜次敏（前国民党县党部头目）、姜益轩（商会会长）向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告黑状。沈鸿烈及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椿等人，早已把范筑先为抗日旗帜的鲁西北视同眼中钉。于是，在1938年4月下令：“查寿张县

管大同，人地不宜，着即免职，另候任用”，免去了父亲的县长职务。

### 三、创建人民抗日武装队伍

1938年5月父亲被免去县长职务后，寿张及邻县政训服务员们曾开会向范筑先建议拒绝。范考虑沈鸿烈是山东省主席，恐影响大局，未予顶回。在聊城的山东共产党省委代表张霖之指示：范司令已表态，我们也只好遵从。至此，父亲只好办移交，但枪支和钱款并未全部交给国民党，而是设法转给了中共鲁西北特委亲手组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山东第六区第10支队（后发展为115师主力部队），然后回到聊城，即到政训处工作。

5月，政训处改为山东第六区政治部，父亲被任命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此前，党组织已在聊城创办了一所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张郁光，教务长齐燕铭，集齐鲁英才而育之，培养了不少抗日干部。父亲常到学校宣讲革命道理。另外，他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战地文化》的刊物，并建立了一个宣传队和剧团。

8月中旬，为配合支援保卫大武汉的战争，范筑先将军亲自率领五六个支队的兵力，发动了对济南的进攻。

战争开始前，中共鲁西北特委为了帮助范筑先抗日，并开辟泰西和运东地区，曾在长清潘店镇组织了一个前方政治部干部学校的学员组成工作队、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支援前线。

抗日队伍的到来，令当地群众欢欣鼓舞，踊跃支援。父亲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发现了许多抗日先进分子，其中有不少是知识青年。父亲报经特委批准，并取得范筑先同意，就地办了个随营学校，自任校长，吴亚屋及刘教东、张志远等为教员。

随营学校办了两期训练班。第一期20多天，学员50多人；

第二期7天，学员100多人。学习的内容主要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救亡工作》以及国内外形势。经过培训，学员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为建立新的抗日武装培训了骨干力量。

这时，政治部已动员了长清、高唐、夏津和在平、博平、清平的几万农民支援部队作战，并配合政治干部学校的铁路工人中队（后发展为山东铁道游击队），对津浦铁路北段进行大反击，使从天津增援济南的日军不得不从德州步行南下。支前的大车不断将后方募集的粮食、肉类、咸菜和军鞋等送往前方，将前方部队缴获的战利品钢轨、枕木、大米、布匹、罐头等运回后方。同时，还派有经验的政工人员率领政干校学员和各县工、农、青、妇抗日救亡团队成员，组织了几十个工作团，到战地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新收复区的人民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打鬼子。在此情况下，范筑先于10月初决定成立山东第六区第31支队，委任父亲为司令，让他把长清北部和齐河一带的老百姓组织起来，抗日救国。

父亲受命后，首先以随营学校和吴亚屋原来带领的战地服务团为基础，迅速组成了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在长清县孙楼打出了31支队的番号。接着，收编了一些当地民团队伍，使队伍增加到五六百人；而到11月中旬，31支队已发展成拥有700多人的战斗部队。他们在鲁西一带杀日寇、夺枪支、打列车、拔据点，搞得日伪惶惶不可终日，悬赏重金要父亲的首级。

11月15日，聊城沦陷，范筑先将军殉国，鲁西北地区的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我党掌握的一部分武装和撤出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向31支队集中，从而使31支队迅速扩大起来。

12月，红军干部、第10支队政治部主任袁仲贤，奉命从长清

大峰山区带八路军东进纵队独立营的两个连来到31支队，传达鲁西区党委的决定：把31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平原纵队”，由袁仲贤任纵队司令，父亲任副司令员。

1939年1月，10支队奉命改为“筑先抗日纵队”，袁仲贤调任该纵队政治委员，父亲继任平原纵队司令员，吴亚屋任政委，王唯一任参谋长。这时，八路军平原纵队已有1300多人。

1939年5月，八路军平原纵队主力转移到肥城县陆房，编入115师343旅686团；另有500人并入山东纵队第6支队。时任115师政委的罗荣桓元帅进一步得知我父亲和31支队的有关情况后，曾当面称赞他：“没想到你这个秀才，还是一个扩军司令！”

#### 四、主管文教

1940年4月15日，鲁西各界在东平县戴庙召开代表大会，决定把原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成立鲁西行政主任公署，选举肖华为主任，段君毅为副主任。5月，父亲调到鲁西行政主任公署，主管文教工作。

当时，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和各级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向全面、正常化发展。为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建立了教育委员会，各级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行署设文教处，专署、县政府设文教科，区设文教助理员。

父亲到任后，在区党委和行署统一领导和部署下，首先制定了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社会教育发展规划。当年10月，又以鲁西行署的名义发布了国民教育计划，其中规定：每3个村设初小一所，每8-12所初小设中心小学一所，每县设完全小学一所；“筑先学院”设初中部；各专、县成立教育巡回团，加强师资培训；各村设立俱乐部，开办夜校、识字班，并计划每个专区设中学一所。中小学教材，全都是我父亲主持编写的。

据1940年的统计，到年底，全区已恢复建立的小学、完全小学57处，中心小学39所，全区小学生总数达4.24万人；建立的群众俱乐部846处，民众夜校940处。

1941年初，区党委又制定了《鲁西文教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全区文教工作的总方针。根据这一总方针，父亲领导文教战线广泛开展了抗日统一战线民族爱国社会教育，如进一步创立民众学校，开办俱乐部，提倡开展文化戏剧活动，大量创办各种报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等。尤其显著的是，冬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提高了民众文化素质。

所谓“冬学”，是指农村在冬闲时开办的季节性学校。主要从事成人教育。冬学教育的内容，一是识字学文化，二是时事政策教育，并时常将两者结合起来。冬学教员，有抗日小学老师，有在乡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拥护抗日民主政府的乡绅、私塾老师，也有各机关团体的宣教人员。冬学教育的对象，以有组织的基本群众为主，如民兵、自卫队，农教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会员，并通过他们动员全体民众参加学习。冬学的教材，大都是当地教员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并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自己编写的对联，顺口溜。如“好爹娘送儿上前线，好妻子送夫把军参”，“鬼子快完蛋，赶快垒猪圈，喂猪积肥多生产”等等。

在父亲和张承先（后来曾任河北省委书记、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建议下，区党委、行署对一年一度的冬学专门发布指示和命令，从而在各地成立了冬学运动委员会，父亲还时常请区委、行署领导同志去冬学讲课。

1941年7月，鲁西、冀鲁豫两区合并为新冀鲁豫区，父亲任冀鲁豫区行署文教处长。据资料显示，当时中心区濮县、范县、观城3县约80%的青壮年都参加了冬学。有些少年、老年人也参

加，甚至还有不少是全家都去，互帮互学，场面十分动人。大家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和文化素质，推动了基层各项工作。有些积极分子，还被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了农村中的骨干力量。所以，后来有人就此评论说：“冬学”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困难时期改造群众传统文化所进行的一次成功尝试，为我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文化基础。

### 五、多方建树

1943年9月、10月，日寇对冀鲁豫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他们由南向北，先湖西，再鲁西南、运东、沙区，最后全力合围濮、范、观中心区。在这次“扫荡”中，鲁西南地区损失最为严重，军分区司令朱程、专员袁复荣都在来都战斗中壮烈牺牲。在此情况下，父亲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鲁西南专署专员的重担，及时地做了大量的恢复生产和救灾工作，巩固了当地革命政权。

1945年之后，父亲工作调动频繁：先是被任命为水西地委代理书记兼水西公署专员，接着又肩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调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和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代表、解放区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

在水西，父亲到任不久，即公布了专员公署施政方针的布告，并召开了县、区长工作会议，布置了工作：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改造保甲基层政权，组织群众团体和抗日自卫队。还公布了减租减息和向恶霸地主要回土地的法令，建立征粮、征税、合理负担的办法，实行拥军优属，号召参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经过几个月的群众运动，农民要回了土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大家欣喜若狂，积极开展劳军运动，青年农民踊跃参军，部队扩大了一倍，秋收缴纳2万多斤爱国公粮。

在调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和解放区救济总会中共代表期间，他和段君毅、王笑一随同周恩来参加了黄河问题的国共谈判；在南京梅园新村谈判桌上，他以大量事实揭露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利用黄河归故复堤工程分割解放区，以水代兵，配合军事进攻的阴谋，争取解放区应得的复堤工款、物资和故道居民迁移安置费；揭露美国和国民党当局违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分配原则，利用救济物资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常使敌人瞠目结舌，为解放区人民争取到了应得的联合国援助。在此期间，周恩来还曾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重点讲了解放后的经济建设设想，诸如如何铲除外国垄断资本，如何保护民族工商业稳步发展等问题，使他深受教益，并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回忆。

1947年，父亲任解放军救济总会驻天津代表。他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既不使谈判陷入僵局，更不做无原则的让步，在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下工作，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党所交付的任务。其间，他还往返沪津之间，在宋庆龄的直接帮助下，为解放区运送了大量救济物资，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肯定和好评。

1948年，父亲调任华北财办出入口管理委员会主任，从此转到经济战线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 六、献身工商管理事业

1949年济南解放后，父亲始任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9月起改任市政府秘书长。他密切关注济南市的原工商业者，协助恢复和发展私营工商业生产，筹备和建立了济南工商业联合会，开始了对济南私营工商界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利用自己曾是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又在北平上过大学的特殊身份，充当党和

政府同济南知识界的中间桥梁，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协助姚仲明市长全面处理市政府的日常事务。

1950年春，父亲奉调进京。当时，外交战线缺少干部，董老推荐父亲为第一批大使培训班学员，拟派他到捷克任大使。后因国内经济工作更缺业务干部，陈云同志把父亲留在了中财委，做整顿经济、反对投机倒把调研，以制订经济政策草案，供中央领导决策。

此后，父亲先后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成员，中央外营企业管理局外资处处长，中央外资企业管理局外贸处长兼秘书长、副局长等职。

1952年，私营企业局更名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后改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父亲任副局长、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还任国家机关党委委员和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等职。

在担任中央私营企业管理局副局长时，因为局长由中财委秘书长薛暮桥兼任，而薛在中财委工作繁忙，私营企业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我父亲主持。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时期，局长为许涤新。我父亲协助他总结各地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一系列规定和办法，把各类工商企业的登记管理、对小商小贩的管理、商标的注册管理和城乡市场管理等项工作，都逐步开展起来，保护合法经营，取缔违法经营，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为贯彻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导下，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推动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中央工商局首先代国务院起草了《公司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于1954年9月公布施行。接着，又代国务院起草了《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

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重要问题的规定》，于1956年2月公布施行。随后，又起草了《对公私合营企业清产核资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7年8月由国务院批转下达施行。这时，许局长已调任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工商局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我父亲组织主持的。

在此期间，父亲能团结各党派的民主人士，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特别照顾年高体弱、有各种困难的民主人士，千家驹副局长就是例子。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已转变为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面对新的形势，党开始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改进进行探索。为利用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956年党提出了在一定范围内开放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包括农村集市贸易，也包括城市中的小商品市场。1960年后，又开放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为利用它们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消极作用，城乡市场管理便成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所以，1956—1965年间，父亲把他的主要精力都倾注在城乡市场管理上。他经常下去调研，召开各种会议，及时抓住城乡市场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并提出对策建议、代中央和国务院草拟相关文件，多次受到周总理和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副总理的表扬。

1963年12月至1964年4月，应西哈努克亲王要求，父亲受中国政府委派，率经济计划、财政、银行、农业、外贸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中国专家组，赴柬埔寨工作了4个月，受到柬埔寨政府的赞扬，西哈努克亲王还亲自给专家组成员授予勋章。1954—1966年10月，父亲为国务院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书记为李先念、副书记为姚依林）。

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常常从事理论研究，并发表了一些论文，对宣传党的政策和总结经验、推动工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也正因此，他在1958年受聘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1964年，曾代表国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被国内外公认为“著名经济学家”。1963年10月，父亲经过深入调研，给中央写了一篇《市场经济的阶级斗争分析》。周总理看后，转主席。毛主席亲自批示分析得好，推荐高级干部学习，并让《红旗》杂志转载，供全国经济战线干部学习、宣传。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直到1977年才被解放。1978年，国务院恢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父亲又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1981年2月27日，病魔夺去了父亲的生命。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赵紫阳、万里等同志送了花圈，薄一波、杨勇、段君毅等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本文源自《冀鲁豫儿女忆父辈》李春光主编，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 记战斗在冀鲁豫的我的母亲何挺

潘豫沙

其实，比起父亲潘焱，我的母亲何挺倒是土生土长的冀鲁豫人。她原名叫涂月英，字俊华，小名春梅，汉族，1924年2月24日（农历甲子年正月二十日）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的一个中医世家。参加革命后，为了不连累家里，她改名叫了何挺，是取“国难来临，何不挺身而出”的意思。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她的祖父。祖父名叫涂令阳，字绍文，祖籍江西省南昌市南门外郊区涂家岭，早年逃荒到了阿城镇，以乞讨为生，后被一个中药店老板收留，做了徒工。靠着勤奋刻苦，慢慢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医大夫，并开有药铺，是阿城镇上的一个大户人家。因为出身贫苦，老人家救死扶伤，给穷人看病拿药不要钱。又乐善好施，经常为乡里做些修桥补路、救济灾民的公益事项，深受乡亲们尊敬。更可贵的是，老人家思想开明，使得她从小就和男孩子一样能够上学读书。她的父亲涂怡君，字佃卿，大学毕业后因无门路找不到工作，失业在家。“七七”事变后，他关心国家存亡，积极支持一切抗日活动。她的哥哥涂世祺，1937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鲁西“肃托”运动中被错杀，1964年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母亲在镇女子小学师从王伯谨（中共地下党员）、杨耕心（中共地下党员），从小就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为以后走上革

命道路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一声炮响，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真正指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她的哥哥和他的同志们。1938年春，母亲14岁，在哥哥的支持下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战移动剧团，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剧团里，她们边学习边演出，走遍了村村镇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群众亲切地称她们“娃娃兵”。1939年，她来到冀鲁豫边区寿张县动员委员会，当时的任务就是大力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动员广大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男女老少齐心协力，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她们组织了妇女救国会，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反对封建压迫，争取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的道理，动员组织各阶层妇女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母亲也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人生观。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40年，还不到18岁的母亲，经路宾、侯淑平两位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春，母亲进入鲁西党校（后和冀南党校合并为冀鲁豫党校）学习。通过学习，她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要能过好“五关”：战场关、刑场关、法庭关、金钱关、美女关等，要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同时加深了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的坚强信念，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党校学习结束后，母亲回到寿张县，担任寿张县妇救会宣传部长兼六区妇救会主任，经常来往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发动群众，巩固和提高妇女们的觉悟，积极发展妇女党员，带领群众筹衣筹粮支援八路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曾多次遇险，都被她机智勇敢化解。

1942年，她经历了冀鲁豫抗战史上最残酷的“九·二七”大“扫荡”，经受住了这场血与火的考验。9月27日那天早上，她在小袁楼村参加县委会议，忽然自卫队长来报，说发现了敌人。县委书记高黎光马上终止会议，命参加会议的同志立刻组织群众疏散。母亲和村妇救会主任袁大娘为了帮助妇女、儿童疏散，走在了最后。这时，敌人已进村，她们来不及走了。为了不连累袁大娘，母亲决定和袁大娘分开走。袁大娘却一把拉住她往自家院子里跑。进了院里的个小屋，里面就只有一个土炕和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具，无处藏身。袁大娘急中生智，叫她躺在那黑咕隆咚的炕头上，再用棉被把她包起来，大娘自己则盘腿大模大样地坐在炕上装残疾。这小屋长年烟熏火燎，窗户像豆腐块大小，透过像萤火虫似的点光，屋子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大娘蓬乱的头发黑瘦的脸，像无事样坐在那里。母亲在被子里又闷又热，喘不过气来，心想，如果被敌人发现就跟他们拼了！死也不能当俘虏，更不能连累袁大娘！敌人在外面烧火做饭，一个汉奸进屋了，向大娘要碗筷，大娘平静地说：“我的腿瘫痪了，下不了炕，你们自己拿吧！”敌人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离开了，在袁大娘的掩护下，母亲躲过了敌人的魔爪。后来在村支书和其他村民的帮助下，她安全地转移了。离开老区多年，每当同志们提起“九·二七”三个字，母亲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小袁楼村袁大娘、村支书和村民的身影。在“九·二七”大“扫荡”中，有多少好同志和乡亲们牺牲在了日本鬼子的枪口下，母亲却在乡亲们的掩护下活了下来，她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1942年冬，在万里、边涛夫妇的介绍下，母亲同时任冀鲁豫军区第2军分区参谋长的父亲潘焱相识。母亲听了边涛阿姨的介绍。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也十分敬重父亲的为人。经过一段短

## 台前

暂的交往，他们于1943年5月结婚。婚后母亲离开了寿张县杭日根据地，到抗大陆中青年队学习。战争年代，女战士们除了要和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还面临婚后生育养孩的难题。她在生第一个孩子时难产，房东老大爷冒着被敌人发现的危险，半夜出村找来了隐蔽在外村的卫生队长，队长连夜赶来施行了急救，孩子总算平安生下，母女保全了性命。由于当时无法带孩子，就把她托给了一户奶妈，3个月后她去接孩子时，才知奶妈在给孩子喂奶时，不慎将孩子捂死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祸，她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历经生死好不容易生下的孩子就这样没了！面对老乡她又能怎样？她愣是硬生生地将这苦果吞了下去，没有任何责难，还照样付了孩子的抚养费，劝阻了村民们对那个奶妈的指责。村民们都称赞八路军，这使得她那伤痛的心里感到了莫大的安慰。多少年后，当我有了孩子，得知母亲的这段经历后，我才深深感受到母亲当时那深深的痛苦、委屈和无奈！她能做出那样的举动，又是多么不易，多么令人敬佩！母亲又是慈爱和大度的。解放后，她积极支持帮助父亲寻找寄养在浆水的父亲前妻厂虹妈妈所生的孩子，并亲自托人打听孩子的下落。父亲为此很感激她，敬重她。

1944年下半年，母亲随父亲调到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在随校政治部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母亲先后在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后勤部供给学校工作。在组织部工作期间，她与同志们相互协作，团结友爱，组织部严谨和谐的工作作风对她以后的工作影响很深，以至在后来几十年的人事工作中，都自觉忠实地执行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在后勤部供给学校期间，她任政治指导员，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兼任政治课教员。在政治课中，为加深学员对理论的理解，她采用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办法，和同志们一起，培养出一批政治思想好、业务能力强的干部充实到部队中去。

1948年，母亲跟随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进军大西南。就此，离开了战斗了10年的冀鲁豫根据地。

晚年的她，最钟爱的是1955年授予她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以及2005年、2015年分别颁发给她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两枚纪念章。每逢重大节日、参加重要活动和她的生日，她都要穿戴整齐并佩戴上它们。它们是她战斗一生的见证和荣耀。

冀鲁豫，是生她养她的故乡，是她参加革命和战斗的战场，也是锤炼她革命意志的大熔炉。在这里，她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里，她找到了培养她教育她的党组织；在这里，她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这里，她也找到了和她志同道合、相濡以沫、挚爱一生的革命伴侣。她永远忘不了这片热土，她永远热爱着这片热土，她永远属于这片热土，她永远是冀鲁豫的好儿女。

（选自《冀鲁豫儿女忆父辈》，李春光主编，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 我的父亲曹华亭

曹景山

父亲曹华亭，台前县杨岗村人，1917年出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阴历10月解放寿张城时牺牲。

父亲当年高级小学毕业。算是有文化的人，写一手不算差的毛笔字。在寿张城西北的马庙村当小学教师，教学期间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张贴党的宣传品。据我母亲说，她有时替父亲张贴宣传品，把宣传品用别针别在袄里子里边，父亲见没人时抽一张贴在墙上、树上等处。一次活动中，我父亲被日伪军发现，他赶快逃离。日伪军朝他们开枪射击，我父亲腿部受伤，子弹从腿肚子进去，钻进腿弯里。当时医疗条件差，无法取出，伤口长好以后，子弹头就落在了腿弯里，走路远了腿就痛。

父亲在马庙村教学期间，经常给学生讲共产党、八路军的事情，被城里的日伪军发现，以共产党嫌疑被拘捕，在押期间受尽了酷刑。除严刑拷打外，灌凉水、灌辣椒水，灌昏迷几乎死去好几次。据说灌昏迷以后，日伪军再用脚踩肚子把水踩出来，这种酷刑反复好几次，我父亲就是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严刑拷打，把身上腿上很多处打烂，这是腿弯子弹处也被打烂了。他在牢里偷偷用手把子弹抠出来，塞在墙缝里，这样，我父亲也不承认是共产党员。这种酷刑还不算，日伪军还押我父亲去刑场陪绑，与死

刑犯一块押付刑场，大洋刀押在脖子上，说承认了共产党可以不杀头，实际上如果承认了共产党当时就杀头。在刑场上我父亲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结果别的死刑犯叫我父亲眼睁睁看着把头砍掉了。当时的惨境把我父亲的心情折磨成什么程度，真是难以想象。

就这样，没有证据证明我父亲是共产党员，日伪军给我父亲提示，如果当下给皇军做事，可以放出去。这时党组织正需要有人派进日伪军内部去做工作，经地下党组织同意，我父亲就进入日伪军内部，表面是当了汉奸，实际上是地下的共产党员。据说与我父亲直接联系的是杨翠民，杨翠民当时是敌工部长（后来到国防科委工作，每次从北京回家探亲，都到我家看望我母亲）。据说杨翠民给台前提供过我父亲的有关在地下党做工作的情况。寿张县敌伪军的有关情况汇报给杨翠民。（据说杨翠民是寿张县地下党的联络部长），有一次由我父亲提供情报，地下党组织截获日伪军运送的粮食等物资好几次。我父亲经常让我母亲帮他张贴共产党、八路军的宣传品。这期间与我父亲联系的还有赵新亭，赵新亭有时候到我家找我父亲，天黑了、晚了走不了，为了安全，他与我父亲不在家睡，他俩就一块到场院地边用高粱秸秆搭建的草屋里去睡，我母亲说，那时赵新亭送我父亲一支钢笔，那时候都是毛笔写字，钢笔可是稀罕东西。（据说当时赵新亭是寿张县地下党的公安局长，解放后，赵新亭任聊城专区正专员，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与我父亲联系的还有闫茂亭，（据说闫茂亭是当时地下党的寿张一区区长，解放后任聊城专区公路局局长）。我父亲那时是寿张县地下党的地七区区长，我父亲就在台前的王楼、后方（南方）一带工作活动。与我父亲有联系的还有杨朝炳（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总后勤部行政管理局局长）。

1944年10月寿张县解放前夕，听说解放军要打寿张，日本鬼子撤退到阳谷准备坚守，让部分伪军守护寿张，当时确定由我父亲带一个小队守西门，地下党组织知道我父亲带队守西门，就确定进攻西门，指示我父亲配合，当时指挥解放军攻打寿张的总指挥是曾思玉（解放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当时城外解放军开始打炮后，时间不长，我父亲就安排人把西门拉开了，解放军很快就进了西门，当时为数不多的伪军听说西门失守，慌忙从北门、东门出城向阳谷方向逃跑了，很快解放军就占据了寿张城，没牺牲一个人。解放军的联络人员和地下党联络人员进城后，就找我父亲，一直没有找到，第二天，发现我父亲牺牲在了寿张北街宋建瑞家里，整个寿张县城解放就牺牲了我父亲一个人，还是派进敌伪内部的地下党员，负责守西门，开西门的曹华亭。当时说法不一，对我父亲的牺牲，有说汉奸开枪打死的，有说解放军误开枪而死。北街宋建瑞与我父亲是拜把子兄弟，据说我父亲便衣在他家，上他家去换掉身上穿的伪军装，就牺牲在宋建瑞家的西屋里，被击中头部。

我父亲牺牲后，当时很多人感到奇怪，说曹华亭是汉奸。解放了，共产党八路军都给他买又大又好的棺材发丧，都不知道我父亲就是党组织派进敌伪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

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母亲从我家西屋后墙处的墙洞里掏出了一些当时地下党发给我父亲的书、小册子等文字材料。我母亲不识字，我年龄小，那些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

我父亲的牺牲，原因是一个难解的谜，寿张县撤县以后，我从寿张县水利局调冠县水利局工作，当时的寿张县委宣传部部长肖道立被调到冠县县委任宣传部部长。到冠县以后，我与肖道

立部长（后任冠县县委副书记）经常见到。肖道立部长亲自对我说：“你父亲的牺牲是一个汉奸特务跟踪你父亲到宋建瑞家里开的枪，这个汉奸特务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期间在东北被捕捉，并在东北被枪决。”



**提供人：**曹景山（曹华亭之子，共产党员，冠县水利局退休干部）

**采访人：**田开沐、钱登文

**时 间：**2019年4月24日

## 吴忠勇闯三官庙

田道彬

吴忠是八路军八团干事，昆张支队队长，他去三官庙鬼子据点的前后都住在我家，当时我十五六岁，对这件事记得比较清楚。

当时我们一带，东边的接泊浪、西杨庄，西南边的三官庙都有日本鬼子的围子（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很少，多数是汉奸。三官庙据点住着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中队，中队长田道林是我们田庄的，说起来还和我们是一家。他和我伙着一个老爷爷，他爷爷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就他老兄弟两个，我的爷爷过继到前边来了，这样算，我和田道林是堂叔伯兄弟，只是远一小步，我们两家住前后胡同。

吴忠原先在黄河南梁山（当时属于寿张县）一带活动，他通过我的表姐（我姑姑的女儿，当年姑姑一家闯关东，女儿年龄小，临走前托付给我母亲，是母亲把她抚养成人后，并嫁到黄河南陆那里，来往走动比较勤。）了解到我们家和田道林的关系，想通过这一关系，进入日伪据点，争取田道林反正。

田道林当时四十多岁，长的也不怎么样，就是有种。日本鬼子来以前就在阳谷县监狱里坐了好几年，当时他胆子比较大，不大干正经事，被县政府抓住，但骨头茬子很硬，打得不轻，但硬是没招，关了几年放出来了。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实巴

脚的人没法混，老百姓没法活，撬门架户的老缺（暗的土匪）很多。他当时在我们这一带也是比较有名的。日本鬼子来了后，就找这样的人，沈大鼻子（汉奸大队长沈广训）多次派人来叫他，并委派他到三官庙围子里当了个中队长。汉奸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多数是好吃懒做的，胆子比较大，混口饭吃。

吴忠到咱家，把这事给你爷爷一说，你爷爷二话没说，说：“行，让道美（田道美，47年参军后来随解放军南下，淮海战役负伤留在安徽蚌埠，1982离休回家，2008年去世）领你去吧！”道美是我三哥，比我大三岁，他胆子比较大，到梁集赶集里经常拐到围子里找田道林，和围子里的汉奸也面熟。

第二天吃过早饭，三哥就领着吴忠就下去了，村子到三官庙也就三四里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到了围子门口，门口站岗的两个伪军认识你大爷，也不怎么盘问。见吴忠面生，当时吴忠也穿咱老百姓的衣服，就问：“这个是谁？”

三哥说：“是俺河南的一个亲戚，来找道林哥有点事！”

一听是中队长的亲戚，两个伪军点头哈腰，也不细查，挥挥手，说：“进去吧！”

两个人就大摇大摆地进去了。吴忠边走边观察围子里的情况，当时围子里驻着鬼子的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三哥路熟，领着吴忠直奔田道林住的院子，院子门口也有两个放哨的，一个进去通报，不一会田道林出来了，看见你大爷领着个陌生人，他也搞不清是干啥的，是亲戚？没见过面。是八路？也忒大胆了吧？满腹疑惑地把吴忠和三哥让到屋里。把其他人支走，随手关上门，声张虚势地问道：“你们来做啥？”

吴忠不慌不忙地坐到太师椅上，不等三哥开口，反问到：“怎么，亲戚来了，也不给倒杯水啊？”

田道林一看来头不小，连忙倒水：“请喝水！请喝水！”

吴忠自我介绍说：“我是昆张支队队长吴忠，今天来的意思想必你也明白，就是想告诉你，小鬼子是秋后的蚂蚱，日子长不了啦，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不要再死心塌地地帮日本人做事了，要为自己想条后路！”

田道林连声说：“好，好，一定！一定！”

吴忠一看该说的都说了，时机了也差不多了，就起身说：“走吧，送我们出去吧！”

田道林一听，如释重担地说：“好，好！”原来，从吴忠一进门，他就高度紧张起来，他既担心日本人知道了，说他私通八路，饶不了他，同时也怕吴忠出事，八路军要找他算账。他赶紧说：“好，好，我送你们出去！”当时，十几个日本鬼子就住在隔壁的院子里，谁也想不到八路军的干部有这么大胆，并没发现什么异常。

田道林亲自把吴忠和三哥送出围子，出来大门，走过吊桥，田道林对吴队长说：“吴队长，你先行一步，我给我兄弟说句话！”吴忠说，“好！”便先往前走。

三哥停下来，田道林比三哥大二三十岁，三哥当时也就二十岁左右，田道林压低声音，恶声恶气地说：“你瞎掺和啥？再敢领他来，我先打死你！”说完不等三哥说话，便扭身回去了。

等三哥赶上吴忠队长，吴忠说：“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他给你说的啥，他准是吓唬你，不让你领着来！”

你大爷惊异地说：“吴队长，你怎么知道的？他就是这样说的。”

吴忠说：“我能看出来，他老奸巨猾，没诚意，难争取！”  
(后来田道林果然没有被争取过来，但自从吴忠警告他以后，田

道林收敛了许多。日本鬼子投降后，他投靠了国民党，参加了还乡团，经常在黄河以南行动，残害农会干部，后来被寿张县人民政府逮捕枪毙，尸首也没拉回家。被枪毙的原因主要还是残害农会干部，这是后话。）

回到家，也没多说，吴忠就住在了田庄。第二天，父亲让我背着粪筐，从中张经李文彩，把吴忠队长送到了梁集，吴忠安全回到了昆张支队。

（田道彬口述，田开沐记述）后记，我曾问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老人记不清是那一年了。据王定烈回忆录《沧海一粟》“昆张支队”一节记载，“同年（1942年）冬天，冀鲁豫军区党委决定派八团营长吴忠和工委书记邵子言、特派员管学思等，带领小部队（四连）化装进入昆张地区活动。”我翻阅县志资料，据一九九六年编写的《台前县志》（上）大事记，记载，“1942年10月，八路军成立昆张支队，支队长吴忠，政委邵子言挺进我县敌占区活动。是年，张秋县抗日政府于夹河一带建立武工队。”第230页记载，“后来根据上级指示，张秋县基干大队编入昆张支队。吴忠为支队长，杨朝炳为付支队长。”据一九九六版《台前县志》（上）第231页第十六条“一夜拔除数十座据点”记载，“1943年6月，为了保卫麦收和反“蚕食”斗争，二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率八路军教导三旅第八团和吴忠率领的昆张支队，一夜之间，把昆山、张秋地区的二十多个据点全部拔掉，俘虏伪军一千余人。我县内的姚邵、马庄、郑三里、西杨、接泊浪、汪庙、孙口、王楼、西官路、三官庙十座据点也一扫而光。大小头目全部被捉，日伪三区区长赵溪事前离三官庙潜逃至寿张城内，四十五名伪军交械投降。”明确记载，三官庙据点被拔下，是在1943年的6月，这样看来，故事发生应在1942年冬天以后，1943年的6月之前。

## 李月贞冲破枷锁闹革命

王德生

李月贞（原名师月贞），山东省寿张县师庄村（现台前县打渔陈镇师庄村）人。参加革命后，为了不连累家人，她的舅父李执再给她改名李月贞（随姥爷姓）。在当年我们寿张县境内，她是一个为数不多、积极参加八路军抗日的女性。

2014年的一天，在一次聚会上，我有幸结识了李月贞老前辈的娘家侄子，并互相加了微信。他曾经看过我写的一篇关于冀鲁豫抗战史的文章，知道我是老革命的后代。随后他给我讲了他姑姑李月贞的故事。他的姑姑李月贞也是个老革命，是因为旧社会被地主逼婚，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喜悦地告诉我说：“李月贞姑姑还健在，现在天津。”并且给了我李老前辈的联系电话。第二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拨打了李老前辈的电话。不一会儿，电话就接通了，里面传来老人家洪亮的声音。我给老人家问好后，说想采访她，老人家就热情地和我聊了起来。

那是1943年的秋天，李月贞刚满17岁，她的父亲就给她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邻村的大地主，有钱有势。当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娶妻必告父母，非媒不娶。”在人们的思想中，媒人是男女双方沟通的唯一途径，“双方非媒不知名”，俩个人非但不能见面，更谈不上有任何感情上的交

流，这就是旧社会的包办婚姻。这种陈规陋习的缺陷显而易见：两个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的男女，却要完全按照父母的意愿生活在一起，这样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婚姻不大可能是幸福的。

秋后的一天，结婚的日子到了。按照当地的风俗，在喜庆的乐曲声中，心怀忐忑的李月贞坐上了迎亲的大花轿，来到了邻村的地主家。拜完天地，入了洞房，揭开红盖头，李月贞才第一次看见了女婿的模样——原来是个长相丑陋的残疾人！这时李月贞的心彻底绝望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就蒙头大睡。送亲的人劝解她说：“闺女，这就是命，你是命该如此，你就认命吧！”到了晚上，李月贞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烦闷。她心想，这就是我一生的命吗？我就要和这样的一个人一起生活一辈子吗？那个新郎早就呼呼大睡了，她独自一人在屋内徘徊，一会怨恨父母无知的决定，一会又想，只有逃跑才能摆脱这个万恶的地主家庭。当天晚上李月贞想了许许多多，跑了以后对娘家人如何交待呢？估计也不会得到娘家人的理解和原谅。以后的命运又如何呢？一切都是未知数。在当时那个旧社会，如果一个已经结婚的女人逃跑了，无论何种原因，人们都认为是大逆不道。

午夜后，李月贞终于下定决心，无论什么结局也得逃出这个令人厌恶的人家，先去姥姥家躲避一段时间。五更时分，她跳墙逃出了地主的院子，出了村庄向黄河南郛城县方向走去。她提心吊胆地在漆黑的夜色中独自行走，怕得要命。也不知道走了多少的弯路，黎明到来时，她来到了黄河岸边渡口。此刻她生怕地主家人追来，慌慌张张地上了一条木船过了黄河，向着姥姥家的方向奔去。

中午十点，她终于来到了姥姥家。她哭着和姥爷姥姥说明了逃跑的真正原因，姥姥心疼外甥女命苦，也陪着她哭哭啼啼。

晚上，李月贞的舅父李执再回到了家，他知道了李月贞的一切遭遇。经过慎重考虑，李执再问她：“你愿意参加八路军吗？”说实话，在当时，李月贞并不知道八路军是什么组织。只听说八路军打日本鬼子。于是，舅父李执再给她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领导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李月贞听到这里，激动而坚定地说：“我报名参加八路军。”舅父说：“你参加八路军我们欢迎！但是，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随时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于是，李月贞向舅父表示：“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她的舅父李执再同志已是地下党员，第一任八路军寿张县抗日七区区长，他是李月贞同志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次日上午，舅父带着李月贞来到了寿张县黄河北岸抗日七区驻地——清水河附近的王庄村。李执再同志给后任抗日七区区长王正霆讲，这女孩是我的外甥女，她要求参加我们八路军。王正霆区长连声说，好啊好啊，我们欢迎你！这时七区妇救会主任吴燕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她。从此，李月贞同志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通过吴燕同志的教导，李月贞同志参加了妇救会及抗日联合会组织。她白天工作，夜间学习文化知识，参加各种妇女会议，再次提高了对马列主义思想的认识，树立起抗战到底的决心！认清了党的性质和任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她经常去七区各村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担任七区妇救会宣传委员。

不久，我第二次电话采访了李老前辈。她告诉我：“1944年冬，我调到侯庙抗日二区工作，同年入党。在二区工作时住在侯

庙镇南孟楼村、东碱场村。因为日伪军经常来扫荡抓捕我们的地下工作者，有时我们夜间也转移到马口村住。在抗战时组织参加妇女工作会议，经常去冀鲁豫军区范县抗日中心区开会，因为我工作积极还登过冀鲁豫军区的抗战报呢。领导对我非常信任，让我担任侯庙抗日二区妇救会主任。我做妇救会工作时，经常跟着男同志下乡村。有时我自己穿便衣去各村发动妇女参加抗联，发展各村妇女党员。我在侯庙二区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负责动员二区各村妇女制作布鞋、衣服，支援八路军多打胜仗。”

我问李老前辈，你现在还记得你的革命战友吗？她说记得几人：有七区的王区长，妇救会主任吴燕，还有杨杰三同志。侯庙二区的工作人员有赵广代、王子玉和王鲁光区长。也认识区小队的张清洲（苗口村人）。王之信同志也经常来我们二区，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个村的人。李老前辈的记忆力真是惊人，说起几十年前的事情如数家珍！1948年初李月贞在侯庙二区孟楼村孟宪保家与二军分区后勤干部林海天结婚。1949年10月，李老调平原省军分区后勤工作。1953年2月，随丈夫调北京军区空15师后勤工作。李老说：“我和丈夫到北京工作时，在火车站巧遇杨杰三同志，他身穿公安制服，正在火车站广场指挥着什么。我给他打招呼，他却专心工作没有看见我。随后，杨杰三同志和几名公安人员就开车走了，一定是去执行任务。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1965年，李老调任天津市红桥区医药公司党委书记，副县级。

李月贞老前辈从一个农民的女儿，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者。她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在抗日烽火中锻炼成长。她勇敢地抵御了旧社会的陈规陋俗，她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屈辱与抗争，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王德生，字大堰，男，汉族，1963年10月生于寿张县东王坊村人。革命家庭，1980年11月参军，中专毕业，党员，1985年转业至烟台市同发木业有限公司经理。热爱革命历史研究，尤其是冀鲁豫边区抗战史、解放战争进军大西南和冀鲁豫边区南下干部的历史。

## 崔子平的抗战故事

崔秀云



崔子平，1920年5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沙湾村（现属河南省台前县）。自幼爱好武术和文学，早年投身革命。

### 一、播下抗日的种子

他出生的那年秋天，黄河在枣包楼决口，滔滔洪水，浊浪排空，无数的村庄被洪水吞没，家乡成了泽国。为了谋生，刚过百日的他就被其父母揣着“闯关东”。他们在哈尔滨滨江县定居，刚开始靠卖大碗茶为生，后来卖烟酒糖茶、轧面条。九岁入滨江县立第九小学学习，过上了还算稳定的生活。

“九·一八”后，生意萧条。1931年初冬随父母协同老乡乘客车回故乡。到家一个多月，就听到了日寇占领哈尔滨的消息。哈尔滨是他曾经生活了十一年的第二故乡。那里是他留下最美好的童年记忆的地方，那美丽富饶的第二故乡被日寇抢占，被日寇践踏，对一个少年的心灵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创伤，那时就播下了长大后要参军打日本、杀鬼子的种子。

### 二、参加抗战初期工作

1937年毕业于山东省第二中学（在聊城），时值“七·七事

变”。黄河在寿张王集决口，洪水滔天，村成孤岛。灾民只好吃水淹庄稼，喝黄水。霍乱、痢疾流行，阴雨连绵又逢菏泽七级地震波及故乡，房屋坍塌。日机轰炸寿张，聊城炮声隆隆。他的母亲在炮声中忧病交加不幸病故。秋末，倭寇攻陷聊城，专员范筑先殉国，次子范树民（崔子平的同学）在齐河与敌拼杀，壮烈牺牲。

天灾人祸，家仇国恨摧残着他。他愤然写到：“极目百里外，滚滚烟尘扬。烧杀复抢掠，倭寇何猖狂。中华男儿血，誓死洒疆场。为国宁捐躯，与城共存亡。”

1938年春，崔子平考入东阿县抗日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分配东阿二区五里乡抗日自卫团任政治委员，训练仅一个月县城沦陷，训练停止。他和汪之平（汪浩，即汪洋的二弟），陈伯平一起组织宣传抗日演讲会，号召群众参军参战，动员当地民众、保家卫国、抗击日寇。

1938年11月，考入国民政府军委会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当时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陈诚、副主任周恩来），编入四支队驻郓城赵家楼。平时学习军事、政治，战时配合主力部队对日伪军作战。曾参加了赵家楼、肖皮口、潘溪渡战斗。1939年夏，日军突袭政治大队，政治大队受重创，死伤多人，与上级失掉联系，队员分散回故乡。

### 三、参加八路军、英勇抗战

经过两年的亲身经历，让崔子平看到了国民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组织上的无力，军事上的无能。要抗日成功，国民政府是靠不住的。

战场的血腥，部队的惨败，并没有动摇他抗日的决心，反而更坚定了他坚决抗日的意志。1939年9月通过统战关系，谒见汪洋同志，聆听了共产主义真谛，阅读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毅

然参加了八路军。先是在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治部，汪洋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选送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9年12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陕入鲁，与山纵军政干校合并为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他编入分校第五大队兼任课代表。

1940年1月初，抗大一分校在山东省蒙阴县岸堤村举行开学典礼，全校师生齐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歌词象千斤重担落在他的双肩，责任感、自豪感，百感交集。

### 抗大即事

敲开冰层饮战马，围坐山岩议兵策。

雪夜奇袭挫敌锐，旭日凯旋唱校歌。

当时山东还是一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不久，而且处于日、伪、顽势力包围中，“扫荡”与“反扫荡”，磨擦与反磨擦，战斗频繁。学校经常处于备战和实战中。山坡、沙场即是课堂，膝盖当课桌，背包当座位，左臂揽枪，右手握笔，课本是油印的小册子。政治课学习马列主义、抗战理论、军事课除系统的学习军事理论外，还配合主力部队参加实战，并研究和总结敌后游击战争的经验。平时以大队为单位集中上课；战时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学习；有时还派出观察哨、游动哨到“据点”周围监视敌人，掩护学员安全上课。学员的枪支很杂，有国产“汉阳造”，也有日本“大盖”、德国“套筒”、俄国“水连珠”……。

因革命形势急需，他那批学员于1940年8月提前毕业。崔子平在抗大学习不到一年时间，但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是难得珍贵的。通过在抗大的学习，他的军事政治素质得到了全面提高，对抗战局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更加坚定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

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部队三团政治处任连级干部。同年秋，在三团一营参加石家岭战斗。天明前，他们在泰新公路石家岭下埋好“拉雷”。拂晓三辆日本军车经过此处，他们拉响“拉雷”炸翻军车；埋伏在石家岭山神庙的战士，居高临下齐甩手榴弹，将三辆军车和鬼子全部“火葬”，我军无一伤亡。他回政治处作诗一首如下：

### 石家岭伏击战

拂晓伏击石家岭，屏息瞠目待寇兵。

榴弹饱饕不速客，缕缕鬼魂返东京。

1941年春，调一一五师一旅政治部文书股任副股长，因工作突出，获师政治部“八一”奖。1941年11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五万日军扫荡沂蒙山区。11月7日夜袭山东纵队政治部（驻马牧池）。宣传部长刘超突围牺牲。我军战斗部队已转战敌后，一旅政治部化整为零，文书股人员分散垛庄一带。11月9日晨，崔子平从西面上山瞭望敌情，恰巧敌人从东面上这座山，他到山顶，敌人才到山腰，他隐蔽好，当与敌人相距20余米，他对敌人急甩两个手榴弹，鬼子卧倒，他乘机下山。不大会“六五”枪弹打得石头冒火星，幸未打中，乘山下有雾，转移到北边大山洞中。那山洞是牧童的卧羊洞。外洞十余米长，是卧羊的；内洞一米多长，是牧童的“卧铺”，两洞中隔1米高的石墙。“卧铺”下层是泉水，中层是鹅卵石、上层是山草。从山洞口向南遥望，可望到他和鬼子遭遇的那个山顶插着“膏药旗”，两个鬼子站岗。他只好在洞内昼伏夜出。半夜爬上梯田扒地瓜吃，回洞饮“矿泉水”。一天夜间他酣睡乍醒，觉着头顶有动物拱耸，一拳将它打跑。他身穿单衣，盖破大衣，枕石头，听“高山流水”，又进入梦乡。12月中旬鬼子飞机绕南山顶“膏药旗”旋转，又打了一阵机枪。12月下旬

一个早晨，洞外飘雪，洞南有马蹄声，他窥见一队鬼子向东走，还抓了两个民夫带路。黄昏又见那两个民夫返回。崔子平向他们打招呼，他们说：“鬼子都滚蛋了！”次晨他踏雪奔南山，走了80余里，在天宝山找到原部队。先换上新棉军装，再听首长讲：“这次日军扫荡沂蒙，我主力部队转战敌后，拔除日伪据点，敌人死伤过半，在山区扫荡的日军，也有伤亡。反扫荡胜利了！”为庆祝胜利，庆贺新年，晚上召开军民联欢晚会，有高跷、秧歌、山东快书。第二天全体指战员举行团拜。1942年秋，崔子平调山东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文书股。不久得悉汪洋同志壮烈殉国，当即由沉痛陷入痴迷。1945年秋，日寇投降，他到莱芜县吉山钓鱼台参加了当地党政军民纪念汪洋烈士殉国3周年仪式，并写诗二首。

### 悼汪洋烈士

赫赫神威震鲁中，吉山战斗陨将星。  
钓鱼台上风雷夜，耳畔犹闻冲杀声。

### 吊吉山烈士墓

哨兵巡五更，晓风报枪声。六路成铁壁，倭寇已层层。  
拼搏与恶斗，白刃尽染红。碧血洒丘壑，杀声撼九重。  
冲杀突围战，百死余一生。吉山汪洋台，志士墓丛丛。  
一部抗战史，英烈血凝成！跃身掣龙泉，起舞歌大风。



崔子平，1920年5月4日出生于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沙湾村。1982年4月，任台前县政协副主席，1990年离休。2010年2月逝世。

1938年参加革命，1940年抗大毕业。曾任政协河南省台前县委一至三届副主席兼县志总编。著有《萍踪集》《万紫千红》。作品入《中国国际文学艺术博览》《中国诗词作家辞典》等。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世界人物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2005年在“环宇杯”“天籁杯”“金爵杯”诗词大赛中全获金奖。2005年8月，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金质勋章一枚。2006年5月在第三届“中华颂”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中获一等奖。同年7月获首届“中国文艺杰出成就奖”；并授予“中国文艺终身成就艺术家”荣誉称号。

## 我的抗战岁月

郭文明

### 革命启蒙

我是山东省寿张县十五里园杨武龙村人，现在阳谷县十五里园乡郭家庄。当时是贫农，家庭生活困难。

当时，老人（父亲）是这么说，为了家庭生活的改善，就是饿死也要去做，我们就是再困难也要让你们去上学，有了文化以后，你们也要去当先生，本人的生活也好了，老人也能跟着你们沾点光。老人（父亲）兄弟三人，当时我二叔、三叔都是给别人家扛活，受别人剥削，吃了没文化的亏，他们主要也是受这方面的刺激和影响。

我们情况是，兄弟两个上学，大哥当时上学是写的，我是读的，只读不写。当时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写字花费比较大，需要买笔墨纸张，纸张比较贵，就让大哥先写，他写完以后，再给我用他写过的纸张来写，我就在他没有写完的缝隙里写，有时候给我一个石板一支石笔在上面写，所以也写不好。大哥学习认真，毛笔字写的非常好。我上学到四年级是初级，也就是初小文化程度。从9岁到14岁的情况，就是一边参加农业劳动，一边上学，家中有7、8亩田地，两家合伙用两头小牛耕田，我负责割草喂

牛。你二大爷劳动不能上学，他不认识就问我们，就看我们的书本、作业本，在家自学。

1937年底，我和大哥在学校学习，就有了地下党，地下党那个时候，就到我们的学校去，去找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老师是做宣传工作，发展地下党，从学生里面找积极分子，动员我大哥参加地下党，第一就动员的是我大哥。当时那个地下党，是阿城人，阿城离我们家18里，当时有民间剧团，叫两夹弦，他就是利用这种演员的身份来做宣传。我们上学的地方是杨堤口，不远处就是田堤口，那个地下党和剧团就到田堤口去演出，那个村子大，比较富裕，有粮食，请去演出需要7、8天的时间，做地下党工作的人就是在阿城，那里成立了解放区，解放区也拿出粮食来给剧团去演出。

当时你大爷要到田堤口去开会，都是秘密的去，不能公开去，有时候老师就通知。大哥晚上到田堤口去开会，离我们有半里路要经过老师家。老师家种西瓜那里有个瓜棚，白天老师上课，晚上就去瓜棚看瓜。他在瓜棚的时候就让我大哥去他那里，我们离他那里有三里路远，大哥一个人去自己有些害怕，就让我陪着他一起去给他做伴，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事，我就这样一次、两次，去的次数多了，经常听到他们谈话，漫漫的就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

## 参加抗日

1938年，日本鬼子来中国，地方就开始乱了。抗日英雄范筑先是聊城专区的一名专员，国民党专员，为抗日，范筑先发展了30多个支队，一个支队有几百人，后来发展到有几千人的武装队

伍，抵抗日本人。我们村是三县的交界处，那时地下党的活动，也是在两县的交界地，或者说是三县的交界地活动，不敢靠近县城太近了，县城里面是地主，他们都有团队、都有武装，统战不了他们。1938年春，咱们地下党开始成立武装队，成立了武装游击队，大哥参加了阳阿游击大队，那个时候家庭生活也很困难，也没有什么吃的，日本鬼子一到，学也上不成了。

1938年，我就跟着大哥去参军，也去了阿城，从张秋到阿城有18里，在我们村的正北，那个地方也是三县交界处，阳谷、聊城、东阿，游击队在那里活动。我第一次参军，就是在那个地方，开始参军时，条件非常困难，什么都没有，只是能有口饭吃。吃饭也是开个条要馒头吃，要白面，要花生油几斤，菜多少，都写在这个条。就到村里去要，不给送来就派兵去要，当时地主家有枪，发现地主谁有枪，就给他们要，地主家也有步枪，手枪都有。1938年，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没有当过兵，我的年龄也就有14、15岁，当时我是供记员，吃饭的时候去领碗肉，领饭，有多少人就要记上，领了多少东西，发多少东西，需要写个条记住。因为当时认识字的人非常少，就让我来当供给员，我负责开条子给哪个村要什么，冬天就要被子，就给专富户要，地主有钱，也就是几十元或几百元，要的钱也非常少，要了钱就是用在及个别情况上。1939年，（日本鬼子）就开始把阳谷、寿张都给占领了，县城都给占领了，所有没占领的就是农村。

1941年，为了活动方便，成立了张秋县，张秋县是以张秋镇为中心，三县联合交界处，阳谷、东阿、寿张，成立了张秋县，成立了抗日政府。那时候县城有汉奸、鬼子，当时八路军就在县的边远区搞活动。1941年，张秋镇成了张秋县以后，我就从阳谷的游击队调到张秋县，成立了联防大队，联防大队也不是正式的

武装，是脱产的民兵。

### 突破合围

到1941年冬天，张秋县的环境就更加紧张了，敌人就想集中兵力，把张秋县的解放区给吃掉，想把抗日给搞垮，这几个县里就开始在县的周围集中修据点，一步步的来缩小范围。1942年日本鬼子大扫荡，在华北地区，日本鬼子集合了3个多师一两万人，他们重点是想把华北地区所有共产党活动的地方，都要给消灭了，他们的任务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要日本鬼子来完成。我们这个张秋县政府是受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冀鲁豫是河北省的南半部，山东省的鲁西，河南的豫北，河南就是现在的新乡一带，黄河的以北，河南的这几个地方，成立了冀鲁豫边区，到了后来又进一步扩大晋冀鲁豫边区，就在山西的东南部一带，划了一个大军区，大军区就是邓小平、刘伯承来管理这个大军区。当时是归他们管理，冀鲁豫是下边的一个小军区。1941年，那个地方的解放区是范县、观城、鄆城、郟城他们的边远区，咱们的冀鲁豫边区就在那一带活动。那一带是敌人的心患，咱们张秋县是冀鲁豫军区的边上，咱们紧靠东边，也是当时日本鬼子要消灭的一个重点。敌人采取一个“铁壁合围”的办法来解决，也叫“拉网战术”，就是把网撒下去之后，再拉网的那个意思，土名就叫这个，他们就在咱们这个敌占区的边上，用兵力一下把这几个据点给包围起来了。1942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包围起来了以后，就开始20米到30米的距离，就有3到5个日本人拿着小旗，一拉就是几十里路远，都是日本鬼子拉的，一看就让人害怕，一路都是日本旗了，从两边往中间赶，当时八路军发现敌人从西北来了，

咱们就往东南跑，这边的就往那边跑，跑着跑着就集到一块去了。“铁壁合围”当时受最大困难的就是昆山县，咱们张秋县南边紧挨着昆山县，现在万里的家乡，我们那个时候，万里是冀鲁豫第二专区组织部的部长，所以敌人当时要消灭的是昆张支队，就是昆山、张秋、东平、汶上这四个县的八路军都要消灭。第一天，刚开始昆山县遇到的困难非常大，因为没有经验，他们是从东南来的要向西北跑，当时昆山单独的一个山，都认为站在山顶高处应该安全了，最后让敌人都给包围到那个山上了，昆山县的县长、县委书记都给包围到那座山上，最后都没有跑掉。咱们张秋县还是比较聪明的，这个时候就开始县委成立了一个敌工部，敌工部下面有个敌工站。我当时是19岁，我的工作就是敌工站站站长，专门搞情报，给政府部队报告情况，在前一天下午，寿张县伪乡长他是两面派，他既听日本鬼子的，又听八路军的，他就给我报信说，不好啊，有可能明天日本鬼子就要进攻张秋，要早做准备。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到县里回去报信，要做好第二天的准备。当天晚上我就回家了，咱们村就是游击区，敌战区的边远，区里就开始集中在一起，把县里的村民都集中在一起想跑也方便，有三百多人，包括区委、区政府，县委、县政府，都集中在一起。当时，你二大爷在县基干大队是大队长，有他在那里我们也就不用担心了。

## 敌工策反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要是做地下工作。敌军工作部的重点，是要打入敌人的内部去，要钻入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我的工作是在敌人心脏的尖兵，是在最前线，要和敌人

生活在一起，不然怎么叫钻入到敌人的心脏呢！从1941年开始到日本鬼子投降为止，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有个汉奸中队长，我认识他，就让我去给他做工作。当时，我就想他能听我的吗？要是不听又该怎么办呢？当时，汉奸队就在张秋镇的三条街，第三条街上有个药铺，那个开药铺的和这个中队长是一个村的，离他的药铺也比较近，给他是老乡，我就让开药铺的先生把他叫了出来。由于我们都认识，一见面就知道，我们一起谈谈，我就对他说，我们的部队就在附近，已经做好攻打你们了，你们不要一直抵抗，还是投降吧。他们当时北门是两个中队，一个中队有一百二、三十个人。他说另外一中队长不投降怎么办？我说你就不要管他了，然后他就给我讲起条件。第一、我投降后要把我给放走。第二、他有一颗枪要自己保留。这种情况当时无法答复他，我说要回到指挥部上报之后，再回复他。当时我们这边的指挥部说，他要是真投降不反抗的话，我们也可以答应他的这些要求，然后我还要再回复他去。

另外一个中队长姓刘，是宋朝龙的拜把子的兄弟。他（宋朝龙）做工作应该不成问题，就让他去说，告诉他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投降被抓住就要枪毙，为了挽救他的兄弟，他一定会去做工作的。刘队长当时说，看看到时候压力大小再说，也没有给明确的答复。我回去把这些情况向指挥部汇报之后，指挥部说好，我们就给他们点压力。

最后，我们开始组织进攻，先打西门，后打北门。先打西门城多的碉堡，西门住着一个分队，是一个小分队，住着一个排有30多个人，就先打这个地方，夜间两点开始直到天明还没有打下来，部队已经牺牲了2、3个人了。这时部队就急了，当时他们的部队就在炮楼的下面，都是住在老百姓的家。老百姓那里有张秋

镇的敌工部，武工队就配合我们攻打他们。我当天晚上住在刘园的姥姥家，离张秋镇有2、3里路，第二天说要打仗，我一早就赶到了，我到现场去。那里有个西关，到的时候，西关都已经封锁了。张秋镇二区中队，他认识我，他就说让他们投降可以，要有认识的熟人，就让我进去给他们谈判投降。当时城墙比较高，让我先进去谈判，我怎么进去啊！在我离城墙有五十多步的距离，他们就看到我去了，也不给开门让进去，而是把我拉到城墙跳过去的，单身一人进去，说不能再打了，再打我们就不放你回去了。我说你们不能打，交枪不杀，既往不咎。谈完后把我又放了出来，我找到八路军，给连长汇报之后，他又给上级领导请示，最后答复了他们的条件。我们要利用那个地方好打北门，因为那里是个至高点靠大门，当时就想让他们抓紧时间给我们把地方给让出来，有利于攻打。我又返回去，给他们说限15分钟的时间整理完，他们把枪交了，这时西门解放了。西门一投降，就开始攻打北门，不给他们点压力他们是不投降的。咱们部队又缴获日本小山炮，当时一个分队有两个班，一个班住在城西边，这边一投降，那边的他们也跟着投降了。下午两点，开始攻打的时候，就把日本小山炮架在城楼上打，第一炮打过了，第二炮打偏了，第三炮没响，第四炮炸了，自己制造的炮弹，共有10多枚，也不敢再用了。团里领导说咱们已经快没有炮弹了，还是做政治工作，不用炮弹就做思想工作。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开始做工作，又跑到北门下面，离碉堡不到100米的距离就是老百姓的家，我们就开始喊话了，让中队长出来，他说什么也不出来，非让要让我到他们院里去了。当时情况比较困难，有任务怎么办，时间不允许多考虑。我就做好进去谈判的准备，据点那里有个大门，我就去大门口，大门面向南离我们的距离有300米，就有个治安营，这边一开

门，那边就能看见了，机枪扫射，非常危险，看到就开始打，面临这样的困难我们怎么办，为了党的利益，我只能这样做了，快到门口时我就蹲下身子往里走，他们又开始机枪扫射，低了他们打不到，最后，我怕被机枪扫射到，只有爬着进去。

我进去后，就开始做工作，我对中队长就说，你们再不投降还要用大炮打。“别打了，别打了”，汉奸中队长说，“再打你就回不去了，要是不打了，我们傍晚就投降，要到傍晚治安大队看不到了再投降”。这边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中队，我就让宋朝龙去做那个工作了。他又在城墙爬了过去，他进去后，也把工作做好了，天黑把门打开，他们就把枪都交出来，就这样的解放了。我们想利用北城门这个机会，因为那里是个至高点，打起来就比较容易些。到了下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消息，敌人从阳谷出了东门，大部队来了，增援部队来了一个团，我们就开始撤离。把那些俘虏带到郑三里（今台前县吴坝镇郑三里村）去，张秋镇的东南方向，就到那里去了。敌人马上要来到，部队撤离，我和家人也一起就回家了。当时也非常危险，我从岳父家刚走了有5分钟，日本鬼子就追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打仗的经过。

张秋镇解放，随后又解放了许家楼，在张秋镇城北有8里地远，有个大据点，还是他们这部分人，需要我们去那里配合。打许楼的时候，还得到了一枚迫击炮，日本鬼子离徐家楼5、6里，我们就在半路上截着敌人，那个时候有玉米、谷子、高粱，都是庄稼。宋朝龙在那个据点当分队长，我到那里第二天，就开始做工作。这个时候，阳谷开始有鬼子出来接应，我们早就知道了，开始做好了准备，那个时候，大部队派了一个营，都隐蔽在玉米、高粱地里，等敌人过来，开始攻打日本鬼子，当时打死了十几个日本人，还有汉奸队。把一枚迫击炮也给打跑了，据点一

看，敌人期盼的增援部队刚来，就被八路军打跑了。那边战斗刚结束不到1个小时，这边自动的就打开门跑了。等我们的部队来到之后，还剩下一个排的人，给打死了两三个，我当时离的较近，有半里地的距离，看的非常清楚，他们就像一群羊都跑掉了。当天晚上，我们的老百姓就拆楼、烧火，把他们的据点全给拆完了，解放了徐家楼。

1943、1944年，通过几个战斗就把张秋县给解放了。解放后，阳谷、寿张县就陆续也解放了。

然后就开始南下，济宁、兖州开始解放这些地方，对山东来说，南部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地区，日本鬼就把这两个据点称为最重要的。我们一起的部长、干事就都调到汶上县农村，我们解放区就搬到那里去。我的任务是让去济宁、兖州到那里我是谁都不认识，我们住的地方离济宁还有150里路远。其中敌战区就有120里路，要经过这么远的敌战区，离咱们老家是240里地远，这个事情，我当时还真有点为难了。张秋镇解放以后，连警察都抓起来了，负责释放要我去参加，吃饭还需要发粮票，发放释放证，那时候发证他们都认识我了，好多人就是济宁的，放了他们回到济宁就都知道我是八路军的身份了，非常危险。再就是需要良民证，为了工作关系，必须要办良民证，当时也都不敢给我办这个良民证。后来到阳谷县去办理，不能到张秋镇去办，因为那里是解放区，我又是八路军，需要改名换姓，都不敢给办理，最后通过关系，到阳谷城东有个三里营，大部分都是姓于，到那里去把姓给改成于，还需要加盖钢印，当时还比较严格。到县警察局盖钢印，整个三里营是敌占区，是他的家。不会引起怀疑，改名为于文明，就是利用这种关系把良民证取来了。到济宁那边去，我就成了合法的，什么都不怕了，当时年龄也比较小21岁，我就

办了这个事，通过张秋镇的张海伦他有个儿子是旧社会的士绅名流，寿张境内的镇长，他有个儿子，爱吃喝。通过什么关系呢，我从汶上解放区到济宁，需要经过两个大据点。

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开始进攻，我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到兵站部工作，鲁南铁路管理局撤销，改为山东军区鲁南第三军站处，我到军战处分站任指导员。开始了新的阶段，又开始解放战争。给国民党开始了打内战，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段经历。

我这一辈子就是这样，没有讲过任何条件，当时在那种环境下工作，衣服、被子、日用品什么都没有，现在想想得有人说你不傻吗？那时就是从不讲价钱，总是认真完成了党交给的一切任务，还一定达到要求。整天就是与敌人生活在一起，收集情报，瓦解敌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我都经历了，我们的政权是先有了武装后有的政权，我们与敌人做了艰苦的斗争，一起的战友去世了很多。

（根据郭文明之子郭林提供录音资料整理）

**郭文明**（1923年12月—2004年4月），山东省阳谷县十五里元镇郭家庄人。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解放做出积极贡献。1938年参加革命，历任过寿张县、阳谷县自卫团事务长，昆山县政府管理员，冀鲁豫边区三支队政治队长。兖济工作团敌工干事，鲁南军区兵站处指导员，华东运输公司直属汽车队，威海中威橡胶厂副厂长，山东省交通厅运输局，烟台市交通局。

## 我经历的“八·二三”铁壁合围

郭文忠

1939年，我那年十二岁，大哥就把带我到了东阿二区，在二区队让我当通信员。那时候，我三个哥哥早已先后参加了革命，大哥在东阿县二区当粮食助理员，二哥是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三哥在东阿县的敌工部。我只有十三四岁，二哥让我区队当了通信员。到1940年成立张秋县时，东阿二区划归了张秋县二区，我年龄不大，仍作勤务员。1941年又参加了张秋县联防大队，任通讯员兼勤务员。

当时县委组织部长雷振、县委书记王化先经常在我家住着，白天一般不出去，晚上出去。我年龄小，外面一看还是个小孩，不显眼，有什么事，就让我传信。那时候经常从我们这一带，到林楼那边送信，有时还过黄河，那时黄河里没有水，老河道，净沙土，很难走。

1942年古历8月23日，日本人实行“铁壁合围”（又叫8·23大扫荡），我随着县大队行动，听说有鬼子要扫荡，但消息不是很确切，也不知道鬼子要从哪边来。那时，头天夜里，我们住在钱楼（今阳谷县张秋镇钱楼村），有人来报告，说鬼子来了，我们先是往西跑。跑了不久，这时有人在高处看见，有日本鬼子骑着马从西边来了，看见有鬼子从西边往东撵。我们一看事不好，

就赶紧往东跑。结果到了空石村（今阳谷县张秋镇窟窿石村）南边，一看不能再往东跑了，东边的也看见鬼子了，西边的鬼子还没上来。于是，我们跑到了空石村西南的一个大坑里，领导们就研究怎么办。当时和我们县大队在一起的还有一个连的正规部队。部队首长也许觉得在一起目标太大，决定分开行动，正规部队往北突，我们县基干大队和县警卫连往南，过金堤河往南，到林楼一带，不行再往黄河南。正规部队行动快，很快没影了。

我们从大坑里出来，往南跑，不远就是大堤。到大堤跟前，一看，坏了，鬼子和伪军已经在堤上布上人了，架上了机枪正等着呢。那也得往上冲啊，我们组织人突击，集中投手榴弹，一下子炸开一个口子，我们连滚带爬地翻过大堤，顺着交通沟往南冲。敌人很快用机枪追着打，敌人在大堤上，我们过了大堤就在低处了，地形对我们很不利，我们牺牲很大。当时冲出去没有多少人，我个子小，也不知道害怕，怕也没有用。身边的同志一会倒下一个，一会倒下一个，一看还有气，架起来就跑，一看没气，也顾不上了。我紧跟着联防队长白志高跑。突然，他一头栽倒了，我急忙去扶他，他脸色很难看，气喘吁吁地说：“小四，我不行了，你赶快跑吧！把我的枪带走，快走！”我说：“你坚持住，我扶你走！”他说：“你别憨了，快走，不然咱谁也走不了，我命令你快走！”我不管他，但我也背不动他，就把他的胳膊搭我膀子上，抗起来就走，他骂我，让我走，我没听他的，渐渐没声了，我知道坏了，把他放下，已经没气了。我一看，后边枪声一阵紧一阵松，我就从他枪套里把他的枪拿出来，掖进了腰里。擦干泪，抬头一看，都已经跑的没人了，已经看不见同志们了。我往哪里去啊，我看看，大概就是接泊浪和丁田庄（今台前县打渔陈镇田庄村）的北边。往西三四里地就是王堤口的地，再

往北两三里地就是我的家。我想，离家近，我还是先回家吧。我就猫腰往西跑，在玉米地里钻，有时听到地头上叽哩呱啦地有日本鬼子说话，也有汉奸在说话。我趴地里不动弹，看见有人端着枪往东搜索着走，我也不敢动啊，等他们走过去，看没啥动静，我就赶紧往西钻。大概爬了有二里地的光景，有个砖窑，旁边有个小屋，我听听没动静，偷偷地走过去，到了屋里，人早跑没了。我又渴又饿，走水缸边，拿个水瓢喝了一气。也不敢多待，赶紧出来，偷偷爬高处一看，从三官庙方向，一队汉奸正骑着洋车子往这来哩。我赶紧下来，钻到棒子地里往西爬，又爬了大约有二里多地，在棒子棵里看到有个人在那时猫着，一看，认识，是王堤口的，人家都喊他二老摆，他正在堤南里收绿豆，他也认识我，他一看见我就招呼我，你不是小四吗？怎么跑这里来啦，我给他说明，刚逃出来，被打散了。他说，你把枪给我吧，我给你藏起来，过两天再来取。我一想，带着枪也是危险，于是就让他把枪用绿豆秧捆好，运回家先藏起来，然后就回家了。回到家，我爹娘都很高兴，但也很担心大哥二哥和三哥他们。等了几天，听说他们都安全脱险了，才放下心来。后来我又把枪给找回来，交给了我二哥郭华和李树德。当时游击队正缺少武器，因此受到他们的表扬。

那以后，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当时，我家里是个点，王化先、雷振经常在我家住，当时大哥、二哥和三哥都参加革命。他们看我父母年龄都大了，他们说，都在外面也不行啊，家里得有个人帮着干干活啊，我五兄弟还小才几岁，干不成活。我十四五岁了，也能帮家里干点活了，三个哥哥都离不开，就把我留家里了，帮父母干活。

时间不长，敌工部和张秋县委的领导又到我们家，重新研究

## 台前

对敌斗争的方法。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当时宋朝龙为首所谓便衣队正在招人，敌工部部长颜华、周金铸就把我和我们村的老党员赵福恩派去了。在那里，我的公开身份是勤务员，暗地里也是为党工作，传送情报，同时还要和张秋镇的地下党保持联系，当时张秋西街有个叫蒋介石的比較了解敌人的情况，我就和他取得了联系，以便衣队的身份进出张秋镇。

有一天下午，张秋县县委书记王化先，组织部长雷震要到河（金堤河）南王堂村（现在河南省台前县打渔陈镇王堂村）杨朝炳家开重要会议。从我们家（十五里园杨武龙村）出发到那里要过几个封锁线，因为又是白天，过敌人的据点，并且也只有这一条路，我就利用自己打入敌伪的身份护行，把他们安全的护送到目的地。

43年冬季，区里成立了三人情报小组，组长是杨子山，其他两个人是我和党建员，主要负责张秋寿张两地的情报。44年11月，张秋、寿张解放，情报站撤销，我又回到区里，组成模范班，负责维持治安工作。

（田开沐根据郭文忠口述整理）

**郭文忠**（1928年—2008年），1939年参加革命，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新中国解放做出积极贡献。解放后历任阳谷县龙王庙乡青年书记、区长、管理区书记、十五里元公社任特派员、十五里元公社社长、城关镇公社副主任，81年因病离休，2008年病故。

## 我的革命家庭

郭继俊

我家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十五园镇郭家庄村。（原名：杨文龙、杨武龙）。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约有36户人家，是一个三县共管的小村庄，也是一个回族、汉族共住民族村，同时因为村上佃户比较多，还叫佃户村。我家地理位置又非常特殊，在行政上，那个年代是属于三县共管村。我们村分前后两条街，前街是以回族组成归东阿县管辖。后街是汉族组成，归阳谷县管辖。但是，西南有一小部分又归寿张县管辖。为什么又叫佃户村呢？是因为我村是一些给地主扛活的佃户组成的，地主是张秋镇的常姓。有一些小商小贩主要是回族多一些。

### 革命家庭

我的家住在村的东北角，在那个年代我家两面没有人家。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曾祖父叫郭风林，共姊妹六人，二曾祖父叫郭风亭，三曾祖父叫郭风山，四曾祖父名字不详，因为在二十几年时离家出走，那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后来听说参了军，一直和家里没有了联系（可能是在战争中牺牲）。老姑奶奶有两个，一个嫁给王堤口，另一个嫁给寿张县张家庙（今河南省台前县打

渔陈镇张庙村)。曾祖父郭风林共有六个子女，二三四曾祖父均无后。

曾祖父六个子女，长子郭文正，次子郭华，三子郭文明（后改于文明），四子郭文忠，五子郭文庆，一个女儿郭文英（姑奶奶），我的祖父就是长子郭文正。姑奶奶嫁于张秋镇姜姓。姑爷之姜东贵，曾参加过淮海战役，后来转到空军，转业之后到吉林省吉林市落户。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由于家中贫寒，主要靠三个曾祖父给常姓地主扛活租地为生。常家地主在张秋镇开设粮店，油房。他们到那里给地主干活，但是那也只能挣到养家糊口的钱。正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的曾祖父决心再难也要供养几个孩子上学，但家里实在是拿不更多的钱来，家里只能供我祖父和三祖父上学。那时正规学校没有，只在东二三里路的田堤口有个私塾，在那里念书，教书先生叫田文全。先生那时生活也不富裕，也是承租别人的地为生。因此，他们边学习边给先生种地，好让教书先生养家糊口，学习时间一天也只有半天的时间，那时的学习也比较简单，没有正规教程，也就是一些《三字经》和《百家姓》等一些“子乎者也”的东西，再者就是练毛笔字，但是练字的纸用量大，买纸就成了困难。兄弟二人只能供一个，这事又落在了我祖父的身上，三祖父就在我祖父练过的纸张的空隙来练字。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加上我祖父的努力，终于练就了一手好的毛笔字，在我们那一带也是小有名气的。

他们在此学习期间，有一位早期共产党革命者以剧团作掩护经常来杨堤口演出。接触到了教书先生田文全，让他在学生中传播革命的道理。经过先生的推荐，就把我祖父作为发展对象，经常灌输革命道理。在那时讲革命理论又不能公开，也只能在夜间

来学习，教书先生那时有个瓜园，他就晚上把我祖父他们约到那里去讲革命道理。由于我家离此地有三里路，有时晚上，祖父一个人不敢去，因此又叫上我三祖父作伴两个人一同去。从此他们二人在1937年就开始接触到革命的道理。后来日本人大举侵犯我国并且发展卢沟桥事变，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做好应战保国的准备，共产党在阳谷县、东阿县成立了一支革命武装叫阳阿武装支队。我祖父和我三祖父就参加了这支队伍，我祖父任文书，三祖父任供给员。从此，他们也包括我的一家在内的革命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

日本人正式占领聊城、阳谷、寿张之后，在党的领导下，真正抗日局面开始了。在此时各村成立农会，妇女救国会，曾祖父郭风林任农会会长，曾祖母任妇救会主任，从此我的一家人都投入抗日救国当中去。

当时我的家庭非常清贫，全靠给地主干活，租地谋生，祖父们兄弟又多，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非常困难。即使是这样，全家在抗战中，为党的事业从来没有迟疑过，在那个时期先后有很多领导来我们家居住，躲过日本人的搜捕。先后有薄一波（后来成为我国的领导人）。当时张秋县委书记王化先（后来任我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张秋县组织部部长雷震（后任我国石油部副部长），谢惠玉（后任聊城地委书记），还有当时的领导人王克、赵克、赵宾、杨朝炳、颜华（当时任张秋县敌工部部长，在清查AB团时，因为他家是地主，被整，在山西上吊自杀）。后来有很多中共高级领导干部来我们家居住，由于形势严峻不能用真名很多。在42年8.23大扫荡后，形势险恶，对敌斗争严酷。我党工作人员大都转入地下，东阿至范县一线的领导干部都来我家居住，避难，开会，工作。其中有肖道立（后任阳谷县，冠县县委

书记），肖道明（后任聊城供销社书记），他们在我家吃饭，休息，办公务。更有些干部为了工作方便，不暴露个人身份，叫我曾祖母帮忙化妆。在过往人数过多时，我曾祖母一夜就做过八次饭，但老人家从来没有怨言。

当时我家处于敌占区，又有很多工作都在地下进行，枪支粮食储存都是问题，因此我们家都成了党的粮库，到处都埋着枪支粮食和弹药（到现在我们院下大雨时都有坍塌的地方）。我的祖母们都成了党的交通员，随时担负着给组织送情报的任务，因此我家也就成了交通站。有一次，在我家正在重要会议，重要的领导同志都在参加了，就在我们西屋，突然有一伙汉奸来到我们家中，其中一个汉奸说：“他们西屋藏着八路，是否搜查一下？”其中一个好像是头目的汉奸说：“人家做人家的事，我们做我们的事，你管这么多干什么？是不是不想活了？”就这样我们家差点成了战场，开会的领导同志化险为夷。我的祖母家每逢接到组织的情报，不管刮风下雨，白天晚上，拿着活筐就上路，路上很多次遇到敌人的盘查，幸好都安全躲过，同时全家都在为我的几个祖父提心吊胆，但是他们从没有怨言。

在我的祖父的祖母去逝时，我的几个祖父们都回家奔丧，我二祖父也骑马带警卫回来了，因此当时正是形势比较严峻，出殡那天，因汉奸据点很多，在我村后二里地的龙王庙就有一个。娘家人为了要场面，想让我的祖父们都跟着出殡，这时我的二曾祖父说：“我的几个侄子，都是共产党的人，后村就有汉奸据点，这时要让他们给抓走了，你们能负责吗？”因此我的几个祖父也就没有上坟。当时延安报纸是我们党的喉舌，有的干部从延安返回之后，给我祖父说：“老郭，你们家的事迹，在延安登报了，真了不起！”

当时的张秋县县委书记来到我家，看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无不感慨的说：“你家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你们兄弟几个都走了，家里怎么办？”为了抗战，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们全家都不顾，这都是常有的事，那怕献出生命。

## 革命五兄弟

**老大：郭文正，又名郭子芳（1917年—1989年）**

在姐妹六个中排行第一，早期在田堤口读私塾时，教书先生是田文全。有一个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以剧团的名誉做掩护经常来田堤口演出，因此接触到田文全，让他在学生中宣讲革命道理，并培养革命力量。田文全就把我祖父作为培养对象，每天晚上找到他的瓜棚讲革命道理，并让学生搞革命宣传，他说：

“这个世道不行了，穷人为什么就应该给地主干活，并且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倒好，不干活只吃好的，我们要起来，推翻这个世道，让干活的人有饭吃，同时也要把别人发动起来，造他们的反，革他们的命。”讲一些这样的道理，后来祖父也把他的几个兄弟带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我村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处于三县共管的地带（东阿、阳谷、寿张）。1937年秋，在我们鲁西党组织了自己的武装，成立了鲁西抗日支队。郭文正带领三个弟弟参加了抗日工作，1941年，张秋县成立，又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鲁西抗日大队第五中队。

郭文正带领三个弟弟又来到张秋工作，任第五中队文书，后任关山区财政助理，在抗战初期大多数时间掩护伤负和护送担架队，接送一些过往的干部。（由于当时形势险峻，好多干部都不

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和名字，因此有很大一部分人名字不知道）。去黄河以东送情报一走就是几十天（因为我们家是交通站兼情报站）。在一次去延安护送担架时，由于一路奔波，几天几夜都不能休息，大多数时间一边走一边睡。来到山西境内，人们都知道，山西境内山高坡陡，路都在山顶，从山顶往两边看，只能看到山谷中大树的树梢。走着走着困意袭来，迷迷糊糊来到山崖边，后面的李树德拉了一把，清醒过来，再向前看，走上两步就到悬崖边，惊出一身冷汗，因此捡回一条命。在第五区队任文书随时都得转移，因为田家是交通站，汉奸也都知道，铁壁合围时，他带领我们全家和县里的领导同志随部队转移，一走就是好几天，并且还得做掩护工作。他还曾参加过陈店大洼战斗，消灭日军十几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在刘邓大军南下时，一天傍晚正在吃饭，上面转来情报说：有重要任务，饭也不能吃必须马上就走。来到狮子阁东面大路之后，从北面开来两辆吉姆车。由于天快要黑了，在远处看不清车内是谁，来到近处向车内一看，只见车内坐着一位又瘦又黑的矮个子，向他笑了笑（后来听说是我们刘邓大军的邓政委），他的警卫说：“快走，别看了。”因此带着他们向前走，一直把他们送到指定地点。

由于郭文正是兼任粮食管理工作，给队伍存放粮食和枪支都成问题，只能存在家中。汉奸又不定期检查，随时都可能有变故。大都把粮食枪支埋起来，等到用时再取出。张秋解放之后，当时在关山区工作，后来张秋县撤销，他又调回龙王庙区工作。大军南下，上面领导同志看到家里的情况说：“你家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你们兄弟几个都走了，家中谁来照顾？”因此郭文正便没有南下，参加了地方工作，任龙王庙区助理员。（当时二弟铁

壁合围时冲出参加了鲁西独立旅，三弟在兖州做敌后工作）。我们这一带解放，他积极参加土改工作，为党的事业做贡献。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发展教育事业。他在龙王庙区同程庄程允武，龙王庙王友芹共同创办了龙王庙完全小学，在学校任教员。一直到1966年，由于儿子郭龙章患有大脑炎后遗症无法照顾，因此在这一年退休。当时医疗条件有限，不能经常带儿子去医院，因此他自己又钻研医学，练了一手针灸和接骨术。经常有乡亲来找他看病，接骨者不管黑天白天，有求必应，又有一手好的书法。每到春节来临，来我家写春联的人很多。我们也成了他们的帮手。

郭文正饮食手艺也很高，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有婚丧等事的都让他去帮忙做菜，从不计较任何报酬。1989年去世，享年72岁。

### 老二：郭华（1919年—1947年）

淮海战役，攻埠阳牺牲，兄弟们中排行第二，幼年聪明好学，家贫不能入学，在劳动之余就向上过私塾的大哥和三弟学习，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

1937年参加我党在鲁西成立的东进支队鲁西抗日游击大队，警卫队。担负大队与机关的保卫工作，后来又调任东阿县二区队队长，负责武装工作。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上级决定成立了张秋县，王化先任书记，雷震任组织部部长，颜华任敌工部部长，郭华调任张秋县三区指导员。因当时对敌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到处打游击，我家就成了工作站。

战斗中他身先士卒，在部队中的作战勇猛而著称。在打击敌人的斗争中，采取伏击敌人的办法时，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协助主力部队，两次解放张秋县城，做出积极贡献。日本人采取的晋冀鲁豫“铁壁合围中”（又叫8·23大扫荡）他当时调任张秋二区指导员，掩护部队从空石起经金堤向河南突围。

## 台前

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金堤，并且已修好工事进行隐蔽。部队已来到金堤根下，看到了金堤上的日本人，但是已没有退路。他带领区队员们奋力向金堤上冲，用鲜血为部队杀出一条血路，到了金堤河南岸。敌人从后面向部队用机枪扫射，当时是死者成片，伤者无数。冲出之后，他们来到范县，在此参加了冀鲁豫军区正规部队，即鲁西独立旅。（当时，张秋县归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管辖，第十一纵又下辖军分区，张秋归第一军分区管，军分区司令员是赵紫阳，十一纵司令员分别是王炳锋，还有一个姓李的司令，都是开国将军）。在鲁西独立旅任营长，后来独立旅又成立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郭华又任干部大队保卫股股长，负责十一纵干部保卫工作。由于后来部队大量扩军，又调任某团特派员，负责上下级的联络工作。后来日本投降之后，中原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由于工作的安排，又调到二野十一纵92团任团政委，做行政工作，在此期间三大战役打响了。

东北四野辽沈战役结束，又对平津进行包围，以防傅作义向南逃跑，在淮海地区又进一场大的战役，即淮海战役。当时在淮海战场上敌我力量相差悬殊，必须用少量兵力牵制住敌人，让其脱离战场。第十一纵队担负起牵制任务。充分调动国民党新编第4军，由河南南部向北部来回调动。（在此期间二祖父回家一次）。南北调动分割包围黄、邱、李兵团并加以消灭。也就是在他们把敌人向南调动时来到安徽阜阳时。因对敌估计不足，认为在新编第4军来到以前能拿下阜阳的新编第5军，因此对阜阳发起攻击。在没有拿下阜阳时，新编第4军赶到，部队受到夹击，敌人用炮轰，部队只好撤退。在撤退中他们担负阻击任务，在阻击战中取得胜利。前方正在扫荡战场，92团团团长说：“老郭我们也到前面看一看，他们是怎么打扫战场的。”因此他们就带着警卫来到前

沿。正在观察之际，一颗流弹落在他身旁，当时身负重伤。后来被运到淮海战役的后方医院，即山东单县。由于伤势非常严重最后光荣牺牲，时年28岁。牺牲之后，被安葬在山东省单县湖西淮海战役革命烈士陵园。

后来，由于国民党返乡团进入烈士陵园，他们的遗体被从棺中取出毁坏，面目全非不能辨认，再加上解放后国家重建烈士陵园，即单县湖西淮海战役革命烈士陵园，只能把他们合葬在一起，因此才有了他们三十几个人的合葬墓。（在陵园西大门北侧，书写郭华团政治委员）。在我们阳谷县烈士陵园也有他的名字，记载是中原野战军（即二野）第十一纵干部大队保卫股股长。

郭华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红色的国旗上有他的鲜血和汗水。

### 老三：郭文明，化名于文明（1923年12月—2004年6月）

郭文明在兄弟几个中排行老三，在三十年代，由于家境贫困，兄弟几个只有郭文正和郭文明接受到了教育，但是还得打草喂牛，还要给先生干活，他们在学习期间接触到党的理论与思想，因此对于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有着重要的关系。

当时党的活动处在三县交界处，这样有利于发展革命武装斗争。到1937年秋，党成立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叫阳阿武装大队，郭文明和大哥一起参加了这支部队，驻地在东阿、阿城一带。由于部队刚成立又是地方武装，生活非常困难，供给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因此也只能给地主要枪要粮。三祖父又是供给员，这些工作也都由他来做。

1938年，日本人占领了聊城，东阿，阳谷，寿张，张秋一带。1941年6月，上级决定成立张秋县，组成抗日政府。领导抗日武装，他又正式调回张秋县工作，并成立了抗日联防大队。到

## 台前

1942年张秋形势吃紧，（日军）正式占领张秋。当时日本人集结三十多个师占领华北地区，以此来扼杀刚成立的革命武装，张秋县划归冀鲁豫军区，归125师刘邓指挥，张秋县位于军区边缘，也是日本人想消灭的重点，在整个华北来一次大扫荡，叫“8.23大扫荡”，又叫“铁壁合围”。

1942年秋，接上级情报有一队日本人，要包围张秋，东阿一线的抗日武装。他们在寿张出动沿途金堤一线向东扑来。此时郭文明已调到张秋敌工部工作，并任张秋敌工站站长，当时19岁。他接到情报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又要发动群众集体外撤。那时他在送情报途中来到钱楼亲戚家正在吃饭时，也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日本人从金堤向东扑来。此时我们的部队也来到钱楼西边的空石村，正准备越过金堤向南突围。当时日本人已占领金堤并已修好工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只能迎着敌人上。在部队杀出重围后，日本人包围村庄见人就杀，到处都有日本人的枪声，日本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1942年以后，占领了张秋。张秋变成敌占区，并成立日军伪政府，大搞封锁政策，碉堡连成片，沟沟都相连，党的工作很难展开，斗争被迫转入地下。当时的125师下辖的33旅也在隐蔽活动，33旅下设的各团都分配到各县化整为零，张秋、阳谷两个县有一个连队活动。那时县政府和部队活动都不固定，到处打游击，但是政府班子没有散，基本上都在夜间活动，因此我们家也就成了他们开会办公藏身之地。当时的形势非常残酷，获取情报都很困难，经过组织研究，派郭文明加入伪治安大队，并进一步搞策反工作，又回到张秋县。当时的伪治安大队大队长叫宋朝龙，经过郭文明的多次接触并获得了他的信任。

时间到了1944年，解放张秋县的时机已成熟，我部队已做好

开始进攻的准备。此时郭文明出了张秋县城到金堤以南白铺（今台前县夹河乡白铺村）去向部队汇报工作，把县城里的情况向部队汇报，以备制定作战方案。到了秋天解放正式开始，上级决定再让派郭文明做敌伪策反工作。北门中队长原来是我党叛徒，三祖父又回到张秋县城，并把北门中队长约到药铺见面。见面后给他分析当前的形势，告诉他，大军已包围张秋县城，最好出路就是投降，日本人不会太长了，你要看清形势，别做无谓的牺牲，很快做通了工作。另一个是宋朝龙的仁兄弟，做他的工作比较困难，只给个活话，说看情况再定。因此部队为了促使他们投降，决定先打西门，西门打下之后，北门就好解决。打西门时一次进攻没有成功。敌军看到我军攻势很猛，知道抵抗没有用了，就要求和谈，和谈还必须要找熟人做保证。况且这个中队长也是叛徒。组织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让郭文明去。郭文明接到任务，并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西城门下，并对着上面高喊：“我是郭文明，你们应该认识我，我给你们谈判来了。”郭文明只身来到城里，经过几番周折和耐心说服，最后西门谈判成功，西门伪军投降，西门顺利解放。

此时，为了促成北门伪军的投降，当时八路军在西门用炮轰击北门，给敌人以震慑，接着又重新开始攻打北门。开始在门外向伪军喊话，此时伪军也看到大势已去，又叫人谈判。这一次谈判很难，如果敌人不投降很可能把人作为人质，人身安全无法保证，并且不远处还有治安军的一个营，封锁城门，还很顽固。如果部队一定要打下张秋城，必须派人去谈判。敌工部长颜华对郭文明说：“没有法子，我也不想让你去，没有办法，还是你去吧。”因此郭文明又一次深入虎穴。由于治安营封锁城门，进城门很困难，只能爬着到城根底下，伪军放下个绳子，把人拉上

去。这次是和伪中队长面对面谈判，经过这次交涉最后同意投降。北门解放后一举消灭了治安营，张秋镇完全解放。不久，日本人的大批援军又开了过来，在郭文明和妻子前后离开张秋镇不到三五分钟的时间，日本人又重新占领了张秋镇，张秋镇又一次陷落。

经过43-44年的几次战役，解放了寿张、张秋、阳谷。战事向南转移。郭文明又去了兖州、济宁一带。总部设在汶上县，由于三祖父在解放张秋镇时曾给伪军发放路费，那些汉奸又都是兖州一带的人，大都认识他，做隐蔽工作很困难。组织决定用化名办理良民证，因此组织启用关系，以阳谷城东三里营于姓办理良民证，因此于文明的名字由此而来。

如果在济宁一带活动必须打好关系，兖州有一个叫候之良的伪队长很有名气，并且结交很广。他与张秋镇有个叫张海龙的很熟，因此组织上又叫上张海龙的儿子一同前往，好与候之良结交关系。

到了第二天，他们一行来到济宁，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一个姓李的，以做买卖为名叫他找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郭文明在济宁通过关系找了一个皮货店，并在此落脚，后来他又通过关系，打通警务局的小头目，以此来了解一济宁的情况。在济宁工作一段后，又被派去兖州。就这样，几经周折，郭文明由鲁西军区变成鲁南军区的人。在兖州工作，又用上了张海龙在机务段的亲戚了。给他说：“家里是地主，共产党到处抓他，没有办法才逃到这里，让他给我找个事做。”因此找了一家客栈先栖身，慢慢在找机会，就这样取得了他的信任。过了一段时间，他让郭文明入股开货栈，这事要上级组织批准，又过了几天上级同意，那才用150桶油做股金加入了一个叫九成的货栈，

从此搬到了货栈去住。一个月之后由于和机务段长混熟了，又以发货方便为借口，搬到了机务段长家中。在机务段长家中，有一个烧火的小伙子，性格开朗，喜欢结交，他们很快混熟了。郭文明在他的带领下，在周围逛着玩，以此来摸清兖州的情况。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前面有一个坑，在坑边能看到日本司令部的情况。因此他们就去那边坑内洗澡，以来观察司令部的情况，也经常去火车站观察到列车运送日本兵源和物质的情况。有一次，因天气太热，很难让人入睡，就起来让外面坐着。突然被一群日本宪兵带到日本宪兵司令部进行拷问，逼问郭文明来这干什么的。郭文明说：“做生意的，在机务长家住，天太热了睡不着觉，出来凉快一下。”他们又经过反复调查后，才把他放了。原来在前天夜里，日本宪兵司令部被盗，错把他当成盗贼抓了起来。

第二次危险，是在回部队汇报的路上。碰到了一群日伪军，把他们抓了起来，被关在一间破屋内。过来没有多长时间，日伪军全部撤走。当时老百姓说：“你们快走吧，他们都撤了，要是再回来，你们就没命了，就这样又逃出虎口。”

第三次危险是回兖州。要回兖州必须要通过兖州正南大桥，否则要绕80里路。大桥有三个岗哨，南头是伪军，中间是日本人，北面是伪军，盘查很严。三祖父腰间还有党的文件和报纸，没有办法了，也只能硬过了。由于日伪军只顾盘问别人，把他只是大概的看了一看就放过去了，因此这次是有惊无险。

1945年，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解放区成立鲁南铁路管理局，郭文明任此地火车站站长。1947年国共和谈最后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攻打兖州。进攻还没有开始，吴化文部宣布起义，此时淮海战役正式开始。郭文明又调任鲁南兵站任指导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文明调山东省交通厅工作，后

来又调到烟台市交通局工作，一直到离休。

### 老四郭文忠（1927年—2008年）

郭文忠，在兄弟几个排行第四。

1939年参加阳东二区队（当时年龄13岁，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小四）当勤务兵。1941年新成立张秋县，又随东阿二区队划归张秋二区，过来的人员大都又重新做了调整，因郭文忠年龄尚小，仍做勤务员。不久又参加了张秋县联防大队，任通讯员兼勤务员。1942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本人实行“铁壁合围”（又叫“8.23”大扫荡），绞杀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全县的主力军从空石向金堤南突围时，在金堤上遇到敌人，部队被冲垮。他和联防队队长白志高同志二人冲到金堤以南，快要冲出包围圈时，白志高同志身负重伤。他在临死的时候说：“小四，我不行了，你快走吧，快回家吧。”随后，郭文忠把他的短枪拿起，在玉米的掩护下，往西跑出三四里地。当时也凑巧碰到了王堤口的外号叫二老摆的熟人，到金堤南来收绿豆。四祖父随机要求他用绿豆秧把枪捆好，到夜间运回家，让他暂时存放。隔了一段时间，郭文忠又把枪取回交给游击小组负责人郭华及李树德同志。当时小组正缺少武器，因此受到他们的表扬。

回家时间不长，敌工部和张秋县委的负责同志经常到我们家来往，又重新研究对敌斗争的方法。后来经过研究决定，派人打入敌人内部。当时宋朝龙为首所谓便衣队正在招人，敌工部部长颜华、周金铸决定把郭文忠和同村老党员赵福恩同志去做。在那里，郭文忠的公开身份是勤务员，好为党工作，传送情报，护送领导同志。同时还要和张秋镇的地下党保持联系，当时张秋西街有个叫蒋介石的较了解敌人的情况，于是和他取得了联系，以便衣队的身份经常进出张秋镇。

有一天下午，张秋县县委书记王化先，组织部长雷震要到河（金堤河）南王堂村（现在河南省台前县打渔陈镇王堂村）杨朝炳家开会。从我们家出发到那里有几个封锁线，因为又是白天，过敌人的据点，并且也只有这一条路，郭文忠利用自己打入敌伪的身份护行，把他们安全的护送到目的地。

1943年冬季，区里又成立三人情报小组，组长是杨子山，党员有党建员和四祖父，主要负责张秋寿张两地的情报。1944年11月份因张秋、寿张解放，情报站撤销，郭文忠又回到区里，同时区队李树德又安排了新的任务。他说：“阳谷还没有解放，敌人经常出来抓人抢东西，你们在村里重点做好民兵工作。同时成立一个坚定的模范班直接归区调动。”当时郭文忠和郭玉章负责成立模范班，进行维护治安工作。

1947年初，上级又号召解放区发展手工业，区内又分派我们三个自然村的社员集资开油房，郭文忠当经理。1952年出任龙王庙乡青年书记。53年任区长，管理区书记。1960年调十五元公社任特派员，十五元公社社长。1971年任阳谷县城关镇公社生产组组长。1976年任公社副主任。1981年因病退休，2008年病故，时年81岁。

### 老五郭文庆（1931-2009年）

在兄弟们中排行第五。

那时，郭文庆年龄最小，1944年加入范县抗日子弟小学学习。在那时，由于时局非常动荡，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和地点，到处打游击，条件也很艰苦。一个小凳子在一棵树下就能学习，既要躲开日本人的扫荡，又要防止汉奸的干扰，经常一天换好几个地方。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他考入阳谷县坡里师范学习，经过不懈的努力，于1950年考入哈尔滨外国语学院。

## 台前 郭文正

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深造，在1955年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山东省支部生活编辑部（省委组织部主办）。由于用脑过度，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1964年调到山东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一直到去世。

2016年8月2日

郭继俊：郭文正之孙，1985年10月—1990年3月，兰州军区空军服役，退役后在阳台县物资局下属企业工作。

## 我的革命经历

李守才

1930年4月，我出生在寿张县碌碡庙村（今属山东省梁山县杨营镇）。

过10岁上了几年小学，在前几名里，每个学生一年向老师交几元钱。中间有隔断，老人不叫上了。学校就在我家后院，我除了在校门口玩，就拾柴火。不多久，老师找，还是上，不要钱了，老师的待遇由公家管了，就是一月几十斤小米。我接着又上学了。常在下午后半晌，老师叫去村头做游戏、跑操，唱打日本歌，叫我带领。我们在校是学生，在校外就是儿童团，轮着在村头路口拿着有枪头的杆子站岗，外行人没有村上的行路条不让走，或有亲戚认识的知情人作保才放行，防止汉奸坏人侦探做坏事。日本汉奸围子，虽几里一处。村里有民兵班，也叫模范班，我父亲就是里面的成员，也有枪。我村没断过抗日工作队，寿张县抗日民主政府就是在我们村成立的，记得有马达、郭善、赵景如（后被敌人杀害），还有一个妇女叫刘颖。我家蒸馍馍，给工作队蒸过枣窝窝。

1944年热天，一天老师李曰雅（按家族比我长三辈，他家在我家胡同的北头。后来知道他是八路情报员）叫我和本村同学刘传印，说有事去我家对门叔伯家。在东屋里，对我两个说：愿参

加共产党吗？我俩说愿意。老师说：不能向任何人说，自家的人也不能说，对敌人斗争不能怕死。我俩就答应。老师就给填表，说我年龄15小，多填一岁，也没在意，就是记着了不能向任何人说，不怕死。革命的事我们不懂，老师给说，不会有蠢事。为什么在全岭叔家办入党的事，后来农村整党才知道他是党员。

一天，老师叫我和刘传印两个去考高小。那时一个区一处高小，黑虎庙和梁山一个区，叫寿张县四区，学校在大杨村，离我家有十华里，叫第四抗日高小学校，年轻的老师刘振远领我们去考，叫写作文，出的题是“动员逃兵归队”。原来在小学里就没作过文，不会造句。也不记得怎么作的。领我们去的老师小声给我们说：上前方去打敌人。教的这句最好了，就被录取了。在校期间，一天晚上，校长董兴良（后任职聊城电厂党委书记）把我们叫到校外一家屋里，对党员说了个事，也不记得啥事了。这是入党后党组织第一次对我们谈话。

在高小上了半年，叫刘传印和我两个去郟城边区一中，也没说什么原因。我两个就去了。到一中报到，也没考试就收了，在13班，后来到了12班。我们感觉跟不上班，产生回高小的想法。我俩商量，找领导问问，再回高小行吗？找到刘干事，汇报我们的意见，很快就同意了我们的要求，麦前就回来了。到区里报个告，找到从高小调来区上工作的领导人王效勤，说了此事。他问党员关系呢？我们说没有，没办过党员关系。我俩又去郟城一中，要了党的关系交给区上。从此明白：组织对人员调换单位，本人不办转党的关系；不是组织上调换单位的，需本人办理转移单位的党员关系（当时不明白，边区一中实际上是培训干部的学校）。

从一中回来后，也未能再去高小上学。我家和伯父、叔叔分家了，叔叔到区里工作了。我三叔叫李全光，也是地下党员，在

家我不知道他是党员，他也不知道我是党员。

不能上学了，也没啥事，好去枪班里玩（民兵有枪的叫枪班、模范班）。都是青壮年，五六个人是单身汉。有十多支枪，我胡同占一半。村上有七八个男的先后参军，群众精神昂扬。

黑虎庙派出所从农村要几个民兵看管犯人，村上当家的就是农会长（党组织未公开，就是党支部书记），不知怎的，村上就叫我去派出所，这大概是农会长李全铎（按家族我叫他大爷）知道我是党员。我就服从去派出所报到啦。所长孙玉明（后任东阿县卫生局长，退休回寿张）带两员，当班长。一天叫我和抽来的其他民兵去寿张法院送个犯人，我们就步行去送那个犯人。走到蔡楼，黄河里还没水，是干的，很宽大。将犯人送到寿张法院，完成了任务，知道了寿张县法院在县城东南，门朝北。

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时，有一次叫我参加往部队送逃兵，去鄆城，已经听见前面的炮响了。我们夜里回来的，详细情况记不清了，这是1946年，我17虚岁。

1946年蒋介石将黄河放水淹解放区，年末就来水了。刚过春节，就是1947年初，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到郟城以北。为对敌人斗争方便，将原黄河南的4个区（四区梁山、五区李集、六区侯集、八区小路口）建为郟北县，县委书记汪浩，县长马达。

国民党来了，无恶不作，安据点，建围院，将群众的枣树头统统伐光，插围院保命，干的坏事极多。

我跟着农会长李全铎大爷参加区民兵连，对敌斗争。到我村东五华里邵楼，发给我一支步枪，很高兴。不是大盖、也不是水连珠，不知啥名，比那还沉些。不记得发子弹带。昼夜活动，白天跑得少，夜里跑得多。一天，县大队在高小所在村大杨吃中饭，被敌人包围。县大队从东门冲出去了。到晚上，很黑，我们

## 台前杂忆

去大杨了，派我和胡台庙的一个青年去西寨门站岗，不靠人家。他在寨门南边，我在北边。

一天中午，连队向河南一个村去，走到准备做饭，有的洗脚。不大一会儿，有敌情报告：敌人从西边来了。县大队随即在村头与敌人交战了，机枪响起来了。我们没参战，从村东头向东南走去。我们没多少子弹，不到要紧时不开枪。

1947年初，国民党在黑虎庙建筑围子，就在黑虎庙南100米左右、1946年我们派出所住过的张家院，是好户，不知几家，在这片院子的周围挖个壕，宽深有四五米，靠西边大道留了个路口。

我方部队在一个傍晚开打这个围子。打一阵激战，国民党兵就逃跑了。在这个夜里，我们民兵连就进了这个围子。一到路口，就看见路口里边北旁有个柴火筑的垛。我们刚到柴火垛跟前，不知谁趟响一个地雷，很响，将柴火垛炸散啦，崩得大家浑头浑身，这不要紧，大家看自己有受伤的吗？都跺脚、伸腿、伸胳膊，没有受伤的，很高兴，就往里去，看了一圈，房子还在着火，东南角有个受伤的国民党伤兵，不会动，问他，说19岁了。我们也无法管他，就向东走去。

夜行军多，常发困，走路不稳，还怕摔到战壕里。这村到那村，以及村外、路边，挖有不少战壕，刚走开人，不到两米深。有一次，走了一夜，从村外走，好引起狗叫，往后传别咳嗽，让群众知道夜过八路了，稳定民心。实际上就是转了附近几个村。

国民党兵安下据点，做更多坏事。我村一个单身男烈属，一个贫民农会员，被国民党军活埋了。一次抓我父亲，叫我祖母领着去找。父亲叫李全明，国民党不认识，走到大街上，正巧遇上我父亲。我奶奶知道是抓他，就把我父亲当外家人，早发话，说你见李全明了吗，我父亲也看出事来了，答他好赶集，在黑虎庙

集上哩，就走了。这回算过去了，以后就不敢在家里住了。这是以后听说的。

形势越来越紧张。在民兵连里，领导看我长得矮瘦，身体不壮，叫我跟着一位残废军人，从黄河下游吴坝过黄河来了。

过来河往哪里去？找老师（李曰雅）去。问到后张住着政工室（县委）。找到老师，他在县联合会，都叫他李秘书（后任聊城地区邮电局长），就叫我住在这里了。没多少天，我叔叔从金斗营出院（公家医院）。他是在原寿张四区工作，归郓北县，还在区上没动。有几天敌人活动少点，我方工作人员有的到家看看。我婶子在娘家胡台庙住着，我叔叔去那里。这天，胡台庙被敌人包围了，逮了不知几个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叔叔在磨房里与敌人干了一阵被捕。敌人灌凉水，当场就灌死一个。我叔叔被敌人带走，路过一个村，路边一个井，我叔叔就跳井里，敌人往井里扔手榴弹。我们的人追着敌人打枪，敌人也没去捞。敌人走后我叔叔被我们的人捞出来，送到金斗营医院治疗，出院后就到县联合会见我老师。他也不知道我在这里。见面时，他身上还有伤疤。

联合会干部就是搞土改的干部，在户家派饭吃，一顿给人家一张饭条，以后向区里结算。有文化的很少，不少同志叫我给他写好，装布袋里：今用某某饭一顿，某某人。他们还叫我老师呢。还有人说我是地主，有文化，会写饭条。

在县联合会老师这里没住多久，七区（马楼）张尧阶指导员（梁山北干鱼头人，后南下）不知来后张做什么，老师把我介绍给他，把我领走了。当时区驻在黄那里。给我个破被子，在大门洞子里睡，也觉得很好。指导员是区委会的（不叫党委）。他出门，晚上在农村开会，叫我跟着，还给我一支匣枪，也学会了拆开能安上。他知道了我是党员。区部里助理员知道谁是党员，给

## 台前

我开个名单，叫我找他们收党费，也不记得收多少，那时没有工资，吃黄水发面，馍有酸味，多是吃黑窝窝。菜就是冬瓜、萝卜条，菜金少，不能吃贵菜，那也觉得很好。能按时吃饭，能睡安生觉。区长王子典也有卫士，好腿疼，有时说守才给我捏捏腿，让我给他捏腿。

对敌斗争，还有个把河涯的任务。黄河水很浅，人能趟过去，河涯边有战壕，昼夜有民兵看守，区武装部长具体领导。马楼区（七区）从尚岭到甘草约30华里，看守河涯怎么分的段，我不知道，不论昼夜跟着指导员去看把守河涯的民兵，经常从韩胡同走到张际阳。区部也迁到后王集，夜里也值班。我在马楼区待了3年。

孙口是黄河渡口，陈楼是公家造船厂所在地。敌人飞机看到了目标，不论昼夜，每天无数遍轰炸、射枪、扔手榴弹，夜里放照明灯。因都有防备，没听说伤亡。因上水，区部搬到陈楼、胥庄。我在陈楼一个院里，白天飞机来了，向房后大堤打了不少枪，掉下来的炮皮比大拇指还大。敌机扔了两个炸弹，响了一个，将我住的东邻小楼炸坏了；另一个掉在东院里枣树上，带着伞挂树上了，被人摘下来。还有一次正在大水时，有高粱棵，派民夫出战勤，夜里下通知，不知从哪村要个小船，两个人撑着，我在船上。飞机来了，扔了照明灯，是圆的，有的叫照明弹。两个船东有经验，将船停在高粱棵里不动了，也没有出事。

当时，多是参加工作组，在村里工作。董亮、岳修岭、姜佃祥先后任组织委员，我是干事，后来，刘平任区委书记，说我是副宣委，叫我参加县青年会议，选举王家胜为团县委书记。

1947年下半年，张秋县和寿张县合并为寿张县，驻八里庙，在树行里开会。县委书记藉献西、副书记何进（后南下）讲话。

听说残废军人闹事，打了县长谢惠玉，军法处来处理的。

当时生活艰苦。藉献西来寿张县任县委书记时，两个脚上的鞋都不一样颜色。冬天下大雪，下乡都是让马在前边走，他和通讯员在后边，万一马掉井里人没事。

干部都是步行。区里除两个交通员上村里下通知骑车，连区长王子典也没有见过他骑车。去观城参加整党，住民房，在树林子里开会。去朝城九地委党校学习都是用木棍挑着被子步行。有人说穷八路，是国共合作时共产党的军队被编成八路军，没几年，就改造成人民解放军了。

黄河才来水时，水不大，后来年年上水，年年复堤，年年救灾。上水时动员群众搬迁，先搬迁老人、小孩、妇女，群众的家难舍，将船驶到门口，他看着门堰，就是不走，会会盼着水不涨，能度过去。那年上水延续时间长达一个月，水位涨到差二寸不与大堤平，临黄堤南的村都看不见了，看看有一片树梢，就是一个村。临黄堤以北村的劳力看守临黄堤，北县的人看守金堤，人心紧张，怕堤决口。临黄堤北的群众就不敢睡觉。看守大堤的人时时刻刻查堤。还有迁出的部分群众，堤上的人很多。县长、专员都上堤，最后领导决定，从下游张书安决口大堤泄水，夹河的群众不同意，民兵看着不让扒。最终县公安局带着机枪镇着，使大堤决口，水向西流，直到侯庙。

给上堤群众送来的救灾熟食一麻袋一麻袋的，花样很多，捂得热乎乎的。在大堤上分发，也分不均匀，谁说人多，就多捏给他几下子。待水下去后，夹河区和打渔陈区东部都成飞沙地，不长庄稼。河床区群众被水毁得很惨，给群众极大痛苦，这是多么大的自然灾害。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群众艰苦努力，克服困难，重建家园，这是最严重的一次。

1950年麦前，我和韩效印同时调来，我分到县政工室（县委）宣传部，部长李秀，干事于加印、杜永朝两个同志。报到后，随即去长刘村打麦地里虫子，住在一个三间破西屋里，我们三人在一间睡，两间办公。办公室在北屋，东屋是油印室，部长在东院。于、杜二同志比我大，比我强，会写材料，我不会。不久，部长调走，来个副部长刘华中。他写个宣传材料，晚上叫人送来印发。我不会写材料，学刻钢板，当夜就印出来了。时间不长，于、杜两个都调到聊城记者站，调来岳修信同志与我搭伴，部长王继堂，副部长魏公相、赵强（驻公安局），后来，加印同志调国家四机部工作，永朝同志调大众日报社工作。再后来调来祁士恩、高祥厚二同志。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和县委机要秘书贺文华、财务科副科长岳彩斌一起办公，向地委报告打老虎的进展情况。

镇反时，分两个大会，藉献西书记在寿张，我们宣传部跟县长谢惠玉去张秋会场。那一天，寿张会场枪决13人，张秋会场枪决14人。

后来，和公安、教育部门配合搞漫画，带着艺人下乡宣传镇压反革命；复堤时，我们参加复堤宣传工作组；抗美援朝时，和妇联参加迎接抗美援朝报告团。

在宣传部3年多。

1953年防汛时，我和李桂芳同时调到打渔陈，他任区长，我任副指导员（副书记），赵华中同志主持工作。夜间下着雨去枣包楼黄河边一个水沟看守，与民工在堤屋里等着，水涨时，就堵堵不往里流水，防止水出沟淹地。还有个民埝政策，不能搞小埝，抬高水位，威胁大堤。防汛时好下雨，我就花五毛钱买个蓑衣，不漏水，又暖和，还能铺地上休息。

其他就是整党建乡、驻队等，在区里二年，1955年调到县委审干办公室，几个月患了肺结核病，去聊城肺结核疗养院住院了。

1952年前寿张县归平原省（省会新乡市），这年干部评级，17级是正区级，18级是副区级。我被评为18级，工资30元，后来逐步增加。评完级后，平原省撤销，寿张县归山东省。山东省18级是正区级，平原省的干部沾一级的光。过去在农村吃派饭，每顿打个用饭条，都很高兴。没工资时，不知哪年发津贴。第一次是一月每人发5毛钱的鲁西票。有了工资，在农村派饭吃兴粮票，早餐晚餐各一毛、三两粮票，午餐两毛、四两粮票。干部口粮一月29斤，不够的再补一斤，一月30斤。这是规定的政策。有了工资，也能洗澡了，一次两毛五，也能在外边理发了，一次两毛五。馆子的菜也是两毛五一个。也有吸烟的钱了。没工资以前，一月还向部门发几盒招待烟，绿锡包、红锡包、大前门。



**作者简介：**李守才，男，1930年4月出生，山东省梁山县杨营镇人。1944年7月入党，1947年参加工作，任马楼区组织干事，委员等。建国后，先后任寿张县委宣传部干事、打渔陈区副指导员、县委审干办公室任副主任、打渔陈公社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64年起，任范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文教卫生工作组组长、打渔陈公社书记、范县教育局局长；1974年起，任台前工委宣传部副部长、台前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台前县纪检委副书记。1985年离休。

## 王敏智斗敌伪

汪 洪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的夏秋之交，崑、张一块狭小抗日根据地到了最艰苦的岁月，遭遇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在此地带，沦陷后的张秋县——碉堡林立，恐怖万端；民不聊生，危在旦夕。

农历，是年的八月十三，差两天即中秋节。谁料到，此时的日伪保安队，竟派出三十多人，突然袭击顾庄村。

此时此刻，正在我家即现今的汪洋故居——小二楼上有四个人，中共张秋县委书记王化先、组织部部长颜华、宣传部部长雷振，抗日民主政府张秋县公安局局长李克东，四位县委县府首长，正在开会议事。

担任这次县委县府会议保卫任务的我祖母王敏（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即发现，混乱异常的院外街上，四邻飞跑。她就让我二婶、姑姑带孩子暂避邻居家。

王化先等四位县领导，目标太明显，时间也不允许，不宜出院躲避。怎么办？说时迟，那时快，且看我祖母王敏，她丝毫也未慌张，眼睛一亮，看到院内高高大大的天囤，竟急中生智，向县领导汇报这一隐身处所，得到县委书记的首肯。

于是，见我三婶吕桂梅、四叔汪之信二人，迅速地将天囤的草蓬掀开，搬了一个椅子，请四位县领导登着椅子跳进天囤，再盖上草蓬，搬走椅子，状态如常。

此时，荷枪实弹的伪军若干，很快打开院门、冲进院里，如

临大敌般屋内屋外、楼上楼下，各个角落甚至床下，好一番地搜了个遍，却未寻得蛛丝马迹，则顺嘴吃了几个、顺手揣了满兜尚未晒干的大枣。

几个伪军十分不满，想将大枣全都带走。四叔在一旁佯装在意地说：“这些枣子，还不值两包点心、两包纸烟的钱呢！”四叔的腓当即被伪军踢了两脚。四叔的话，却也奏效，伪军竟放回大枣，悻悻离开。

伪军撤离，危险解除。我祖母王敏等为四位县领导张罗着吃饭。领导们一边吃着手擀面，一边向我祖母和婶婶竖起大拇指，并大声赞扬说：“生死相救啊，真是好大娘、好大嫂。”

这时，李克东说：“我当时真想与伪军拼个你死我活，但又想到，敌我人数对比悬殊大些不说，在民宅和天围中的地形也不利战斗，难以施展拳脚。”接着他补充说：“何况真打起来等于暴露了这个工作点，损失更难估量。”

的确，那个时候，国难当头，小小的家庭就如同战场，许多的家人都积极参战。汪洋故居就是如此的所在，汪家人就是这样的担当。

**作者简介：**汪洪，革命烈士汪洋之子，河南台前人，1930年8月出生，194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1月任冀鲁豫军区报训队学员；1948年11月任华北军区机要训练大队学员；1949年4月任华北军区察哈尔绥远省军区司令部机要员；1952年7月至1952年10月先后在绥远省平地泉镇委机要室、绥远省集宁县委机要室工作；1952年11月至1964年12月，先后任内蒙集宁地委机要科、宣传部、档案处副科长、科长；达茂旗乌克镇公社党委书记；内蒙乌盟公署外办交际处处长；1965年到1980年先后任内蒙凉城县委、武川县委副书记；1980年至1993年先后任聊城地区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调研员；1993年3月离休。

## 十八棵青松般的十八名基干民兵

汪 洪

约在1940年春（即民国二十九年），日伪军在张秋县境内东南一带，疯狂实行三光政策，据点密布，纵横挖交通沟，横行乡里，到处放火烧房，血腥四溅，民不聊生。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张秋县抗日军民，坚持就地抗战；党政军民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依靠群众，全民皆兵。

那日伪军，不时地大白天从县城和各据点出来扫荡，大黑天则龟缩在城门里和炮楼中，绝不敢越雷池半步。

记得那时候，恰逢我三叔汪之忠即汪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他说，敌不让我安生，我绝不让敌睡上安稳觉，去集中破坏其通讯和交通。

于是，每到晚上，多数时间，作为县属三区武委会主任的他，大多组织民兵，对日伪军据点实行袭扰，拔电线杆，割剪电线。

利用青纱帐掩护，三叔汪川等游击队员，机智果敢，以铁桶放鞭炮，机动灵活，向炮楼放冷枪，吓得敌伪军不敢轻易出动。

与此同时，三叔汪川等人开展心理战，瓦解伪军，规劝其家属以民族大义为重，留下后路，适时倒戈，取得一定成效。

三叔汪川对党忠诚，义气豪爽。他在顾庄村的哥们儿，是十

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即十八棵青松般的十八名基干民兵。一天夜晚，趁敌不备，十八个哥们儿齐上阵，一举端掉了郑三里炮楼。

胜利的消息一经传出，不仅是在郑三里，而且在穆阳、夹河、白铺、吴坝等乡镇都引起震动，给当汉奸者以威慑，给老百姓以信心，给抗日积极分子和各村基干民兵以鼓舞。

之后，在抗战时局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我三叔汪川等人，将割剪电线的钳子、拔电线杆子的扒子当粪插子也分了，将电线杆子做了无人住房的檩子。

在顾庄村乡里乡亲中间，我三叔汪川的口碑甚佳，他办事认真而妥当，所以，跟他一起抗日者众多。

据我的记忆，这几位哥们儿一起端炮楼的有：汪之忠（汪川）、吕平功、汪敬连、吕平政、顾传友、陈伯作、陈伯让。此事，至今，还有老年人津津乐道。

汪洪草稿，2016年8月3日

（作者简介：汪洪，见前文）

## 在抗日烽火的洗炼中成长

(张杰回忆录一)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二月里来呀是新春……牛呀羊呀送到那里去？送给咱亲人八呀路军……。”

每当听到这亲切的歌声，总隐隐感到胸膛深处那埋藏已久的亡国耻辱和反抗怒火的余颤，和当年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与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的余辉，同歌舞升平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土地仍是这块土地，天空仍是这块天空，不同的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共和国成长了，人民当家做主了。

我的成长同当年长清县第二批大峰山独立三营的成长是分不开的。共同经历了抗日烽火的洗炼。这还要从我的个人背景讲起：

### 一、多彩的青少年时期与“近朱者赤”

1919年8月，我出生在黄河畔黄泛区的小村——山东长清县归德焦家寨，家境殷实，是个老中农的大家庭。父亲张福五有文



在青坨集与侦察员合影

化，在村里教书。我1927年在本村上小学，1932年到国家庄第三高小读书，1934年考入长清县乡村师范二级，录取成绩名列第十。我在学校学习功课成绩一般，不爱死读书。我爱好较多，入校后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军乐、雅乐、舞蹈、戏剧、体育等组，每天早操时在队外练号拔五音。

1934年春季运动会，我参加童子组田赛，跳高、跳远、标枪、铁饼、铅球和撑杆跳六项皆获冠军，撑杆跳在中学班与乡师班决赛时又获胜。在画展中我的一幅梅花雄鸡国画加裱展出，因此我在同学中颇有影响。

当时魏福品（魏金三，他是长清县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校学生会常委，对我很好。他主管学生伙食两个月，钱少吃的好，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并很崇拜。后来我能跟着共产党走，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与金山同志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 二、在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寇在卢沟桥打响了侵略中原的枪炮声，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国民当军队节节败退，济南危在旦夕，长清县也不断遭敌机轰炸。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义愤填膺，誓死不做亡国奴。这时，山东省委派共产党员魏金三、夏页文两同志来长清，同东关第一高小爱国校长张耀南结合，以该校为基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积极开展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建立民先组织和党的组织。我就是在这时加入民先组织的（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底，我通过村里的同学会，团结青年，先发展民先队员赵世奎、冯照繁、刘思伦、赵万英、赵万坦等，后又转为共产党员，我任党支部书记。我参军后，我村支部书记张树泉、支委张福五（张杰之父）、张丰鑫（张杰之弟）新发展党员赵子生、马庆福、女党员

刘传银、刘褚氏、赵王氏等。当时这个支部很巩固坚强，区委曾誉为“小苏维埃”。

### 三、大峰山独立营在战火中诞生

当日寇的侵略战火烧到山东，济南失守，长清县在党的领导下燃起了反侵略的烈火。

我们遵照县委的指示，于1938年7月考入聊城范筑先第六专署军政干校学习。当时我二区有唐刚、刘若与我三人入学。不久聊城失守，学校拉到城南一个大村子，因为学生多而枪支极少，没有战斗力，并且供应无着落，吃饭成了大问题，所以校领导宣布，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

我回到家后第二天就向县委写信汇报回来的经过并请示工作，很快接到金三同志的回信，大意是县委要在大峰山成立独立营，令我马上动员党员带头参军。我带党员赵世奎、群众焦兆香，于1938年10月下旬赶到大峰山黄崖参军。

到达后第二天，金三同志找我谈现在来参军的已有100多人，先编一个第一连（后改为第九连），你当指导员，焦剑侠当副连长，连长杜汉卿是刘官庄的人，不几天就来。当天上午十点左右，在大庙上召开了成立大会，金三同志在会上宣布了干部名单。下午我们又编了三个排九个班，连的兵员补充由长清一、二区动员。

大约在十一月，从河西来了个第十连，连长李清山、指导员李鲁民（原名李传廷，家是河西坊子的，是我乡师二级的同学）。

到十二月将要过春节前，王子亭同志在三黄崖动员新兵120多人，编为第十二连（又叫黄崖连），连长刘殿玉，指导员王子亭。不久王子亭又调地方工作，唐刚同志接任指导员。

当时独立营营长是吴庆林，政委是魏金三，政治部主任崔

健，副营长董涛。这个营虽然枪支不多，但人数已有400多人，集合起来出早操已很象个部队样了。部队就这样从无到有的成立起来了，迎接他的将是更大的战火考验。

#### 四、在建立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成长

1938年底、1939年初，敌人扬言要扫荡大峰山区根据地。部队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夜里顶着大风就拉到河西沿邵庄。魏金三政委决心把部队整编一下，目的是充实连队，兵要精干一些，集中提高战斗力。以十连为基础，由其他连调些骨干，编为加强连，作为战斗拳头，改名为特务连。连长仍是李青山，调我去当指导员。十连指导员李鲁民去九连当指导员。经过酝酿，各连都不同意，尤其是九连班以上干部坚决不同意，这个整编方案没有实施。

部队回到山区根据地，根据工作的需要，由全营各连抽调12——16岁身体较好的大约五十多人编为青年队，归属我连领导。这个青年队实际上作为宣传队，当时边涛（后为万里夫人）、朱慧（张承先夫人）同志教他们唱歌，指导写标语，排演活报剧。当时张明（张耀南同志的女儿）经常跟他们一起活动。有时于淑芳也跟着活动（她后来调到凤凰庄教学），搞的整个山区很活跃，到处是歌声。到1939年夏青年队才解散分到各连去。在工作中培养了不少干部，如林虎、田浩当了排的政治战士，王伟（原名王万成，城里人）当了营青年干事，李光（现名董炳宇）调县委机关文印组，后做青年工作。

在部队住黄崖初编整训期间，做了两件事。首先是魏政委抓了整顿纪律。当时黄崖党支部反映，有一位八路军的连长与一家住在山洞姓李家的姑娘胡搞，还赖着不走，在群众中影响很坏。金三同志派我与边涛同志去调查落实情况，经查明属实后，召开了军

民联合大会处决。部队受到很大教育，挽回了影响，有力地贯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增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第二件事，侦察员从肥城城里抓来一贯道两个活佛，实际上是日寇的特务组织的两个头子，是反共反八路与人民为敌的汉奸。当时召开了军民大会，判处他们死刑。这样既揭穿了一贯道反动本质和敌特的罪恶嘴脸，又破除了迷信，教育了部队和群众，使军民提高了觉悟。

不久部队就受到了战火的考验，在不断的胜利与失败中得到锻炼，逐步成熟壮大。

那时候，部队大部分都是年青人，都20岁左右，血气方刚，为打日寇都不肯落后，虽然没有战斗经验，但冲锋时，谁弯下腰都算秃种，心中虽也害怕，但枪一响都争先恐后杀敌。

我营第一仗是在翟庄南山公路上打响的。那是1938年底，部队住在坦山准备过春节时，接到情报，长清的日军到肥城去，乘有一辆汽车。我们选在长肥公路翟庄南山伏击敌人。战斗打响，日寇汉奸被围困在山上，日本鬼子被打的“嗷嗷”乱叫，并烧掉敌人一辆汽车，打死打伤敌人10余人。后因长清日伪援兵来了，我即撤回坦山。这一战虽未全歼敌人，但也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我方只牺牲一名通讯班长。

1939年初，天已不太冷时，金山政委去特委开会，令我去护送。返回后，正值张耀南同志在河西搞工作团，我连第一次到河西配合活动，扩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当时东进支队还有一位特派员跟随活动，他经常到连里来与我联系，有一天夜晚，我还协助他抓捕了一个汉奸。

当天住在董家桥时，连部住到我乡师二级同学董景库（现名董千里，已离休，在北京国防科工委北京第一干休所西郊太平路13

号)家里,他刚结婚,还陪着我睡了一夜,用他的话说:“我是舍命陪君子。”他已与工作团有联系,尚未脱产,我劝他脱产好。

1939年夏末秋初,谷子尚未熟时,张耀南当县长后,我连又第二次到河西活动,配合推行抗日政策的实施。在返回大峰山根据地过河以后,路过连长杜汉卿的家——刘官庄。我让杜连长回家看看,我带部队在土屋休息。连部住在一家姓赵的地主家里,因我患了疟疾,为早日病好狠吃药,同时吃了金鸡纳霜、四灵散等三味药。由于吃药过量,转为严重的急性胃肠炎,发高烧,头昏头痛,全身瘫软,饮食不进,险些丧命,不得已留在土屋养病(据说这位姓赵的地主是共产党员)。

在我养病期间,李玉华同志(家是聊城城里人,高中毕业)代任九连指导员工作。我病稍好,回营部休息时(因我是营分总支的委员,党的生活编在营部首长小组当组长),有信说,六支队政治部要调我到支队做青年工作,原营长吴梦观同志早已调走,副营长董涛同志也调走了,新调来的营长张玉山是位红军长征老干部,打仗很勇敢,指挥能力强,工作有魄力,很受同志们的欢迎。到职后不久,他带九、十两连到河西赵官镇打击企图安设据点的日寇。但此仗真是出师不利,营长张玉山同志不幸牺牲,九连连长杜汉卿同志负重伤,因未及时抢救下来,流血过多而牺牲,部队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回到大峰山根据地后,九连的干部战士情绪不高,思想混乱,都埋怨李玉华同志,并要求我再回连里。魏政委为了巩固部队令我暂时回连工作。

1939年夏末,原范筑先部31支队司令(后为平原纵队副司令)管大同同志带一个连(系部队受损后缩编为一个连,司令员袁仲贤同志也调回鲁东115师任作战处长)到大峰山编入我营建制为第十一连,连长凌林、指导员关\*\*、副指导员李应(现改名

李玉林，湖北省军区副主任）、副连长焦剑侠。该连武器较好，并有一挺日寇歪把子机枪。到这时，我营已有四个连队，600多人，部队情绪高涨，战斗力加强。

1939年秋，魏政委率领九、十一两连计划再次到河西活动。从半边井向北进发，进行破击战，一路割电线，破公路，搞了一夜，拂晓部队到凤凰庄暂住休息，准备继续北进过河。不料下午三点许，万岗据点日寇来偷袭，摸了我十一连村西北角上的哨兵，哨兵因疲劳睡着被敌人打死。日寇偷偷进村突然开火，枪炮声响成一片。我军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仓皇撤向东山，边打边撤。我连负责内卫及营部的警卫。营部与我连住在村东南靠山的東西街上，营部在路西南，我连住路东北错对门。

我正在屋顶上睡觉，村里的小学教员于淑芳来找我玩，带班的排长上屋顶告诉我：“小于来找你。”我很疲劳，就顺便说：“你告诉她我不在。”他走了不一会，突然枪炮声响连天，我知道坏了，被敌人袭击了。我一面集合队伍，一面掩护政委和营部人员撤向东山。我带一个排断后，当政委已上山后，敌枪炮声渐稀。我连就撤到山脚隐蔽待击日寇，发现敌人没敢追击，我们才撤到山顶，这时已到黄昏，看到政委坐在圈椅上，才知他左臂负伤。政委讲，刘若同志左股也负伤，他已骑驴走了。

这次被袭，我（连）侦察副班长小张牺牲，轻伤五人。当我向政委请示任务时，他命令我带一个排，在山上警戒到天黑后，到黄丽泉找我们。

国民党顽固派专员郁仁智部一营，已被我曹洪胜部（前大峰山独立营）歼灭在泰肥山区。其顽军第三营又到平阿山区抢占我已开辟的根据地，我营奉命消灭该顽匪，于罗圈崖一带，全歼顽军第三营，从此巩固了我泰西长肥及平阿山区两个根据地。

1939年11月间，我营正在平阿山区活动，没在大峰山，因此敌人造谣说：“长清独立营被消灭了……等等。为辟谣，九连奉命由平阿山区返回大峰山。金三政委指示其任务：一是扩大影响，消除敌人谣言影响，稳定家属和群众的情绪。二是动员逃兵归队。

春节前我连回到山区，靠近张友壬同志的独立营。我连住在房山谷，警戒石岗据点之敌，准备过年。山上放一排哨（排长带一个排），次日拂晓被石岗日寇偷袭成功，全排在我排长指挥下英勇抗击，白刃搏斗全部壮烈牺牲。正当连队出早操时，敌人居高临下，集中炮火突然袭击。情况太突然了，被迫撤离到村东山沟后，才弄清情况。这次战斗牺牲马夫一人，丢马一匹（当时每连配马一匹，备连级干部驮东西用），排长及一个排的战士，全部牺牲。这样大的损失是第一次，所以干部战士都很气愤窝火，全连同志一致要求寻机打个胜仗给敌人以报复，给死伤战友报仇。在这种情绪下，部队转移到马山一带活动。一天，地方同志报告一个情况，万德车站桥头上日寇设一个班，一挺机枪，六〇炮一门，共十余人。夜间设岗哨一人，其余人睡觉时将枪捆起。只需三人带手枪、手榴弹，突然摸进屋里，两颗手榴弹就解决问题。当时未经详细周密调查研究，就急于要打。先决定由副连长睢福林带一名班长，我和李玉华同志争着要去，因我在房山谷战斗中脚脖扭伤走路不便，没争过李玉华同志。他们这个战斗组各带手枪、手榴弹，由地方同志带路，赶到桥头时，已是夜里十一点，急速过桥一半时，被敌人发觉，开枪射击，当三人迅速回返时，李玉华同志不慎摔下桥去，头磕到河卵石上不幸牺牲。

因连受两挫，使我们头脑清醒，来时政委明确指示没有战斗任务。我连返回大峰山区后，就接到营的指示，要迅速返回平阿

## 台前

山区接受新任务，动员逃兵的任务。留下文化干事底清海同志，依靠地方党政机关协助完成。我连遵照指示连夜返回平阿山区。

1940年春，我营奉命由平阿渡过东平湖到戴庙待命整编，在戴庙以北高家集一带住下。这时正值日寇一个骑兵连进占戴庙。金三政委当晚率我连袭击这股日寇。敌住戴庙东北角大院里，马都在院内马廊里。该院西边紧靠着一个住家，并且房子较高，正好能隔院投手榴弹炸其马群，地形对我袭击有利。

我连副连长睢福林带三排占敌西院房顶，我带二排做二梯队随时接应。政委随一排由连长乔杰带领在戴庙西北角十字街做警戒，保障后卫不受袭击，并便于撤退。营部指挥所设在十字路西小庙。

战斗打响后，炸得日寇马嘶人叫乱作一团，约有半个小时，只听到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后来敌人展开火力时，集中向房顶射击，我副连长睢福林牺牲。敌人炮火太密集，这时政委命令快撤退，并将副连长的尸体一定要抢下来。

据战后了解，日寇死伤战马60多匹，死伤30余人。我连除副连长牺牲外，伤两人。敌人受重创后，第二天仓皇逃窜。

我营到鲁西后首战告捷，情绪大振，为戴庙一带根据地扫清了敌人。

在这个时期，我营先编为泰西六支队三营，后正式编为鲁西军区运河支队第四团，不久改为鲁西军区野战部队教三旅属下。后改名为三四三旅第九团，我营仍为第三营，我连仍为九连。营长：高塔拉，教导员魏金三。团长何光宇，政委刘汉。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旅长杨勇，政委苏振华。

1940年夏，九团奉命到范县一带打叛军石友三部。

叛军住陈楼、陈桥一带。我团进到陈桥、陈楼一线，我九连

为先头连，一个连进驻陈楼，被叛军一个团包围，激战一整天。叛军曾组织三次突然进攻，均被击退，等到夜晚十点才奉命转移。第二天，由六集轻装急行军跑步18里路，赶到龙王庄南树林暂停休息。时值三伏，天气炎热，部队虽有不少人中暑躺到，但部队的战斗情绪非常高涨。金三政委虽然身体虚弱，但仍和我们一样带头跑步18里。

当天下午，山西陈世渠支队抽调轻机枪数挺，我营每连配属一挺加强火力，这样连里的战斗情绪更高了。

我连的任务是从叛军驻地陈桥正东正面进攻。陈桥有寨墙，工事坚固，武器装备好，火力强，白天强攻伤亡太大，因此改为步步坑道作业，尽量接近敌人，待夜间发起总攻击。白天轮番组织佯攻，火力侦察。

叛军发现我们是主力军。围攻部队有三四三旅（七、八、九团）全部；山西陈世渠支队全部；肖华支队全部。总指挥杨勇司令员，政委肖华。我们将叛军团团包围，形势对叛军不利。到黄昏后，敌即向西南突围逃窜，从此鲁西根据地连成一大片。

1940年夏，打击“红会”。在石友三叛军逃窜后，除山西陈支队外，杨、肖大军挥师东下，到长清河西三区潘店以东，赵官镇以北，以联五庄赵连城的老窝枣杨庄为中心，摧毁平息会道门。

当时会道门头子赵连城十分嚣张，他已称帝，身着蟒龙玉带，封了娘娘、皇姑、驸马、宰相、大臣、将军、元帅等。他早已投靠日伪，并发给其枪支，建有常备武装。公开反共、反八路，与人民为敌。

部队对会道门的据点发起攻击，我营任务，消灭胡官屯的会道门。肖华部队打联五庄。经过三天战斗，将这一带赵连城的反动王朝君臣全部活捉，将这个危害很大的封建反动组织、日伪的

特务组织彻底摧毁。

我团不久又奉命到郟城打小民屯伪据点。该地是个汉奸区公所，有武装数十人，据守两丈多高的寨墙，对我危害很大。第一次打击，我连负责扫清外围，并伏击郟城来援之敌。第二次打击，我连变为主攻，从围墙的东南角，利用自制的云梯登城，全歼该敌。

1940年夏末秋初，我九团奉命到巨野以南开辟新区。该区是日伪顽军活动区（顽军是国民党顽固派以反共为实质，消极抵抗，勾结日伪的军队），组织有自卫团八个。以羊山“姚团”最反动，直接受日寇指挥并配有常备武装。以“李团”较进步，持中立态度，但他归“姚团”调遣。这一带土围子很多，夜间围墙上岗哨，灯火一片，梆声响时，寨门紧闭，部队无法进驻。凡有土围子的大村子多是乡长兼自卫大队大队长的驻地。

我们选小村住下后，金三政委胸有成竹地命令我带一个排到寨里以要粮为名，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乡，其目的是将该寨的“李团”大队长请来，做人质进而再争取李团长。

我进寨前，先将这个排留在寨外高地树林中等我。我只带通讯员进寨。没找到大队长，我就对围观的群众宣传抗日十大纲领，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为团结广大老百姓共同抗日救国保家乡的，并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策。在人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就提出要粮的要求。有的群众说，再好的队伍也得吃饭，但这得大队长乡长说了算。我就顺口让他请大队长出来商量。

大队长出面后，把我请到乡公所。经过自我介绍，大队长姓张，以此拉成族家兄弟关系。他一面办酒席请我，一面布置缴公粮。饭后当我走时，他一直送到东门外，部队看到这种情况，就过来跟在我后边，在我握别时，我向他提出，我们首长请你到部

队去谈谈，请你放心，我保证你无事。此法很有效，他跟我们顺利到营部，交给金三政委，又通过他争取了李团长，从此部队在这一带扎了根。

部队驻大田集时，哨兵送到连部一位可疑人，经查问是黄克诚部队负伤在家养伤的一位排长。他听说集上来了部队，不知是什么队伍，他就借赶集来探明情况。既然是一家人，不说客气话，就请他给部队动员鞋袜……。后来又通过他，拉来了当地部队100多人，经请示团部，给予“巨野大队”番号，并派原12连指导员唐刚同志去当教导员。这个地区能很快地打开局面，与魏金三政委统战工作有办法是分不开的。

1940年9月，鲁西军区根据地正在巩固，军区政治部集训连、营、团三级政治干部，办训练班。内容以刘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修养为主和学党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启发报告和讨论。政治部主任付竹亭同志亲自做启发报告，时间约月余。结业时，留我到军区给杨勇司令员当秘书。由训练班支部书记李大同（现名左宏奇）同志先给我谈的话。从此我就离开了九团三营九连（也就是大峰山独立三营九连）。

我的军旅生涯是从长清县独立三营九连建连开始的，又随着部队的成长壮大而逐步走向成熟的。

长清县独立三营，是抗日初期长清县党委组织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我党地方抗日武装。由于当时武器装备太差，且大部分同志没有军事素养，因此，虽然升级为三四三旅九团三营，但是与别的老红军底子的部队比，打仗是有差距的，因而群众有评价说“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后面吃干饭。”但是九团也有突出的特点，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创建新根据地是相当擅长的。如平阿山区、巨南平原两个根据地均是九团开辟的。九团在战斗中不断地成

## 台前 在台前

长，到1945年日寇投降时，打长垣、曹县两个战役中，攻坚能力已与几个红军为基础的老团第七、十团不分上下了。

1948年，在世界闻名的与蒋匪军决战的淮海战役中，该团发挥了更大的威力。战斗力、战斗作风都显著提高，该团团长晋士林同志在这次战役中为党和人民捐躯。

当毛主席、党中央决心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号召全军追穷寇、彻底消灭蒋匪军时，这支部队毅然跟随大部队，挺进极度艰难困苦的大别山区。然后进军云、桂山区，并挥师西进到康藏，完成了全国解放的任务。

全国解放后，于1961年，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这支部队在装备了防化兵的轻、重喷火器的情况下，更发挥了步兵五十五师（我九团三营也编入此师）火龙般的威力，使侵略我领土的印军无法抵抗。打出了军威、国威！这也是我们长清县党和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以上情况是我1977年会见济南军区原副政委殷法塘同志（他是原九团一营分总支书记）时，谈心中所得知的情况。

# 抗日战争中我在冀鲁豫军区的工作与战斗

(张杰回忆录二)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 一、为杨勇司令员当秘书

1940年9月，军区政治部组织的连、营、团三级政治干部训练班结束后，我被留到军区，为杨勇司令员当秘书，从此离开了九团三营九连（既原大峰山独立三营九连），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 二、六十万“中央票”的故事

1941年4.12铁壁合围打扫荡时，我鲁西军区驻苏村警卫营被日伪军（包括80余辆坦克，500余辆汽车）团团包围。激战一昼夜，弹尽后，把武器砸毁或埋藏后，与日寇决死白刃搏斗。全营除了轻伤员30余人，由副教导员陈昌银同志率领，趁夜突围脱险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我军代价很大，敌人死伤约千余人。

而庞大的军区党委行署等机关近万人，被敌人飞机低空轰炸扫射后，虽然“放了羊”，但损失很小。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杨勇司令、苏振华政委把我和苏政委的秘书张勋叫到跟前，把用骡子驮的给党中央上缴的六十万元国民党中央票交给我们，派了四个武装警卫员保护着安全突围，并交待我们：“人在骡款在，丢掉款子由你俩负责。”

开始我们与大队人马一起突围，随着骡子队一块跟进。敌机

低空扫射轰炸，我被炸弹崩埋了半身土，幸而没被炸伤。但看到驮地图的骡子被炸着，炸得图纸满天飞。我看到骡子集中在一起目标太大，敌机追着炸，十分不安全，我就拉着骡款离开大队，向东北走。过了个干河床，天已近黄昏，这才脱险。但天一黑，在农村旷野中，找不到正路，更不知向何处找机关部队，只是向东北方向跑，生怕遇到鬼子，完不成任务。这时遇到一个村庄，先摸清情况，正好碰上我县大队与县委书记张新村同志，我们就放心了。我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任务，要求他们保护并护送到军区司令部。他们很负责，派了一个连护送我们到军区司令部。

这时，杨、苏首长正在焦急等待，担心我们丢了骡款。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听我们汇报了突围情况，并交清了骡款，我们才卸任放心了。

### 三、为杨得志司令员当秘书

1941年5月，杨勇司令员调延安学习，我即留在司令部作战股当作战参谋。同年十月集总巡视团到鲁西军区办轮训大队，组织上又送我去学军事。三个月结业后，于1942年1月又调我到冀鲁豫军区司令部，给杨得志司令员当秘书。原鲁西军区机关由曾思玉同志率领，编为二分区机关（有关首长们的故事，我准备专门写个回忆录“某某二、三事”之类，这里不多讲了）。

1942年4月部队整编，精兵简政。针对日寇的战略方针“林立据点，深沟高堡，分割囚笼，蚕食政策，结合铁壁合围大扫荡”。我军以战养战，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化整为零。连队实行政委制，分散打游击。

根据这种情况，我本来就十分想上前线，就要求下连队工作，再去打游击。这时正赶上鲁西南五分区司令员昌炳桂到军区要干部，领导同意我调到五分区工作。到分区后又未遂心愿，留

到分区司令部一股当作战参谋兼秘书、军法干事。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敌人扫荡频繁，战斗残酷，又加旱灾欠收，生活极端困苦。部队战斗情绪一度低沉、贪污腐化、伪造粮票及战场上怕死等情况时有发生。当时仅送分区处理的犯人就约有六、七十人。警卫连押看犯人成了包袱，更削弱了战斗力。

分区首长决心另成立个临时执法队。令我集中精力，限期三个月，把这批犯人处理完毕。于是我组织了内查外调，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精神，根据当时的军法纪律条例，正确做出量刑的结论，经首长研究批准，分别处理，按时完成了任务。

不久，又责成我抓队列工作，并主管干部管理工作。

后来，分区又组成轮训队，令我任队长，组织科副科长王少江任政委，轮训小部队，目的是提高政策纪律观念和军事素质。

当时战事频繁，有一次战斗最危险，而又最幸运。

#### 四、一天挨了三颗手榴弹

1943年9月，打古云集时，我部队冲进集内与敌人巷战，司令部也进入集内。我去司令部院中，在房侧的夹道的厕所中方便，忽听“咚”的一声，只见一颗手榴弹隔着院墙打到厕所中，我来不及提裤，一个箭步蹿出夹道，猛一拐弯，只听轰的一声，炸得粪便满天，而我已转过房角，刚进入安全区，躲过了一难。

这时敌人已大部被歼，最后只剩下城墙东南角上的碉堡。日寇据守顽抗，死不缴枪投降。分区司令李东潮同志命令我带炮兵连打掉这个碉堡。因炮是我边区改造过的迫击炮改平射，非靠近射击才能生效。我们选择靠近碉堡的一堵矮墙为阵地。我带一排长等人选好位置挖通炮眼，准备射击时，没想到墙外有战壕通碉堡，敌人顺战壕过来。本来距离只有几十米远，又从战壕接近，

## 台前

向这边扔来了两颗手榴弹。因距离近，十分准确，都打到我脚下，我立即弯腰去抓，想扔回去。还没来得及抓到手就炸了，把我的左脸喷黑了，左耳膜震破了。后来左耳一直半聋，但全身上下一块弹皮也没崩着，真是侥幸之极！距我稍远的排长、炮手均被炸伤。我们立即撤回。

这一天我挨了三颗手榴弹，真是凑巧，均未炸伤，万幸，万幸！

在战争中，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因此能活下来的同志都是很幸运的，战争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捐躯而获得的。

抗战后期的工作及最后的两次战役。

在抗日战争中，我一直在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工作。1943年11月朱程司令员带来的民军（国民党张阴吾部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八团。该团政治处主任因违反政策调回分区，原来决定调我到该团任总支书记代主任工作，组织科已给我谈话，后又改任团作战参谋。

到1945年6月我又调回五分区司令部任作战股长，主要做反攻准备工作。“八、一五”日寇投降后，湖西三分区与五分区部队暂时编为三纵队，司令员殷宪宾、政委赵基梅、政治部主任岱润生。三分区作战股长张辽与五分区作战股长张杰和署办公。

这期间打了两次战役，第一阶段：1945年6月份先打长垣战役，缴获很大，还歼敌一个骑兵营，获战马近千匹。

大约于1945年8月初打的曹县战役。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役结束后，第一次组织入城仪式，召开了军、政、民祝捷大会，很隆重热烈，大会开的欢声雷动！

正好消灭了敌人过八月十五，部队休整后，三分区的部队回归湖西三分区建制。

1945年9月初，以五分区司令部为指挥部，司令员王秉章、政委董君义（现名段君毅）组织二、五分区部队开展第二阶段打曹州府战役。战役中采用了坑道作业，用棺材盛炸药，炸飞南门楼，部队很快攻入城内，全歼敌人。部队经短期休整后回归原建制。

抗战结束后，很快就进入了消灭国民党蒋匪军的解放战争。

## 驰骋冀鲁豫，消灭蒋匪军

（张杰回忆录三）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 一、转战黄泛区，牵制蒋匪军

1946年春，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除组建杨（得志）、苏（振华）纵队出关北上抢东北外，同年四月又组建一个华北军区独立一旅，调我到该旅任作战股长。当时该旅由一个骑兵团和睢东分区的一个团组成，由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潘焱率领，从兰考过铁路，经过黄泛区，挺进到河南省杞县、睢县、太康一线，其任务是将围困李先念部队的蒋匪军十几个整编师吸引过来，支援李先念部队突围，并以牵牛和回马枪的战略战术夺得胜利。



在冀鲁豫军区时

当把蒋匪军十几个整编师和原伪满军张兰凤的五个师吸引到我杞县、睢县、太康根据地一带后，敌人企图缩小包围圈吃掉我军。这时，我军开始反攻，一举吃掉敌人步、炮两个营。蒋匪军发现我不是地方部队，是正规军，立即退兵50里外。接着我军乘胜由东向西连扫数个据点，最后打下吕潭（吉鸿昌老家），休整一个星期等着敌人。那时，部队行动迅速，经常将敌人甩掉，但

为了牵制敌人，只好留下一个连，等敌人来狠狠地打他一下，然后从容不迫地再带敌人跟上来。

在吕潭休整期间，派遣我二团团长，通过内部关系进入张兰凤的老巢柘城。待把地形、兵力配备图送出以后，我军以釜底抽薪、长途奔袭的战术，当天下午由吕潭出发，到拓城约200多里地，部队快速急行军，于当夜11点到达拓城。马上进行攻城，仅一个小时攻进城内，到早晨七点全歼该敌所谓的“方面军司令部”，捣毁了由民国初以来数十年未曾动乱过的老巢！并俘虏了张兰凤的独生女儿，以此作人质，迫使张兰凤起义投诚。

这次战斗缴获极大，机枪100余挺，炮数十门，炮弹、子弹数十万发（均系美国装备的红、绿屁股门的崭新子弹）。另外，还有海洛因也叫白面的有三十多皮箱，大烟土三千多斤，黄金八十多斤。其他还有服装仓库一个，约有日寇装备的卡琪布军衣、衬衣40万套及一个军械库。由于情况紧急无力全部运走，只好忍痛一把火烧掉。大火冲天，炸声不断整整响了三天。张兰凤这时虽然赶到了离拓城八里的一个团驻地，但也只能眼看着自己几十年经营的老巢被烧掉而望洋兴叹了，也不敢进城救火。

我们缴获的这些战利品装了十几大马车，皆上缴军委，为以后的陇海战役准备了不少弹药。

任务完成后在夏邑休息一天，由商丘以东过铁路，回到老根据地范县休整补充兵员。

## 二、万福河畔遭遇战，负伤捡条命

独立一旅在补充兵员后，又奉命到定陶一线，配合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我旅的骑兵团由西向东顺万福河前进，预计在双方运动中，伏击由东向西的蒋匪一个师，准备在常集口万福河畔伏击敌人（这种战术为运动中的急袭战）。因行军中步、骑兵

## 台前

配合不利，伏击圈有利地形被敌人占领，骑兵团行动迅速，早与敌人接火，在精神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遭敌炮火突然袭击，我军骑兵一个排受损，只好下马进攻，待我旅主力到达后，由伏击转为强攻。

当时我带司令部机关前梯队（特务连、侦察连、通讯连、司令部机关等）顺河北岸堤下前进。为及时观察敌情，我带特务连先头排长上堤上观察，刚走到河口，河南岸堤上隐蔽之敌突然开火，第一发步枪子弹击中我左胸，紧接着—梭子机枪弹打到我左臂上，棉袄袖子全打开花了，却未伤到我左臂。因流血过猛过多，我昏倒在地。排长把我背到堤下，并迅速架上两挺机枪，用火力压制住了敌人。这时我旅政治部主任屈兴栋同志带担架上来，将我抬到北村里包扎所。卫生处长给我打了强心针，我才苏醒过来。后经检查，第一发子弹穿过我左肺，据心脏仅二指远。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在这之前凡肺部受伤者100%死亡。因为按习惯的治疗方法，是用粗布沾食盐水做药捻子，贯穿胸部来回牵拉以排脓消炎。但此法不仅不能消炎，反而带进细菌导致化脓而死亡。我入院时，刚好改变方法，用针剂从内部消炎。经过四个月的治疗，基本痊愈。虽然肺部受伤严重，但赶上好的治疗方法，又加上有药，我又捡回了一条命，幸哉！幸哉！

### 三、千里黄河军渡忙

#### 1、调到黄河司令部，组建河防营。

我伤愈后，回军区等待分配工作时，感到三次负伤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时又处于自卫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效命战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又觉得前线的战斗实践是最锻炼人的。基于这个想法，再不愿机关里工作，要求南下到野战军去当营长。

当时也巧，军委考虑到部队大兵团渡黄河的需要（当时是刘邓大军渡黄河），决定成立黄河指挥部，保证渡河任务。司令员曾宪辉、政委郭英、副司令刘茂斋、参谋长梁仁魁、副参谋长谭光汉、政治部主任李兴城。除了机关，沿河每个县组建一个水兵大队外，还设有一个河防营，以此为核心，组织沿河县、区地方武装防敌偷渡，维持主要渡口秩序，防奸防特，保证黄河南北交通顺畅，同时把住关口，根据地粮食禁止外运。

河防上正缺少军事干部，准备调我去，我也正要求上前线，但这个半地方性的军队我不愿去。经军区副政委赵健民首长谈话后，我才接受了任务。我的主要职务是，除了造船、生活管理不管外，其余凡是作战任务和司令部全部军事工作（包括作战、侦察、通讯、队列训练等），以及河防营的全面领导、组织、协同地方武装作战等。总之，凡是军事方面的工作都管。

1947年5月我到职后，司令部机关除几位首长外，军事股只有我一人。我首先组建军事股机关，物色一位有文化的年轻的公安战士段维忠同志为首长办公室守机员和文件记录管理负责人。经试用提为作战见习参谋，后为参谋，干过旧军队的电话排长的高自怀提为通讯侦察参谋，改造后的国民党军队的连长黄玉山为训练参谋。营部配一名1938年的老党员刘久清为管理员，东阿县小学教员姜\*\*为营书记。同时组建了通讯侦察班。我又任首长办公室主任。这样虽然编制不健全，但已能正常开展工作了。

### 1、组建河防营

河防营的三个连是由各县县大队调来组建而成的。范县调来的是一连、连长王玉祥；指导员冯书堂。寿张县调来的为二连、连长朱来文，指导员王\*\*。河西县调来的为三连、连长赵世英，指导员尹华，副指导员倪洪仁，副连长沙兰堂，

机炮排长董冠五。每个连轻机枪九挺，每班一挺外另配军区后勤造的五零炮一门。机炮排重机枪四挺，迫击炮四门。另配缴获的六零炮一门。

按装备来说，在当时是很强的。有时部队过河也会留下部分武器。在当时条件下，我们的造船厂已能制造可载四辆汽车或坦克的大船，载步兵能载一个营，摆渡能力大大加强。

### 2、架设跨黄河指挥电话线

有史以来黄河天险不仅涡流多、水急、变化无常，主流多漂移不定。孙口渡口跨度太宽，要想架设跨河电线困难很多。

我带全营到孙口渡口，先摸清河宽度、水流急度，河中心大流宽度。在计划中需要几支大船做桥柱，两岸的绞盘需要多大等问题。等绞盘做好，试用能用时。两岸各分一个连，中流船柱上一个连，我控制一个排做预备队。经全营奋战一天，从早上8点半开始，直到下午4点，电线拉断了三次，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架好了电线，使黄河南北通了话。紧接着又将河北岸沿河西起鄆城、东到东阿玉山架起了电话线，保证了军事交通运输的指挥。

### 3、大军过河军渡忙

1947年6月以来，渡黄河南下的部队增加，除了二、三野战军因为作战的需要来往运输外，又增加了不少兄弟部队的运输任务，军渡运输量增大。河防指挥部的几位主要首长分头到主要渡口组织指挥军运，曾司令员到寿张的孙口中心渡口。

1947年8月，刘茂斋副司令员到濮县李桥渡口。

郭英政委在家主持全面工作。

当时西线李桥渡口任务较大，除二、三野战军来往渡河任务外，还有越中部队第十纵队渡黄河南下，他们每个干部都带有银元，以便南下后开辟新区的需要。

我奉命带两个连到李桥渡口，为刘副司令员组织军渡做保障，并维护渡口安全。

在李桥渡口时，还执行了个临时任务，将野战军俘虏蒋匪军营以上军官的俘虏营护送到渡口以北20多里的桑村集住。真巧，第二天是该集的古历大会，到上午八点，赶会的群众已约万余人，目标很大，结果蒋匪军的八架飞机赶来扫射轰炸。

我营在看好俘虏的情况下，组织对空射击，经过约一小时的交战，敌机逃窜。我一机枪班两名战士被炸塌的房子砸成重伤。村民损失较大，该机枪班后院被炸弹炸了约十米深的一个大坑，有一头小毛驴被崩到了寨墙外边。我在通讯班房内被震了一身土。村里的群众死伤各六名。还好，俘虏全部安全，没有乱。我们把俘虏安全地交给上级军委，胜利完成任务。

一天拂晓，李桥渡口的河南蒋匪军联合还乡团企图强渡，打枪打炮以示吓人，被我一连击退。这时在渡口见了两辆崭新的自行车，上边载有边币40万元，失主是濮县银行两位会计，经问明情况后当面交还。人民子弟兵打退了敌人，保护了国家财产。

1947年7月，孙口渡口南岸，蒋匪军配合还乡团，企图拂晓偷渡到大桥村我造船厂进行破坏。我以一个连的兵力击退了敌人，保卫了船厂的安全。

1947年7、8月间，三野十纵把蒋匪军新五军、邱清泉部拖到黄河边来，保证野战军南下过江。孙口渡口的军渡任务太大，因此于孙口东的万那里开辟新渡口。同时新成立的琼崖纵队（亦名12纵队）赵基梅司令率部由万那里渡河。

我随谭光汉副参谋长组织军渡48天，每天只睡一、两小时，基本上只打个盹，还要挨飞机轰炸，那时几乎失眠。以后也落下了神经衰弱的病根，但保证了大军渡黄河南下任务的完成。

我从万那里渡口回到司令部，就着手于河防营的秋训，重点是四大技术的苦练，主要是各兵器（步、机枪、重机枪、五〇、六〇迫击炮）实弹射击，成绩全营达到良好以上。三连全优，战术以连、营攻防夜战为主。

#### 4、千里河防战事多

1947年11月，我营奉命到东阿县位山、玉山、苦山一线加强河防。当时河的南岸，东阿城内之敌（据说系汉奸汪精卫伪满治安军）一个团进驻斑鸠店，企图破坏我魏山渡口。

二月初（春节过后），我以两个连夜袭该敌，成功地歼敌步、炮两个班，缴获六〇炮1门，步枪十多支，我无一伤亡，迫使该敌于第二天全部逃窜回东阿城里，保证了魏山渡口安全。这次战斗是我营成立以来第一次象样的大规模战斗，首战告捷。

1947年12月，到军区整党学习三个月，重点以阶级成分、阶级斗争为中心，我们这个小组成员以河防指挥部几位首长为主体，我任组长。

整党的结论：我家定成分为中农，在整党结束的总结大会上，付家选参谋长宣布：张杰同志留军区另有任务（主要是十一纵一旅参谋长毛定远要我到一旅）。结果河防几位领导都不同意我的调动，说调走后军事无人管，我没有走成。

1948年5月28日到6月底，由司令部驻地长刘（现台前县城关镇长刘村）出发奉命参加军区组织的豫北战役。

教导员抽调政治处，特派员王庆忠同志兼任。经两天行军，因天气较热，到军区指挥部后王庆忠同志感冒引起哮喘病复发，即坐担架返回长刘。

这次战役中，我营共作战三次：

第一仗，我带一连，半夜急行军，一小时18里到达孟庄将还

乡团区部围住，拂晓发起攻击，没打几枪就将敌歼灭，缴获战马一匹，步枪8支。该敌闻枪声后没来得及还击，丢枪逃窜。

第二仗，全营围歼一个大寨子，寨内正唱豫剧，据侦察得息有还乡团80多人看戏。我营二、三连，由寨墙西、北、东三面包围，我带一连由西南门攻入会场。一阵排枪将敌吓坏，除俘虏带短枪一人外，全部藏在看戏人群中逃窜。战后统计：缴获短枪1支，步枪5支。

第三仗，季城战斗。侦息还乡团300多人和一个敌县政府在季城。我军决心以四分区两个团（每团6、7百人）和河防营将近两千人以强攻围歼该敌。

我军当时决心很大，信心很足。四分区部队由北、东两面进攻。我营由我带二连由西南进攻，一连由西北进攻，三连跟在我后边作二梯队，机炮排由梁仁魁参谋长带领作火力掩护。

部队发起进攻，进展很快，攻到城下时，敌人突然反扑过来。大批敌人密集群团，光着膀子，手持刺刀枪，不要命地冲过来。我军人少，陆续后退。为挡住敌人，我上前组织人员抵抗，但让冲过来的敌人抓了一把，我个子小，赶紧后退，没被抓住。与警卫员跑到一片坟堆，射击抵抗。三连上来把我接应下来，这时才发现是还乡团顽匪王三祝的全部人马，3000余人都住在城内。王三祝系过去中共一县委书记，叛变投敌，组织地富反坏，建立还乡团，大部分为阶级死敌，亡命之徒，又兼之运用毛主席的“十六字令”等游击战术和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战术来反对共产党，十分顽固。他们非常反动，仇视共产党，如果我被抓去，共产党的营长肯定要剖腹挖心点天灯。

因情况突变，一时对我军不利，我们人数不足2000人，在部署和心理上都准备不足，军区刘志远司令员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我

## 台前

军虽稍有损失，但我军的炮兵发挥了威力，顽匪头子王三祝知道我们也是主力，不敢追赶，缩回城内，趁我军撤退之机仓皇逃窜。

豫北战役我营牺牲连长、副连长各一名，伤战士4名，整个战役只有我营稍有缴获，军区刘志远司令做总结时还表扬了我营。

### 四、冀鲁豫剿匪，巩固大后方

在1948年底组建十一纵队时，军区已下调令，调我到纵队司令部任队列军务科长。调令被河防领导扣押四个月，直到调河防司令曾宪辉同志南下，才拿出我的调令，并一同去军区报到。同行的路上，曾司令员动员我随他南下，这正中我意，很愿意南下，但到了军区，我的工作已定。于1949年3月到新组建的华北军区独立二旅司令部任作战训练股长。其旅长余克勤，政委廖亨禄，政治部主任刘世洪，没配参谋长。

我1949年到职后，即开赴新乡城东五、六里一线，担负东南至东北方向的围困封锁任务。西、南、北三方由十四纵负责。在围困期间，敌40军曾向我防区进犯，我旅全歼敌人两个连后，敌再也不敢出城。

四野主力九月到达后，连歼新乡、安阳两据点，拔掉两个钉子。

1949年底，我旅奉命到河北其门、新镇、道口一线，剿灭京津一带地区的土匪，并同时整训。

北平和平解放后，本来应编师入朝，因天津沿海盐场偷税漏税严重，国家损失太大。二旅部队政治觉悟很高，党团员占部队总数60%以上，军委决定将独二旅缩编为盐警团，以便分散为班组护盐，司政后机关回平原省军区另行分配。

我旅政委廖亨禄调省军区军政干校任政委。

这时军区首长已给我谈话，让我到军区作战科暂时帮助工作，我爱人赵勤到军区后勤部家属队当指导员。工作还没到职时，廖政委动员我随他到军政干校工作。我当初我给杨勇司令当秘书时，廖政委在鲁西军区政治部当保卫部长时就很熟，老首长互相了解，工作心情舒畅。于1950年3月跟廖政委到辉县军政干校。

该校共有干部队十三个，还有一个培养优秀战士的三大队，一个专学文化的分校。我分配到二队（参谋队，文化较高，尚有天津业大挑选来的一部分）任政指。

当时校里对在职干部理论要求很严，对我来说，战争年代没条件学习，到校后，有和平的环境，条件具备，学习抓得很紧，每天夜里都学习到凌晨一点才睡觉。当全校在职干部300多人理论测试时，我成绩分数最高，张榜名列第一，从此调我到校部任专职政治教员。

## 为军队建设贡献力量

(张杰回忆录四)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 一、投身防化兵建设

全国解放以后，1952年7月我所在的军政干校缩编为教导大队，我又调到石家庄华北军区政治干校理论队进修。到1952年底，又调到华北军区（后改北京军区）党史训练班学习。到1953年8月学习结业，因学习成绩好，留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干部教育工作，分工专管学校教育管理。



解放初期

不久，军区防化兵处扩大，又调我到防化兵处（现已改为防化兵部）任作战侦察训练科长，并代理处长一年。

在这期间，在苏军顾问直接指导下，学习集团军、方面军、战略、战役等很多理论，并参加了两次方面军司令部海岸防御及抗登陆攻防战役法，有一个师的兵力参加现代联合作战演习，对现代化立体战争知识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对防化兵在现代化联合兵种作战中的作用认识提高更大。

1959年3月送我到北京市委党校哲学班进修几个月，结业回

军区。直政部主任孙雨林同志找我谈，本来调你到防化兵当团长，军区五个防化营由防化处直接领导很不力，也无法深入管理，军区首长决定成立一个专职防化兵独立团，这样有很多好处，并势在必行。想不到总政干部部非调你不可，我们留了两次都不行，但是调走也是好事，要的条件非常严格：政治上绝对可靠，并具有较高的文化技术水平！调你到军事尖端绝密单位国防科委某单位当处长，也是很光荣的事，可能也很艰苦。要做好思想准备，具体工作我也不清楚。谈话后，我就走上了另一条神秘的工作岗位，并与正常社会断绝了一切联系。许多老家的亲戚都找不到我家，连书信联系也断了好几年。

## 二、为国防尖端事业作贡献

1959年9月到国防科委报到，才知道是去导弹综合实验基地，我的具体工作是特燃处处长，也就是研究制造导弹用的各种推进剂。我知道后认为这与防化兵是两回事，因此要先学习一下，组织上答应我先到北京工业学院化学系进修八个月。

这个进修班全是国防科委做此项工作的，共计70名学员，绝大多数是58届毕业的大学生。我一面学习并兼任班主任，一面还要照顾到处里机关工作，每周听一次汇报，作出下一周的工作安排，如有重要的事，还得及时处理。因此，学习工作时间很紧张。我十分努力的学习，好多化学符号、公式都要背诵，学习相当艰苦。结业考试时三门主课全部5分，成绩优秀，比许多大学生成绩都好，在毕业典礼会上受到刘院长的表扬。

我去的基地是国防科委第20导弹训练基地，在酒泉附近的戈



60年在酒泉  
导弹基地时

## 台前

戈壁滩中，是我国最早的国防科委基地之一。因为是军队性质的，基地内的工作人员全是军人，是由从朝鲜回国的第20兵团为基础，从全军团以上调选干部和挑选名牌大专院校（交大、清华、南京、上海复旦、天津南开等）1957、1958年应届毕业生组成的，代号0029部队。当年保密纪律很严，一般不能与外界联系，亲人来找，也只能到兰州接待站见面。距基地还有一天一夜的火车，其中一夜火车是军队自己的铁路线，在戈壁滩上。

我的家属是1962年进场的，全家由北京大城市来到戈壁滩，除两个大孩子在北京军区部队子弟学校住校学习外，全家都生活在戈壁滩上。当时口号是“以场为家，死在戈壁，埋在青山。”

我们进场后，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我处在一个靠山近水的地方建成了有空分厂（液氧厂）、仓库、化学实验室的九号基地，保证了实验的需要。

我们整个基地规模很大，具有自己的火车、自用飞机场和汽车交通网络及自己的发电厂，还有供苏联300多名专家住的招待所、治疗带疗养的七层医院大楼和人民大会堂式的大礼堂影剧院。远处有原始森林、水库、水源地，司令部在10号地区还挖有环城河，俨然象个大花园。各街道绿树成荫，就象戈壁中的绿洲小国。

戈壁滩的雨很少，基本常年无雨，夏季酷热，温度都在38℃-40℃，冬季零下38、9℃。每次冬季试验，野外作业都穿着军队的皮大衣、皮棉鞋、皮帽子，脚还冻得象猫咬似的。尤其是刮起飓风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火车都无法开，风停时全线都挖铁道。特别是龙卷风，柱天着地，如果人卷到中心就不知去向了。

## 参加地方科研建设，经历“文革”考验

(张杰回忆录五)

张华北整理 张增新执笔

### 一、参加设计革命和“四清”

1963年，毛主席提出地方学习解放军，1964年地方建立政治机关。在这种形式下，毛主席又提出要100名能做党的工作的校以上军官，支援中央直属各部。我被选调到化工部（没想到准备献身戈壁时，又调回北京），分配到橡胶研究设计院任党委书记。

1964年8月到职后，就赶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设计革命，要求设计人员下楼出院现场设计。建筑要节约耕地，向空间发展；厂址要靠山近水，分散隐蔽；要改造工具，提高速度和质量。院的编制结构由专业室变为综合工种的战斗队，并批判好大求洋。

这次运动搞的还好，化工部领导讲话：“动的快，后劲大。”运动后期提了一批干部，符合阶级路线的要求。

紧接着又搞“四清”，部里派来位老局长（橡胶公司副经理）周小丁同志，带来五人小组，周任“四清”工作队书记，我任副书记，主要靠党委的组织力量来搞。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清队，发动群众依靠党员为骨干，经内查外调，实事求是地办案，绝不乱整人。

后来民兵大比武，让我重点辅导一下。化工部在京十三个单

位，我院荣获政治挂帅大锦旗。

### 二、经受“文革”的洗礼

“文革”开始后，我靠边站，搞接待“毛主席的小客人”红卫兵的工作，共组织接待了八次。此项工作由周总理亲自抓，军委一位中将具体组织。由这个渠道可以看到中央文件，能够看清运动的大方向。在总结接待工作时，我院受到了表扬。

大批判后期，我搞历史专案，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经内查外调取得证明才能结案，达到不放掉一个坏人，不冤屈一个好人。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消极抵制极左路线，这样一来，与军代表鲁克发生了矛盾。他给我戴上一顶帽子“不相信组织”停止了我这项工作。我想也好，你们做错了结论，就没有我的责任。

当时部里军代表主任兰文照给我谈，让我到焦作市革委会当主任。我不去，我想极左路线到哪里都一样，个人是抗拒不住的。院军代表鲁克找我的材料要批判我，说我是“三反”分子杨勇的秘书，这段历史要交代清楚。当时我就豁上了！我说，很简单，我给他当秘书是1940年的事，是组织上调我去的，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司令员。事隔几十年没见过面，与我无关系。他调北京军区当司令，我已调国防科委，又没见过面，更没有关系。他和我都在北京，可派人去查吗。结果院里两派群众都不同意批判，也就不了了之了。

因为自“文革”以来，特别是1967年8月看了林彪讲话，他直白的说，这次文革的革命对象，是革那些革过命的人。我就下定决心，即不能怕，也不能趋势，必须有明确的方式和灵活主动的方法去应变。第一，没野心，不要争权，抢着结合。第二，不支一派压一派，并反对派性。第三，要宣传文斗，反对武斗，反对打派仗，促进大联合。

打派仗时，我同一位老红军副院长郭文玉站在中间念语录。当两派头头找我说：他这派是毛主席的革命派，你参加我们派吧。支持我们派，否则参加对方他们一派，支持他们一派。我就公开表明，我还没有看准你们哪一派是革命派。以我个人的水平，认为是对的我就支持，认为是不对的我就向你们提出意见。我不要权，不去结合，也不需要哪一派保我，我有错误，你保也保不住；我没错误，你打也打不倒，即使暂时打倒，将来还得给我平反。

军代表感到我是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对头，如按毛主席语录精神，我是二等残废军人，不应下放劳动，但他们又巧立了个头衔，管理牛鬼蛇神劳动改造。于是，在1969年7月15日，下放我到河南省淮阳县化工部五七干校，后转到太康县化工部五七干校。

到干校后带队劳动十多天，又下伙房劳动一个月，还好我学会了和面。炊事班长吴秀清是个复员军人，他保护我，开会讲张杰同志是二等残废军人，谁也不能让他干重活。伙房劳动完又派我去看瓜，没几天又抽我去各友邻干校调查研究政策。

当时到了中央党校，党校住址是黄泛区农场。它是解放初期苏联农业专家帮助规划的，规模很大，共分四个分场，地跨三个县，土地约400万亩，建设很完善，尚有一万亩果园。农民皆按农业职工待遇，并有自己的党委、政府、常备武装，俨然一个独立小王国。他们做工完全是机械化，生活得美满幸福，我认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农庄的模式也就这样吧。

在这时期，太康县乘机要求给他们建个化肥厂，五七干校抽调秦仲达（原局长，现化工部部长）为筹建组长，我也被抽调到筹建组，开始搞地方各种原材料。三个月全县动员，按时完成了任务。后又让我招工，入厂集训，并带队到水冶红旗化肥厂实习，分三批轮训，然后回厂参加建厂安装试车，这个年产万吨的

碳酸氢氨小厂仅大约一年就投了产。

叛徒陈伯达暴露后，由周总理抓专案，这时我又被抽调到专案组工作。周总理指示的政策非常明确，不叫清查516，要以问题罪行为依据，有什么罪清什么，并不轻信口供，更不能逼供诱供套供。要重证据，要有人证、物证、旁证才能定案。

1971年春，周总理视查五十四个大企业。这些企业多因打派仗不能正常生产，因此决定由各部五七干校抽调一批文革中没受批判的、没陷派性、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排除派性的老干部，下到各大企业抓革命促生产。

我又被选调到山东，时值王效禹被打倒，山东由杨得志司令员负责，他派军代表刘彬（当时在胜利石化科研所当政委）把我要来。1971年8月我到任职科研所所长，刘彬同志调走后没配政委。所里的情况是由化工部下放来的研究设计人员四百多人，原有炼油厂小研究所150多人，连上部里下放的，大学毕业补充的，共约600多人。

北京来的人员思想混乱，不愿在这小山沟里，不少人积极活动回京。因此，所里平时工作不务正业，研究人员搞家属工厂，赚钱解决家属问题；没有房子，自己打土坯，盖干搭垒房，并经常给工厂挖沟、除泥，当壮士用，美其名曰：通过劳动改造臭老九！还有个别领导主张分到各厂去，闹得无法工作，我只有到化工部科研局请示部领导怎么办。

中央召开了科研工作会议，余秋里同志讲话才真正解决了问题，明确指出，中央下放的研究设计人员，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只准扩大，不准削弱，集中精力搞专业研究。

我根据这种精神和部里的指示，又结合我总厂的具体情况，在李志超指挥、张瑞平政委的具体支持下，抵制了不务正业、不

讲政策等不正之风的极左路线，首先停办了家属工厂，集中人力、设备、仪器，转向当前的急需项目，特别是急需的合成氨厂，制尿素的胜利一号催化剂。我日夜尽力去抓，因为我认识到当时合成氨厂是全国最早的一家用油气做原料，年产尿素十万吨的先进厂子，是化工部、省委重点项目，早研制成功一天，就早出一天尿素。同时我也是省委组织的化工建设工程指挥部核心小组成员之一，那是责无旁贷的。

当时科研所组成两个小组：设计组，负责检查工程质量；化工组，负责合成氨厂催化剂车间安装试车生产的指导工作。由于科研所应合成氨厂急需之所急，提前完成了任务，保证了合成氨厂提前投产，并填补了我国两项空白，胜利一号催化剂得到了国家级三等奖。

科研所通过整编学习，安定了思想情绪，又根据中央科研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厂的实际，经过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三次认真、反复研究讨论，最后集中了正确的意见，制定出“以生产服务为中心，面向车间，面向职工，面向设备的改造挖潜，提高生产力为目的的长远科研路线方针规划。”使科研工作纳入正轨。

1972年8月调我到合成氨厂任副政委，当时没有政委，到职后，就蹲点合成车间，直到出了合格的尿素。

批林批孔时，抵制了极左路线，保证了职工队伍的安定团结。这个厂当时年年超产，是大庆式的先进企业。

我国以这个自制的专利厂援助第三世界。给巴基斯坦、孟加拉建成了此型尿素厂，给中国争了荣誉。

由于我战争年代肺部负伤，流血过多，创伤较重，且又长期搞新建创业工作，以及十年浩劫的精神创伤，致使积劳成疾，先后并发贫血、胃肠炎、脑血管硬化、精神衰弱、脊椎骨质增生、

## 台前 张杰

迁延性肝炎等症。1978年4月13日，突然暴发了脑痉挛，因抢救及时转危为安，后经长期住院治疗、疗养才逐渐康复。我于1982年10月离休，经中央组织部确认为司局级。

张杰，1919年出生，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县人，1937年参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长清县大峰山八路军独立营，一连指导员。后历任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的司令员秘书，军事参谋。独一旅、独二旅的作战股长。华北军区黄河司令部军事股长，兼河防营长，配合大军渡河。建国后曾任国防科委，酒泉导弹基地，组建火箭推进剂处（称基地工程部第五处，第一任处长）。转业后到化工部橡胶研究设计院任党委书记。胜利石化总厂科研所所长，研究院院长，胜利第一化肥厂副政委，顾问。1982年10月离休，经中央组织部确认为司局级。

## 活跃在鲁西平原上的济南乡师 学生抗日教导队

朱德兴 王 克

抗战初期，在鲁西大平原上，活跃着一支青年抗日武装，这就是以济南乡师学生为主体的教导队。这支队伍成立于鲁西南的菏泽县，后来到了鲁西北的冠县一带，她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济南乡师的共产党支部，是山东省党组织的一个战斗堡垒，工作基础一直比较好，学生中抗日救亡的热情十分高涨。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不平静的济南乡师更加沸腾了，有些人回到家乡发动抗战，有些人到了石友三部队的学兵队，有些人暂时留在济南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并进行了募捐和慰问伤兵的活动。

1937年9月，沧州失陷，日寇逼近德州，济南告急，省政府教育厅通令学校南迁。党支部便在同学中进行思想工作，根据党中央关于脱下长衫到农村打游击的指示，动员大家留山东，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9月下旬，在钱振东校长率领下，有师生108人（号称一百单八将），打着“济南乡师战地服务团”的旗子，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离开了济南，经长清、肥城、宁阳、汶上到达济宁，休

息几天后，又继续步行，经嘉祥到达巨野县城。

在南下途中同学们进行了一些宣传工作，在济宁时还准备了一些宣传节目。到巨野驻定后，便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利用原有的戏台，演出了宣传抗日的话剧、歌剧、哑剧、双簧及抗日歌曲大合唱。宗金箱因会耍几下大刀，与张晋德、王丕良等演出了《战恶魔》。在《明誓杀敌》中，朱法圣扮演张学良，张子源扮演开明士绅。郇正华、王宗孟、臧训之、路默华、靳成畴等还演出了青年农民被日寇逼上梁山的《参军》，这些演出都很吸引观众。此外，还演出了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辛明允扮演卖艺老人，王宗孟扮演香姑娘，朱法圣扮演青年观众，在演出达到高潮以后，及时把演出变成了讲演会，向围观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观众情绪十分高涨，一起振臂高呼：“誓言死不做亡国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到巨野以后，党支部与中共鲁西南工委取得了联系，并在其领导下进行工作。工委书记、乡师同志学白学光来看过我们，工委组织部的乡师同学孙志谦经常来指导工作，了解同学情况，传达上级指示。为了掌握武装以坚持敌后抗战，孙还亲自去菏泽，通过统战关系介绍了十几位同学参加菏泽专区民团政训处训练班。当时听说钱振东校长与专区的高赞非交往密切，也请钱给高写了一封信。到专区民团政训处的同学，计有宗金箱（宗明）、张敬一、王福五（肃武）、臧训之（育生）、郇正华（郑华）、王玉显、刘茂堂、李鸣歧、张晋德、刘振光（周泉）、刘安仁等。这时，钱振东接到通知，学校要继续南下去河南省，据说到江西南昌成立联合师范。由于党支部自离开济南的一系列工作，大多数同学都响应了党支部“山东人不离开山东，就地发动群众

武装抗日”的号召，留在了山东。随校南去的只有8个同学，主要是刚刚入学，年纪较小的九级学生，连教师在内还不到40个人。在宗金箱等去菏泽之前，有些同学如周维岳、刘效成、张永锦、吕子文等到于学忠部队的学兵队去了。留在巨野的同学，现在想起来的有窦长祥（于杰）、辛明允（辛明）、朱法圣（德兴）、王宗孟（王克）、张子源、王丕良、王玉坤、张明谦、唐茂乾、王成业、许士杰、李庆文（明实）、靳成畴（靳毅）、路默华、王光钧、孙昌繁、李玉华、曹允先、刘茂春、毛正新等。

在巨野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了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的发展工作，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是窦长祥。钱振东南下以后，窦和王玉绅等回到鲁南老家抗战去了，支部书记由辛明允继任。支部委员有朱法圣、王福五、张子源等人。

1937年12月底，孙志谦同志受中共鲁西南工委的委托，率领济南乡师留守巨野的全体同学到了菏泽，利用统战关系，编为山东省第二专区（菏泽专区）教导队，发了棉布军装，但是没有发枪。这时先到菏泽的同学，除到二团连队在政治指导员的宗金箱、张敬一、张晋德、刘安仁等人，随第二专区专员孙则让的第二团南下外，其他同学均与后边来的同学聚在了一起，共有人员近40人。过了一些日子，宗金箱等几位同学也先后回到菏泽，同大家汇合了。只有张敬一同学被鲁西南工委分配去了中共郓城中心县委。

1938年元旦，菏泽专区召开民团大会进行团拜。孙志谦与第二专区的有关负责人商议好，确定在此次大会期间，将准备解散的民团的枪武装教导队。我们是最后进入会场的，按照孙志谦的嘱咐，主席台第二个人一开口讲话，我们这些坐在会场后边的人，就三三俩俩撒到了会场以外的预定地点，迅速到达民团住所

的草棚营房内，全体人员一起动手，先挑选一部份枪支、弹药和大刀、手榴弹等，搬到事先准备好的牛车上。然后再武装自己，每一支步枪，两袋子弹，四、五个手榴弹，跟随军火大车转移到一个小村庄，吃了牛肉泡馍后，回到了城内的第六中学。

第三天正式编队，宣布张汉才为第二专区教导队第一中队队长。教导队大队长是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教务主任高赞非。下设三个中队，第二、三中队由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学生组成。第一中队以济南乡师同学为主，吸收了当地学生近10人，如苗德茂、王同昌、穆虹等。第一中队有三个小队，每队15人左右。第一小队有朱法圣、王福五、王宗孟、王成业、李庆文等人；第二小队有王玉显，宗金箱、张晋德、郇正华等人；第三小队有路默华、刘振光、王丕良、靳成畴等人。三个小队中都有共产党员，民先队员为骨干。听说张汉才是刚刚出狱不久的共产党员，还没恢复党籍，随后又从西安来了一位程牧，担任第一中队副队长。

教导队第一中队的三个小队，初建时，曾分散住到区乡政府（乡农学校）内。教导队的队员和区乡武装人员很融洽，和他们谈家常，谈抗日救亡，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还天天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彼此关系相当密切。他们的觉悟也有提高，但是，还不到发展他们为民先队员的程度。为了扎根群众发动抗战，第一小队的同志搞了封建色彩的东西，和区乡的武装人员结拜盟兄弟。如王福五、朱法圣、王宗孟三人和一个区乡武装人员朱××结拜了盟兄弟，排了大哥、二哥，三哥和四弟。朱法圣、王宗孟两人还到这个盟兄弟家住了一个夜晚，食宿优厚，情真意切，犹如手足一般。不久，教导队调离乡农学校，集中到城北的高庄集进行军事训练。有室内讲课，院内瞄准，野外实弹射击，连队、班排的进攻和防御，还有单人训练等等。同时，继续以戏

剧、歌咏、讲演等多种形式对附近群众进行了宣传工作。

1937年12月底济南沦陷，1938年1月初，曲阜、兖州等相继失守，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率10万太军狼狈逃跑，老百姓称他们对日本侵略军是“闻风四十里，抢响一百一”。孙志谦同志前来告诉我们，刘汝明部将很快撤退到菏泽，要当心教导队被他们吃掉。教导队便于1938年1月底以军事演习的名义，从高庄集转移到黄安、红船一带。据说高赞非通知了当地政府，负责供应教导队的给养。高赞非的弟弟高盘九到教导队担任军需，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青年名叫陈先武。当时张程队长与队员之间的关系不够协调，我们便派了辛明允作为队员的代表，到队部协助队长工作。到黄安、红船后，我们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有一次宣传，我们先唱抗日歌曲以便集合群众，当唱到《在松花江上》时，不少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接着便进行演讲，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过春节时，我们全队动员，给红船居民拜年，也到钱振东家去过。经过这些工作，教导队同群众的关系很好，特别是少年儿童们，开始对我们有些惧怕，以后经常围着我们转，有的忘记了吃饭，家长去喊几次才回去。红船人民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更红了，“把鬼子赶出境”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歌声更高了。

在红船住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同黄河以北中共鲁西北特委取得了联系，特委派乡师同学郭超来看过我们。2月中旬，特委军事部长、十支队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同志派马骏、徐少岩等同志来接我们，教导队便离开红船，向聊城专区的寿张县城进发。同学们一路上激情满怀，歌声嘹亮，忘记了行军疲劳，连脚底磨起了水泡也成了大家谈笑的资料。从郓城县的野猪淖渡河时，歌声、笑声、欢呼声与浪击木船声交织在一起，激荡着每个人的心弦，

“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教导队到达寿张后，给我们讲话的第一位领导干部，就是王幼平同志，他的讲话语言生动，内容深刻，使大家很受鼓舞。过去对红军干部只是抽象敬佩，现时则在亲身体验。当时的县长是管大同，他经常来看望我们，问寒问暖，照顾周到，每人还发了一套灰色军装。以后，王幼平同志还派姜威杨同志来教导队，帮助处理了队员与队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寿张期间，我们天天进行操练，也经常进行群众宣传主作，并且吸收了新的队员，靳朝滨、郭永昌和张洪芝（燕翼）就是在寿张参加教导队的。济南乡师同学李相三（朱飞）这时也来到了教导队。有一天接到命令说有一股日伪军进犯范县，山东第六专区（聊城专区）专员抗日游击司令范筑先亲自率领部队出击，让教导队作预备队。我们从寿张县城出发，沿黄河北岸的金堤西行，中途宿营在某村待命。在朱法圣查哨时，李庆文在哨地上倾谈了他过去参加“CY”时被捕入狱和出狱情况，出狱后写党失去了联系，希望找到党的组织。次日，朱法圣将李庆文的情况和意见，响向领导作了汇报，在到达冠县以后，恢复李庆文的组织关系。

教导队抵达范县城，驻到县政府大院内，任务是帮助打扫战场。范司令率队追击敌人去了，解除了我们预备队的任务。教导队三、五人为一个组，到居民区、大街，小巷去活动，有的目睹了被人刺死的女尸赤身仰卧地上，满身血迹。街巷两旁，房舍无人，门窗被烧，满地狼籍，十分惨痛。县城内有抗日民主政府组织群众清理积物，掩埋尸体。商铺、饭店、推贩没有一家营业、颇象一座死城。经过一系列的善后工作，第二天县城便恢复了正常秩序，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教导队在返回寿张途中，高歌猛进，到了开阔地区还进行军事演习，时而快速前进，时而散开卧倒，时而就地休息。说是大休息15分钟，小休息5分钟，但都没有钟表，只是大体估算。路经“子路堤”时，还访问了该村群众齐心协力谋杀日本鬼子的情况。也目睹了日寇疯狂报复杀害群众的惨状，大家受到了深刻教育。

3月上旬。中共鲁西特委决定将这支教导队改为山东省第六专区抗日游击第十支队（中共领导的一支队伍）的教导队。我们先到聊城住了十来天，然后去十支队司令部驻地冠县一带。到达冠县后，上级派赵晓丹同志来任队长，张汉才与程牧调出教导队，高盘九也随同调出。不久，上级又派从“陕公”来的郭强同志任指导员，这就使教导队进入了全新时期。成立了军人图书馆（宗金箱负责），出版了《冲锋》旬刊（朱法圣负责），后来成为十支队的《冲锋报》，组成了“冲锋剧团”（王宗孟负责）。各方面活动都更有计划，更有准备，效果也更好了。

6月间，赵队长奉命带领教导队去黄河南岸野猪淖一带，运回12挺轻机枪，武装了共产党员刘志远那个营，该营即改为机枪营，这是鲁西北装备最好的一个营，在对敌斗争中战绩卓著。在那以后，我军收复馆陶县城，教导队第二小队，在小队长宗金箱和指导员郭强的带领下，前往进行善后工作半月左右，密切了军民关系，坚强了队员信心，有一次范筑先司令到达冠县，教导队参加了欢迎行列和欢迎大会。

从离开济南到寿张县，党的组织一直是秘密活动，“民先”组织基本上也是不公开的。到十支队后，王幼平和熊义武（十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同志的意见，可以公开“民先”队，但不说谁是队员。自离开济南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党支部发展了少数党员，也发展了一些“民先”队员，但总的来说有些保守，当时党

的活动是秘密的，都是单线联系，“民先”的活动也只能说是半公开，一切重大的事，都是通过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在群众中发挥作用。

当时抗日根据地形势大好。7月初，从教导队调了几个共产党员去中共冀鲁豫省委党校学习，其中有辛明允、王福五、朱法圣、宗金箱、藏训之、郇正华、李相三等，党校结业后，他们都留在冀南分配了工作。以后一、二个月内，由于工作需要，教导队的队员都陆续分配了工作。有的到连队当连长，如路默华、靳成畴等。有的去连队当指导员，如王玉显、唐茂乾、刘振光、张洪芝等。这些同志分配到连队以后，作战英勇，表现很好。如王玉显参加了围歼王来贤匪帮的夜战，张洪芝在金滩镇参加了阻击卫河西岸国民党专员丁树本的东犯。他俩在战斗中都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受到官兵们的好评。之后，唐茂乾在茌平金河庄战斗中，与日伪军激战一天，双眼被打穿后，光荣殉国。路默华往朝城县耿楼战斗中率领全连与日军奋战，据说他在同敌人肉搏中牺牲后，还扭抱着一个日本兵。有的留在政治部工作，如张子源、刘茂棠、张晋德、许安杰等。李庆文、侯承寿二人去司令部当了参谋。最后的一部分队员建立了第十支队宣传队，王宗孟担任党支部书记、队长兼指导员，也是“冲锋剧团”的团长，李鸣歧任宣传队副队长，王丕良任剧团主任，王成业、王光钧担任中队长，靳朝滨担任总务。分配到政部局宣传科后的张晋德，也来宣传队帮助工作。他们学习了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宣传队的一部分节目，自己也创造了不少节目。王宗孟还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抗日歌曲，汇编了一本厚厚的《冲锋歌集》，在宣传工作中起了积极作用，在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将军坚守聊城壮烈殉国后的悼念活动中，王宗孟创作的《安息吧！范总司令》悼歌，和张

晋德绘制的范筑先画像都印发到连队，激励了部队战士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决心。教导队的建制没有了，教导队培育出来的队员们，都在新的战斗岗位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将近50年后的今天，回顾这支教导队的战友们，他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如唐茂乾、张子源、路默华、刘茂棠、王成业、曹允先、王同昌等同志，有的负伤成疾或积劳成疾，抗战期间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如王福五、王玉显、靳成畴、刘茂春等同志。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我们这些战争中的幸存者，虽然大多已是“古稀”之年，已经退出了紧张工作的第一线，但也要抖擞精神，奋勇向前，“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987年3月

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王克主编

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

上海市联络组

## 寿张县区划演变、 隶属关系及各届领导人情况

杨萃氏

### 一、寿张县行政区划的演变

抗日战争前的寿张县，横跨黄河两岸。全县共六个区。一区以城关为中心，北至三支王，南至孙口；二区在城西南，东起裴城寺、后方，西至候庙、苗口，北起关门口、朱口莲花池，南至清水河一带；三区以张秋为中心；四区在蔡楼、赵固堆以东，大路口、小路口一带；五区以梁山为中心。六区在黄河南，小吴、黑虎庙以西，杨集、李集以东。阳谷县的六区于一九四〇年春夏之间，划归寿张县为第七区，该区共三个乡，智和乡和寿张一区的一些村庄交插，仁和乡和寿张二区交插，勇和乡在黄河南和寿张六区交插。一九四一年春，把七区和勇和乡划归六区，同时对一、二、七区作了调整：一区仍以县城为中心，北到三支王，南至孙口；二区在临黄堤以北，后方、马楼以西；七区在临黄堤以南，裴城寺、黄那里以西。一九四一年六月，为打破敌人的封锁，加强对敌占区抗日工作的领导，区党委、行署决定成立张秋县与昆山县，寿张县的三区（张秋镇周围）划归张秋县，五区（梁山周围）划归昆山县，金斗营、子路提，朱口、莲花池一带成立范、寿、朝、阳小边区，归二地委直接预导。

一九四二年五、六月间，寿张县对所属区又重新划分，一、二、七区未动，范、寿、朝、阳小边区撤销，原寿张部分仍划归寿张，成立第三区；黄河南岸的六区一分为二，西半部为五区，东半部为六区；黄河东的四区一分为三，北部为八区，中部为四区，南部为十六区：“九·二七”敌人大扫荡之后，五、六区合并仍为六区，十六区和四区合并仍为四区，八区未动。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为配合其军事进攻，花园堵口，黄河北回故道，这时寿张县的四、六、八区划归郟北县领导，张秋县与寿张县合并。

## 二、寿张县的隶属关系

一九三九年，鲁西区党委、行署、军区成立。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主任肖华、付主任董君毅（段君毅），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肖华（兼）。寿张县属鲁西区二地委领导。一九四〇年，申云浦任二地委书记，以后万里任书记。二专署专员开始由杨勇兼，后邹鲁风继任，二分区司令员周贵生、政委刘星。

一九四一年，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为冀鲁豫边区，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副书记张玺，行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董君毅，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

一九四二年七、八月间，冀鲁豫八地委建立，辖范县、寿张、阳谷、张秋、昆山等县。地委书记唐克威、专员王笑一，分区司令员吴机章。“九·二七”大扫荡后，八地委和二地委合并，成立新的八地委。地委书记董君毅、副书记万里，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董君毅（兼），专员邹鲁风。这时八地委下辖：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寿张、张秋、昆山、东平、汶上、济宁、嘉拳、巨野、郟城、郟北、鄄城、临泽（菏泽北部），南华（东明县一部份）等十余县。

一九四四年五月，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党委合并成立平原分局，分局书记黄敬；行署（仍称冀鲁豫行署）主任晁哲普，付主任贾心斋；军区（仍称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政委黄敬。八地委未动。一九四五年六月，董君毅调予东区党委，万里任八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日本投降后平原分局撤销，冀鲁豫和冀南分开，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行署主任董君毅，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张霖之（兼）。八地委一分为二，西部为二地委，东部为七地委。寿张属二地委，二地委书记郭超，一九四七年安法乾继任，专员张方、秦和珍，一九四七年金凤继任，分区司令员张刚剑。

一九四七年黄河北成立九地委，寿张县划归九地委。

### 三、寿张县党政军各届领导人

#### （一）中共寿张县委会：

中共寿张县委会于一九三九年七月在黄河南成立，这时我尚未入党，对县委领导人的情况不了解。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开始和县委领导人有接触，这时杨岗任县委书记（听说杨之前是徐坤，被敌人抓走了），陈亚颀任付书记兼宣传部长，李哲任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春，杨岗调走，陈亚颀代里书记，一九四一年六月，黎光任县委书记，陈亚颀任付书记，一九四二年“九·二七”敌人大扫荡后，陈亚颀被小吴据点敌人抓走，邵汝群任付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哲任敌工部长，葛庭任宣传部长。

一九四三年夏秋之间，李仲勳调任三支队政委兼寿张县委书记，黎光任副书记。同年葛庭调走，杨村夫任宣传部长，邵汝群调走后，一九四四年汪浩任组织部长。一九四三年春民运部改为“抗联”，田西文任主任，一九四四年田西文调走，高志其（于耀）任抗联主任。一九四五年三月李中勋调走，黎光任县委书

记，一九四六年初，黎光调走，杨村夫任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汪浩，宣传部长鲁光，社会部长崔影。

## （二）抗日县政府

寿张县抗日政府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在黄河南昌祖庙成立，县长杨朴民，秘书郭少川。一九四〇年秋，杨朴民调走，郭少川任县长，彭伯诚任秘书。一九四一年彭伯诚调走，

叶大风任秘书，一九四三年叶大风调走，张云峰任秘书。

一九四五年郭少川调走，张云峰任县长，梁百朴任秘书

## （三）各区党政负责人

一区：区委会一九四三年前只有李健民一人，领导城关周围几个地下党支部工作。一九四三年正式建立区委会，书记李基础，付书记杨萃民（兼），日本投降后，魏世昌任书记。

一区刚成立区政权时，区长于清源（因通敌被逮捕，在刘怀良叛变后被政府枪决），副区长周跃西（刘怀良叛变时被敌人抓走，后牺牲），一九四一年八月，于峻峰任区长，一九四三年于峻峰调县委敌工部，李景任区长，李景被敌人抓走后起凤生任区长，不久赵被调走，刘玉情任区长，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刘玉清调任反攻营营长，鲁蔚民任九区区长，鲁走后陈水甲任区长

二区：区委书记崔影，一九四五年崔影调县委工作，鲁光任书记，鲁光调县委工作后，宋化海任区委书记

二区区政权成立时区长候杰，副区长鲁光，一九四〇年底，候杰辞职，徐波兼区长，一九四一年初鲁光任区长，一九四五年底鲁光调县委工作后杨署光任区长，

老三区（张秋）

区委书记杨朝炳；区长姜德和

新三区（即子路堤、金斗营、莲花池一带）

## 台前

区委书记祁秀山；区长藏廷阁、邵力群、杨杰三。

四区：区委书记高志其；区长孔庆恒（不久逃跑），一九四一年马达任区长、崔养斋任副区长，一九四三年后陈法任区长

老五区（梁山），只记得区长姓史，其他不记得了。

新五区（一九四二年六月成立，只半年和六区合并）

区委书记韦苾民（兼）；区长杨萃民，付区长芦惠卿

六区：区委书记韦苾民，“九·二七”敌人扫荡后韦被敌人捕去，赵镜如任书记，不久赵又被捕，一九四三年汪浩任书记，一九四四年汪调县委工作后李连峰任书记。

六区政权成立时李震任区长，一九四〇年王村任区长，一九五四年王调县武委会任主任，田之符任区长；以后雷朝卿任区长。

七区：区委书记崔影（兼），一九四四年高志其任书记，高调任县抗联主任后辛捷任书记，辛走后王子典任书记。

一九四〇年李执在任区长，一九四一年初徐波任区长、王正延任付区长，一九四二年王正延任区长，一九四四年杨杰三任区长，杨走后，王子典兼区长。

八区：区委书记高志其（兼）；区长岳川。

十六区（一九四二年初成立，只半年就和四区合并）

区委书记高志其（兼），区长陈法。

### （四）独立营、县大队

寿张县独立营是一九三九年成立的，营长巩××，数导员史芳亭，一九四一年徐廷任营长，一九四二年独立营改为县大队，县长郭少川兼大队长，大队副唐XX，县委书记黎光兼政委，副政委文立。

一九四三年三支队和县大队合并，名仍称三支队，五个连的兵力，张新泽（外号张大脚）任司令，李德滂任副司令，李仲勋任政委。一九四四年李德芳调任五团团长，曾长柏来三支队任副司令。一九四五年三月，三支队四个连升级编入主力部队，留下一个连和各区队又扩编为三个连，张新泽仍任司令，李仲勋调走，黎光兼政委，李传恩任副政委。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三支队全部编入八路军六十团。寿张县组织反攻营，营长刘玉清，教导员王村。不久分区将反攻营调走，编为特务营，寿张县重新组织县大队，共三个连，杨林山任大队副，杨萃民任总支书记代理副政委。一九四六年四月，分区又将两个连调走，编入独立旅，杨林山、杨萃民也先后调走，留下的一个连改为县基干队，杨炳魁任队副，张清洲任指导员。一九四七年春，黄河南几个区划归郓北县领导，寿张县基干队也编入郓北县大队。

**作者介绍：**杨萃民，台前县仁和村人，一九四〇年三月入党，曾任寿张县七区队指导员，一区区委副书记，县敌工部副部长、县大队副政委等职。现在国防科委工作。

## 摆渡李先念将军过黄河

杨卫民

我国伟大的解放战争进行到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关键阶段，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将军从华北回中原，途经孙口、蔡楼，我们曾摆渡李将军过黄河，现记忆犹新。

为客观、全面、具体地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真实，特访了原黄河司令部四大队教导郭德全同志（在黄河航运离休）。我原系四大队船管干事，经共同回忆当时李先念将军的渡河情况，现整理如下：

黄河司令部四大队所辖六个连，共有650余人，30多条船，大队部驻寿张县一区孙口村（今台前县孙口镇孙口村）。

1948年5月间的某天上午，黄河司令部用电话转告我大队部；兵站通知我们，近日有首长在孙口渡河，要大队作好准备，具体时间另告。我大队立即向河两岸地方政府要民夫，平修道路、码头，备好船只待命。相隔两天的下午，接到司令部通知，今日晚上有位首长从孙口向南渡河。晚饭后，大队长陈子彬，教导员郭德全等四五个人去黄河岸边的码头检查准备情况。在那里已有靠牢待用的三连一号摆渡船。郭教导员向水兵们说：“今晚，你们的船要安全、迅速圆满地完成任务，不得有误。水兵们回答说：“保证顺利完成任务。

太阳刚落山，黄河司令部司令员曾宪辉、政委郭英、梁仁魅参谋长偕同警卫员乘马来到黄河渡口，在场的四大队干部齐向司令

员与各位首长行军礼。他们还礼毕之后，曾宪辉司令员向大队干部交待任务和要求。

我们皆知，只要是曾司令员、郭政委亲自到码头来迎送，一定是位军级以上的将领在此渡河。那时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我们在军事方面的所见所闻不准外传，不叫你知道的事不准问，一定做到保守秘密，否则要以军法论处。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对道路、码头、桥板与船只设备重新进行检查，确实达到了安全、牢固要求。时间不久，大约在下午五、六点钟，有二十多人骑着战马来到孙口码头前。司令部二位首长与大队领导迎上前去，齐向来的领导行军礼。那位首长与曾司令、郭政委等人握手问候，并由曾司令等人陪同那位高身材、着草绿色军官服的首长走到平摆上，由四大队陈大队长、郭教导员等人护送到黄河南岸。

大平摆渡船虽非机动船，但也很安全，迅速顺利地渡到南岸，停稳靠牢之后，先下人而后下战马，很快下完。我们四大队的干部们，向过河首长敬礼告别，并且说：“祝各位首长一路平安，再见！”渡河军人与战马经蔡楼向南奔驰而去。

大队部的干部们随船返回北岸时，曾司令很满意地说：“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你们辛苦了！”郭政委接着说：“你们刚才护送过河的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将军。他是从中央军委开会之后返回途中经过此地，并且暗示，不久将要打开封城”。我们听后，都从内心感到非常的高兴，能护送一位高级将领渡黄河，是黄河司令部全体指战员的光荣！

不久，开封战役打响了。这是解放战争中攻坚战的演习，意义重大而深远。

（本文源自《梁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 有关曾宪辉在黄河司令部长刘村的回忆

刘伦秀口述 徐柱玲执笔

我叫刘伦秀，1932年出生，中共党员，长刘村村民。当时黄河司令部驻我村时，我十五六岁，还在上学。黄河司令部，曾宪辉是司令员，郭英是政委，梁仁魁是参谋长，司令部有三个连。

曾司令及其爱人冀华、儿子曾海山，海山当时有三四岁，在我家东屋里住了两次，有五六个月。放学后，我经常去她屋里，抱着海山玩。冀华让我去当勤务员，因为我是独子，曾司令说，兄弟一人就别去了。曾司令去毛主席那里开过会（应该是七大）。

曾司令在我村时，一化妆，生人一看就是个伙夫，也是邋邋的很，穿的很不像样，穿的破破烂烂，裹着小腿，裤子膝盖两个大窟窿，露出棉絮，棉絮上抹上泥巴，活脱脱一个农民，根本看不出是个大干部，更不像一个司令。但是，军装一穿，一上黄河，精神得很，很像样。

黄河南边是蒋介石，有把守河沿的队伍。前方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是那边过河里，过来三只船。电话局挨着我家，在我家西边，一接着电话，屋顶有集合队伍的，一拧，“昂昂”的响，立即集合了一个30多人的小分队。那时没汽车，有三匹马，曾司令自己骑一匹，两个勤务员骑一匹，他们在前，小分队在后，一个

跑步就上去了，一看船已到河中间了，司令下令排长开机抢，两梭子打翻一只，国民党就退回去了。

记得当时当兵的可受罪了，天很冷了还穿着单鞋。在我家前面一个大场院里吃饭，饭前先唱歌，一般喝米汤、玉米糊，吃窝窝头。

**提供人：**刘伦秀（共产党员，长刘村村民）

**采访人：**田开沐、杜贵华、徐柱灵

**整 理：**徐柱灵

**时 间：**2019年

##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胜利 的原因及其历史地位

台前县委党史研究室

1947年6月30日夜，月白风清，群星闪耀。这时，国民党军队在穷凶极恶地继续向陕北、山东我解放区“重点进攻”，愚蠢地做着妄想消灭解放区的美梦。而在黄河北岸，从张秋镇（寿张县）到临濮集（鄄城县）三百里的地段上，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十二万六千余人神兵天降，迅速集结，以雷霆万钧之势突然强渡黄河天险，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胜利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渡河任务，吹响了我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实施全国战略反攻的胜利号角。这一石破天惊的壮举，极大地震动了敌统帅部。蒋介石顿时手忙脚乱，不寒而栗。蒋介石的美国顾问们也不禁张惶失措，惊呼“六卅事件非好兆！”而广大人民群众闻此捷报，无不欢呼称庆。一时传诵着这样的民谣：“刘伯承，得天助。黄河六月结了冰，千军万马一夜渡。”刘邓大军强渡黄河重大战斗任务的胜利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突破敌人黄河防线的奇迹，并不是偶然的事件，它是敌我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反复较量的必然结果。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这一巨大胜利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坚定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英明的战略决策，这是刘邓大军胜利突破黄河防线的根本保证。**

首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抓住了战略进攻的有利时机。从1946年——1947年经过一年战争之后，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三百七十三万人。国民党在整个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经大为减少，后方空虚。由于一年来国民党军队迭遭失败，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整个国民党军队充满了失败情绪。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和暴政的革命运动普遍高涨。与敌人的情况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从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多万人上升到一百九十五万人，其中正规军在一百万人以上。由于解放区后方日益巩固，不需要分兵守备后方城市和供应线，这样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就优于敌人。由于一年来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解放军的装备也大为加强，广大指战员掌握和运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本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军心振奋，充满了胜利信心。由于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继续普遍进行，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拥护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在北线战场，我军继续发动攻势，敌人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在南线战场，敌人虽然还在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但其主力却深深地陷入了这两个战场，致使连接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防御力量大大削弱，战略上更加被动。在敌人战略纵深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守备空虚、兵力薄弱。

党中央和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这种形势，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的伟大革命高潮临近了。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我军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去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党中央和毛泽东英明果断地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

“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把中国革命推向新高潮，争取中国革命早日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纵观全局，审时度势，正确地指明了我军战略进攻的方向是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所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和山东两翼，在其联系两翼的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有少数兵力实施防御。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从敌之要害和薄弱的中央部分进行突破，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地区。大别山区曾是老革命根据地，我军容易立足生根。这里又是敌人战略上最薄弱最敏感的地区。我军占据大别山，就象一把利剑插进敌人的心脏。蒋介石必然会调动山东和陕北的部队回援，来争夺中原这块战略要地。这样，就可以便利我军最后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同时达到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全国性反攻的战略目的。

为实现向大别山战略进攻的计划，党中央和毛泽东以无与伦比的胆略，决定了采取大兵团跃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入敌人纵深的战略进攻方式，并作了三军配合，两翼钳制的周密部署。三军配合：以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防线，直趋大别山；并由陈毅、粟裕等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由陈赓等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另一个军为右后一

军，自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两翼钳制是：以陕北我军出击枪榆林，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便利上述三军的行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个英明战略决策的提出和实施，异乎寻常，大出敌军统帅部之所料，决定了我军出奇制用胜，所向无敌。

**第二，刘邓卓越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这是我军胜利突破黄河防线直接的关键性因素。**

临敌渡河作战，古今中外均为险着。我南征大军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黄河。黄河水宽流急，奔腾咆哮，自古称为天险。所以蒋介石自恃这一天险，鼓吹可抵“四十万大军”。且敌人早有戒备，以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两上师共六个旅的兵力，从开封到东阿，五百里长的黄河设防，沿河交通沟相连，调堡林立，更给渡河增加了困难。

党中央和毛泽东将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的重大战略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高瞻远瞩，通观全局。具有驾驭战略形势的卓越才能。他们善于根据党中央总的战略企图和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在浩瀚纷繁的斗争中，迅速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性问题，巧妙运用谋略，克敌制胜。当时蒋介石利用黄河从陕北到山东构成的“乙”字形天然形势，把主力集中于陕北、山东两翼，企图将南线我军压缩到“乙”字形的弧内聚而歼之。在其联系两翼的战线中央，则凭借黄河天险只以少数兵力实施防御。这中央部分正是敌人的要害和薄弱部分。刘邓把蒋军这种总的战略态势形象地称为“哑铃战略”。敌人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晋冀鲁豫是联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

正象这个哑铃的“把”，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里去，在党中央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对这次重大渡河作战，刘邓以才胆卓识，象描花绣朵一样精心布置。经过充分周密的调查和精心的分析判断，决定了隐蔽接敌、宽大正面多路齐发，实施夜暗突然强渡的方针。6月20日，刘伯承发布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指出：“南岸部队应背击河防之敌”，肃清我渡河场地，以掩护主力渡河。而野战军主力，则应遵照战斗命令，力求秘密渡河，为使敌人防不胜防，各纵队尤应乘夜间黑暗，突然实行“宽大正面渡河”，并规定，每个纵队最好有两三个渡河点。刘帅的指示中，突出强调了利用“夜暗”、“秘密”、“宽大”渡河的指导思想，这恰恰是针对敌人依靠天险、戒备森严的特点而制定出的正确方针。

为确保渡河作战的秘密性和突然性，迷惑敌人，在作战发起的前几天，刘邓命令太行、冀南的部队，在豫北伪装主力发起进攻；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地区佯施进攻，转移敌人视线。而野战军主力，则隐蔽神速从豫北向东南，开进渡河出发地。这一行动果断奏效，直到渡河前一周——6月24日，蒋介石还蒙在鼓里，命令在我野战军近处的王仲廉部由滑县向北面安阳开进，更加远离我之渡河地方。

一切准备就绪后，6月30日，刘邓指挥南征大军第一梯队三个纵队，选择敌人防御的翼侧和接合部，在濮阳到东阿之间三百里横宽的正面，从八个地段，同时发起强行渡河作战。奉国民党国防部严令坚守黄河的南岸蒋军，原以为河水湍急，河面宽阔，加之有空军昼夜轰炸北岸配合防御，黄河天险万无一失。怎么也料想不到解放军全线猛扑过来。我军勇士们在风浪中迅猛划行，

船到对岸时敌人才发现。此时，我北岸炮兵立即向敌人轰击，船上各种武器也全部开火。在我南岸部队接应下，第一批部队只用了五分钟时间就完成了强渡。我渡河大军过河动作突然勇猛，使敌人惊慌失措，防不胜防。蒋介石吹嘘抵得上“四十万大军”的黄河河防全线迅速崩溃。敌五十五师一八一旅旅长米文和，于当晚十时放弃南岸第一线的鄆城，星夜逃往荷泽。刘邓大军如此迅速全面突破黄河防线，就连敌人也感到莫名其妙。当我军渡河的消息传到蒋军陆军总司令部后，他们急询负责河防的六十八师师长刘汝明，共军是否已经渡黄河？而刘盲无所知地说：“共军只向河南岸发射炮弹百余发。”敌七十师副师长罗哲东作了我军的俘虏后，还不禁感慨地发问：“这么宽的河水，对面又有重兵把守，解放军是怎样过的河？”由此可见我军突然袭击的成功。敌人连连惊呼：“捉摸不定刘伯承，神机妙算邓小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刘邓无与伦比的胆略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第三，我军斗志空前高涨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这是刘邓大军胜利突破黄河防线的基本条件。**

我军为强渡黄河实施鲁西南战役，执行跃进大别山的任务，在豫北反攻胜利结束后，即以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部队普遍进行了大反攻的形势和任务的学习，开展了立功运动，召开了英模大会，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认真学习了野战军司令部颁发的《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使我军指战员积极性空前提高，群众的智慧普遍发挥，部队各项工作突飞猛进。在“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全军上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所以各纵队一经进入反攻，即表现出空前的战斗热情与顽强精神。

1947年春，党中央开始运筹更大规模的渡河战役。4月27

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冀鲁豫军民预备船只，准备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迅速动员起来，掀起了全力支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大举反攻的热潮。

在解放区人民群众的支援下，迅速圆满地完成了修造船只、组织训练水手的任务。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1947年春在寿张县长刘村建立冀鲁豫黄河河防指挥部。指挥部的主要任务是造船、组织训练水兵船工、渡运人员、物资、保卫河防。根据冀鲁豫区党委向长垣、昆吾、濮县、范县、寿张、张秋、东阿、河西八县征调水兵、水手的通知，该地区按照要求条件和具体数目，挑选思想进步、熟识水性的水手、船工，很快完成了任务。先后在高固（北坝头）、李桥、张庄、孙口、位山、齐河等处设立了七个航运大队，每队五百至六百人，二十至三十多只船，每个大队根据人数和船只多少编为四到六个中队。全部是部队编制，享受与军人同样待遇，集中驻守、集中学习、集中训练。在渡河作战中，各渡口员工不怕敌人的炮火和飞机骚扰，不顾日夜的疲劳，积极协助我军完成渡河任务，受到刘邓首长的嘉奖。

冀鲁豫行署和军区发动沿河群众修造船只。行署在3月发出“封各村大树用以造船的紧急通知”，将造船数目下达给沿河各县，提出每只船封号五把粗的杨树三十株，由政府按价购买；4月21日下达了向“沿河各县征购苧麻以应急需”的训令，要求东阿、范县、平阴、张秋、濮县等十一县于当月底完成收购三万至五万斤苧麻的任务，并规定了合理价格与拨付粮款的具体办法；6月17日，冀鲁豫行署又下达了“整修军运大路及协助军运”的第21号训令，向沿河群众提出整个道路、安全运输、保护物资的要求。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都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为了做好船只准备，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和冀鲁豫行署秘书长罗士

高主持召开沿黄各地专员、县长和黄河修防处主任会议，部署建厂、筹料、造船、征船工作，当即确定建立四个较大的造船厂。会后各地展开积极地造船活动，除按行署通知备料外，铜油要到敌占区采购，所缺钢材，由群众凑集，还组织民兵到敌战区挖铁路轨，既断敌交通，钢材又为我所用。沿河各县还建了一些小的造船厂。仅范县就建了十几个造船厂，动员木工三百多人，铁匠一百多人，武装人员四百多人。在修造船只的过程中，不仅要克服物料、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需要防备黄河南岸敌军的不断骚扰和敌机的日夜侦察轰炸。船工们隐蔽在树林里操作，在地窑里安炉。白天目标大，晚上突击干，所有的灯还得用纸或布罩起来。造好的船隐藏在村里，给船加上伪装。有的挖个船窑，工程大的船坞，还要挖若干条长四、五百米，宽三十米，深三米的引河。仅范县就挖了十几条，动用民工五千多人，挖了半月。藏到村中的船，临用时，得用二十头牛拖拉牵引，费力很大。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修造了一百二十余只木船，可供部队同时渡过八千人，按时完成了修船和造船的任务。

解放区人民群众组成的民兵民工队伍有力地配合了我正规部队的作战。为了对付敌人的骚扰破坏，作为后方基地的黄河北岸，保卫河防是一项重要任务。在从濮县到齐河境内全长五百华里的地段，经常有六千多民兵防守。为统一指挥，以分区为单位组织河防团。一县一个团，县长兼团长，县委书记兼政委。河防团在阻击来犯之敌、保卫河防、保证刘邓大军顺利渡河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六分区河防团，在一九四七年反击敌人偷渡中就毙敌四百九十九名，伤敌特六百一十五名，俘敌三百零五名。寿张县河防团在封锁消息盘查行人过程中，查获敌特六十二名，逃亡地主一百零八名，以及大批现洋、法币和敌货。在刘邓

大军渡河前，敌五十五师两只小船强渡侦察，被我将船击翻，二十二名敌人全被打死或淹死。据不完全统计，冀鲁豫为支援大军渡河作战，先后出动民兵、民工五万多人，畜工十五万多个。在雨季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军用物资运往前线，将伤病员转运到后方，保证了战役的顺利开展。

黄河北岸也是我军组织兵源的重要基地。1947年3月，原泰（西）运（东）地委二、三团全部升级，又把阳谷县大队一部分编为分区特务营，5月又将齐禹、聊城、阳谷、茌平县大队各一个连编为区河防团。由于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人民力量空前壮大，广大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掀起参军高潮，涌现了集体报名和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争取参军参战的动人事迹。寿张县祝口的王大娘同时送两个儿子、两个孙子、两个侄子六人参军；阳谷县范海村七个刚结婚的妇女一齐送郎上前线等等。1947年4月冀鲁豫区一次就完成了十万翻身农民参军的伟大工作，超过预定计划一倍以上，使我出征部队普遍满员，成为克敌制胜的基本有生力量。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蒋介石所谓可以代替四十万大军防守的“黄河战略”的神话，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这样就彻底打断和砸碎了国民党军全国战略态势上的“哑铃”把子和钳铰，打开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南大门。使敌人袒胸露腹，将鲁西南地区直接暴露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强大突击力量之下。其战略深深受有严重地威胁，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进军鲁西南，开辟了鲁西南广大战场，配合了山东、陕北我军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作战，打乱了国民党的全盘战略部署。我军一举突破黄河防线，敌人震动极大。

蒋介石为了堵住这一缺口，仓皇从豫北、豫皖苏战场抽调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增援，并责令王敬久由山东火速赶来统一指挥这个方面的作战。我军趁机发起的西南战役。经过二十八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敌九个半旅和四个师部共五万六千余人，迫使国民党从山东、陕西等地抽调十一个整编师二十八个半旅的兵力向鲁西南增援。国民党军的兵力与空间的矛盾大大尖锐化，到了顾此失彼，惜指失掌的境地。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而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结集于鲁西南，形成了强大进攻态势，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处于主动地位。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胜利揭开了全国战略大反攻的序幕。南渡黄河，是全国战略反攻的序战，是“一子定中原”的决定性环节。刘邓大军突破黄河防线，胜利渡过了大反攻的第一个大阻碍，为反攻大军的南进，开拓了良好的开端，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自此以后，刘邓、陈粟、陈谢所部六十万野战军，纵横江淮河汉之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大片国土，已不再是蒋家天下，整个战争形势从此根本改观。接着开始了人民解放战争中波澜壮阔的中原逐鹿这最壮观的一幕。

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向南进攻，把战争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是我这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志和转折点。它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人民大反攻的暴风骤雨已到来了！

## 谁打响了战略反攻第一枪

王德生

1947年3月，我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大部转移至黄河北岸寿张县一带休整。6月30日在东起东阿西至濮县300余里的堤段上，以山东省寿张县孙口（今属河南省台前县）为中心，刘邓大军12万人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实施宽大正面强渡，一举突破上有飞机轰炸、对岸有重兵把守的黄河天险。以上是军史、史志界通用的描述刘邓大军大反攻序幕的词语，再现了当年真实的战争场景。

可是，谁打响了战略反攻鲁西南战役第一枪？到底是那一支英雄的部队呢？也许有很多史学界学者不是很清楚。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大课题。笔者查阅了大量党史资料及回忆录，驱车实地考察了当年战场的村庄，采访了梁山县鹅鸭厂村86岁的张士恩老人，拜访了打响战略反攻第一枪的老战士。

1947年6月15日，刘邓首长一道命令下达到了在山东寿张县东北方向（张秋镇北下闸村）休整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委张玺手中。接到刘邓首长命令后，王秉璋司令员随即召开军区独一旅紧急作战会议。当时冀鲁豫军区前指和独一旅旅部都驻防在张秋镇北下闸村。据健在的寿张县大王村人90岁的王汉民讲，他当时任旅部勤务员。参加会议的几人（有旅长汪家道、副旅长马宗凯、参谋长杨昆、政治部主任屈兴栋。一团长苟先学、

二团长张心田、三团长岳舜卿）他还记得，在会上王秉璋司令员讲接一二号首长命令，独一旅三个团务必在6月16日夜提前秘密渡过黄河。

王秉璋司令员和张玺政委分别给独一旅详细介绍了这次提前秘密渡河的任务和目的，其任务就是为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扫除郟城周围一百余里国军及还乡团小股部队的一切障碍。汪家道旅长接受命令后，立即令参谋长杨昆制定作战计划，渡河地点选择了寿张县东（张堂与林楼渡口之间）。冀鲁豫军区在黄河北岸成立了黄河河防指挥部，驻防寿张县长刘村，（今台前县城关镇长刘村）司令员曾宪辉，政委郭英，并组建河防营，营长张杰。河防营主要任务是测量黄河宽度，水的深度，渡口是否坚固、是否适应大军渡河并时刻防守黄河南岸的敌人和还乡团破坏渡口船只，为大部队渡河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据梁山县地方党史记载，1947年6月16日深夜，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三个团秘密渡河，而后部队沿河岸南行，进抵梁山西北郭楼驻防待机歼敌。我郟北县九区短枪队在这一带活动，深入敌穴侦探敌人动向，并与一团苟先学团长接上关系，为独立旅传送情报，我部对歼敌充满了必胜信心。部队在黄河北岸刚刚经过休整扩军，又得到当地群众热烈拥护和支持，所以该部情绪高，斗志强。苟团长接郟北县九区短枪队情报，有敌人五十五师七十四旅八十一团（团副金克俊带领）向我方挺进，目的就是阻挡刘邓大军南渡黄河。据情报讲有五个连的兵力和还乡团中队、一个便衣队正进入梁山东北方向25华里的鹅鸭厂村。苟团长立即报告给在黄河北岸的旅部，汪家道旅长当即下达了作战命令，二团继续向梁山脚下的张坊村布防，以备阻击来自驻扎在孔坊村的敌八十二团。三团布防在距离鹅鸭厂村西40华里的王连坡村，以备阻击来

## 台前

自黑虎庙的敌五十五师特务营。为配合我军作战，昆山县政府组织郭楼一带村庄的群众，成立了担架队随一团行动。1947年6月22日下午5点，天降大雨，昆山县政府为支援我一团指战员多打胜仗，冒雨送来了炖好的猪肉20桶。饭后，我独一旅一团在苟先学团长的带领下从郭楼出发，冒雨向东直奔鹅鸭厂村。晚8时许，我一团趁着夜色悄悄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将敌人包围，一团全部进入阵地待命。夜里11点，苟团长一声令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迫击炮和喊杀声响起、一时间使敌人晕头转向。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我三营从村西攻击进村，占领了村子西部，将敌人压缩到村中间大庙附近。在炮火掩护下，我一营四连从村西南角攻克寨墙，占领了敌人第一道防线，为主力营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时敌团副立即组织疯狂反扑，我三营阵地前面出现了黑压压的敌人，八连战士胡有才端起机枪横扫一阵，把敌人压了回去。我一营四连占领了第一道防线后，由于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赶到，被敌人反击退回。同时由于黑夜四连被敌人抓俘去50余人。此时四连长立即报告给苟团长，苟团长命令四连立即撤出战斗、调整部署，研究战术准备再攻。

据王秉璋将军传一书描述，鹅鸭厂战斗中敌人有四个营兵力，还乡团和便衣队、人有千余，装备精良。此时的苟团长连夜召开指挥部作战会议，发现侦察敌情有误，不是四个连、还乡团中队、便衣队等。这一夜零星战斗不断，但是敌我双方进展不大，由于黑夜只看到敌人在村东有一处高层建筑，向我军阵地用机枪扫射。据我采访的鹅鸭厂村张士恩讲，这一高层建筑就是李家土楼，让敌人的团部给占领了，易守难攻。经过一团细致侦察摸底，确定敌人果然有千余人，大部敌人在村东部及东南角。针对这一紧急情况，凌晨苟团长立即报告给独一旅前指请求二团增

援，随即苟团长派侦察排长骑快马接应驻防在张坊村的张心田团长。

据鹅鸭厂村张士恩老人讲，1947年6月23日上午，村里只要是十岁以上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一天，正值收麦，又是端午节，因打仗村里人谁也没心思过节。23日早晨，张心田团长接独立旅前指命令，除留守一营及侦察排和团部后勤人员继续监视阻击孔坊之敌外，二营营长赵宝元、三营营长刘玉清随张心田团长立即上马飞速的直奔鹅鸭厂村。上午8点半张团长很快就到达鹅鸭厂村西（田庄），见到苟团长，张团长第一句话说：“大哥你说怎么打？”苟团长讲：“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把这股蒋匪消灭掉！”（苟先学团长是红军优秀的军事干部，张心田团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他们俩人在湖西军分区时就是老搭档。）

二团两个主力营急行军25华里，上午10点前到达鹅鸭厂村。兄弟主力营的到来，使得一团指战员信心倍增，经过苟团长与张团长的重新部署，我军实施全村包围进攻重点。由于天气闷热，苟团长与张团长把上衣一脱，光着膀子提着手枪，来到了前沿阵地亲自指挥。

下午4时，我向敌发起第二次攻击，在一团迫击炮连的猛烈打击下，我军飞速地攻破交通沟。龟缩在暗体内的敌人看见我军步步逼近，拨腿就跑。我指战员全部冲入敌阵，将村内敌人分割包围，与之展开白刃战。晚8点我军攻克村内防线并且向纵深与敌发生巷战。此时我独一旅首长又命三团除一，二营留守阻击来自黑虎庙的敌五十五师特务营外，有三营营长王月瀛、营教导员于军带领快速赶到鹅鸭厂村东南。一直战至夜间12点，我军将敌人全部压缩到李家土楼院内，并展开了政治宣传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可敌团副金克俊就是顽固到底。狂叫“顶住！

顶住！”妄想固守待援。午夜后，我军开始围歼残敌。迫击炮、重机枪齐射，扫向李家土楼团部，炮火摧毁了敌团部高层楼房。七、八连二、三营勇士们在炮火的掩护下攻击到李家土楼墙下，实施爆破。这时敌人乱作一团，敌一营长带残敌突围至村南方向，被我军追赶上包围全歼。除团副金克俊带残敌200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至凌晨5点战斗全部结束。

鹅鸭厂战斗彻底打乱了敌五十五师妄图阻止我刘邓大军南下的计划，为大军顺利渡河扫除了障碍，提供了保证。此次战斗，共俘敌130人，毙敌近400人，伤敌甚多。我军伤亡260余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500余支。被敌人抓俘去的我战士50余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被关押捆绑在一院内全部救出。鹅鸭厂村张士恩讲我军伤亡的大多是入伍的新战士，因为战术基础不牢，加之侦察敌情有误，导致伤亡数字增加。他讲牺牲的烈士多数是黄河北岸寿张县人（今台前县），当然也有阳谷其他县人。

据王秉璋将军传讲，冀鲁豫军区独一旅旅部，是6月27日秘密渡过黄河的。王秉璋司令员与军区为配合一纵围攻郟城，是29日在寿张县张堂渡过黄河的，比刘邓大军提前一天。这里要说明一点，据一等伤残军人周怀玉老前辈（寿张县西夹河村人）证实，他是1947年6月27日随独一旅渡过黄河的，并且我们新兵有两个营的兵力。到了梁山我补充到了二团二营，有的补充到一团，这充分说明独一旅在寿张县境扩充兵员是两次。

谁打响了战略反攻鲁西南战役第一枪，显然是冀鲁豫军区独一旅一团苟先学团长，二团张心田团长，还有三团三营。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在一纵全歼郟城守敌之后，王秉璋司令员命令独一旅，独二旅于7月中旬至下旬为配合刘邓大军血战羊山集。他们在金乡万福河英勇阻击国军七十师，国军六十师，

阻击了九天十夜，又将前来增援的国军五九五团全歼！由于独一旅战绩突出，为羊山集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受到刘邓首长通令嘉奖！

（作者简介：王德生，见前文）

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 难忘刘邓大军强渡黄河

——老船工王怀信讲述亲身经历

特邀撰稿人 杨宝章

在河南省台前县，90岁高龄的王怀信，是迄今唯一健在的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时的老船工。当笔者如约来到老人居住的民房时，老人已经在屋门口坐等多时了。老人的儿子说，知道我们要来采访，老人家早就等不及了，不停念叨着要讲什么。

### “非兵”

王怀信老人说，1947年的时候，他23岁。当时他们家就在现在的“将军渡”附近，那时不叫“将军渡”，叫孙口，是个渡口。说是个家，当时也就是在黄河河滩边上搭个棚子，在河滩里种点庄稼，平时以摆渡为生，黄河水没个准儿，滚来滚去，一涨水棚子就被冲走了，是居无定所呀！

有一天，曾司令来了，要他去当“非兵”。

什么是“非兵”？笔者很不理解，同去的当地同行“翻译”说，“非兵”就是“水兵”，也就是船工，当地方言，常把“水”念作“非”。

那“曾司令”又是谁呢？

台前县档案馆提供的一份资料中显示，这“曾司令”就是当

时设在这里的“黄河河防指挥部”的司令曾宪辉，是专门负责刘邓大军渡河准备工作的。“黄河河防指挥部”下设7个大队和1个独立营，四大队和独立营驻防孙口。

笔者问老人家，怎么当上“非兵”的？

老人说，当“非兵”是有条件的，曾司令说，要不怕死，还得年轻，能摆渡、会凫水才行。他从小生活在黄河岸边，抛锚划桨、推舵使船都会，就被选上了。当了“非兵”就是当了兵，管饭，发饷，跟正规部队一样的待遇，还全家光荣。全村那么多人，只挑了30个。老人感慨：“唉，都死了，30个人现在就剩下我了！”老人还说，他年轻的时候，浑身是劲，很能凫水。当“非兵”是有规矩的，穿着统一的衣服，晚上也不能回家，啥时候下河，啥时候摆船，都得听使唤，还经常操练，练划船、凫水。

### 渡船

说到渡船，王怀信老人说，老百姓家里的老船，早被国民党军破坏了。解放军用的渡船，大多是后来新造的。新造那个船，大的一次能运一连人，最小的也能坐十几个人。他们“非兵”专管摇船，最大的船上有10名“非兵”，一般一只船上有六七名“非兵”。

当时，在台前县先后兴建了十里井、林楼、张堂、孙口、毛河（后移陈楼）5处造船厂，沿黄河10里以内的群众主动把自家的大树砍伐，运送到造船厂。在孙口附近兴建的造船厂规模最大，开始设在毛河村后树荫下，刚刚施工，就被国民党军的飞机发现目标，盘旋轰炸，造船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设备迅速转移到面积大、树木茂密的陈楼村西林带里，继续施工。造船工人们风餐露宿，生活极其艰苦，但情绪却十分高涨。陈楼造船厂制造的长8丈5尺、宽4丈的平头

## 台前

“大1号”船竣工了，船厂举行庆贺典礼（1947年7月4日夜，刘、邓首长渡河时乘坐的那只“爱国号”平头大木船即陈楼造船厂制造的平头“大1号”船）。自此一只只大船陆续制成，陈楼造船厂共造船28只，均按长、宽和面积的大小，依次由1号排到28号。与此同时，台前县境内其他造船厂也在紧张工作，先后制造出一只只大船，全县共造120余只大船。这些大船一船可渡一连人、5辆汽车。

老人对拉船记忆犹新。他说，船造好了，离那个渡口好远呢，几里地，得往那里拉，费劲儿！他说，当时肩膀都让绳子磨出了血！原来，造船厂船造好后，要运到各渡口，由于途中无水，旱地行船，极为困难，全体干部群众都参加了拉“旱船”，在拉船的途中，还经常碰上国民党军的飞机轰炸，尽管如此困难，但军民协力把一只只大船按时运到各个渡口。

### 先锋船的“非兵”

对于自己能够成为先锋船的“非兵”，王怀信老人尤其感到骄傲。他说：“1947年6月30日晚上，刘邓大军开始渡河。王克保、王子亮、丁土工、肖广存和我划一条船。这条船可是先锋船，走在最前头。我们这5个人，都是挑选出来的，得有胆有识，不怕死才行！临出发的时候，曾司令拍着我的肩膀问我怕不怕，我说不怕，人在船在！那时候，黄河比现在水大，水面也宽，我们的船快到对岸时，与岸上的国民党军打起来了，还没靠岸，船上的解放军都跳到河里往上冲，天很黑，我们猫着腰，使劲划船，船头上解放军的机关枪‘啷、啷、啷’往那边岸上打，解放军在河对岸还往这边河沿上打着炮，国民党军就都跑了，解放军很快把这边的河岸占领了。排长发了那个白色信号弹，那边的人看到后，渡船一齐出发渡河。那一夜，光我们这条船就往返

了6趟。”

关于刘邓大军在台前孙口渡河的情景，台前县档案馆馆藏的一份资料中有这么一段话：“6月30日夜12时，指挥部下达渡河命令，二纵先遣部队首先在孙口强渡，严阵以待的水

手们从船坞中将隐蔽的船只推出，先遣连的勇士们登上12只木船，船头上架起机枪，精神抖擞，竞相行驶，12只小船像离弦的箭，急速地向南岸驶去，敌人发觉后，猛烈阻击，先遣队猛烈地予以还击。此刻，北岸掩护部队的大炮，也瞄准对岸国民党军队的滩头阵地进行轰击，在掩护部队炮火的掩护下，水兵们冒着对岸敌人炮火的阻击，驾船强渡，有的负伤后不顾生命危险，包扎伤口后继续快速划桨，快速驾船往前冲，不到一刻钟将先遣部队某部四连送到对岸。先遣队还没等船靠岸，即下船趟水，直冲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阵地，国民党士兵抱头鼠窜，战士们登岸后立即控制了国民党防御阵地的火力，继而攻破严密布防的地堡群，为大军南进打开了通路。与此同时，黄河各渡口舟楫竞发，一纵队在东线张堂一带、六纵队在西线李桥一带实施大规模渡河作战（三纵队为预备队，后在孙口、林楼、李桥渡河），一夜间国民党部队精心设防的自诩足抵40万大军的黄河防务，全线崩溃。”

我们从这里可以进一步印证老人所讲的情况。

笔者问老人，见过刘、邓首长没有。他回忆说：“1947年7月4日晚上，曾司令那晚和很多人一起坐这条大船过河，天黑人多，我们只顾着划船，过河以后曾司令才告诉我们说刘、邓首长刚才已经过河了，我们这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乘我们这条大船过的河！”

### 被炸受伤

当笔者问到先锋船上其他4名“非兵”的情况时，老人很悲

## 台前 王怀信

戚，同时掀开衣服，露出自己胸口上的伤疤。他说：“他们都死了，被国民党军的飞机炸死的！我也受了伤！”接着，老人描述了被炸的经过。

他说：“那一段时间，我们‘非兵’都是夜里摆船，白天睡觉。有一天，我们5个人正在房间里睡觉，突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轰炸，把我们睡觉的那个房子炸塌了，我命大，当时也受伤了，流了不少血，晕过去了，救援的人用担架把我送到了医院”

记者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王怀信老人参加了黄河航运工作，在台前交通局航运公司工作至1983年10月退休。

（中国档案报/2014年/9月/1日/第003版档案与社会）

## 后 记

统编本书，感慨万千，掩卷深思，感恩在心！回望发生在台前大地上的那段激荡的红色历史，我们深感这是台前特有的精神财富。

正如书中所载，我们的前辈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在台前这块热土上，谱写了感天地、泣鬼神的动人华章，书写了值得我们台前人骄傲的红色历史。作为我们党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这种红色记忆记载下来，传承下去！用心灵的笔触，书写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台前红色文化、红色经典。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职责和使命，我们责无旁贷，唯如此，才无愧于无数先贤志士，无愧于时代。

我们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是在为党树碑、为人民记述历史，这也是和他们心与心的交流、灵魂与灵魂的碰撞。战争的硝烟渐渐散去，岁月的流失渐渐尘封了这些并不遥远的往事！

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今天的我们处于和平时期，虽没有战争年代那种枪林弹雨、生死存亡的考验，但如果我们失去了理想和信仰，我们同样会失去前进的动力，迷失前进的方向！

因此，我们不能、不敢、也不会忘记革命先辈们的创业艰、之险、之难，让自身肩负的使命成为融入我们灵魂的一种满腔激情、一种执着信念。

## 台前

因此，我们满怀敬畏之心，尽力将那些流动的、随时会飘散在时间天际的革命事实凝固下来，用真实还原这段历史，呈献给读者，让这段历史变得立体、丰满、可靠。希望透过这些文字，让我们深深感受到革命先辈们那些有名的还是无名的英雄们，那坚定的革命信念，感受到那个年代澎湃的革命激情，让这段红色历史成为我们前进的不竭动力。

滔滔黄河，奔流不息；巍巍金堤，绵延逶迤；历史无言，革命精神不朽；时光荏苒，英雄浩气长存！

责任编辑：崔凌霄  
封面设计：靳红波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